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彭树智

ZHONG DONG GUO JIA TONG SHI

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王新刚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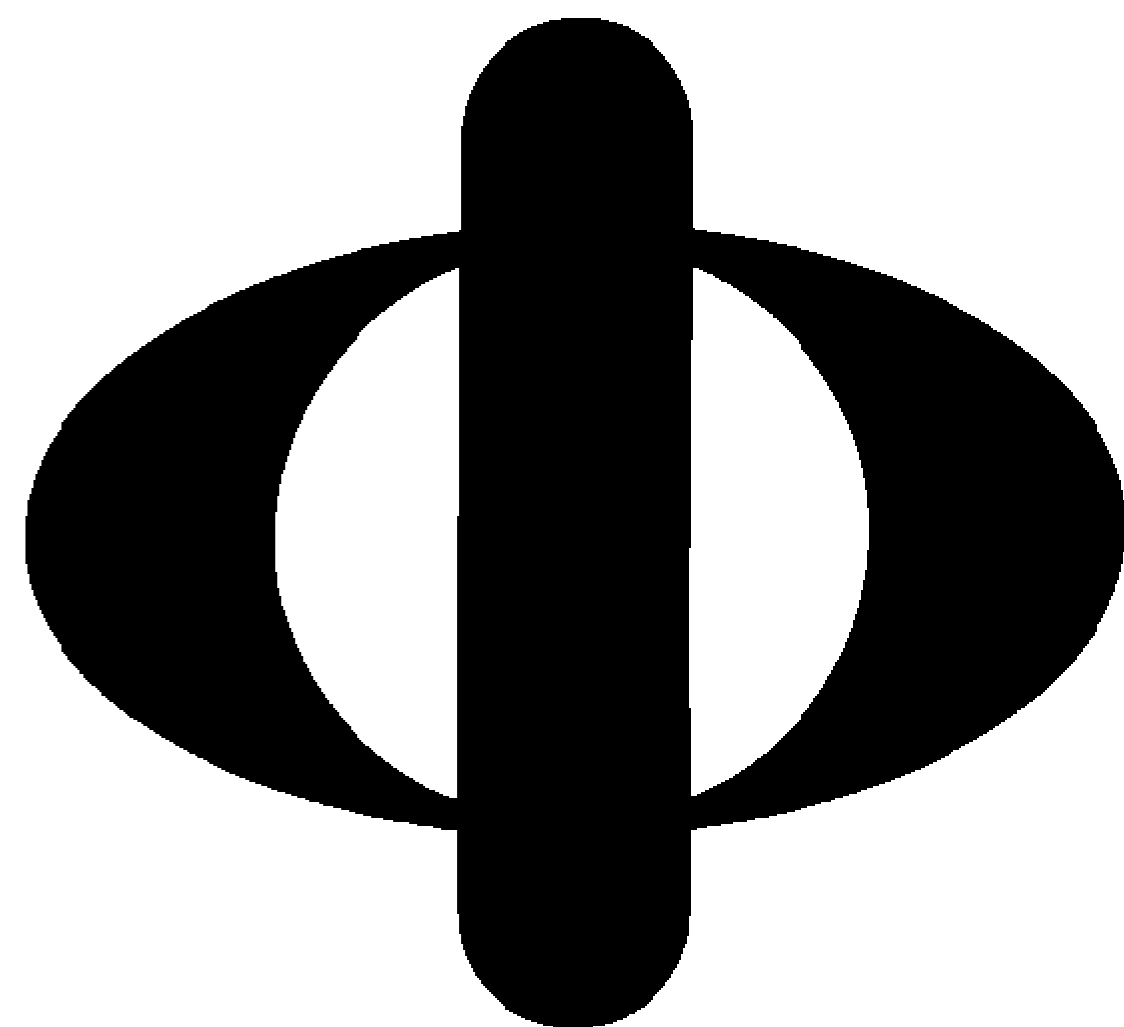
XU LI YA HE LI BA NEN JUAN



商务印书馆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彭树智



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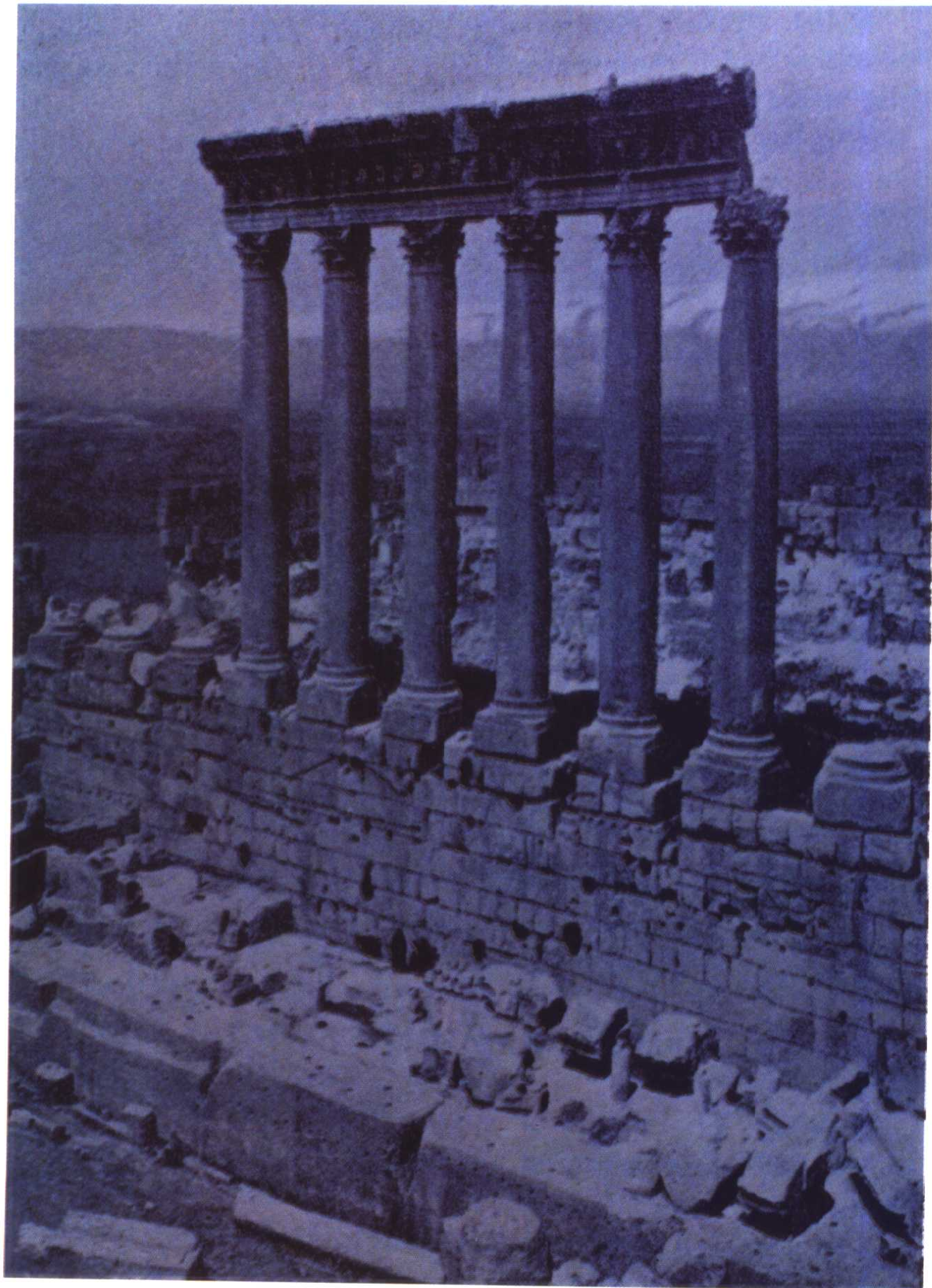
王新刚 ▷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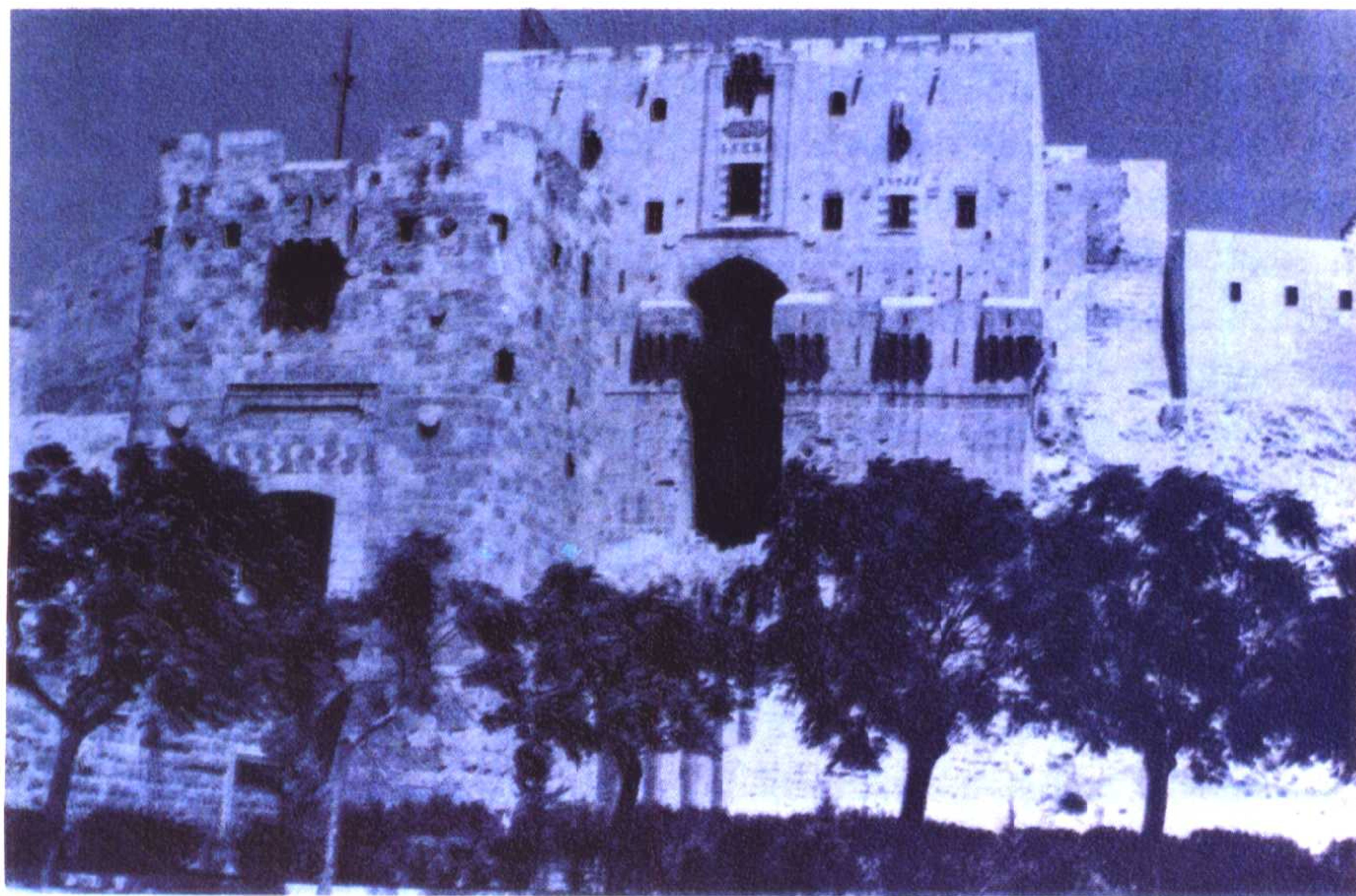
古叙利亚的塞姆人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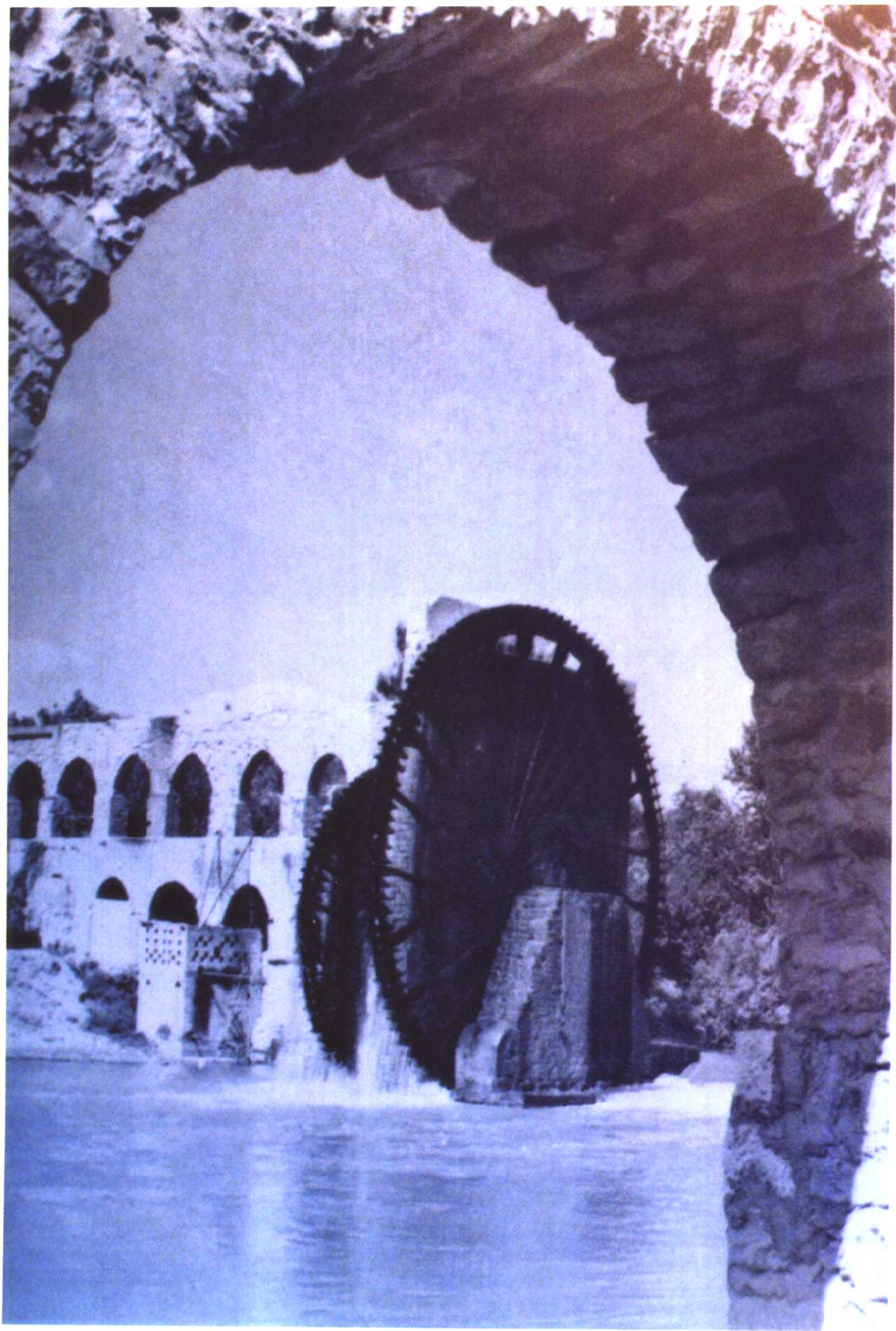
黎巴嫩巴勒贝克古城堡遗址



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遗址



叙利亚阿勒颇古城堡



叙利亚哈马古城古老的水车



费萨尔亲王1918年10月在大马士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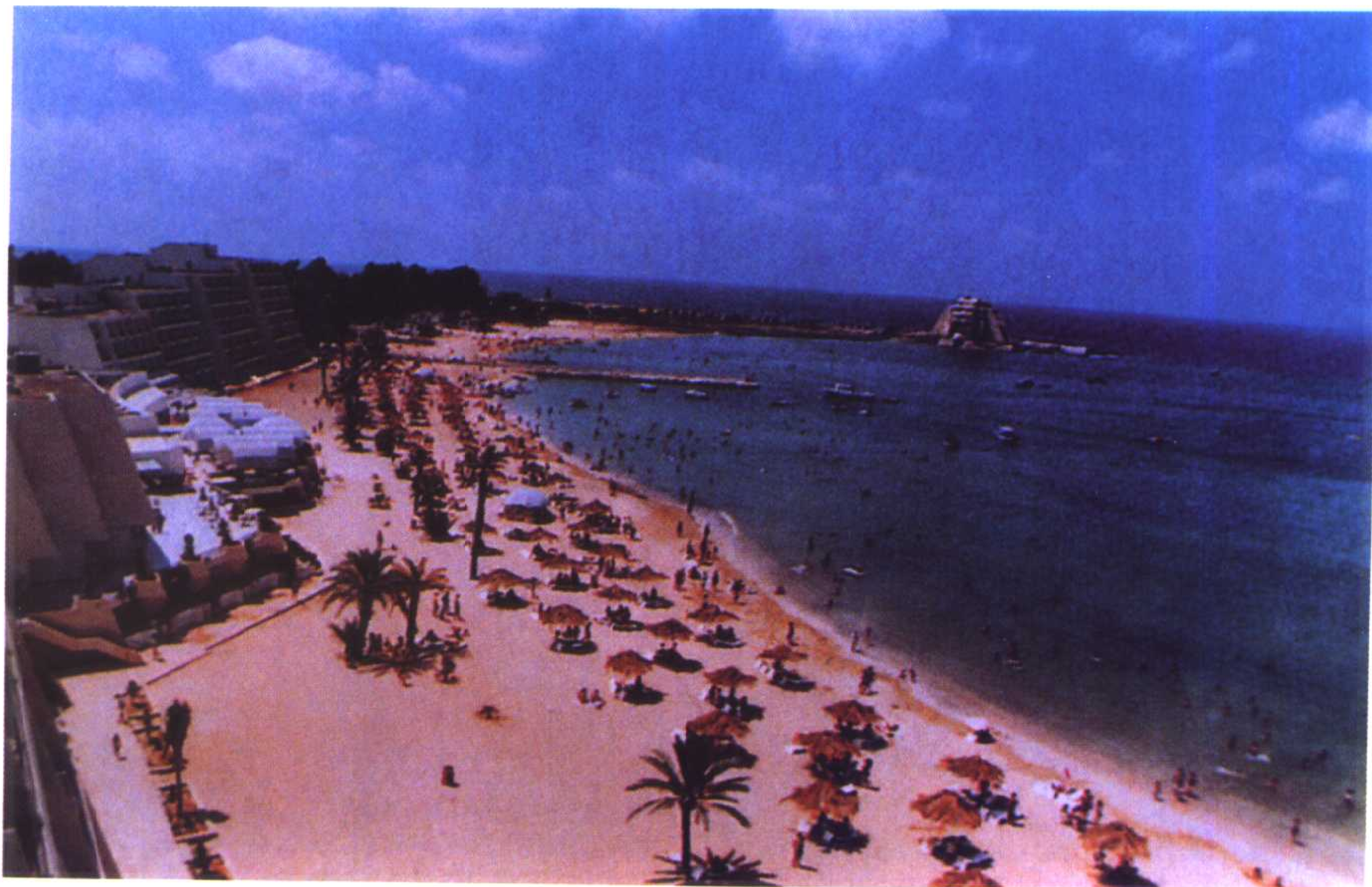
黎巴嫩腓尼基人古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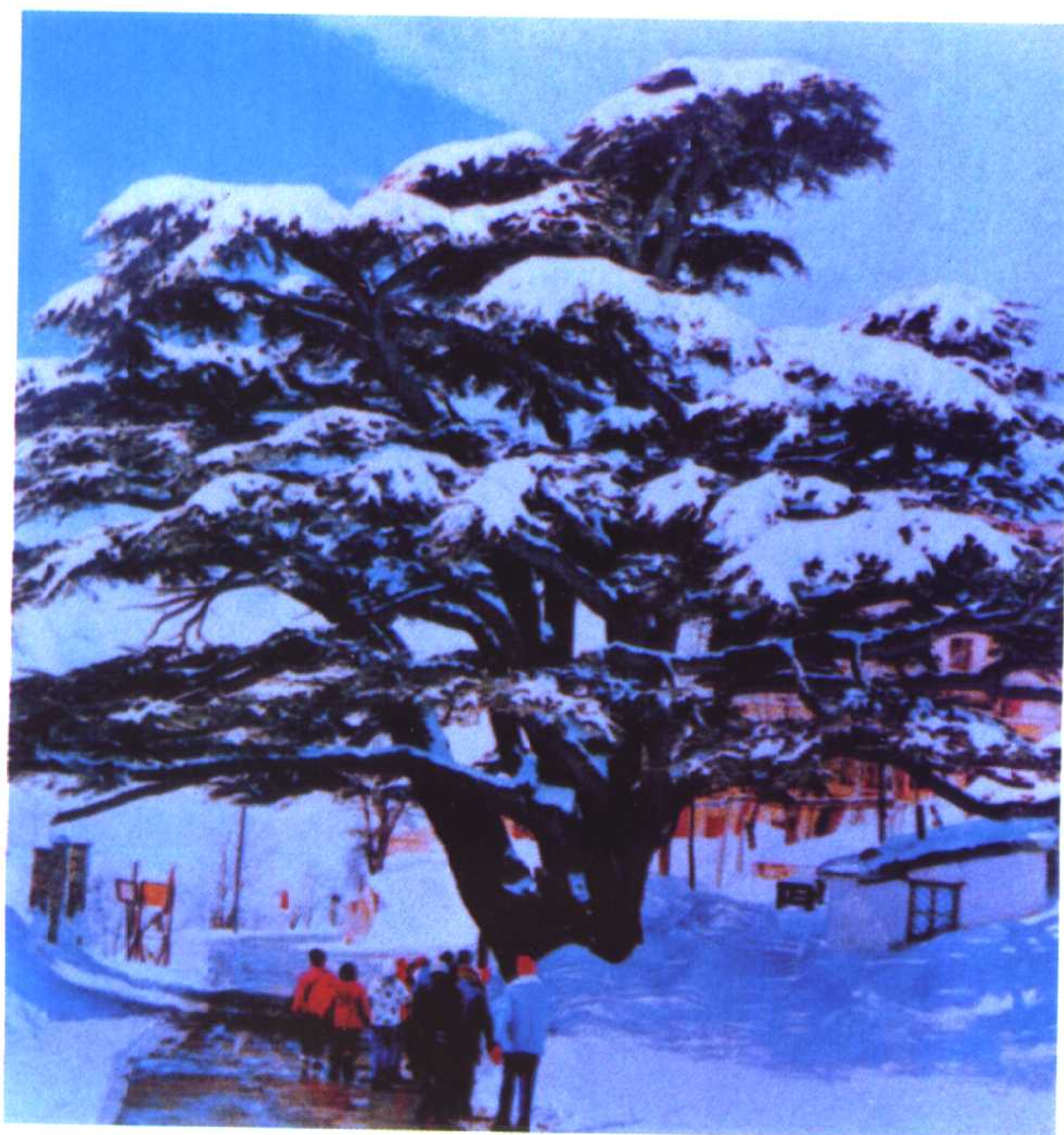
叙利亚著名政治家、前总统（1943—1949、1955—1958）舒克里·库阿特里



叙利亚军队在“十月战争”中



叙利亚拉塔基亚海滨旅游胜地



黎巴嫩雪松



叙利亚阿萨德总统在人民议会发表演讲



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课堂一角



叙利亚大马士革市旧城全景图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

彭 树 智

我在写《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的时候，想到1964年翦伯赞先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的讲话。他说："凡搞通史的人，似乎都懂得一些历史事件。但搞通史有搞通史的任务，所以对历史上的不少考证，必不可少地要依靠对个案深入研究者的劳动成果。我们搞通史的，向来尊重搞断代的，或搞专题研究的。"

这是指中国通史而言。对于世界地区通史，国家通史个案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础工程。中东地区国别通史，同样是中东通史的基础。用文明交往论对中东各国通史进行个案研究，既包括断代，又包括专题研究，更主要地是在综合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从而理出发展的总脉络。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十三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以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在每卷之前，均列叙意如下。

一

现代中东国家体系由整个亚洲西部和北非的埃及共18个国家组成。这个国家体系是《中东国家通史》所述说的范围。

根据完稿计划先后顺序排列，《中东国家通史》包括以下各卷：

1.《阿富汗卷》;

2.《沙特阿拉伯卷》;

3.《以色列卷》;

4.《伊拉克卷》;

5.《也门卷》;

6.《巴勒斯坦卷》;

7.《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8.《伊朗卷》;

9.《土耳其卷》;

10.《埃及卷》;

11.《海湾五国(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卷》;

12.《约旦卷》;

13.《塞浦路斯卷》。

二

《中东国家通史》编写的要求如下:

各卷篇幅约为20-25万字,全书约为240-300万字。

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阐明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通古今之变"是全书努力追求的目标。

各卷遵循的学术风格是以"以一贯之"的原则,即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注重"关照现实"与"反思历史"的一致性。

各卷强调各国的综合性特征,它既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

实，也包括宗教与民族、自然与社会、人口与环境，还包括生产力水平，阶级关系、文化传统等等。

各卷一般不设注释。凡对主要著作及资料有必要注释时，可在文内或下页作适当处理；同时，在每卷后附有中外文主要参考书目五十种左右。

各卷恪守严谨、创新原则，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体现“自得之见”。

各卷力求做到专业研究与大众言说相结合，在“简要、清晰、易懂”的顺、畅、通、达的表达方式中，保持其学术性。

每卷末都有“编后记”。

三

《中东国家通史》采用国家通史的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从而区别于迄今为止的中东地区史著作的框架结构。

认识一个地区的整体面貌，从一般学习过程看，大都通过“一般”—“特殊”—“一般”的递进上升的认识路线。编写地区史，可以是按“大地区”历史发展的纵向编写的“一般”和“特殊”；它也可以是“大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横向编写的“一般”和“特殊”。

我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例如，1991 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和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国家简史》，都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写成的“大地区”纵横结合的通史。1992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则是“大地区”断代史的体例。1997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又从专题方面作了“大地区”通

史的写作尝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种各样的体例都有各自的优点。视角不同，呈现出的地区面貌便各有特点。中东国家通史这个视角的选择，最后的决断是出自1991年我对《阿富汗史》写作的尝试。这个尝试一方面使我感到我国对中东国家的历史知识较为零碎、较为片面，另一方面也很表面和缺乏深刻理解。像阿富汗这样的周边邻国，只是在发生了苏军入侵和旷日持久的内战，我们才去追溯它的历史根源，显示出我国中东领域学术研究的落后。有些国家已有几本阿富汗史，而我国竟然没有一本自己的学者写的有关著作。推而广之，其他中东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学术史和学科史告诉我们，对各国通史的撰著，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研究单位的学术队伍群体的研究水平，也是学科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阿富汗史》写作的尝试中，我还体会到，关注每一个中东国家的现状和历史，不仅可获得系统、全面、深入和厚重的历史知识及智慧，而且在理解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方面，具有一般“大地区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它可以把“大地区史”所忽略或省略的许多历史侧面，纳入读者的视野；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详细地占有材料，更具体和独立地分析历史问题；同时可以对一个个中东国家进行更集中、更具体和连贯性的理解。

《阿富汗史》的写作，也使我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以单纯的逻辑推理作为最后结论。这种历史真实不是以世界某个“中心”为出发点，推导出一个涵盖全体的公式及规律，而是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进而揭示历史真实。

此外，中东各国通史的撰写，对于各个中东国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内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会有系统理解，对于时间、空间的变迁和世代兴衰的更替会有理性认识，从而可以为中东地区史打下更厚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把中东地区各国的通史，集中于一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之中，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撰写的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按照多卷本编著要求，各卷作者都注意世界及中东的宏观背景，并用中观视角，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艺术、科技、地缘环境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这样，可以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丰富中东史的内容，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人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感、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作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通过以上对中东各国通史研究的分工合作，既可以保持每位作者在各自撰写的国家通史中的个人思想、风格的独立性，在体例和角度一致的前提下，各卷之间也可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

四

《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从理论线索上说，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1999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序言中，谈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时，曾引用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 – 1901 年）关于国家和文明交往的一段话。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述》中写道："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

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往越广，法律也越完备，从而感情越和睦，见闻就越广”。文明一词，英语叫作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

诚如福泽谕吉所言，交往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表现，是从血缘、等级的自然联系，进入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广泛社会联系。交往是文明之源，而国家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兴衰和更替，是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结果。

实际上，关于文明交往的理论与国家史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用工业文明、商品交换和武力使世界普遍联系，并把相对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时，已经作了更为系统精深的论述。在他们的视野中，文明交往是以国家为基地向全世界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进而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从而使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并把文明交往视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动力和发展的总线索。我们用这些观点，审视中东国家的历史，就会得出许多新的认识。中东是上古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尔后的伊斯兰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延续至今。不仅古典文明融入伊斯兰文明，而且希伯来文明仍在这一地区复兴。中东各国确有自己文明交往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通过各国发展所表现的，则更加异彩纷呈。《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可以说都是对中东文明交往和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个案分析。

从这些个案分析中，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人类文明交往过程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而生产实践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

往。具体而言,文明交往论有以下诸要点:

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四大部分。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和普遍的社会联系;

人类文明经历了远古、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之后,现在正进入当代时期。与这些时期相对应的内容为:原始工具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知识文明等等为特征的交往;

文明交往的工具——语言文字,是物质在精神方面表现的震动空气层的声音和尔后形成为文字的文明符号,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意识。这种口头和书面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交往服务的思维手段;

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各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文明交往既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人群、集团之间、地区之间,它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是科学技术及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古往今来,文明交往从来就是曲折复杂的过程。它既有和平形式,也有战争形式,不仅存在文明冲突,而且存在文明融合。只有保持开放和进取状态的文明,才能长存不衰,才能在已形成中的多元文明世界里确定自己国家的民族性文明的位置;

文明交往论是多极主体交往论。一国独霸或几国分霸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全球化发展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

反相成的双重内容，前者是整体性趋势，后者是主体间交往的平等性，必然的趋势是发展主体的多极化与平等化。

文明交往论是互动合作论。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过程中，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特别是今日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文明交往历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互动和多向因素的逐渐增强；

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文明交往的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在趋向上日渐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

文明交往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是怀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襟怀和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全面理解；

文明交往论所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对世界文明交往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现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包括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文明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在进程中表现为文明交替超越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再如，文明交往中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世界文明兴衰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总之，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进程，因此，从广义上讲，它是

一种历史交往。它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融会和综合。21 世纪文明交往是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更加深入化的时代。文明交往的主流是各种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共同发展。人们对文明交往的未来理应持冷静与乐观的历史态度,因为它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总的特征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以文明交往理论为线索,以文明交往的历史主线来贯通中东各国的内部和外部诸多联系,来沟通中东各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来会通各种交往方式,力图勾勒出中东各国的基本历史面貌和国情特征。

五

《中东国家通史》在关注中东各国文明交往活动的同时,也注重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各方面交往活动,为此在每卷的最后,都设有专章来集中叙述中国与该卷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联系。

这是撰写中东史的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事,也是对文明交往的另一个专题性历史个案分析,同时也是这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特色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就随之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不断增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逐渐复杂化,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交往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样,在古代世界中,特别在一些世界大帝国之间,就出现了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和一些国家关系体系,用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

在这些国家关系中，中国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交往很具有代表性。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以其“华夷一统”秩序原则，与中东地区各国进行了悠久广泛的文明交往。

早在汉代，中东地区就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交往的中介地区。当时与汉帝国处于同一古典文明等级、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同中华文明东西交相辉映，造成了古典丝绸文明交往之路的繁荣。但是，这两大帝国之间的文明交往的中介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波斯（伊朗）帝国和贵霜帝国更处于枢纽和前沿地位。汉王朝与波斯帝国和贵霜帝国之间是三强鼎立的平等友好交往。这东方三强，和西方强国罗马一起，合演世界文明交往四重奏，共同维护丝绸古道安宁与畅通的国际秩序。

到了唐代，中华文明之光，辉煌四射，和中东地区兴起的、地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彼此吸引、互相交往，同时也发生冲突，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合作。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交往，是中国在中东对外交往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国际文明交往史上的重要篇章。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两大文明，都各自在营造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它可分别称之为“华夷一统”与“阿拉伯伊斯兰”秩序。这两种秩序此消彼长，终于随着751年（唐天宝十年）怛逻斯之战唐军失败而使“华夷一统”秩序在中东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代之外，基本上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呈守势或防御性攻势的状态。

但是，民间的文明交往，商旅、教旅和文化交流，却通过各种渠道，时多时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进行。这些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越了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特别是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扩以后，中国和中东各国经历着共同的遭遇，

人民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与联系。所有这些，同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交往一起，成为今日中国与中东各国平等、友好、合作的历史基础。

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我编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忽然想起了马克思这段至理名言。我今年已六十有八，是"坐六望七"之年了，放着轻松不享，却要耗费心力去编写这样大部头的书，莫非忘记了年龄，要"入地狱"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七十虽说不稀，也已是老龄阶段的第二个十年了。要说"入地狱"，早该到了"入口处"了。不过，马克思把"科学入口处"比作"地狱入口处"，那是指但丁《神曲》中所描述的由面对现实的"地狱"，经过苦斗的"炼狱"，从而到达理想"天国"的科学韧性追求，其实质是一种奉献精神。惟有奉献，而后方有求实、求真、求是、批判的科学信仰和科学态度与方法。因为科学就是艰辛的创造性事业，它最需要的就是奉献；科学的核心就是奉献人类，奉献社会。

1993 年 3 月 12 日，我在《阿富汗史》的跋语中写过："《阿富汗史》是西北大学南亚中东史博士点拟议中的中东国别史丛书中的第一本。列入计划的还有土耳其、海湾五国、也门、以色列、埃及等国。不料第一本书就遭受磨难，使人慨叹不已……"。在跋语中，

我坚信有历史学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不会被短见所惑。盛世修史，修史资治，普及和提高历史素质，实在是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所必需。我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的话，正好同马克思的"入地狱"比喻意相贯通。在跋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中国学者撰写的系列《中东国家通史》，必将和外国作者的同类书籍并列在我国图书馆的书架上，供莘莘学子们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意识、获取历史智慧、探求历史启示和提高历史素质之用。"

《中东国家通史》似乎应了中国一句名言：好事多磨难。屡经磨难的《中东国家通史》，终于有幸逢遇西北大学进入211工程的良好时机！1997年，它被列入211重点课题项目，被作为标志性成果而给予资助。陕西省"三五"人才建设基金办公室也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把这部近三百万字的《中东国家通史》，列入了选题。我真的宿愿得偿，要"入地狱"了。"入地狱，写中东史"，成为今后四年奉献自己心力的行动口号。

最近我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名叫《活出意义来》的译著。它是奥地利精神病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名著。过去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时，有一种消极的、但又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以苦为乐。如果从这种消极意义上理解"入地狱"，那是很难振作科学精神的。维克多·弗兰克则从积极方面，深刻地指出，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原因，在于"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虚"。人们应当为生命找出意义，特别是要找出某一时期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这就是他的独特着力点。请看他的精彩论述：

"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天

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他具体地去实现。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维克多·弗兰克所讲的生命真谛，启示着科学奉献精神。具体的时间段，是成就事业的关键之处。时光稍纵即逝于各具体时间段中。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寿命的长久，而在于为人世间付出多少；不在于一时的豪言壮语，而在于持续实践具体时间中的具体任务。今日事，今日毕。时时克尽做人的本分，于工作中得到快乐，这才是最幸福的人生！正如他所说，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生命的具体意义，自然容易笑对人生，以乐观的现实态度，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而负起最大责任。这完全是从积极方面、进而把生命的意义具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入地狱，写中东史”，就成了一个科学奉献的积极行动了。

在这里，我引用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序言的结束语，以表明自己的心情：

“我们治阿拉伯史（包括中东史）的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荏苒光阴书边过，花苍白发镜中来。我已‘坐六望七’之年，但心境未衰，体力尚健，学志犹在，追求未了。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许多已经创造了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理应多增添一些新成果。我正在主持编写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是《阿拉伯国家简史》的姊妹篇，也是我老来在世界上再留点东西，为中东学再添几块砖石的心愿。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

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史学前列。”

《中东国家通史》的写作始于1997年，终于2002年，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产品。我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面向新世纪，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

根绝一切犹豫，排除任何怯懦，找出生命的具体意义，走“入地狱、写中东史”之路吧！

1999年9月9日写成

1999年12月15日修改

目　　录

Contents

绪论:叙利亚、黎巴嫩概况

一、古老土地上的现代国家叙利亚

地理、人口和新旧合璧的城市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简称叙利亚,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北靠土耳其,东南邻伊拉克,南连约旦,西南与黎巴嫩、以色列接壤,西与塞浦路斯隔海相望,海岸线 183 公里,面积 18.52 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以色列占领下的戈兰高地约 1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领土大部分是西北向东南倾斜的高原。按照地形特征,叙利亚可分为 4 个地形带:地中海沿岸平原;从此向南与海岸线基本平行的山区和高原;内陆平原,其中包括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哈塞克、德拉等大中城市;东南部是与约旦、伊拉克相连的荒漠地带。叙利亚沿海和北部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南部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四季分明,沙漠地区冬季少雨,夏季炎热干旱,气温有时高达 48℃。全国气温一般比较温和,年平均气候在 18℃ 上下,年平均降水量沿海地区为 1000 毫米以上,南部地区仅为 100 毫米。总体而言,除东南部荒漠地区外,叙利亚自然环境良好,特别是与西南亚其他国家相比,

它的气候及地理条件相对优越，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

根据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提供的数据，1998年叙利亚人口为1700万。阿拉伯人占80%以上，另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切尔克斯人、土耳其人等。85%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什叶派中阿拉威派占75%。14%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此外还有极少数犹太教徒。阿拉伯语为国语，政府部门及上层社会法语和英语较为流行。

叙利亚全国行政区域划分为13省和一个自治市。大马士革为自治市，13个省分别为：德拉省、德尔祖尔省、大马士革省、阿勒颇省、哈马省、哈塞克省、霍姆斯省、伊德利卜省、拉塔基亚省、库奈特拉省、腊卡省、苏韦达省和塔尔图斯省。重要城市有首都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哈马、腊卡、德尔祖尔和德拉等。总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分别是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前者为322万，后者为154.2万(1996年)。

首都大马士革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城之一。早在公元前2600至前2400之间，大马士革就已经建立。公元前19世纪，阿拉米人曾在此建立沙马尔王国。公元前9世纪左右，为了争夺对商队贸易的控制权，以色列王国与亚述帝国经常互相争夺，直到公元前732年，亚述帝国征服大马士革。此后，大马士革又受到巴比伦、波斯的统治。公元前62年，大马士革落入罗马人之手，成为罗马帝国叙利亚州的一部分。东罗马帝国时期，大马士革成为基督教的主教区，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公元636年，大马士革被阿拉伯人征服。从公元661年到750年，成为伍麦叶王朝的首都。伍麦叶王朝历代哈里发都在大

马士革留下了气势恢宏的历史性建筑。特别是瓦利德哈里发酷爱建筑艺术，他从罗马招聘能工巧匠，投入巨资，历时 10 年，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伍麦叶大清真寺。该寺在 14 世纪被帖木儿所毁，后由阿拉伯人重建，1893 年曾遭火灾。修复后该清真寺当年的雄姿虽已无法复原，但至今仍相当壮观。伍麦叶王朝时期的另一座雄伟建筑是闻名遐迩的哈里发宫，因其宫顶呈绿色又名绿宫。伍麦叶时代，大马士革是西亚地区的文化中心，伊斯兰世界第一座图书馆就建造于此。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翻译中心也坐落在这里，大批罗马书籍和学术文献在这里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阿拔斯王朝时，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巴格达，大马士革成为地方城市。13 至 16 世纪，大马士革沦为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区。阿拉伯帝国艾尤卜王朝时，大马士革因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抗击十字军而闻名天下。萨拉丁于 1193 年去世后葬于大马士革，他的陵墓就建在伍麦叶清真寺以北的阿齐兹耶学校内。马木鲁克王朝奠基人扎赫拉·贝比亚的陵墓也在大马士革，如今改建成为叙利亚国家图书馆。

今天的大马士革分成两个毗邻的区域：旧区和新区。旧区在巴格达河右岸、古城墙内外地带。该区保留千余年来的传统面貌，两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是旧区的主要街道，大街两旁店铺鳞次栉比，绝大部分保留着古老的阿拉伯建筑古朴典雅的风格。两街之间有一条短街，叫哈米迪亚市场，是旧区繁荣的商业中心。

城墙外向南、北、西三个方向伸展的地带为新区，区内街道宽阔，两旁建筑新颖，政府各办公大楼、各级星级饭店、大小公司、各种商店、餐厅、咖啡馆、电影院、图书馆等沿街而建。新区内还有国民议会大厦、全国最高学府大马士革大学、国家博物馆、现代化的

体育场馆、阿拉伯科学院、科研机构和外国使领馆等。在郊区建有新的工业区,电子、发电、机械、石油、化工、纺织、轻工、食品等工厂林立。

大马士革居民中绝大部分是穆斯林,也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城中有不少与《圣经》有关的历史古迹。大马士革今天仍然是西亚地区的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铁路北通土耳其,西接黎巴嫩,南连约旦、埃及和沙特。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中继站。

叙利亚第二大城市是享有"古代文明之都"美称的阿勒颇。该城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3000年,阿拉伯半岛上的塞姆人支系——亚摩利人离乡背井,越过浩瀚的沙漠来到阿勒颇周边地区,建立了亚莫鲁国。阿勒颇曾屡遭邻邦和外族的侵略,塞琉古王朝期间,又沦为马其顿的殖民城市。公元637年,阿勒颇被阿拉伯人征服,10世纪时,成为穆斯林对付拜占庭人的前卫基地。虽然曾一度受到十字军的包围,但最后还是将其击退。1261－1516年,阿勒颇处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之后又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1920年,法国托管当局一手筹划,建立了所谓"阿勒颇国"。3年后,这个国家被废除。

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阿勒颇古城的一大财富。一些古代建筑虽经战乱破坏和岁月侵蚀,但依然雄伟壮观,吸引着许多国内外慕名而至的游客。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屹立在市中心、闻名于世的阿勒颇古城堡。这座古城堡原是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的神庙,与阿勒颇城一样的历史悠久。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起,神庙改建为坚固的卫城和军事要塞。此后的千百年中,城堡不断加固和扩建。迄今保留下来的城堡是公元13世纪艾尤卜王朝时期建立

的。古城堡内保存着各个时代的历史遗产，不少风云人物在这里创造过惊人魂魄的业绩。阿勒颇古城堡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而且也是当地居民战时的避难所。随着时代的变迁，阿勒颇古城堡已逐渐失去其原来的军事价值。如今，人们把它视为古代文明的象征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叙利亚独立后，古城阿勒颇重放异彩，如今已发展成为叙利亚北部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这里的化工、纺织、印染、水泥、皮革、烟草和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在全国占有相当比重。自古以来，阿勒颇就是地中海沿岸和东方各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纺织、食品、皮革等手工业以及农产品、传统工艺品的交易中心。20 世纪 70 年代初，政府为了加速民族经济的发展，在阿勒颇建设了一个 100 万平方米的工商业自由区，该区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了阿勒颇工商业的发展，使该市更为繁荣和兴旺。

风光旖旎、四季常青的历史名城拉塔基亚是叙利亚最大的现代化海港城市。早在古代腓尼基人时代，拉塔基亚就是商船的集散地。它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名叫"劳狄西亚"，到拜占庭和十字军时代逐渐衰落。拉塔基亚位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海岸线的中心，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20 世纪初期，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叙利亚后，为了掠夺和扩张，对这里的港口进行了整修和扩建。独立后，叙利亚政府对港口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拉塔基亚港口获得新的发展。50 年代初政府对港口进行大规模扩建，70 年代初再次扩建，海港规模再次扩大。

拉塔基亚海滨平原土壤肥沃，雨水充足，农业发达。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棉花、烟草、水果等。这里的工业主要有烟草业、净棉、榨油和水泥工业。拉塔基亚的内陆交通相当发达，有铁路和

公路与内地相连。因其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又是叙利亚的旅游胜地。

其他重要城市有霍姆斯、哈马、库奈特拉、德拉和苏韦达等。这些城市大多是历史名城，如霍姆斯在罗马帝国之前就已经存在。罗马人时代，霍姆斯又名耶梅沙，被并入罗马帝国。3 世纪时，城市十分繁荣，成为腓尼基利巴内希亚州首府。东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为单独的主教区。公元 1276 年，遭蒙古人侵袭后，该城迅速衰落。19 世纪后，霍姆斯成为前往黎巴嫩沿海特里波利的交通要道，从此又兴盛起来。今天的霍姆斯是黎巴嫩贝鲁特、叙利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公路和铁路的交会点，也是农产品的集散地。这里的纺织、食品特别是石油炼油工业发达。叙利亚东北部原油经输油管道送到霍姆斯精炼，然后再通过输油管分别送到大马士革、拉塔基亚和阿勒颇等大城市。哈马周围地区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区，哈马城又是商业交流中心。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当地的棉花、粮食和水果的种植和纺织、食品工业的发展。

库奈特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位于大马士革西南约 70 公里处的战略要地戈兰高地上，是叙利亚以戈兰高地为主的库奈特拉省的首府，曾是叙利亚西南部最繁华的城市，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由于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气候温和，库奈特拉是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了包括库奈特拉城在内的戈兰高地约 1200 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色列当局驱赶当地居民，毁坏了 144 个城镇、村庄和农场。1973 年 10 月，叙利亚武装部队在“十月战争”中英勇作战，一直推进到库奈特拉城下。1974 年 5 月 31 日，在美国调解下，叙以

双方达成戈兰高地停火和脱离接触协议。然而,以军撤离前,对库奈特拉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以军用坦克、大炮以及推土机等夷平了城里的所有建筑,所有的学校、清真寺和医院被摧毁。90年代末,库奈特拉城的重建工作已初具规模。

古老的土地

今天的叙利亚是一个古老土地上的现代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现代叙利亚国家建立之前的数千年文明与历史演进过程中,叙利亚(Syria)一词不是一个国家称谓,它所展示的内涵是渊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灿烂悠久的文明交往的土地。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讲,历史上的叙利亚一词所特指的范围主要涵盖亚洲西部南起西奈半岛,北到陶鲁斯山脉,西起地中海东岸,东到叙利亚沙漠这一广阔的区域。它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土耳其南部伊斯坎德伦(即叙利亚称之为亚历山大勒塔)等地区。这些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陆续获得独立,除巴勒斯坦之外,它们均成为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的一分子。然而只有今天的叙利亚沿用"叙利亚"这一古老的称谓,使"叙利亚"这一古老的称谓由一个数千年来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概念的词汇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现代民族独立主权国家的名称。而这一名称下的国家所涵盖的领土和疆域与历史上的"叙利亚地区"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之间的地理概念与疆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已不能肯定"叙利亚"(Syria)这一古老称谓的确切来源。"叙利亚"一词可能来源于"亚述"(Assyria),也可能来源于腓尼基城市提尔(Tyre)的塞姆语名称"苏尔"(Sur),还可

能来源于黎巴嫩山脉的古代名称“叙利昂”(Siryon)或“叙利安纳”(Siryana)等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这一古老的称谓在塞琉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312 - 前 64 年)已经开始通用。塞琉古王国因以叙利亚地区为中心,曾被称为叙利亚王国。此后罗马人统治时期,叙利亚一词被广泛使用。然而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及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很少使用“叙利亚”这一称谓,而是将地域广泛的古叙利亚地区统称为“闪姆”(al - Sham)。“闪姆”一词的含义也不十分明确,它可以解释为“北边”或“左边”。因为早期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在不同时期向半岛以北地区迁徙,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摩利人、迦南人及阿拉米人等由此向古叙利亚地区迁徙。由于是以半岛的方位为基准,他们是由右向左的方向迁徙。同时,按照汉志阿拉伯人的看法,古叙利亚地区与他们南边的也门地区相对是北边,因此“闪姆”一词既有“左边”的意思,也有“北边”的含义。不过自近现代以来,“闪姆”一词已经成为叙利亚地区的俗称,甚至今天的阿拉伯人时常把叙利亚称为“闪姆”,意为北部。由此看来,“闪姆”一词历经历史的变迁,其含义也在变化。

无论历史时代和疆域及其称谓如何变迁,今天的叙利亚依然是一个拥有 4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西亚地区除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之外,另一个人类文明的摇篮。在这里,最初的人类痕迹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这里出现一些独立王朝,如阿勒颇、卡特纳、卡克米希国等。公元前 1200 年左右,阿拉米人迁移至此。公元前 8 世纪,亚述帝国征服叙利亚地区,将其变为亚述帝国的附属国。公元前 612 年亚述帝国灭亡,新巴比伦帝国成为叙利亚的新主人。至公元前 538 年,波斯兴起,叙利亚又成为波斯人的领地。公元前 4 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经伊索斯战

役,大马士革被占领,从此开始了叙利亚的希腊化进程。在希腊人统治叙利亚300年之后,公元前64年叙利亚又沦为罗马帝国的属地,包括东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对叙利亚的统治持续了近600年。

公元7世纪初期,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公元636年雅尔穆克战役后,阿拉伯军队征服了叙利亚。从此,叙利亚并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叙利亚人的命运与阿拉伯伊斯兰紧密相连。公元661年至750年伍麦叶王朝时期,叙利亚成为统治西亚地区至西班牙广大区域的阿拉伯帝国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当地的叙利亚居民开始阿拉伯化,阿拉伯语得到普及。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帝国首都东移,叙利亚丧失了帝国中心的地位。此后,叙利亚地区形成了若干独立或半独立的王朝,并进入了王朝并起、争雄天下的混乱年代。11世纪至13世纪,叙利亚受到十字军的冲击,在此期间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建立的艾尤卜王朝是一系列独立或半独立王朝中声名最为显赫的王朝之一。它打败了法蒂玛王朝,抗击了十字军的进攻,统治了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到埃及的大片领土。13世纪后,叙利亚进入马木鲁克王朝统治时期,直至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叙利亚又于1516年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持续了400年之久,其间经历了西方殖民列强的渗透与争夺。在奥斯曼帝国日益走向衰落,在西方殖民者不断加紧争夺奥斯曼遗产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日趋高涨之时,叙利亚人民及其阿拉伯民族看到了独立与解放曙光。但是西方列强背弃诺言,致使叙利亚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与解放的理想破灭。1920年,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委

任托管制的结束。

现代的国家

1946年4月17日，叙利亚获得彻底独立。独立后，叙利亚成为中东现代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从此，叙利亚走上了巩固国家政权、发展民族经济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叙利亚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平坦。1948年5月，叙利亚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由于战败，国内政局更加动荡，经济也遭到破坏。1949年至1951年，叙利亚连续发生军事政变。195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反对政变领导人施舍克里独裁统治的抗议浪潮。施舍克里逃亡国外后，临时政府废除军事独裁法令，恢复了民主制度。1958年2月1日，叙利亚、埃及两国政府通过了合并和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决定。2月21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正式宣告成立。合并后，由于纳赛尔的集权措施等，引起叙利亚军队和人民的不满，1961年9月，叙利亚退出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63年3月8日，以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员为主的军人集团发动"三·八革命"，复兴党逐步成为叙利亚政坛的主导力量。1966年2月23日，复兴党内贾迪德为首的派别集团(后成为复兴党"文官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总统委员会主席阿明·哈菲兹，驱逐复兴党创始人阿弗拉克和比塔尔等人。1970年11月13日，以哈菲兹·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军人派"以"纠正运动"为名发动政变，改组党的地区领导机构，改组政府，重建国家政治制度，实施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1971年3月，经全民投票，哈菲兹·阿萨德当选共和国总统，并一再连任直至2000年6月10日逝世。阿萨德执政后，在调整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还注意调整经济政策，

实行有限的经济开放政策,注重私营经济的作用,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在阿萨德近 30 年的执政时期,由于睿智精明的外交策略,叙利亚赢得了中东政治外交大国的地位,国际威望显著提高。90 年代后,执政的复兴党注意团结全国进步阵线的各个党派,适度开放民主,推进经济改革。尽管 90 年代中期后,经济又出现困难,但政局保持稳定,特别是在经历了阿萨德去世这一剧烈的震荡之后,阿萨德的继承人顺利地接过了最高权力的接力棒,完成了权力的平稳交接。

叙利亚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它的经济体制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模式,国营企业是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和人民的基本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分配,对国民实行高补贴。1970 年阿萨德执政后叙利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但 1985 年后经济出现低潮,由于农业逐年歉收,特别是外汇短缺日益严重等因素,80 年代末叙利亚经济陷入危机之中。长期以来,由于同以色列对阵,军费开支庞大,因而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80 年代末,叙政府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了有限度的开放措施,积极寻求外援,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先后颁布了有关允许外国人入境投资的法令和新税务法等。同时,叙政府强调经济多元化,促进经济多方位发展,私营、合营经济在规模及数量上不断扩大。1991 年,叙政府颁布 10 号投资法,鼓励吸引国内外资金,投资于农业、工业和旅游等项目。截至 1996 年底,投资总额达到 86.19 亿美元。加之石油收入增加,90 年代中期前叙利亚经济逐步好转。1998 年,叙国内生产总值 7760 亿叙镑,约合 171.18 亿美元;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98 美元。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比重

分别为：农业 29.2％，采矿、制造、电力 22.3％，批发、零售贸易 19.2％，交通与通讯 11.9％。其他为：建筑业 3.7％，财政与保险 3.7％，政府行政部门 7.9％。

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强国之一。正规军总兵力：现役部队 31.6 万，预备役部队 50 万，分陆军（21.5 万）、海军（6000）、空军（4 万）和防空军（5.5 万）四大军种。另有准军事部队 40 余万。其中主要有宪兵 8000；警察约 2 万；情报特工 2 万；人民军基干民兵约 10 万。1946 年英、法撤军后，叙利亚于当年 8 月 1 日正式组建武装部队，同年建立空军，1957 年组建海军。阿萨德总统执政后，军费开支增加，军队发展较快，使叙军在火力、机动性和打击敌纵深目标等能力方面有很大提高，成为中东地区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1967 年"六·五"战争后，叙利亚提出了"全民战争"的口号。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叙利亚开展"全民皆兵"的国防教育。为此，叙利亚还成立了"革命和祖国委员会"，任务是对居民进行"提高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准备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国防意识教育。

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中国民素质较高、教育文化事业较为繁荣的国家。叙利亚政府历来重视教育事业，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家预算比例较高，1971 年占 9.7％；1980 年占 4.5％；1991 年占 9.1％。这个比例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名列前茅。据 1995 年统计，初、高中学校有 1894 所（包括中等专业学校 121 所），学生在校人数 845631 人，教师 47889 人。小学实行 6 年义务教育。全国小学 10079 所，在校学生 257.3 万，教师 106164 人。叙利亚现有综合性大学 4 所，即大马士革大学、阿勒颇大学、十月大学和复兴大学，包括 40 多个院系，在校学生约 17

万人。大马士革大学是其中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该校始建于1903年,现有教学规模、教学质量和师资配备等方面可与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开罗大学和伊拉克巴格达大学相媲美。该校现有医学院、药学院、牙医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电力工程学院、机械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法学院、伊斯兰经学院、教育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和经济学院等共15个附属学院,其中法学院历史最长,医学院规模最大。1995年大马士革大学学生人数超过9万。

叙利亚全国性阿拉伯文官方报纸主要有:《复兴报》、《革命报》、《十月报》。《复兴报》是复兴党机关报;《革命报》和《十月报》是政府官方报。另有《十月报》社出版的英文报《叙利亚时报》。叙利亚通讯社简称“萨那”(SANA)。1965年6月创建,是全国惟一的向叙各新闻媒介提供国内外新闻和新闻图片的国家通讯社。叙利亚广播电视总局是政府官方机构,下设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和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947年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创建。除在国内使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广播外,还使用英、法、阿、希伯来、西班牙、土耳其语等对外广播。1990年建立第二个广播电台——人民之声电台。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于1960年7月建立,分电视一台和电视二台。一台主播阿文节目,二台播发外语节目(英、法文等)。

二、雪松之国黎巴嫩

地理、人口和城市

黎巴嫩共和国是阿拉伯世界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位于亚洲西南地中海东岸。东、北部与叙利亚相邻；南部与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西濒地中海。黎巴嫩地形狭长，从东北顶端至西南角共长217.27公里，中部宽32.18－56.32公里。总面积为10452平方公里。黎巴嫩山纵贯全境。耸立在黎巴嫩中部特里波利东南方向的库尔内特—萨乌达山海拔3038米，为黎巴嫩最高峰；沿黎巴嫩与叙利亚边界向南伸延的赫尔蒙山海拔约2814米。黎巴嫩河流较多，利塔尼河是黎巴嫩最主要的河流，发源于贝卡谷地，向南折西注入地中海，全长140公里。奥沦河(又称阿西河或奥朗特河)发源于贝卡谷地，向北流入叙利亚，经土耳其入地中海，全长约675公里。沿海从北至南还有基皮尔河、伊卜拉欣河、加尔布河、贝鲁特河等。

黎巴嫩属于热带地中海气候。沿海一带夏季炎热潮湿，冬季温暖，距海岸线16公里以外的山区自12月至次年5月被积雪覆盖，部分高山地区终年积雪。全国大部分地区10月至次年4月为雨季。年平均降水量近1000毫米。

黎巴嫩总人口350余万，阿拉伯人约占95%，其余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等。黎巴嫩境内侨民较多。据统计，长年生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约40万，叙利亚人25万，近10万其他阿拉伯国家人及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外国人。居民中54%信奉

伊斯兰教，主要有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信奉基督教，包括基督教马龙派、希腊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通用法语、英语。首都贝鲁特。其他重要城市有特里波利，西顿（又称赛达）、提尔、扎赫勒、朱尼耶、阿莱等。自19世纪50年代起，黎巴嫩人陆续向国外迁移。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内战期间，黎巴嫩居民外流现象严重。目前，散居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超过黎巴嫩本国人口4倍多，估计有1300万。

黎巴嫩全国划分为5个省：贝鲁特省，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黎巴嫩北部省，中心城市为特里波利；黎巴嫩山区省，首府为巴卜达；黎巴嫩南部省，西顿为中心城市；贝卡省，首府扎赫勒。省级以下依次设州、县、乡。

首都贝鲁特人口约150万。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早在新石器时代贝鲁特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原先人们将它称为“阿什特里特”，意思是爱和美的女神，后更名为贝鲁特，在古叙利亚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里是“井”的意思。公元501年和551年贝鲁特发生过两次地震，对该城造成严重破坏。在该城以北30多公里处的毕布鲁斯，仍能看到腓尼基人的村庄和罗马时期的城堡、庙宇、剧场等遗迹。世界著名古迹——巴勒贝克神庙位于贝鲁特东北80多公里处，腓尼基人修建这座神庙是用以供奉日光之神巴勒。“贝克”是“城”的意思，巴勒贝克由此得名。罗马帝国时期，在原神庙基础上又增建了几座宏伟的新庙宇。在贝鲁特市内还保留着十字军时代的古迹。如位于马拉德街、建于12世纪的大清真寺，是十字军东征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历史遗迹之一。萨拉尔清真寺，建于公元10世纪。埃尔努阿法拉清真寺，是典型的16世纪黎巴嫩建筑，它吸取了罗马庙宇中圆柱建筑样式。今天的贝鲁特可谓东西

合璧，气象万千。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宣布定都贝鲁特。内战前，贝鲁特是金融、新闻中心，是国际著名的航空港，商业和娱乐业著称于世，被称为“不夜城”和“小巴黎”。内战时城市一分为二，从北部贝鲁特港，经老商业区，到南郊形成一条长5公里、宽200米的无人区，被称为“绿线”。“绿线”以西城区和南部郊区，由阿迈勒运动、社会进步党、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控制，居民大多是穆斯林。“绿线”以东为基督教区，为黎巴嫩力量和黎巴嫩政府控制。内战结束后，东西两区完全开放。由于经历了16年的内战，贝鲁特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贝鲁特位于黎巴嫩海岸中段一个三角形半岛上，背靠黎巴嫩山。海岸线弯曲，有20多个半月形海湾，为建造港口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在腓尼基时代，整个黎巴嫩海岸线地区航海业较为繁荣。随着航线的扩展，贝鲁特逐步发展为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和远东船只的汇集点，成为地中海东岸最大的港口城市。1892年贝鲁特正式建立自由港。当时港口的所有权属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但法国人占有大部分股份。1961年黎巴嫩政府从法国人手中收购了股份后，全部交由黎巴嫩公司管理，并对港口设施进行整修。贝鲁特港在内战期间受到严重破坏，曾停止开放。内战结束后，黎政府于1991年1月宣布收回贝鲁特港，政府直接参与管理，排除了内战时留下的地雷、炸弹及海港中的沉船残骸，修复了部分港口设施，使昔日著名的海港重现生机。

特里波利是黎巴嫩第二大城市，为地中海东岸另一重要港口。公元前700年建立。全城分为阿里河流经的主要城区和米纳港口区两部分，是黎巴嫩商业、工业和旅游中心。伊拉克著名的基尔库

克油田输油管终点站就建在这里。这里有炼油等石油化工工业，以及制革、水果加工、纺织业等。

雪松之国

雪松是黎巴嫩的国树。黎巴嫩国旗和国徽中挺立着一株绿色的雪松。国旗和国徽中的雪松象征着纯洁、挺拔和刚劲有力。雪松树干粗壮、树冠呈塔状三角形，显示出秀丽、庄严、肃穆的气质。当地语言黎巴嫩一词是白色山脉的意思，意指黎巴嫩多山并终年积雪。雪松就生长在这高山多雾、空气新鲜、土质良好、雨量适中的雪山之上。据说，目前存活6000年以上的雪松仍有数十株之多。古人曾称黎巴嫩山区为“雪松高原”。雪松与黎巴嫩的历史和文明发展有密切联系。黎巴嫩雪松木质坚硬，纹路细密，抗腐性强，而且清香四溢，是建造寺庙、宫殿的上等材料。古代的亚述、巴比伦等统治者都曾用雪松木材建造自己的宫殿和庙宇。如公元前17世纪建造的“所罗门神殿”，屋顶、廊柱等都使用是雪松木料，人们因此称之为“黎巴嫩森林宫”。雪松还是建造船只的上好木材。善于航海的古代黎巴嫩人用它建造坚固的船只，航行于各地通商贸易。据称，90年代初，在开罗出土的太阳船就是用黎巴嫩雪松建造的。经考古学者考证，太阳船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雪松还是古代埃及宗教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法老死后需用雪松木制作的护身船作为殉葬品，由此，人们将它称之为“死者的生命”。据传，雪松与《圣经》同时诞生。《圣经》把雪松称为植物之王。古代腓尼基人传说雪松是“上帝”栽种的，曾被称为“上帝之树”或“神树”。黎巴嫩雪松作为国树映衬着黎巴嫩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刚强的民族精神，高大、敦实的雪松是黎巴嫩国家和民族性格的象

征。正因为如此，黎巴嫩被世人誉为“雪松之国”。

黎巴嫩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鲜花盛开，濒临碧波荡漾的地中海，依傍白雪皑皑的黎巴嫩山。秀丽的国土养育出勤劳智慧的民族。因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要津，使其东西方文明兼而有之，既呈现出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及道德观念，又不乏西方文明的开放意识。得天独厚的人文精神和自然景观，使黎巴嫩成为人们向往的“东方小巴黎”，是中东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

黎巴嫩教派众多，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丰富而奇特。黎巴嫩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与众不同的是，穆斯林可以不履行伊斯兰教的全部仪式，不把斋，不朝觐，不举行每日的祈祷，只过宰牲节。这也许是受德鲁兹人和阿拉威穆斯林的影响。但是近年来，受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什叶派穆斯林宗教文化精神日益强烈。大多数穆斯林不与异教徒通婚，婚姻、生育在黎巴嫩因教派不同各有千秋。在基督教教徒中实行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在伊斯兰信徒中还时常出现一夫多妻的现象。早婚及近亲之间择偶联姻是黎巴嫩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教派众多，各种宗教节日及世俗节日名目繁多。基督教教历 1 月 1 日为新年；2 月 9 日为圣马龙节；8 月 15 日为圣母升天节；12 月 25 日为圣诞节；伊斯兰节日中有宰牲节、开斋节、朝觐日、阿术拉节等。11 月 22 日是黎巴嫩独立日，5 月 1 日劳动节为全国公假日。

黎巴嫩的皮影戏较为有名，具有悠久的历史，多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将幻想的东西搬上舞台，主要表现民间的哀怨，常在穆斯林节日上演。踏歌舞是较有名的民间集体歌舞，表演者肩并肩排列起来，举起手，跟着领舞人伴着欢快的乐曲跳动摇摆，这种舞在黎巴嫩农村贝卡地区举行婚礼和欢度节日时最为流行。

文学艺术大师纪伯伦

纪伯伦是黎巴嫩现代历史上享誉世界的哲理散文家、神秘主义诗人和艺术大师。他尽管大半生是在海外度过，但他终生苦恋着祖国和故土，黎巴嫩祖国和人民给予他极大尊敬和荣誉。1883年1月6日，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美丽的山乡贝什里，在那里度过了自己难忘的童年。大自然的瑰丽，母亲的慈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爱与美"的种子，日后终于成长为结满累累果实的文学艺术巨树。1895年纪伯伦被迫随母亲迁居美国波士顿。15岁时只身回国，在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院学习阿拉伯民族语言文化，以及历史和法语。1901年返美，后又去法国，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并得到罗丹等艺术大师的亲授和指点。是一位美国的女校长发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并资助他赴法国学习绘画。在有幸受到艺术大师罗丹等人指点的同时，他有机会游览欧洲文化名城，寻访历史古迹，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艺术视野。1910年纪伯伦从欧洲返美后，于次年定居纽约，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侨民文学家生涯，直到1931年4月10日病逝于异国他乡。病逝后，按照他的遗嘱，骨灰运回祖国黎巴嫩，黎巴嫩政府专门为他修建了纪念馆。

纪伯伦是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散文诗充满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堪与泰戈尔相媲美，并驰誉东西方世界。纪伯伦又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画家，他将诗才和艺才集于一身，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西方世界被誉为"20世纪的威廉·布莱克"。由于深受布莱克以及尼采和《圣经》的影响，他的文学、美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纪伯伦的文学

创作，前期以小说为主，后期以散文诗和散文为主。但这只是根据其作品结集出版先后而作出的判断。事实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散文创作。1903年首批散文诗问世后，他一生几乎从未中断过散文诗的创作。纪伯伦同时又是一位双语作家。他最初的散文是用母语阿拉伯语创作的，后来他改用英文写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评论家认为，纪伯伦驾驭英语的能力，可跻身当时世界最优秀的英语作家之列。纪伯伦被认为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奠基人，是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他的爱国诗篇《朦胧中的祖国》，讴歌毕生苦恋的祖国。一生主要文学作品有：1914年创作的《泪与笑》、1920年创作的《反叛逆的灵魂》、1922年创作的《折断的翅膀》、1923年创作的《先驱者》、1926年创作的《沙与沫》等作品。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纪伯伦全集》已译成中文出版。

文化教育事业

长期以来，黎巴嫩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图书出版业中心。

黎巴嫩国内新闻事业相当发达，全国共有各类报刊600余种，其中政治性日报52种，日发行量1万份以上的近20种，周刊30余种，月刊和双月刊20余种。其中，《白天报》、《安瓦尔报》、《使者报》、《事件》周刊、《阿拉伯周刊》和《狩猎者》周刊等发行量在4万份以上，不仅在国内发行，而且行销到许多阿拉伯国家。英文《中东报道者》摘译当天阿拉伯文报纸及国内、国际新闻和述评，有较强的时效性，深受外国读者的欢迎。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成立于1962年，为惟一的官方通讯社，每

日播发阿、英、法三种文字的国内新闻稿。中央通讯社成立于1982年，为私人通讯社，每日播发阿文国内消息。《中东报道》成立于1977年，为另一私人通讯社，每日播发国内外新闻的英文稿。黎巴嫩广播电视事业在中东地区也比较发达，国家广播电台除用阿拉伯语广播外，还用法、英、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亚美尼亚语广播。国家电视台用两个频率播出，除阿语节目外，尚有大量法语、英语节目。此外，多数教派、政党均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据称，黎全国广播电台约有180家，电视台40余家。

贝鲁特的图书出版业相当发达，有20余家较大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行销许多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黎巴嫩的出版业可与开罗的出版业并驾齐驱。出版的许多辞书及专著颇具学术性和权威性。东方出版社、大众知识出版社、狩猎者出版社、白天出版社等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教育普及率和公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10多年的内战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黎巴嫩学校分公立学校、私立免费学校和私立收费学校三种。公立学校数量不足，如在贝鲁特仅占学校总数的55%。私立免费学校多为慈善机构创办，但仅限于学前教育和小学。私立收费学校多由教会主办，教学质量高，但学费昂贵。教育制度分为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四个阶段。1989年全国有中小学2300余所，学生71.9万。黎巴嫩高等教育较为发达，一个35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7所高等学校。其中黎巴嫩大学为国立综合大学，其他16所均为私立院校。1996年在校学生8.15万，教师约1万。黎巴嫩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当属贝鲁特美国大学。该校1866年由美国教会创建，是黎巴嫩和中东地区的名牌大学，学校的决策机构是设

在美国纽约的校董事会。内战期间外籍教师陆续离境,教学水平有所下降。学校设有文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英语为教学语言。该校附属的“美国大学医院”是贝鲁特最主要的医院,在中东地区有较高声誉。国立黎巴嫩大学创建于1952年,在贝鲁特东西两区,以及黎北方、南方和贝卡三省设有分校,共设有法律系、政治学系、管理科学系、工程系、教育系、社会科学系等11个系,教学语言为阿语。

第一章　远古文明

一、 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

古代叙利亚地区以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等国为主体，是一个地域广泛、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发祥地。根据史前考古学研究，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这里就存在原始人类的活动，并遗留下丰富的原始文化遗址和遗物。

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以砾石砍斫器和手斧为主要特征，与非洲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近。旧石器时代中期以石片文化为特征，在技术和类型上与欧洲的勒瓦娄哇文化的莫斯特文化接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是石叶文化，最后出现了细石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本地区人类活动的典型遗址有约旦河流域的欧拜迪耶遗址（今约旦境内）、吉斯尔—巴纳特—雅各布遗址（今以色列）、姆西勒遗址（今黎巴嫩境内）和海拉莱遗址（今叙利亚境内）。欧拜迪耶遗址文化遗物发现于厚 12.9 米的湖相沉积中。其早期遗址中含有单面和双面打制的砍斫器，中期出现了多面体和

橙形石球以及啄掘器，晚期出现了粗糙的手斧。这些发掘反映了从砾石文化向手斧文化的过渡。吉斯尔—巴纳特—雅各布遗址位于约旦河阶地上。这里的阿舍利早期类型手斧与灭绝的大象和犀牛共存；其上的文化层中含有阿舍利中、晚期类型的手斧。姆西勒遗址位于艾因伊比勒西南的旱谷中。在砾石中发现了圆形和梨形手斧，打制已较为进步。海拉莱位于拉塔基亚以东高出河床 70 米的阶地上，在砾石层中发现两件梨形手斧。上述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在考古学上没有相对和绝对年代考证。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本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是巴勒斯坦卡迈勒山的塔本和斯胡尔洞穴。在塔本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一些早期智人化石。在下部堆积中发现了粗糙的石片文化，它与欧洲的泰亚克文化相似。中层堆积中发掘出许多手斧、刮削岩、雕刻岩、石叶等。在上部堆积中，则是勒瓦娄哇石核和盘状石核的许多三角形石片。塔本洞穴的年代至今仍有疑问。斯胡尔洞穴遗址的石器遗存主要是勒瓦娄哇、莫斯特型的石片和石片制品。在中层堆积的下部发现有少量手斧，从洞穴中还找到了 10 具属典型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被称作斯胡尔人。旧石器时代晚期本地区最重要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是卡迈勒沃德洞穴遗址和黎巴嫩的库巴遗址。这一时期石叶文化以燧石为主要原料，文化性质与欧洲的奥瑞纳文化和格拉韦特文化相近似。沃德洞穴遗址堆积自上而下分 7 层。从第 6 层开始出现石叶；第 5 层中有大量鼻形刮削器和喙形刮削器，与奥瑞纳文化相似；第 3 层有陡刃刮削岩和雕刻岩。西亚沃德遗址石叶文化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与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的沙尼达尔洞穴出土的石叶文化被认为是欧洲石叶文化的发源地。石叶文化被认为是晚期智人克罗马农人的文化，而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

大量早期智人化石，因而一些学者推测，晚期智人可能是在古叙利亚等西亚地区演化形成，他们曾与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杂居，后来取代了早期智人，并把石叶文化带到了欧洲。

凯巴拉文化与纳吐夫文化

公元前1.5万年前后，古叙利亚地区(又称黎凡特地区)进入中石器文化时期，其下限大约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作为古代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自中石器时代起，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开始居于领先地位。包括周边地区在内，现已发现的文化遗址数以百计。1928年英国女考古学家P.加罗德在巴勒斯坦犹大山西坡的苏克巴洞穴遗址，首次发掘到典型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翌年，英美联合考古队又在巴勒斯坦卡迈勒山发现同类文化遗址，它们被统称为纳吐夫文化。此后20年间在古叙利亚其他地区又发现了其他纳吐夫文化遗址。依据考古学，整个西亚中石器时代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公元前1.5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为旧石器向中石器过渡阶段;后期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8000年，属典型的中石器阶段。古叙利亚地区中石器前期文化源于旧石器文化——黎凡特—奥瑞纳文化，并逐步演变发展为凯巴拉文化。后期中石器时代承接前期——凯巴拉文化发展为纳吐夫文化。凯巴拉文化得名于巴勒斯坦卡迈勒山凯巴拉洞穴遗址，在古叙利亚其他地区分布甚广，其典型石器是细石器，以小、仄、尖为特色。该文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并与纳吐夫文化的细石器衔接。凯巴拉文化约始于公元前1.6万年，下限为公元前1万年左右。该文化时期的原住民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已广泛使用矛、镞等细石器工具，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由于在该文化众多遗址中发现许多

山羊、羚羊骨，因此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已出现放牧，而山羊可能是最早的家畜。纳吐夫文化直接从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并演变为最初的无陶新石器文化，其典型工具仍为细石器，除了用于矛头、箭尖等狩猎武器外，还有镰刀、刃片等农具，表明此时的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不少遗址已有建筑遗迹及初具规模的村落，成为后新石器文化村社的基础。纳吐夫文化仍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但经济已向农业方向发展，其石制农具有镰、磨盘、臼、杵等，皆属收割碾磨工具，可能主要用于收割作物的活动，可看作农业生产的最早起源。纳吐夫文化存在着和外地的交换关系，如用于死者头饰的齿贝，即来自地中海沿岸。

古叙利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

依据史前考古学，整个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 8000 年，止于公元前 6000 年；铜石并用时代约为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金石并用时代)。在此期间西亚地区社会发展迅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金属制作等古代文明。自 20 世纪初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原古叙利亚地区陆续被发现。1935 年在约旦河河口附近首先发现了耶利哥遗址。此后又相继发掘了多处遗址，其中主要有：1958－1967 年发掘的贝达遗址；1962 年发掘的蒙哈塔遗址；1963－1968 年发掘的拉马德遗址；1965 年发掘的穆赖拜特遗址和布格拉斯遗址；1972－1977 年发掘的阿布胡赖拉遗址。这些考古发掘证明，这一地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发展最早、最充分的地区。南部耶利哥遗址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从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文化各阶段的发展顺序，并证明新石器时代之初，曾有无陶新石器阶段存在。耶利哥的新

石器文化从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发展而来，耶利哥的主要堆积为前陶新石器文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或分为A、B两段。A阶段已出现农业，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及无花果，但尚无家畜；已形成定居村落，有城堡和城墙，据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同类建筑。至前陶新石器B阶段，耶利哥的农作物品种增多，除小麦有两个品种外，还增加了豌豆、野豌豆、燕麦，并出现了家畜山羊。耶利哥遗址所在地南部古叙利亚地区，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及其他文化遗址如贝达、拉马德等都有前陶新石器A、B两段遗存。约公元前6000以后，这些文化可能因干旱而迅速衰落，其文化发展水平大不如前，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取代古叙利亚成为西亚当时文化发展的中心。

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文化遗址是穆赖拜特遗址、阿布胡赖拉和布格拉斯遗址，它们均分布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穆赖拜特遗址位于今天的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东南约86公里的幼发拉底河东岸。在其遗址前陶新石器地层中，发现了5件迄今所知最早的陶器，其年代约公元前8000年，但这些陶器过于粗糙，还不能替代木制容器。在穆赖拜特发现有农耕及饲养家畜的迹象，但整个前陶新石器阶段始终以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主。另一个文化遗址阿布胡赖拉是迄今所知叙利亚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根据史前考古学家研究，与世界其他地区近似，古叙利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有农业、畜牧业、磨制石器、陶器等出现。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前陶文化时期开始栽培小麦、大麦，饲养狗、绵羊和山羊，但采集狩猎仍占较大的比重，已形成半稳定性的小规模聚落。使用嵌镶几何形细石器的镰刀，半磨制的刀斧，琢

制的石容器，但还没有发现陶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农业、畜牧业逐步确立，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磨制石器普遍使用，开始制作深钵形圆底陶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中期文化阶段，发明了彩陶（发掘于今天土耳其安条克附近）和编织技术，作为家畜牛也开始出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新石器后期文化阶段，已形成大规模的聚落，以制作精美的彩陶和营建神庙为其特征，社会分工显著，阶级分化萌芽。

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2000年。在这一阶段铜器在本地区开始广泛采用。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与遗物在今天叙利亚拉塔基亚附近的乌加里特，以及叙利亚西北部其他地区及南部的巴勒斯坦地区都有发现。这些文化遗存和遗物证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古叙利亚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古叙利亚北部地区是整个近东地区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繁盛的中心区域。同时，青铜技术也从此地向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以及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传播。著名的美籍黎巴嫩裔历史学家菲利甫·希提认为，古叙利亚的先民是青铜时代最早用青铜制作武器，最早广泛使用铜制兵器的民族。在铜石并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又有新的发展，除家畜的牛之外，山羊、猪、狗，已普遍存在。另外，灌溉技术已发明，不同类型的园艺技术也开始出现。伴随冶金术的出现以及制陶工艺的进步，彩陶艺术、壁画艺术及雕塑都开始出现。特别是彩陶制作为原始工匠们提供了施展才华、展示艺术天分的途径。至公元前4千纪末，产生于古叙利亚北部的彩釉绘画艺术已西传至迈斯克里文化的中心区域克里特岛以及早期王朝时代的古埃及地区。在铜石并用时代及早期青铜时代本地区内部及与外部初步的贸易联系开始产生。由于古

叙利亚地处古埃及及巴比伦之间的交通要冲，贸易的跨区域联系与文化的初步交往已初现端倪并具重要意义。令考古学学者们困惑不解的是，在公元前 3 千纪阿拉伯半岛的塞姆人迁徙至本地区之前，古叙利亚地区原住民的种族及民族渊源与构成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和不能破解的谜。但是公元前 4 千纪左右这里的原住民已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并越来越多地使用铜器，同时开始了氏族社会解体和向文明过渡的过程，至公元前 3 千纪古叙利亚地开始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并出现了一些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奴隶制城邦国家。

二、古代塞姆人的迁徙、交往与文明的传播

古代叙利亚的塞姆人

塞姆人(Semite，旧译闪族)是古代西亚地区说塞姆语的居民。塞姆语语系主要包括阿卡德语(Akkadian)、亚摩利语、迦南语(Cananite)又称腓尼基语、阿拉米语(Aramaic)、希伯来语(Hebrew)、阿拉伯语(Arabic)等。使用上述语言的民族分别又称阿卡德人，也称亚述巴比伦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又称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塞姆人的祖先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是他们的故乡和文明的发祥地。由于阿拉伯半岛土地硗瘠，生活资源贫乏，不能容纳众多人口，每当繁衍增殖到相当数量时，这里的原住民部落在族长的率领下向半岛以外迁徙。由于三面环海，向北迁徙是惟一便捷的途径，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以及北方的“肥沃的新

月地带”——即黎凡特地区是阿拉伯半岛游牧民外迁的理想之地。

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阿拉伯半岛塞姆人的一个分支向美索不达米亚迁移。在与已经定居在这里的、且拥有高度文明的苏美尔人交往与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阿卡德人，后称巴比伦人。据有关研究证实，公元前3千纪的后几百年中，来到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支塞姆人部落由此又向西北进入叙利亚北部的平原地带，历史上他们被称为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被认为是最早迁移到叙利亚的塞姆人，并在这里建立若干个小王国，形成叙利亚的第一次塞姆人化。公元前2千纪前后，第二支大规模移入古叙利亚地区，即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塞姆人为迦南人。迦南人在地中海东岸及内陆建立了一些各自为政的城邦，创造了迦南文化。公元前2千纪末叶，古叙利亚地区进入铁器时代，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迦南人，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发展了航海贸易，促进了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创造了有22个辅音字母的腓尼基文字，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出现了第3次塞姆人进入叙利亚的大迁徙。他们是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内陆地区，并定居下来。他们建筑的哈马和大马士革等古老的城市和广泛使用的阿拉米文字是古叙利亚文化的宝贵遗产。

在塞姆人历时两千余年的大迁徙过程中，先后进入和争夺叙利亚的民族还有喜克索斯人、胡里安人、埃及人、赫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和波斯人。古老的叙利亚地区成为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大熔炉，形成了举世注目的古叙利亚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亚摩利人与亚莫鲁国

首先迁徙到叙利亚的塞姆人被苏美尔人称作亚摩利人(Amorites)。“亚摩利人”的含义是西方的人。在此后的4个世纪中,亚摩利人逐渐向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叙利亚及西部的贝卡谷地及附近地区迁徙。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亚摩利人开始从游牧生活向半农业定居生活过渡。也正是在这些世纪中叙利亚地区除少数地域外经历了第一次塞姆人化。

亚摩利人在哈布尔河口附近的马里(Mari)建立了国都。亚摩利人的居住地被苏美尔人以及巴比伦人称为亚莫鲁(Amurru),意为西方的国度。亚摩利人最早的史料记载出现于萨尔贡创建阿卡德王国和统一巴比伦时期。萨尔贡在位期间曾征服亚摩利人的国都马里以及叙利亚古国埃勃拉。亚摩利人不仅在幼发拉底河建立了国家并统治着整个叙利亚中部及北部地区,而且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亚摩利人城邦国家。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他们在北起亚述(Assur)南至拉尔萨(Larsa)之间建立了巴比伦等王朝国家。巴比伦王朝的第6代国王汉穆拉比,即古代奴隶制社会第一部最为完备的法典制定者,在公元前1700年征服了亚莫鲁,并将其并入巴比伦帝国。

汉穆拉比的征服使马里古城渐趋衰落,并逐渐从历史中销声匿迹。20世纪30年代对马里古城原址哈利利山丘的考古挖掘使马里古城重见天日。哈利利山丘的考古挖掘是叙利亚20世纪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文物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两万件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其书写文字属阿卡德语,但词汇及语法却有明显的亚摩利语特征,因此考古学家们推测,马里泥板文书的作者是

通晓阿卡德语的亚摩利人。泥板文书是亚莫鲁国最后一位国王齐姆利—利姆(Zim ri-Lim,公元前 1730 - 1700)的宫廷档案。正是在齐姆利—利姆在位时汉穆拉比征服了亚莫鲁。泥板文书包括国王及官员的书信、政务与经济档案及报告。马里古城遗址考古挖掘表明,齐姆利—利姆的王宫占地 6 公顷,由 300 余间屋舍组成,包括设施齐全的浴室、议事厅及学堂。在残存的遗物中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壁画,其中一幅展示了国王接受女神伊什台耳(Istar)授封仪式的场景。泥板文书证明哈拉布(Halabu,即今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作为亚姆哈德(Yamlchad,即亚莫鲁国)王国的首都,在公元前第 2 千纪的后几百年享有较高的文明与繁荣的经济。古布拉(Gubla 今黎巴嫩地中海沿岸重镇朱拜勒)、盖泰纳(Gatana)以及哈兰等地区或作为商业中心,或作为商路枢纽是亚摩利人的重要城市。在公元前 1800 年前后,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埃拉姆(Elam)高原,亚摩利人建立了众多王朝国家或亲王领地。

亚摩利人的繁荣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雨水丰沛,河流纵横,本地区灌溉农业得以发展。亚摩利人畜牧业的自然条件与叙利亚广袤丰美的牧场草原,是其祖先的居住地阿拉伯半岛无法比拟的。由于地处亚历山大勒塔海湾到幼发拉底河上中游河湾之间的马鞍形走廊地带,亚摩利人商业贸易条件得天独厚。叙利亚马鞍形走廊北有陶鲁山脉,南有黎巴嫩山脉,关山阻隔,河流当道,这里自古以来乃至后世的数千年中一直是沟通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商业通道。这条商路沿幼发拉底河蜿蜒而下,直抵波斯海湾。亚摩利人作为天然的掮客享受着商业的繁荣。富庶的土地、繁荣的商埠自此以后一再引起外族的觊觎。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以及古罗马人

相继而至,上演了一幕幕历史的悲喜剧。

公元前2000年代之前,埃及人的触角就已开始伸向叙利亚南部,其后埃及人逐渐将西奈半岛及黎巴嫩沿海地区的部分城邦国家纳入埃及人的统治之下,或沦为纳贡附属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人日益崛起时,亚摩利人被迫南移。根据"阿玛尔纳书简"推断,亚摩利人活动区域此时是黎巴嫩北部和东部,以叙利亚内陆及大马士革地区为中心。

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叙利亚摩利亚人与埃及人的交往已十分活跃。在耶路撒冷西北一个名叫盖塞尔的古城废墟中,发现了带有较为明显的埃及文化特征的砂岩和花岗岩雕像,以及来自埃及的各种象牙制品和其他物品。在朱拜勒还发现了属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器皿、狮身人面像等铜器。著名的《辛努海特的故事》中,讲述了埃及同叙利亚之间活跃的商业联系。在埃及的贝尼哈桑墓画中,画有37个亚细亚人在部落领袖的率领下来到埃及的情景。

早期亚述时期,亚述人的商业贸易相当发达。由于叙利亚的亚摩利人地处通往小亚细亚及地中海的通道之上,亚述人与叙利亚的商业联系相当密切。据马里发掘的泥板文书证明,公元前2000年代初,亚述城的统治者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等人对叙利亚地区进行了多次远征。马里城就曾臣服于亚述人,沙马什阿达德之子担任了马里人的统治者。公元前15世纪末叶,亚述进入中期亚述时期,此时由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都在叙利亚扩张势力,因而阻断了亚述人向西发展的可能性。

叙利亚北方近邻赫梯王国形成于公元前19世纪中叶,它的势力逐渐向南扩展,亚摩利人被迫向南迁移。赫梯人与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在叙利亚展开了长期的争霸斗争,其中夹杂着

喜索克斯人、亚述人、米坦尼人等的混战与争斗。依据圣经研究专家及史学家的研究判断，在阿拉米人和以色列人到来前后，在叙利亚南部巴勒斯坦地区亚摩利人仍占据着山区和外约旦地区。

亚摩利语曾广泛流行于古叙利亚地区，但没有重要碑文及文献流传下来，仅有一些地名及诸侯亲王的名子沿用至今。依据语言学及史学家的研究，亚摩利语与迦南语或腓尼基语极为相似，或者说就是一种语言中的两种方言。实际上亚摩利语可以被认为是叙利亚东方的迦南语；叙利亚西部迦南人的迦南语，就是西部亚摩利语，而后人则将其称为迦南语或腓尼基语。

亚摩利人的原始宗教与其祖先阿拉伯半岛游牧民的宗教存在相似之处。最初他们的信仰是多神崇拜。亚摩利人逐步定居于古叙利亚地区之后，随着生活、文化的改变，其宗教也逐渐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战神亚莫鲁是亚摩利人的主神。主神之下是众多各司其职的神明。其中，雷电之神哈达德在西亚地区广受崇拜，并逐步演变为巴勒神，在叙利亚西部又称玛尔图神。拉沙普神为火神，是另一重要神灵，新王国时期通过迦南人被埃及人所接受。达贡神曾被巴比伦人崇拜，专司食物食品，在乌迦里特建有达贡神庙。腓尼基人接受达贡神之后，达贡神演变为鱼神并在加沙地带广泛流行。战神亚莫鲁主神的妻室是阿诗拉特，是女性主神，在南部阿拉比亚的众神中阿诗拉特与月神相对应，又与希伯来人女神阿谢拉赫相对应。在马里泥板文书中，上述神灵都被引用或提及。亚摩利人的众神祇均为迦南人所接受并与希腊神祇相融合。

迦南人与腓尼基文明

迦南人是继亚摩利人之后进入叙利亚的塞姆人。历史学家们

认为迦南人与亚摩利人是同一迁徙大潮的两个分支。所不同的是，迦南人在叙利亚沿海地区定居下来，并与当地的原住民融合后在沿海地区形成迦南人的活动区域。随着历史的演进，迦南人深受埃及文化的影响，但在语言与宗教上，迦南人与早期亚摩利人的区别并不明显。迦南(Cannan)一词据考证源于胡里安语，原指相对黎巴嫩高原东南部的低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迦南人后来又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使用腓尼基人一词远比“迦南人”广泛得多。迦南人生活的区域即腓尼基地区泛指古叙利亚的沿海地区，北起苏克苏、南至阿科、东起黎巴嫩山、西至地中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沿海、黎巴嫩及叙利亚西北沿海地区。最初在这里居住的大概是胡里安人。

古代的腓尼基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只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名称。事实上，腓尼基地区即迦南人生活的地区从未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形成了若干彼此独立的小城邦国家。如乌伽里特、毕布鲁斯、西顿等。居住在本地区的人们也从来不把自己叫作腓尼基人，如同亚摩利人不把自己称为亚摩利人一样。他们只是把自己称为某某城市人，如西顿人等。“腓尼基”原是紫红色的意思，它起源于本地出产的一种紫红色染料，这种染料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一种海螺，从中提取出一种可作染料的紫红色颜料。

腓尼基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地区。据考古发掘资料，在公元前5000年代，腓尼基的毕布鲁斯就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约自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腓尼基相继形成了乌伽里特、阿拉杜斯、特里波利、西顿、提尔、阿什克伦等城市国家。这些小国大都建在海边的岩石之上，易守难攻。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海港，利于对外航行和贸易。内陆地区的吉塞尔、耶路撒冷、杰里科以及奥沦河

中游的卡迪施等地也建立过城市国家。

与其近亲与近邻亚摩利人相比，腓尼基人在国家组织、政治生活等方面已明显地进步于前者。虽然有关政治生活的资料遗存甚少，但以现有资料看，在腓尼基形成的国家已具备最基本的国家形态。这些小国大多是王朝国家，其权力更迭表现为王朝的更替。不过在这些王国中，国王权力很小，没有形成君主专制。可能存在贵族会议（或长老会议）一类的机构，国王的权力受到贵族的约束。国王往往同城市最重要的神联系在一起，有时干脆被称作某个神人祭司。另外，也可能存在个别贵族寡头共和国。

古代腓尼基虽然地域狭隘、人口不多，且常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但它对古代世界的影响和对文明的贡献却不容小视。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当时一流的造船业、航海业、商业，而且还因为它的殖民活动，它发明和传播的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

腓尼基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颇负盛名的有用驰名的黎巴嫩雪松为原料的造船业，以及其特有的紫红色染料的纺织业等。它的玻璃制造业、金属加工业、木器手工业、陶瓷制造业、象牙雕刻等也很著名。腓尼基各个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它们充分利用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发达的造船业，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就同埃及、两河流域的叙利亚古国建立起广泛的商贸联系。它们从埃及输入亚麻，从塞浦路斯输入铜，从小亚细亚进口锡和铁；而自己则输出象牙制品、青铜或银制器皿、玻璃制品、雪松，以及用紫红色染料漂染的纺织品等。它们同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贸易十分活跃；同北非沿地中海地区，同西班牙南部地区，以及地中海岛屿国家都建立了商业联系。

腓尼基人是古代著名的航海探险者。据说他们是最早穿越直

布罗陀海峡到达大西洋的航海家,他们的航程甚至远及英吉利和爱尔兰。腓尼基人的航海探险活动是与殖民商业活动相联系的。他们的商业殖民地几乎遍及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在公元前13、12世纪,在叙利亚中部和南部地区受到阿拉米人和以色列人排挤,腓尼基人的领地进一步转向地中海。塞浦路斯、西里西亚、科里特、萨摩斯、科林斯、色雷斯、马耳他、西西里、撒丁、科西加等岛屿都留下了腓尼基人经商贸易的足迹,几乎所有北地中海沿岸地区都与腓尼基人建立了海上商业联系。据史料记载,埃及法老尼科曾利用腓尼基人乘船绕航非洲获得成功。腓尼基人的探险活动显然都与对外贸易有着密切联系,具有寻找新市场、新原料和奴隶来源地的目的。在探险与商业活动中,腓尼基人建立起众多商业殖民地。这些殖民活动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前后,其中最著名的殖民地是建立于公元前814年前后的迦太基。当腓尼基人衰落之后,迦太基作为西地中海商业与政治中心屹立于非洲北岸,直至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摧毁。此外,在意大利西海岸,塞浦路斯岛南部沿海,在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上,腓尼基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据希罗多德证实,在埃及的孟菲斯,有一个腓尼基人居住的街区。腓尼基人同其殖民地保持着商业联系,但没有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隶属关系。

腓尼基人不仅是睿智的手工业者、精明的商人和不畏艰险的航海探险家,而且还是知识与文化的创造者和传递者。他们与亚摩利人一样是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文明的传递人,特别是古希腊人不仅从腓尼基学会航海和经商,而且部分地继承了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腓尼基人在古代世界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创造的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共22个,为线形符号,只有

辅音而无元音;元音主要由读者根据上下文的语音和语境自己推测出来。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经说,希腊人原来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带给了他们。古罗马学者普林尼也曾盛赞腓尼基人发明字母的功绩。不过狄奥多拉斯引用克里特人的见解认为,腓尼基人不是字母的发明者,而是改进者。无论事实如何,腓尼基人把字母传入希腊,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入元音,形成希腊字母;罗马人又在希腊字母基础上形成拉丁字母,从而为后来西方各字母文字发展和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东方,腓尼基字母经阿拉米人改进之后,被阿拉伯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亚洲使用字母的民族所接受。

阿拉米人的迁入与阿拉米文化

在公元前第2千纪中期,阿拉米人已经在幼发拉底河中段定居下来,并逐步形成了自己民族的语言——阿拉米语。“阿拉米人”一词大约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末前后)开始流行开来并被广泛接受。从亚述国王的年代记及一些铭文中推断,在公元前14、1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地区和叙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塞姆人已显现出阿拉米人的特征。亚摩利人、胡里安人以及赫梯人聚居的奥沦河河谷地带以及以北地区逐渐被阿拉米人所占居,或被阿拉米人所同化。黎巴嫩山阻碍了阿拉米人的西进。而在黎巴嫩山区的亚摩利人等社区继续存在,沿海地区的迦南人(即腓尼基人)也未受到阿拉米人的冲击。阿拉米人在他们新的家园逐渐吸收了亚摩利人和迦南人的文化,但是保持他们的文化特征,尤其阿拉米语一直保留下来。

公元前13世纪末,阿拉米人迁徙基本结束。阿拉米人早期国

家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之间的广大区域。其中一个名叫阿拉木纳哈拉姆的阿拉米人国家在公元前13世纪亚述人的铭文中屡屡出现,其地理位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哈布尔河上游地区。公元前8世纪后在亚述帝国的扫荡下,这个国家逐渐消失了。另一个美索不达米亚阿拉米人国家是帕丹阿拉木,国都豪兰。豪兰地处重要的商路之上,是阿拉米人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阿拉米人建立的诸多小王国中,最主要的国家是建都于祖巴赫,此后不久又迁都大马士革的阿拉米人国家。这个国家建立于公元前11世纪后期,与南部的以色列犹太国家处于同一时代。它的管辖区域,东北方延伸至幼发拉底河流域,西南至雅尔穆克河,北部与亚述帝国征服的小亚细亚南缘接壤,南部与希伯来人王国相邻,西部是黎巴嫩山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这一广阔的区域都在大马士革阿拉米人控制之下。至公元前9世纪中叶时,大马士革阿拉米人国家还一度将南部的以色列国、犹太国变成它的附属国。阿拉米人与早先迁入叙利亚的塞姆人一样,从未建立过统一的国家。阿拉米人建立的祖巴赫和大马士革国家也只是一个阿拉米人诸国联盟中的领袖。阿拉米人时代正值亚述帝国崛起强盛时期,阿拉米人不断遭到亚述人的入侵。公元前732年,大马士革被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攻陷,国王被处死,居民被放逐,大马士革阿拉米人国家在亚述人的铁蹄下沦为废墟,从此阿拉米人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走向终结。

阿拉米人的商业活动和文化影响远胜于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阿拉米文化在公元前9、8世纪达到巅峰时期。阿拉米人商旅遍布整个新月地带,甚至远及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地区。阿拉米商人曾垄断了叙利亚地区商业贸易达数世纪之久。阿拉米人联盟的

政治中心大马士革曾经是各方商贾云集之地。阿拉米商人同时还是文化的传播者，尤其是他们把阿拉米语传播给邻近的民族。公元前约500年前后，原本是叙利亚商人社会的阿拉米语言已经成为整个新月地带商业、文化和政府的官方语言，本地区的居民们更是把阿拉米语作为本民族的本土语言广泛使用。阿拉米语甚至取代了希伯来语成为希伯来后裔们的通用语。更为令人称奇的是，阿拉米语的传播超越了塞姆语语系地区，在大流士(公元前521－前486)执政时期的波斯帝国，成为西部省区政府官方语言，并持续至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时期。这种不依靠帝国征服或官方干预仅以其商业活动及文化传播取代另一民族语言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许仅此一例。

伴随着阿拉米语的传播，腓尼基字母传播到亚洲其他语系地区。希伯来人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接受了腓尼基字母，希伯来圣经使用的方块字就是由阿拉米语发展而成的，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阿拉伯人通过使用阿拉米语的奈伯特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阿拉伯古兰经也是由腓尼基字母书写的。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是通过阿拉米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帕莱威语、梵语最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阿拉米语。佛教僧侣还将梵语带到了中国。腓尼基字母文字正是通过阿拉米语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正如通过希腊语传入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阿拉米语逐渐演变为几种不同的方言，即西部包括圣经阿拉米语、帕尔米拉语、奈伯特语，及其其他方言和东部的曼德语和古叙利亚。古叙利亚语通过与本土方言的结合，日后演变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基督教通用语言，至公元13世纪被阿拉伯语所取代。古叙利亚语今天仍在黎巴嫩个别地区的马龙派教徒及叙

利亚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中使用。

阿拉米语言文字是阿拉米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阿拉米人的物质文明也达到较高的水准。阿拉米人在与本地区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中,接受了他们的文化。在叙利亚的北部,他们继承赫梯、亚述文化,在中部他们成为迦南人文化的继承者。西北部的沙玛尔古城、北都的哈兰和赫拉帕里斯古城,以及中部的哈马和大马士革古城,都是阿拉米叙利亚文化中的宝贵遗产。阿拉米人建筑、制陶、雕塑和壁画等艺术融会了本地区其他民族的特点,并且与宗教文化相联系。在沙玛尔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发掘到帕纳穆一世为祭拜阿拉米人的主神哈达德而制作的巨型塑像。塑像高达9英尺,显示出较高制作工艺。赫拉帕里斯古城建有哈达德主神庙,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也发掘到祭奠哈达德的神庙,从阿拉米人把哈达德主神(专司雷电)与太阳神相联系的现象判断,叙利亚的阿拉米人还是一个具有相当水准的农耕民族。帕纳穆一世制作的哈达德塑像铭文中就记载了大麦、小麦、大蒜以及耕作土地、葡萄园种植等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

阿拉米人崇拜的主神哈达德专司雷鸣与闪电。哈达德主神具有善恶双重特征,他既可带来雨水滋润土地,也会带来暴风与洪水,涂炭生灵。哈达德主神在不同地区又名玛达德或阿杜,也称哈达德—雷蒙。大马士革的国王们将哈达德称为纳阿曼。哈达德妻室配偶与亚摩利人时代女性主神不同,她被称为阿塔伽提斯(Atargatis)。阿塔伽提斯女神是塞姆人的土地之神,有象征土地母亲的含义。在赫拉帕里斯出土的一些硬币上,阿塔伽提斯头戴城冠,有的硬币上她与雄狮为伴。在卡尼昂(位于今叙利亚南部德拉市西北11英里处)也有一处祭拜阿塔伽提斯的神殿。南部的巴

勒斯坦阿什克伦是崇拜阿塔伽提斯女神的主要地区之一，在出土的硬币上，阿塔伽提斯女神头戴面纱，这一现象与帕尔米拉太阳神殿发现的浮雕中妇女头蒙面纱的情形极为相似。在叙利亚希腊和罗马时代，哈达德主神与阿塔伽提斯女神又与希腊罗马人宗教崇拜相融合，尤其是在塞琉古王国时期，希腊罗马人对阿塔伽提斯的崇拜十分流行，甚至在罗马帝国的本土建立了以阿塔伽提斯命名的神庙。

在哈达德主神和阿塔伽提斯女神之下还有众多神灵受阿拉米人的崇拜。如拉卡布一艾勒神(Rakkab-EL)原为亚述太阳神，传入叙利亚后演变为驾驭战车的战神。亚述沙玛什神(Shamash)被所有塞姆人誉为太阳神，雷舒夫神(Reshuf)象征全副武装的战士。撒哈尔神(Sahar)为月亮神。这些神都在帕纳穆一世的墓碑铭文中出现过。

希伯来人与以色列、犹太国家

国外的史学家们认为希伯来人是继亚摩利人、迦南人、阿拉米人之后第四批进入并定居于古叙利亚的塞姆人。如前所述，亚摩利人时代，古叙利亚塞姆人的活动中心是叙利亚北部地区，迦南人时代是叙利亚沿海地区，阿拉米人时代是叙利亚中部及北部的内陆地区。而希伯来人时代的活动中心是巴勒斯坦地区。希伯来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前后经历了三次移民潮。第一次迁移大约在公元前 18 世纪，他们与喜索克斯人和胡里安人同时代来到地中海沿岸。第二次在公元前 14 世纪，与阿拉米同时进入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第三次于公元前 13 世纪后期在摩西与约书亚的率领下从埃及通过西奈半岛来到巴勒斯坦。希伯来人定居于巴勒斯坦地区

古称迦南。希伯来人之前迦南地区主要居民是迦南人以及少数其他民族如胡里安人、赫梯人等。希伯来人在与当地居民的融合、通婚过程中逐渐形成通常所称的希伯来人。

但是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000年代初率领他的子民从两河流域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由于气候干旱等原因,一部分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之孙时代到了埃及,在埃及居住了八百年之久。由于遭受埃及统治者的压迫以及内部矛盾,他们的领袖摩西制定了律法,试图解决内部矛盾,并率领他们离开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地区。有的学者认为这段历史发生在埃及新王国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不过这一切,在埃及人的史料中毫无记载。

大卫王死后,其子所罗门即位(公元前960-前930)。他同埃及和推罗结为盟友,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发展红海一带的贸易。所罗门死后,希伯来人的王国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王国(都撒罗利亚)和南方的犹太王国(都耶路撒冷),其中的以色列王国存在了约200年后,便从历史上消失了;南方的犹太王国则断断续续地存在至罗马人统治之初,但也是多灾多难。亚述人、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人都曾征服过它。尤其是新巴比伦王国时期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公元前586年第二次对它的征服战争时,攻陷耶路撒冷,将该城居民掳至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直到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灭了新巴比伦王国后,部分被掳的居民才返回耶路撒冷,并建立起新的圣殿,史称第二圣殿。但他们又落入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三、外族入侵与塞姆人时代的结束

亚述帝国的征服与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

从公元前10世纪末叶起,亚述人经两个多世纪连续不断的征服战争,建立起地跨西亚北非的奴隶制帝国。它将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及两大文明中心,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亚述帝国自重新崛起至公元前612年被新巴比伦王国所灭,这一时期史称亚述帝国时期,又称新亚述时期。亚述帝国对叙利亚的征服大约始于公元前1094年前后提格拉斯帕拉沙尔一世执政时期。到阿舒纳西尔帕二世统治时期(前883-前859),叙利亚北部分裂的与小国之林立的地区首先被征服。亚述人征服战争遭到叙利亚中部阿拉米人为主体的叙利亚联盟的抵抗。公元前853年,沙尔玛纳塞三世率亚述大军远征中部叙利亚,在奥沦河中游哈马古城以北的卡尔卡城,与本·哈达德(大马士革国王)领导的联军爆发激战。本·哈达德联合包括阿拉米人、腓尼基人、以色列人以及哈马王国等12个城邦国家组成的联军约6万人,在埃及人、阿拉伯人的支持下英勇奋战,阻止了亚述人的进攻。本·哈达德的儿子哈萨艾勒于公元前842年和前838年两度率领叙利亚联军击溃沙尔玛纳塞三世的进攻,为此他被尊为阿拉米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不过他却在胜利之后将矛盾指向盟友以色列国,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死海东部和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地带,控制了这里的贸易通道。当他进军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的居民们奉以黄金与财宝,耶路撒冷城幸免于难。亚述人步步进逼叙利亚联盟,联盟内部内讧不断,大马士革统治势

力逐渐衰弱;而亚述帝国的战争机器则蓄势待发。公元前734年,叙利亚联盟内讧又起,当犹太国无力抗拒以色列国与大马士革威胁之际,请求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给予援助,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借机举兵进犯。大马士革统治下的16个省及591座村镇陷入亚述人之手。公元前732年,在围困近两年之后,大马士革被攻陷。11年之后于公元前721年萨尔贡二世(前722-前705)征服以色列国,镇压了得到埃及支持的叙利亚、腓尼基等地的起义。继他之后西拿赫里布(前704-前681年)围困犹太国,犹太国被迫臣服于亚述。西拿赫里布进而再次镇压了腓尼基人起义。至此叙利亚完全被征服。

亚述帝国的征服战争及其对被征服地区的政策以野蛮和残暴闻名于世。亚述军队所到之处,城镇被夷为废墟,财物被劫掠一空,居民或被杀戮,或被掳走,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地方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生产衰退。这在亚述国王们的年代铭文中有鲜明的记载。例如,在阿舒纳西尔帕二世的铭文中说:"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掉他们的首级,我用他们的人头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在城门前建筑了一座墙,包上一层由反叛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一些人活着砌在墙里,另一些被沿墙活着插进尖木桩上,并加以斩首"。西拿赫里布的年代记里说,他占领和毁灭了75座城镇,人和财产尽被洗劫。萨尔贡二世远征巴勒斯坦地区撒马利亚时,俘虏27290人;在镇压叙利亚巴勒斯坦起义时,又把2万余人及大批财富劫回亚述。

由于亚述帝国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尖锐矛盾,在被征服民族中引发强烈反抗,包括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地区不断爆发起义。由于各种原因,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帝

国对被征服地区的政策发生变化。对征服地区不再施行屠杀劫掠政策，而是采取迁移和不同民族混居的政策，以使他们互不相识，不便交往。这些迁移混居的居民都分给土地，准其独立经营。他们无人身自由，分属各个亚述人奴隶主；土地也不归他们所有，而是归奴隶主所有；他们需将大部分收成交给亚述奴隶主，亚述帝国派官吏对他们进行统治。

新巴比伦王国于公元前 612 年攻陷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灭亚述帝国。帝国灭亡后，它的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与米底王国瓜分。新巴比伦王国分取了亚述帝国西部的半壁河山，即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公元前 604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为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当时，叙利亚立即归顺新巴比伦王国，但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区则态度不明。公元前 597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出兵巴勒斯坦，攻占耶路撒冷，扶植犹太人齐德启亚为傀儡统治犹太人。公元前 590 年，埃及法老普萨姆提克出兵巴勒斯坦，提尔国王投靠埃及，西顿被占领，犹太人齐德启亚及巴勒斯坦、外约旦等地一些小王公倒向埃及。为此，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 587 年第二次进军巴勒斯坦，迫使埃及放弃了对巴勒斯坦的野心，围困犹太人都城耶路撒冷。犹太国王齐德启亚突围失败，落入新巴比伦国王军队之手，被挖去双眼后送往巴比伦尼亚。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城在经过一年半的围困后被攻破，大部分居民被俘后押往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公元前 587 年至前 572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对腓尼基地区进行军事讨伐，将多数腓尼基城邦征服。但提尔城进行长期抵抗，尼布甲尼撒未能得手。公元前 574 年，双方议和，提尔国王伊托巴尔三世承认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统治地位。外约旦的一些小王公则被迫向尼布甲尼撒二世俯

首称臣。至此整个古叙利亚地区陷落。

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期是新巴比伦王国最强盛的时期。但他死后不久,王国走向衰弱。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王国被新崛起的波斯人所灭。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内部阶级矛盾和被征服地区的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当波斯人入侵巴比伦尼亚时,巴比伦城内祭司竟打开城门迎接波斯军队入城。波斯人进入叙利亚地区也未遭到抵抗。波斯人的到来结束了新巴比伦王国对叙利亚地区的短暂统治。

波斯帝国与塞姆人时代的结束

波斯帝国建国后,居鲁士二世率军于公元前539年兵不血刃占领了坚固的巴比伦城,并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包括古叙利亚地区臣服于波斯帝国,不仅宣告了一个奴隶制帝国结束,同时还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塞姆人时代的终结。从此,印欧语系人开始统治西亚地区。古叙利亚地区也进入了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等印欧语系人的统治时期。

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建国到大流士执政,前后仅28年就建立起西起埃及,东抵印度旁遮普,北到小亚细亚的艾奥尼亚,南濒波斯湾的庞大帝国。波斯人开始觊觎赫勒斯滂特(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名称)以北的欧洲地区。在大流士时代,波斯人也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地区,从而成为古代世界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是帝国西部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区在大流士的帝国行政区划改革中,与塞浦路斯一同被划为帝国的第五行省,史称阿巴尔·纳哈拉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与仍处于游牧部落阶段的帝国东部相

比,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近3000年,社会经济也已达到相对繁荣的程度。对于包括叙利亚地区在内的帝国西部来说,波斯统治者的统治和贡赋制度无疑是一种负担。但波斯人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等制度并不过多干预,而是维持现状,其社会结构也未改变,社会生活未发生大的变化。波斯统治者力图为该地区经济生活创造条件,如发展过境贸易等。正是这一背景下,腓尼基地区的国际商贸活动再度活跃和兴旺起来,特别是腓尼基人的造船和航海天分得以充分展示。在冈比西斯远征埃及和努比亚时,腓尼基人的造船及航海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克谢尔克谢斯(公元前486－前465)进军希腊时,以腓尼基人为主的波斯海军战舰多达两百余艘。不过这支波斯海军舰队在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海战中遭希腊海军重创。

为了扩大帝国的统治基础,巩固波斯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对被征服地区原统治者给予一定权利参与地方政务。在制定法律时,也参照各地原有法律,对各地原有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因此,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在政治上尽管帝国政府派遣的总督(Satrap称萨特拉亚帕)总管行政和税收大权,但总督府之下的地方政府,都有当地原统治者参与。有些地方甚至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在腓尼基地区的阿拉杜斯、毕布鲁斯、西顿和提尔等地就允许地方自治。公元前4世纪时,这些自治城邦曾一度结成联盟,在特里波利建立联盟机构。来自提尔、西顿和阿拉杜斯的代表在特里波利组建联盟议会。据说议会共有三百余名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一次大会。不过联盟及其议会的存在十分短暂,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帝国统治者阿塔塞克西斯三世的干涉。

公元前351年,阿塔塞克西斯三世统治时期,以西顿为中心的腓尼基地区发生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西顿国王泰奈斯率其臣民砍倒帝国皇家园林的树木,焚烧波斯骑兵的草料库,夺取波斯军队的武器辎重,波斯驻叙利亚总督被逐出腓尼基,9座腓尼基城市联手驱逐波斯军团,并宣布独立。当听说阿塔塞克西斯率30万大军御驾亲征,泰奈斯屈膝献城,但西顿的居民们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当波斯大军破城之际,他们烧毁港湾中的船只,紧闭自家的门窗,任由大火吞失他们的生命与财产,约4万余人在大火中丧生。曾傲视地中海的西顿古城,连同它的繁荣文明与文化,倾刻间化为灰烬,这是西顿城的第二次毁灭。公元前677年它曾被亚述帝国国王伊撒哈顿所毁。西顿的盟邦们为免于同样命运,被迫屈膝投降。

叙利亚内陆地区,大马士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城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大马士革及其其他内陆地区的历史资料十分有限,叙利亚历史上波斯帝国统治状况的历史资料更为稀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化方面叙利亚在波斯帝国时期继续了阿拉米—腓尼基文化的特点,如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一样,并无明显的改变。由于波斯人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与叙利亚等帝国西部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程度上显然处于较低水平。在帝国统治后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在腓尼基、叙利亚等地区表现日益强烈,这一现象可以在考古出土的银币及明显带有希腊化特征的雕塑中得到印证。同时在宗教方面,帝国西部表现出二元化甚至多元化的特征。波斯帝国国王继大流士之后,多为袄教教徒,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如犹太教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阿拉米语在波斯帝国西部地区的广泛流行。波斯帝国境内,由于民族众多,语言极为复杂。从大流士

时代的《贝希斯敦铭文》以古波斯语、阿卡德语等三种文字书写而成判断,这三种语言文字流行于帝国本土及巴比伦尼亚等地。但是阿拉米语在帝国西部叙利亚地区广泛使用更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阿拉米语一直是叙利亚地区商业社会中的通用语言。波斯人征服本地区后,阿拉米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波斯帝国西部各行省的政府官方语言。波斯帝国时期,帝国所有发往西部的政府公文及法律文书,均使用阿拉米语或附以阿拉米语译文。这说明阿拉米语曾在波斯帝国时期的商业、外交及政府公务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从波斯帝国形成之日起,直到灭亡,它与希腊的矛盾贯穿始终。最终波斯帝国于公元前334年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从而结束了希波之间长达两个世纪的纷争。同时,也结束了波斯帝国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波斯帝国兴起时代,正值包括叙利亚地区在内的西亚古代文明极盛而衰的时代。当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走向终结时,同时也结束了历时近两千年的塞姆人时代。从历史的中观角度看,波斯帝国的兴起打断了包括叙利亚在内的西亚北非原有古代文明独立发展的进程;而从微观的角度看,波斯帝国被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所取代,标志着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接踵而至的时代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时期,当新的文明向西亚扩散时,叙利亚地区也进入了新的时代。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代

一、叙利亚的希腊化

亚历山大大帝东侵

亚历山大大帝东侵之前,叙利亚地区与古希腊地区的各种交往已十分频繁,特别是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商业、文化等交往十分密切。叙利亚地区作为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古希腊之间文明交往的桥梁,在古代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近两个世纪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叙利亚地区同希腊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受到限制,但是两地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不可能被完全阻隔。亚历山大东侵之前近一个世纪中,叙利亚地区特别是腓尼基人已由过去文化的传播者转化为希腊化影响的接受者。在这一时期,叙利亚沿海城市中希腊商人和工匠已随处可见,在小亚地区已有若干希腊化城镇与商业殖民地。亚历山大东侵之前,两地之间的交往以和平方式为主,希腊世界的商业与文化对叙利亚的影响是渐进和缓慢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过程。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 336 年继父为王,在迅速控制了国内

政局、平定了骚乱的北方、镇压了希腊城邦的起义后,他于公元前334年,即继承王位两年后发兵东侵西亚诸国。在小亚驱逐波斯人、解放希腊人城市后,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彻底击溃波斯军队。为纪念这次战役,亚历山大在此建立了亚历山大勒塔城(现土耳其境内伊斯坎德伦)。随即,亚历山大派遣军队沿奥沦河而上,并占领大马士革。他本人率军沿地中海东岸南下,征服了阿拉杜斯、毕布鲁斯、西顿及其他海港城市。提尔古城及加沙地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强大的军事围困之下,相继失陷。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受到当地祭司们的欢迎,并称他为"埃及的法老"、"阿蒙神之王"。他在尼罗河口亲自勘选了以他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在美索不达米亚,马其顿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建立腊卡城,并在波斯本土捣毁王朝的首都苏萨、柏塞波利斯,进而向米底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西北部进军。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进攻已成强弩之末,被迫返回巴比伦,十年东侵至此结束。通过征服战争,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领土大体包括巴尔干半岛、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他采取波斯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雇用当地贵族,推行种族融合,鼓励将士们与东方女子结婚,袭用波斯宫廷礼仪。在战略要地建立起一批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为主的要塞和城镇。从此开始了历时三个世纪的希腊化时代。

塞琉古王朝的国家与社会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3年返回巴比伦不久即染疾而亡,他所建立的帝国迅速解体。在帝国故土上,经长期混战,形成了以

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马其顿王国为主体的一批希腊化国家。塞琉古王国是希腊化国家中版图最大的国家，曾领有西起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东达印度的广大地区。塞琉古王国的版图常因战争发生变化，从塞琉古王国曾分离出不少新的国家。塞琉古王国因以叙利亚为统治中心，历史上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称为条支。塞琉古王国的缔造者是塞琉古一世（号称“胜利者”，公元前 312－前 280 年在位）。亚历山大死后，他任巴比伦总督（公元前 321 年），公元前 312 年塞琉古一世据巴比伦而自立，塞琉古王国诞生。7 年之后，塞琉古一世正式称王。塞琉古一世自立为王前，叙利亚地区隶属亚历山大大帝另一位部将安提哥那的统治。公元前 312 年，塞琉古一世与托勒密联手在加沙击败安提哥那。托勒密攫取巴勒斯坦；塞琉古一世占据叙利亚中部、北部及东部地区。公元前 301 年，塞琉古一世再次击败安提哥那，巩固了他在叙利亚的统治。在争夺叙利亚的同时，塞琉古一世还向东部扩张，其领土东至印度河流域。公元前 281 年，塞琉古一世渡赫勒斯滂特（今达达尼尔海峡），企图占领马其顿，翌年被刺身亡。

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们继续奉行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化政策。塞琉古一世在世时，在亚洲修筑了 30 余座城市。他的后代也步其后尘，进一步推行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殖民政策，继续建筑城市，兴修军事坞堡或移民地。对一些塞姆人的古城及乡村逐步实行同化。在众多的城市与坞堡中，安条克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并成为王国国都。希腊人还在奥沦河中游的阿帕米亚兴建军事及财政基地，在拉塔基亚建造港口。同时更改塞姆人古城名称，阿卡更名为托勒麦斯，贝斯辛更名为西索波里斯，哈马更名为埃辟

法尼亚,金伊萨尔更名为拉里萨,阿勒颇更名为贝鲁亚,还将山谷河流重新命名。这些希腊名称除特里波利之外无一流传至今。军事坞堡、移民地及希腊化村镇日后大多发展成为城市。如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塞琉西亚发展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和繁荣的商业中心。希腊化城市都经严格勘选和规划,城市内部多建有祭坛、剧院、竞技场、公共浴室及其他设施。塞琉古王国通过各地的希腊—马其顿城市和移民地来达到下辖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这些城市一般保持希腊城市的外在特征,如部落、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员、城市法令与财务规定等建置。新建立的城市,拥有国王给予的土地,城中往往也有一些当地居民。他们或杂居,或住在专门的街区。有的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发展迅速,有些城市有一定的自治权。移民地是军事殖民地而非城市,一般建在当地村庄附近,由服役期满的军人驻屯,有自己的官员,对内部事务有一定权力。各种类型的希腊化城市与移民地的存在,虽然确实从外部加强了对当地人的控制与影响,但在历史上它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文化的,它们是希腊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文化主要从这些城市产生,并向外部传播。

在政治上,塞琉古王国推行国王崇拜、强化王权。宫廷设有宰相、议事会、秘书处。高级官吏由王亲国戚和王室亲信充任,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等长期被排除在官僚阶层之外。塞琉古王国沿袭波斯行省制,但控制较松驰。全国分为 25 个省,72 个州府。行省设总督,财政归财务使,他直接向安条克的财务大臣负责。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偶尔负担军事义务和不正规的贡赋。

希腊化时代叙利亚政治经济文化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使叙利亚本土经历了深刻的希腊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化文化是指从亚历山大东侵以来，到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为止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之后各希腊化王国的建立，将希腊文化广泛地传播到西亚北非地区，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原有文化对希腊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内容，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交流融会的结晶。虽然它们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言，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它不仅包含了一定的东方文化的因素，而且是对变化了的世界的反映。希腊化文化对西亚地区叙利亚的影响是深刻的，尤其是与马其顿人政治统治相比，希腊化文明在叙利亚地区的存在与影响要久远深刻得多，并持续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产生之时。希腊化文化虽然是希腊文化与西亚北非土著文化相互融合折中的产物，但地区不同，希腊化文化影响也不尽相同。例如叙利亚北部作为塞琉古王国的中心地区，几乎成为第二个马其顿，希腊化文化在这里获得广泛传播，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宗教观念。例如，塞姆人的主神巴勒神转变为宙斯奥林皮亚神。安条克南部的宗教圣地被命名为达弗尼(Dapne)女神圣地。安条克阿波罗神殿成为来自各地叙利亚香客定期朝拜的圣地。叙利亚沿海腓尼基城市与希腊文明的交往已有数世纪之久。它们对希腊化文化的态度积极主动，因此与阿拉米人，尤其是与犹太人相比，希腊化文化在腓尼基地区的融合与发展更为和谐顺利。与安

条克相比，这里的希腊化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毫不逊色，其中南部的阿什克伦是重要的希腊化文化中心。

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地区的政治统治，是以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为支柱的专制统治。希腊人建造的城市和本地原住民聚集的城镇均具有一定的自治特权，但同时也有广大无城市建制地区存在，这构成了塞琉古王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有的以寺庙为中心的城镇和公社。在农村地区，较为原始的村社组织广泛存在。在一些希腊化城市中，公民享有土地私有权。城市内部有公民选举的自治机构，但必须向王国政府纳税上贡。向王国政府纳税往往以实物和以城市部族名义由他们的君主或祭司缴纳。王室收入还包括人头税、盐税等。矿山、采石场、森林以及渔业资源由王室所有或开办，其收入由王室垄断。在农村“王室农民”耕种属于王室、高官、显贵的“王田”或“让与”土地，向王国政府或土地所有者交租，其中什一税最通行。

叙利亚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商业传统，商贸活动活跃，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来自阿拉比亚、印度、中亚等地的商贾来此经商。他们转运至本地的商品，一方面在本地消费；另一方面则转手运往希腊和罗马地区，从而促进了叙利亚地区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商贸联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一度成为叙利亚贸易活动的竞争对手。塞琉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连绵不断的战争既有政治因素，同时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因素，即争夺地区间贸易的主导权。塞琉古王朝时期叙利亚南部即巴勒斯坦以南地区常常处于托勒密王朝控制或影响之下，因此来自阿拉比亚、印度等地商品主要通过波斯湾，再由叙利亚地区运往欧洲。叙利亚转手贸易陆路与海路并举。同时本地区的手工业及农产品也向周围邻近地区出售，因而

促进了叙利亚人的经济繁荣。在贸易活动中,奴隶贸易十分活跃。战争及海盗活动为奴隶贸易提供了来源。

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叙利亚地区的农业和园艺已发展为本地区经济的重要部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和腓尼基沿海地区,以及巴勒斯坦等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在对外战争、贸易和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生产的产量已达相当规模,农产品除传统的谷物以外,果疏的品种和产量也有较大增加。由于不同地区的相互交往范围扩大,先进的耕作技术不断引进,进而促进了农业发展。

手工业方面,腓尼基的木材加工与造船业,巴勒斯坦酿酒与食用油加工,叙利亚的纺织业等依然在西亚地区保持领先地位。制陶业及玻璃器皿的制作技术受希腊人的冲击一度萧条下来。经过模仿学习,改进工艺,叙利亚人的制陶及玻璃器皿的制作业再度兴盛,特别是彩釉陶器的制作已相当流行。腓尼基沿海地区的玻璃器皿的制作与出口在希腊化国家和地区享有盛名。在希腊化时代泥板文书的制作材料已被羊皮纸及纸沙草取代。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长足发展。南方的奈伯特阿拉伯地区,陶鲁斯山区的银矿与铁矿,以及本地区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铁矿和铜矿为金属冶炼提供了丰富矿产原料。无论是战争的需要还是经济的发展,金属及其冶炼技术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所有的希腊化王国中,铸币技术都因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而有提高。除去首都安条克之外,在阿拉杜斯、西顿及大马士革等城市中都设有地方政府下辖的铸币场。货币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并逐步取代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方式。

由于内外贸易的增长,手工业的繁荣,农业生产的进步以及货币的使用和官方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的推行,在塞琉古王国统治时

期，叙利亚地区的经济经历了相对繁荣的时期。叙利亚人普遍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尽管政治动荡和外族入侵频繁，但叙利亚的人口不断增长，到罗马人统治初期，叙利亚的人口数量大约已增加到500万至600万之间。

塞琉古王国时期，是叙利亚地区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贫困的时代，王国的统治者们并不像某些后世的帝国君主们那样关注和奖掖学术活动。希腊化时代的叙利亚虽然也产生过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但他们多数人的学术水平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化王国和地区相比，相对落后。但受斯多噶派哲学的影响，叙利亚地区曾出现过不少斯多噶派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公元前135年出生于叙利亚奥沦河中游城市阿帕米亚的波赛东尼厄斯（公元前135－前51年）。波赛东尼厄斯同时还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继承了希腊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公元前200－前118年）的史学研究，并对罗马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公元前63? －公元24?）和希腊传记作家蒲鲁塔克（公元46? －120?）产生过重要影响。他还著有《论海洋》，提出五带的划分，把潮汐之因归于月之盈亏。他求学雅典，云游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西里西亚等地，最后作为斯多噶学派的学术泰斗，定居于罗得岛。公元前51年亡故于该岛。据传，罗马大将庞培征服叙利亚之后，返回罗马途中，曾在罗得岛逗留并亲自聆听波赛东尼厄斯授课。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西塞罗自称也聆听过波赛东尼厄斯的授课。根据菲利普·希提先生的研究，斯多噶派哲学在叙利亚盛行缘于其哲学思想在初创之日起就与塞姆人的人生观，与塞姆人化的希腊文化思想和希腊化的塞姆人道德观念

存在密切联系。斯多噶派的学说兼有唯物与唯心的因素，以重视现实世界为特征。斯多噶派学说提出“人人皆兄弟”和世界公民的政治主张，其理想是建立一个由理性所统治的世界国家。这些政治主张及其理想迎合并反映了叙利亚地区长期以来屡遭外族侵略，人民生命屡遭涂炭，社会财富屡遭劫掠，民族文化屡遭摧残，渴望安定和平的愿望。同时也符合希腊化时期文化从城邦文化走向帝国的、世界性文化总的时代趋势。在文学艺术方面，希腊化时代的叙利亚地区也出现过一些有成就的诗人。西顿的安提帕特，加达拉(今约旦乌姆盖斯附近)的菲洛德莫斯以及出生于加达拉、后移居提尔的麦利吉尔等。他们的诗歌创造多以田园诗、讽刺短诗、赞美诗等为主。由于希腊化的影响，他们的诗歌创作形式和内容有所创新，但他们的成就与同时代希腊化地区诗人如提奥克里图斯等不能相提并论。

二、罗马帝国时代的叙利亚

帝国统治与地方自治

公元前 64 年，史称古罗马“前三头政治”人物之一 G. 庞培将军彻底征服已十分孱弱的塞琉古王国。地理上和传统上的叙利亚地区被纳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统称叙利亚省。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叙利亚作为帝国行省始终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的行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任命的总督管辖；另一类为皇帝直辖省，由皇帝指派的总督管理。后者是一些还未完全绥靖的边疆地区或军事战略要地，驻有正规的罗马军

团，总督有权指挥境内驻军。叙利亚地处帝国东南部边陲，是防范东方帕提亚帝国的前沿地区，因此它直属帝国皇帝的管辖，属第二类罗马行省之一。其首府设于塞琉古王国的故都安条克。

叙利亚行省的首任总督是A.加比涅斯，握有军事与税收大权。他执政期间重建了马卡比人毁灭的希腊化叙利亚人城市萨马利亚、西索波里斯和加沙，并将犹太人王国肢解。公元前54年，贪婪的克拉苏继加此涅斯成为叙利亚总督，翌年在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中被杀。继任总督加西阿斯收拾克拉苏留下的残局，与帕提亚人对峙于安条克城下。帕提亚人久攻安条克未果，后沿奥沦河撤出叙利亚。此时正值罗马内部内战正酣之际，叙利亚行省处于动荡之中。行省北部及东部阿拉伯人，南部的奈伯特人、犹太人，腓尼基沿海的海盗蔑视罗马人的统治权威。至“后三头政治”时期，“后三头政治”人物之一M.安东尼攫取了包括叙利亚、埃及在内的罗马东部行省，叙利亚的混乱并未因此而改善。公元前40至38年间，帕提亚再度入侵叙利亚，除提尔等少数城市之外，帕提亚人几乎将罗马人赶出叙利亚全境。尽管此后不久罗马人恢复对叙利亚的统治，但是另一位“后三头政治”人物屋大维与安东尼形成争雄之势，并于公元前31年在阿克提乌姆海战中，击败安东尼。屋大维被共和国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尊号，确立了个人专制统治，罗马从此进入奴隶制帝国时代。奥古斯都及其后代罗马皇帝的统治，在帝国境内开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并在公元1世纪前后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罗马和平”时期，也正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叙利亚地区完全纳入帝国的政治统治之下。当地的居民们获准有限的自治，保持自己的宗教、语言与习俗。居民们不再充军服役，以岁赋而代之。作为防范帕提亚帝国的边陲省份，叙利

亚自始至终由罗马帝国军部直接委任的全权总督治理。他们的任期往往只有3至5年，但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地位。叙利亚历任总督由兼管行政的地方财政长官扶佐。在叙利亚地区通常驻扎4个罗马人军团，负责帝国在西南亚的军事安全。

当地社团是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希腊—马其顿人殖民地由地方执政官管理，在他之下设有元老院或公民院。腓尼基人城邦保持了传统的寡头政治，阿拉米人的内部事务则仍保持传统的管理方式，阿拉伯人的霍姆斯及贝卡地区由它们的城市君主治理，沙漠边缘的阿拉伯游牧民保持部落族长的统治传统。在犹太人社团中，最高士师不再享有君主的权利，他们由犹太贵族提名并担当犹太社团的领袖。上述情形说明，罗马帝国的地方政治统治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和自治传统。

叙利亚人的社会经济生活

罗马帝国统治之初，东部行省包括叙利亚地区在内，希腊语保持了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优势，阿拉米语仍为地方方言，拉丁语则为统治者的官方语言。罗马人在艺术及哲学领域的贫困，反衬出希腊化文化在叙利亚继续居于优势的地位。叙利亚的希腊人城市生活方式仍在延续。犹太人、阿拉伯人城邦，朱迪亚、皮特拉、帕尔米拉等在罗马人统治之初仍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

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叙利亚地区的种族与文化融合开始加快，在叙利亚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能发现腓尼基人、阿拉米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马其顿与希腊人的活动踪迹，昔日的种族对立与民族分治已渐趋消失。相反，罗马人与当地居民保持着距离，他们在贝鲁特及巴勒贝克等地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城市日后演变为

罗马文化的中心区域。罗马人只是将叙利亚当作防范帕提亚帝国的基地而关注它的军事价值；叙利亚人也只是在他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对罗马人的军事行动产生兴趣。罗马人在叙利亚的行政管理并不像在西班牙及高卢地区那样成功。罗马人对叙利亚希腊人聚集区、腓尼基人城市及犹太人城镇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甚微。但是阿拉伯人如以东人、奈伯特人等对罗马人文化的反应有所不同。叙利亚是罗马帝国在近东的权利中心，罗马帝国行政当局沿沙漠的边缘地区修建起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军事营地，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扰。贯穿帝国东西的驿道，将两河流域的城市与地中海城市联系起来，加之政治相对稳定，从而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恢复与繁荣。

罗马帝国的统治客观上使叙利亚免除了外族的侵扰和内部的动荡，也为擅长商业贸易的叙利亚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商业市场。在帝国统治的第一个世纪中，叙利亚从内外战争中逐步恢复。帕提亚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被阻止。公元 70 年后，特别是自公元 96 年罗马皇帝诺尔瓦执政时起至马尔卡斯·奥里欧斯（公元 121－180 年）执政时期，叙利亚地区经历了近百年的繁荣与发展时期。社会的安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公元 1 世纪中期，叙利亚地区人口增长至 7 百余万。奥沦河河谷、豪兰高原地区，甚至外约旦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耕作技术的改善，成为农业发展相当繁荣的地区。叙利亚园林艺术在帝国境内堪称园林艺术之最，是古罗马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叙利亚的园林艺术可追溯至塞姆人时代的初期，至罗马帝国时代时更趋完美。安条克、大马士革及耶路撒冷的贵族园林及私家花园饮誉罗马世界。

工商业方面，染织业仍然是腓尼基地区手工业的传统优势行

业，腓尼基的猩红色染料仍然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叙利亚的亚麻制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帝国各地，裘皮制品更是以优良的质地享誉各地。叙利亚本地出口的土特产品包括医药制品、香料及其果酒等。死海地区的磷酸盐、大马士革的雪花石膏和琥珀、安条克的石灰岩以及丰富的铜矿资源得到了大规模的开采。另外西顿的铜器及玻璃制品，仍然长盛不衰。商业的繁荣为叙利亚人创造了财富。皮特拉、帕尔米拉以及腓尼基城市都因商业的繁荣而富庶殷实。尽管意大利人、希腊人也有经商天赋，然而叙利亚的商业优势在帝国境内无人匹敌。来自阿拉比亚、印度、波斯乃至中亚地区的商人及商品从叙利亚穿行而过，一些传统商埠也因此再度兴盛起来。

罗马帝国时代的叙利亚农村地区与以往相比无明显变化。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遍布数以千计的村社，农民们的生计以园林果蔬及农耕为主。这里似乎并不存在农奴制。与农民为邻的是木匠、铁匠、制鞋匠及商店店主。可以说，罗马人统治对广大乡村地区影响微乎其微。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基本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农民之上是本地贵族，他们占有土地和牧场。贵族阶层同时又是宗教事务的领袖。富有的商人及手工业主居住在商业发达的城市、沿海地区和希腊—罗马人的殖民地。帝国政府及地方官员们生活在中心城市。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家族观念依然盛行，是社会组织及结构的重要纽带。

文化与宗教

罗马帝国时代叙利亚的文化遗产，首推罗马化的建筑艺术。从北部安条克到中部的帕尔米拉，从中西部的巴勒贝克到南部的

皮特拉，罗马帝国时代的建筑遗址至今依然昭示着其昔日的宏伟与壮观。文学艺术方面叙利亚人对拉丁文学的贡献除贝鲁特出生的普罗布斯之外，有成就的学者寥寥无几。普罗布斯定居罗马后，潜心研究罗马艺术和古典罗马文学，先后翻译威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赫瑞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年）的诗集。他的重要贡献是为罗马帝国后期的古典文学奠定了基础，是罗马帝国时代屈指可数的语言文字学家。这一时期与叙利亚人对拉丁文化的贡献相比，他们对希腊文化的贡献更有影响。其中最有成就的人物是公元37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他的代表作是《犹太史》和《犹太战争》。《犹太史》引用大量旧约圣经的资料，勾勒出犹太人的历史概况，特别是对后期马卡比人和希律王统治时代犹太人历史做出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犹太战争》一书使用的是阿拉米语，作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在书中详尽叙述了犹太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军事斗争。同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文化名人还有毕布鲁斯的语法学家及作家菲洛（公元61－141年），拉塔基亚的雄辩家麦纳德尔以及伽姆布利切阿斯。伽姆布利切阿斯生卒日期不详。他曾编撰了巴比伦历史，还被认为是最早使用希腊语创作爱情故事的作家之一。这一时期，提尔人马里纳斯在地理学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据认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根据经线与纬线制作地图的地理学家，是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在哲学领域，菲利甫·希提先生认为，是纽曼涅斯在叙利亚阿帕米亚开创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尽管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普鲁太纳斯（公元205－270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不过，纽曼涅斯的声誉无法与玻尔菲利相比，玻尔菲利编辑整理了柏拉图的著作，他本人也是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并且著述颇丰。贝鲁特是腓尼基地区罗马

文化的中心，这里的法学研究特别是民法研究自公元前二世纪初至公元六世纪中期长盛不衰，众多法学专家及学子云集于此。建于此地的法学院在罗马帝国时代后期享有盛誉。其中两位学者帕皮尼安和乌勒皮安的学术成就最具影响，他们因参与制定查士丁尼法典而在法学及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叙利亚语（阿拉米语）文献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约圣经及早期基督教文献。

罗马帝国时代，在叙利亚地区仍盛行多神崇拜及偶像崇拜。帕尔米拉的天地之神起源于巴比伦；安条克的阿波罗太阳神及多弗尼女神是希腊化世界敬奉的神祇；巴勒贝克的哈达德主神崇拜是希腊罗马神祇与当地宗教神祇的混合物。公元一世纪中叶，在叙利亚南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它最早出现于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下层群众中间。恩格斯曾经指出：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从犹太人中产生是与其历史密切相关的。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犹太人曾先后遭受埃及、亚述、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塞琉古王国的奴役，公元前63年又为罗马人征服。在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屡次进行反抗，在公元66－70年、113－116年、132－135年先后爆发了三次大起义，但都遭到血腥镇压。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戮，或被驱逐。犹太人民特别是流落异乡者深受国破家亡之苦，在苦难重重和复国无望的情况下，只有在宗教中求得一些精神安慰。于是在下层居民中出现了一些秘密教派，原始基督教就是从这些秘密教派中逐渐形成的。

基督教最初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或“异端”出现的。它继

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和救世主观念以及创世神话等等，并接受犹太教的《圣经》而称之为《旧约》。但与犹太教又有不同，它信奉耶稣为救世主，说他是上帝之子。为了拯救人类降临人间，耶稣到处传道显灵，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死后三天又复活升天。它宣称耶稣将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所以，基督教把耶稣的神话传说作为基本教义，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作为信仰的标志。其实耶稣的生平未见于公元1世纪任何记载，《圣经·新约》中有关耶稣的记载，都是在二世纪才笔录成书，不足为信。历史上究竟有无耶稣其人，历来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耶稣可能是犹太人中某个秘密教派的领袖，其事迹传说开来，被蒙上神话色彩，附合为神。所以，与其说是耶稣创立了基督教，不如说是基督教创造了耶稣。基督教产生后，因其主张与犹太教传统教义相抵触，犹太教不承认耶稣为救世主，遂将该派教徒逐出教门，于是基督教便和犹太教分离，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区，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其信徒多为犹太人。信徒的社会成分有自由民，也有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但主要以下层群众为主。犹太人创立的原始基督教，打破了民族宗教的狭隘性，建立了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不分民族、不分阶级，只要信奉耶稣和遵守教义，人人都可以成为教徒并得到上帝的拯救和赐福。基督教改革礼仪，废除原始宗教中大量献祭及繁琐仪式，为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城乡居民尤其是社会下层中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基督教产生后，迅速传播，不仅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而且在希腊乃至意大利半岛等地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基督教教徒日益增多，成分日益复杂化，原始基督教的社会成分、组织和教义也不断发生变化。直至拜占庭帝国时期，基

督教逐渐蜕变并被拜占庭帝国皇帝所利用,受到他们的控制和庇护,进而完全蜕化为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第三章　阿拉伯帝国初期的统一与兴盛

一、伊斯兰兴起前的叙利亚

拜占庭时期叙利亚行政区划和基督教化

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定都，并将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因此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它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交界处，领土以巴尔干、小亚细亚为中心，包括亚美尼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被北方蛮族所灭。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至公元1453年。但是拜占庭帝国对叙利亚的控制，在公元7世纪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兴起及对叙利亚的征服宣告结束。公元4世纪末，作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省，叙利亚被划分成7个地区。北部继续沿用叙利亚名称，但划分两个区，即以安条克为首府，以毗邻城市塞琉西亚、拉塔基亚、加巴拉、阿勒颇、卡尔息斯等重要城镇为主的第一叙利亚区；和以阿帕米亚为中心，以邻近的哈马、拉尔伊萨等为主要地区的第二叙利亚区。腓尼基也分为两

个区，提尔为第一腓基尼区首府，该区包括阿科、西顿、贝鲁特、毕布鲁斯、特里波利、阿拉杜斯等。第二区以大马士革为首府，包括埃得姆萨、希利俄波利斯等城市。第一腓尼基区为原腓尼基沿海地区，但第二腓尼基区是此前从未隶属于腓尼基地区的叙利亚中部及内陆地区。巴勒斯坦地区则被划分三个区：第一巴勒斯坦区首府是凯萨里亚，该区城市包括耶路撒冷、纳布卢斯、雅法、加沙、阿什克伦等。第二区包括西索波利斯、伽达拉和太巴列等城市，以西索波利斯为首府。第三巴勒斯坦区主要由原罗马帝国阿拉比亚省构成，以皮特拉为首府。

罗马帝国的分裂及叙利亚行政区划的改变似乎并未对叙利亚内部联系及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在拜占庭统治叙利亚时期，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一如既往仍由叙利亚人及希腊人控制。特别是在叙利亚，腓尼基商人的贸易活动远及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商埠，如罗马、那不勒斯、迦太基、马赛和波尔多。但是叙利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宗教信仰却发生巨大变化。拜占庭帝国时期因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传播，特别是君士坦丁一世等帝国皇帝的推动下，叙利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是叙利亚历史上惟一个基督教化的历史时期，教会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机构，教会的圣徒们成为社会中最令人敬重的人物。从公元 4 世纪至 6 世纪，僧侣、修女、隐士、牧师、主教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朝觐活动兴旺一时，禁欲主义甚为流行。在君士坦丁执政时，由于正统教会对教义存在分歧，因此教派争端十分激烈，其中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阿里乌斯派反对正统派主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否认基督的神性。阿里乌斯派违背“尼西亚信条”遭到斥责，阿里乌斯本人被革除教籍，予以放逐。但阿里乌斯派却广泛

流行于叙利亚及埃及地区。公元5世纪初,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兴起,并流行于叙利亚东部地区。其创始人聂斯脱利乌斯出生于西里西亚,公元428年升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由于聂斯脱利派主张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不是结合于一位(一位二性),而是分为二位(二位二性),被斥为异端,并受到迫害。教徒们被迫逃亡波斯,于公元5世纪末成立独立教会。继聂斯脱利派之后,一性派又称雅各派在叙利亚西部流行开来。一性派也否认基督耶稣集“神性”与“人性”于一体的信条。一性派宗教观念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期,被叙利亚北部多数地区所接受,同时在叙利亚南部赢得主导地位。至此,一性派在流行聂斯脱利派的叙利亚东部以外其他叙利亚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并由此传入北方亚美尼亚和南方的埃及。一性派教派创始人雅各·伯拉德伊斯于公元543年任命为埃德萨主教,公元578年亡故。一性派因其创始人雅各又被称为雅各派。在叙利亚基督教化时代,还流行另一教派基督教马龙派,这一支派也因其创始人马龙而得名。该教派起初流行于奥沦河流域,公元6世纪初因与雅各派教徒发生冲突,马龙派教徒移居今天的黎巴嫩北部地区并逐渐演变成本地区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社团。

加萨尼王国

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兴起前的几个世纪中,加萨尼王国在叙利亚中南部兴起。大约公元3世纪末期,也门马里卜大坝决口,一支南阿拉伯人(艾兹德人)部落,沿着也门通往叙利亚地区的商道,迁徙到大马士革东南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加萨尼国。加萨尼王国以大马士革附近的季里格为首都(也曾将罗马

人殖民地布斯拉作为首都)，其版图大致包括大马士革周围地区、叙利亚东南部、约旦和西奈半岛部分地区。加萨尼人进入叙利亚后改信基督教，同时被叙利亚人所同化，接受了叙利亚阿拉米语，但他们并未抛弃母语——阿拉伯语。5 世纪末叶，加萨尼人逐渐被纳入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成为拜占庭帝国防御来自沙漠地区贝都因人侵扰的缓冲国和打击为波斯人效力的莱赫米人的同盟国。双方曾订立盟约：当加萨尼人受到贝都因人侵袭时，拜占庭帝国提供援兵 3－4 万人；当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交战时，加萨尼提供援兵 2 万人。

6 世纪是加萨尼王国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国王中，哈里斯二世是最具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加萨尼编史中最伟大的君王，同时也是同期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曾打败了劲敌莱赫米王国孟迪尔三世，为此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他为叙利亚各阿拉伯部族首领，并封他为贵族和族长，这是仅次于皇帝本人的最高封号。哈里斯在位期间长期征战，但都是为拜占庭帝国效力，因而国力消耗巨大。公元 544 年，在与莱赫米人交战中哈里斯二世的儿子被俘。不过 10 年后，哈里斯在著名的"哈里玛之役"中大败希赖国王门才尔，加萨尼王国的地位不断加强。哈里斯二世公元 563 年在君士坦丁堡觐见查士丁尼一世，他威武的仪表，令拜占庭朝野折服。哈里斯二世力荐埃德萨雅各·伯拉德伊斯担任叙利亚阿拉伯人的主教。雅各是一性派教会的创始人，他对一性派教会在叙利亚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哈里斯二世在叙利亚基督教化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哈里斯二世的继任者是其子孟迪尔，即拜占庭历史上的阿拉孟迪洛斯。孟迪尔是一性派教会的热心支持者和维护者。公元

580年他游历君士坦丁堡，受到提庇里阿斯二世皇帝的热烈欢迎。孟迪尔曾击败莱赫米人并捣毁其首都希赖城。孟迪尔极力庇护一性派教会，加之其他曾背叛拜占庭朝廷的举动，因而受到皇室的猜疑而遭拘捕。其子努尔曼继承王位之后，举兵袭击拜占庭边境地区，拜占庭皇室予以回击，并将他俘虏后囚禁于君士坦丁堡。

在努尔曼之后，加萨尼人陷入无政府状态。叙利亚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也脱离加萨尼王朝，各自为政。东方的萨珊王朝不断侵扰叙利亚地区，公元613－614年萨珊王朝皇帝伯尔威兹曾一度占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加萨尼王朝遭到致命打击。阿拉伯历史学家认为，哲伯莱·伊本·艾伊海木是加萨尼王国最后的国王。公元636年，阿拉伯穆斯林人征服叙利亚时，艾伊海木与拜占庭结盟，抗击阿拉伯穆斯林的进攻。据说，艾伊海木曾皈依伊斯兰教，因在朝觐穆斯林圣地天房时与哈里发欧麦尔发生争执又抛弃了伊斯兰教，后流亡君士坦丁堡。加萨尼人被阿拉伯穆斯林人征服之后皈信伊斯兰教。

加萨尼人来到叙利亚后，接受了基督教，并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叙利亚阿拉米文化，因此他们的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他们所达到的文明程度高于劲敌希赖国的莱赫米人。他们曾经生活的主要区域豪兰地区遗存有玄武岩筑起的房屋、宫殿、凯旋门、公共澡堂、水道、剧院和礼拜堂等。在加萨尼人的极盛时期，仅豪兰地区就有三百余座城镇，有些城镇的遗址至今仍然是游客们旅游观光的胜地。不过，加萨尼人的文化由于过早地遭到摧残，在历史上对后世的影响不大，甚至不及曾被他们多次击败的莱赫米人。

二、征服运动和伍麦叶王朝

阿拉伯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征服

公元7世纪初,叙利亚地区因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长期战争而处于混乱状态。就在两大帝国不断争斗之际,在阿拉伯半岛上一个新的帝国正在孕育成长之中。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首先创立了伊斯兰教,进而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号召阿拉伯半岛各个部落消除氏族部落间的分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提出众信士皆兄弟的口号,劝诫民众顺从真主,服从真主的使者。伊斯兰教顺应了阿拉伯各氏族部落要求结束分裂状态、实现民族统一的共同愿望,使历来惯常劫掠好斗的各部落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实现了团结统一,进而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铺平了道路。伴随着新宗教的胜利,以伊斯兰教作为共同宗教信仰的第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于公元622年在麦地那诞生。公元630年整个阿拉伯半岛各部落都接受了伊斯兰教。翌年底半岛地区基本上统一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初步形成。

公元631年,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突然病故,加强新兴国家统一的重任落在了他的接班人——哈里发们的肩上。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局势,巩固了半岛上阿拉伯人的团结和伊斯兰化。为解决各部落间的内部冲突和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在为真主而战的口号下,执政者把阿拉伯各部落的尚武精神及时地引向对外扩张,新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从此开始大规模的征服运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634－644年)执政时,将征服运动推向高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叙利亚被阿拉伯穆斯林所征服。在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运动之前,阿拉伯贝都因人时常袭扰叙利亚地区,与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战斗时有发生。先知在世时,叙利亚人对他创立的宗教及新兴的统一国家知之甚少。据传,先知在世时曾派遣使节出使加萨尼人首府之一布斯拉,因加萨尼人杀害了先知的使者,双方于629年在死海的南端地区爆发冲突。阿拉伯人军队首领宰德·伊本·哈列塞在这次冲突中阵亡。这次冲突是先知在世时对叙利亚人惟一一次战争。但拜占庭皇室及叙利亚将此次冲突视为经常发生的贝都因人的侵袭。然而这次冲突却揭开了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历时数世纪的对抗和征服叙利亚的序幕。

公元633年秋,阿拉伯穆斯林军队首先沿地中海东岸向叙利亚推进。另两支部队沿通往叙利亚及北方的商路和朝觐者的道路向北进发。633年秋,哈立德·伊本·韦立德首先夺取了希赖王国。叶齐德率领另一支部队在死海南岸击败巴勒斯坦拜占庭皇室贵族塞基阿斯。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霍姆斯指令其弟西奥多罗斯为统帅奋力反击时,哈立德奉命率部经18天的艰苦行军穿越沙漠,突然出现在大马士革附近,在希拉特草原大败加萨尼王朝的基督教军队。哈立德由此向布斯拉挺进。公元634年7月,阿拉伯军队取得艾只那代因战役胜利后,整个巴勒斯坦乃至叙利亚的门户洞开。阿拉伯军队会师巴勒斯坦后,哈立德担任了联军最高指挥,并开始了有计划的进攻战役。首先攻陷加萨尼王朝的都城之一布斯拉。635年秋,大马士革被围困6月之久,城内文官、牧师们变节,大马士革投降。同年,巴勒贝克、霍姆斯,翌年哈马、阿勒颇、安条克被占领。只有耶路撒冷、凯撒里亚等少数城市坚守待援。

当阿拉伯军队在叙利亚不断推进之时，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在北方集结兵力5万余众，由其弟西奥多罗斯统率，准备决战。哈立德放弃霍姆斯及战略要地大马士革，布重兵于约旦河支流雅尔穆克河谷地区。两军经数月小规模冲突后，于636年8月20日展开决战。烈日炎炎、热浪翻滚的战场上，战马嘶鸣，杀声震天。拜占庭正规军和亚美尼亚、阿拉伯雇佣军在神父牧师的祈祷和十字架的助威下，不断发起攻击。骁勇善战的阿拉伯贝都因人以一当十，势不可挡。正当激战之时，一场沙暴突袭而来。惯于在风暴中作战的阿拉伯贝都因人逐渐占据战场优势，拜占庭军队则向鲁卡德河谷退却。在阿拉伯人的追击下，西奥多罗斯本人被杀，惊恐万状的拜占庭军队群龙无首，立成乌合之众，逃生者寥寥无几。叙利亚的命运就此注定。希拉克略感慨不已地叹息道："叙利亚！永别了！在敌人看来，这是多么美丽的地方啊！"

雅尔穆克战役之后，阿拉伯人收复大马士革、霍姆斯等战略要地，继之北进攻占阿勒颇、安条克，直抵陶鲁斯山脉。天然屏障陶鲁斯山脉阻断了阿拉伯人的北进之路。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阿卡、提尔、西顿、贝鲁特、毕布鲁斯、特里波利相继落入阿拉伯人之手。耶路撒冷于638年、凯撒里亚于640年向阿拉伯人投降。至此历时7年的叙利亚征服战争宣告结束。

被顺利征服的原因

阿拉伯穆斯林对叙利亚征服始于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完成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期。对叙利亚征服十分顺利，仅历时7年便宣告结束。究其原因首先是，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实现了团结统一。新宗教对一盘散沙的民族产生了强大

的凝聚力和无比的感召力，使阿拉伯人成为当时西亚历史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在圣战口号的鼓舞下，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这一新生力量向外迸发。阿拉伯穆斯林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拥有敌人前所未闻的适宜沙漠作战的马匹和兵器，加之战术灵活和行动迅速，因而他们的军队所向披靡，令敌军闻风丧胆。第二，长期盘踞叙利亚的拜占庭人在与波斯人的长期战争中已元气大伤，面对阿拉伯人的强大攻势，无力抵抗。第三，被征服地区广大民众的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塞姆人看来，阿拉比亚人，比那些令人生厌的拜占庭人亲近得多。从种族上说，阿拉伯半岛是塞姆人的发祥地，自古以来他们陆续移居到肥沃的新月地带。如前所述，就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不久，还有一些也门的阿拉伯部落迁居到叙利亚，所以这里的居民与半岛上的阿拉伯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宗教上看，伊斯兰教更容易被征服地的人们接受，因为他们始终把基督教看作外来宗教。叙利亚的一性派教徒，历来备受拜占庭皇室教会的迫害，他们不愿抵抗阿拉伯征服军队。经济上，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相反，阿拉伯人征税较轻。由于“拜占庭和萨珊王朝的老百姓渴望摆脱残酷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他们对统治者恨之入骨，把阿拉伯人视为救星”。所以阿拉伯人能够顺利地推进征服运动。随着征服运动的推进和结束，一批又一批阿拉伯人来到叙利亚地区，为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化奠定了基础。

阿拉伯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征服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叙利亚地区自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持续近千年的希腊罗马时代就此结束，从此叙利亚回归东方，逐步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从此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

伍麦叶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对外扩张

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在征服叙利亚的同时，还征服了伊拉克、波斯、呼罗珊、埃及以及北非的部分地区。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执政(644-656年)末期，四大哈里发时代大规模征服运动已接近尾声。但是此时阿拉伯人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奥斯曼哈里发于656年被刺杀。阿里继位后，穆斯林内部发生分裂，并爆发内战。当拥护阿里的派别在巴士拉附近的战斗中击败以泰勒哈、祖拜尔、阿以涉为首的反对派之后，以穆阿威叶为首的伍麦叶贵族派成为阿里的劲敌。双方于657年7月26日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畔爆发激战。在阿里派同穆阿威叶的斗争中分裂出来的哈瓦立吉派，即所谓"军事民主派"于661年1月24日刺杀了阿里，正统哈里发时代结束。

阿里死后，在内乱中占得优势的伍麦叶家族的穆阿威叶被叙利亚及埃及上层社会拥立为哈里发，成为伍麦叶王朝的缔造者。穆阿威叶生于602年，是麦加古莱什族伍麦叶家族中商业贵族首领艾卜·苏福扬的次子，皈依伊斯兰教后曾为先知当书记员，后被派往叙利亚对拜占庭人作战，640年被欧麦尔任命为叙利亚总督。他在叙利亚任总督20年，招募和训练了一支对他极其忠诚的军队，为他后来建立伍麦叶王朝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曾率领这一支军队一次次击败拜占庭人的入侵，而且多次向敌方主动发起进攻。他还创建了一支阿拉伯海军，在地中海大显神威：649年占领塞浦路斯岛，654年占领罗得岛，并在655年的"船桅战役"中几乎全歼拜占庭海军。他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伍麦叶家族的世袭王朝——伍麦叶王朝。该王朝自661年建立到750年灭

亡，经历了14任哈里发，存在了89年。

伍麦叶王朝建立后，穆阿威叶及其后代先后在争夺哈里发地位的斗争中挫败对手，巩固和加强了伍麦叶王朝的统治地位。穆阿威叶通过威胁和利诱的手段，迫使可以继任哈里发地位的阿里之子哈桑退出哈里发权位之争。他给哈桑及其家族提供了"巨额的年俸，外加波斯一个县的岁收"，让他隐居麦地那。穆阿威叶执政到680年，指定其子叶齐德为继承人，将哈里发由原来的选举制改变为世袭制，从而破坏了他死后由众穆斯林决定哈里发人选的承诺，此举激起了伊斯兰什叶派的不满。盛邀之下，哈桑的弟弟侯赛因愿意接受人们的拥戴，去库法出任哈里发，但在途中他本人及随从200余人被拦阻于卡尔巴拉。因拒不承认叶齐德的哈里发地位，遭到政府军的无情杀戮。侯赛因死后，祖拜尔（反对阿里出任哈里发的反对派领袖人物之一）的儿子阿卜杜拉在麦地那自任哈里发，并很快得到整个希贾兹地区广大穆斯林的支持。由于叶齐德去世及穆阿威叶二世懦弱和短暂的执政，阿卜杜拉势力扩大，得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承认，直到692年才被马立克哈里发派出的叙利亚军队镇压下去。至此争夺哈里发地位的斗争宣告结束。

伍麦叶王朝国内统治一经稳定，便开始对外扩张，再次掀起阿拉伯穆斯林的征服运动。早在669年时就首先向北方发动攻势，几个回合的胜利后，兵临君士坦丁堡。在著名的七年战争（674－680年）中占领克里特岛，并迂回包围君士坦丁堡。北方的进攻终因气候恶劣、瘟疫泛滥、粮草不济而被迫撤回叙利亚。此后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直至15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才落入穆斯林之手。但是西线与东线的对外征服取得了巨大胜利。698年伍麦叶

王朝军队把罗马人从迦太基和沿海地区赶走,接着又打败了柏柏尔人,完成了对整个北非的征服。711年阿拉伯军队北渡地中海,登陆直布罗陀,远征西班牙。至713年末,整个西班牙被置于伍麦叶王朝的控制之下。732年阿拉伯军队企图征服法兰克王国乃至全欧洲的军事进攻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被法军击败,比利牛斯山成为他们的北部极限。大举西进之时,东部战场也频频告捷。阿拉伯军队在东部战场北线首先出击中亚,占领河外地区。征服吐火罗斯坦后,又占领巴厘黑和花拉子模地区,接着又征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在南线,711年至713年两年中,先后征服阿富汗和印度的信德及旁遮普地区。至此,在伊斯兰教创始人逝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一个西起大西洋东岸,东到印度河和中国边境,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最终形成。

伍麦叶王朝建立与巩固,对叙利亚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伍麦叶王朝是以叙利亚为中心建立的庞大帝国。在伍麦叶王朝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叙利亚地区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与完整的地区载入叙利亚历史史册之中。虽然在希腊化时代,塞琉古王国曾统一了叙利亚地区,塞琉古王国也曾被后人称之为叙利亚王国,但是政治上的统一从未达到伍麦叶王朝时代的程度,其版图更不能与伍麦叶王朝同日而语。伍麦叶王朝之前乃至此后直至现代叙利亚形成之前,叙利亚长期处于分裂、混乱和无政府等交替轮回的状态中。因此,对叙利亚地区来说,伍麦叶王朝统一叙利亚地区无疑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叙利亚作为伍麦叶王朝统治中心,并从这里再次掀起对外征服运动的高潮,从而最终完成了建立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庞大帝国的丰功伟业。这是叙利亚人最引以为荣的历史遗产,是叙利亚在阿拉伯伊斯兰历

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第三，叙利亚地区从此进入到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强盛的时期，而此后的年代中直至近现代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年代可与这一历史时期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三、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

国家与社会

早在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叙利亚时，欧麦尔哈里发为了有效地管理被征服的叙利亚地区，曾将叙利亚划分为四个军区，即大马士革区、霍姆斯区、约旦区（包括加利利）和巴勒斯坦区。这四个军区相当于罗马人占领叙利亚时所建立的四个省区。伍麦叶王朝叶齐德一世征服北方的肯奈斯林后，北方地区又设立了肯奈斯林区。伍麦叶王朝建立后，帝国版图不断扩展，行政区划几经变更，最初的 9 个省逐渐合并演变为 5 个省。但是叙利亚地区一直作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区归哈里发直接管理。在近一百年的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叙利亚始终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虽然各省督区均由哈里发任命的总督管理，握有军政税收大权。但叙利亚地区的军政大权由哈里发独揽，其他政务、税收、宗教事务由他人协理。后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对各省督的权力进行调整并加以限制，例如将税收和司法权集中到中央，但对叙利亚的统治没有大的变化。

在伍麦叶王朝统治的叙利亚社会中，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伍麦叶贵族是社会的最上层，他们握有国家的各种权力。在普通百姓中，叙利亚地区与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分为四个等级。这种

等级制度发端于四大哈里发时期，伍麦叶王朝基本定型。

第一等级是穆斯林统治者伍麦叶哈里发家族及阿拉比亚贵族。广大阿拉伯人通常也被列入第一等级。由于阿拉伯人对农业不感兴趣，因此与阿拉伯征服者一同来到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多聚集于城市。农村及山区虽被征服，但阿拉伯人除定居于少数沿海城市外，广大山区地带特别是黎巴嫩山区的阿拉伯化十分缓慢。黎巴嫩地区实际上在被征服后的好几百年中，一直保持着基督教的特性和阿拉米古叙利亚语。与其他征服地区一样，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起初居于少数，他们的家族团结、崇尚个人才智及与人友善的精神受到当地居民的称赞。阿拉伯语在希哈姆哈里发时期逐渐演变为城市的通用语言，虽然当地的居民仍保持他们的土著语言阿拉米语。当地的知识阶层为了获得政府的职务，把阿拉伯语作为必须掌握的语言。来自乡村的商贩及手工业者为了谋生便利，也逐渐掌握了阿拉伯语。起初，阿拉伯远征军及其家属靠政府供给和战利品生活。后来，他们仿效被征服的拜占庭贵族，占有土地。伍麦叶家族在叙利亚占有大片土地和庄园，奴隶是主要生产者。

第二等级是新穆斯林。他们是土著叙利亚人，但皈依伊斯兰教。起初，在理论上被赋予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权。新穆斯林往往依附于阿拉伯贵族和部落，并逐步成为他们中的成员。新穆斯林对他们的地位不满，部分人因此转而信奉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教义。到伍麦叶王朝中期时，新穆斯林不再享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完全沦为二等公民。他们中的有些人被逐出城市去农村种田，有些人则致力于学术和艺术活动。这些人成为叙利亚传统文化与新宗教—伊斯兰教之间相互融合的桥梁。但新穆斯

林的不满与嫉妒是明显的，因此，日后成为伍麦叶王朝政局不稳的主要因素。

与大马士革等主要城市相比，叙利亚乡村及山区的伊斯兰化要缓慢得多。即使到伍麦叶王朝后期，大马士革等城市已有浓重的阿拉伯伊斯兰特征，但乡村和山区真正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还是十分有限的。根据希提先生估计，732 年前后叙利亚总人口大约 350 万，但完全信奉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不超过 20 万人。

第三等级是所谓“有经典的人”。主要包括同穆斯林立约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以及豪兰地区的萨比安多神教徒。他们可以不从军出征，但要向穆斯林缴纳重税，作为受保护和宽容待遇的报酬。他们享受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民事和刑事诉讼方面，除与穆斯林有关者外，由本教领袖处理。叙利亚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在欧麦尔二世执政前一直享有良好宽容的待遇。欧麦尔二世执政后对他们实施侮辱性限制。例如限制基督教徒获得公职，禁止他们披戴头巾，不能骑有马鞍的马，做祈祷时必须压低声音等。但总体上，由于犹太人善理财、会经营，基督徒文化水平高，他们在伍麦叶王朝政府中还是可以谋得一官半职，如会计、文书、医生等。

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奴隶制在古代塞姆人时期就已存在。阿拉伯伊斯兰时期，奴隶制有所改变。《古兰经》禁止任何穆斯林将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变为奴隶，但并不保证改信伊斯兰教的外族人的自由。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拉伯贵族家庭竞相蓄奴，奴隶买卖生意兴隆。蓄奴对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融合有巨大影响。贵族可以纳女奴为妾，阿拉伯士兵可以同女奴结合，女奴充斥各个阿拉伯家庭。阿拉伯人因此混进了波斯人、罗马人、埃及人等血缘成分。奴隶们主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如种地、兴修水利、采矿

等，有的供家庭役使。伊斯兰教提倡解放奴隶，但释奴的处境十分恶劣。

阿拉伯人与叙利亚的土著居民杂居与混合，共同参加社会经济活动，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加入伊斯兰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士参加政府事务，对叙利亚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阿拉伯人的新概念："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会说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不论他原来的民族成分如何。"

文化与宗教

阿拉伯人来自文化贫瘠的沙漠地区。除去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之外，他们在文化、艺术、科学及学术传统方面与被征服的叙利亚人不能相比。在叙利亚如同过去希腊人向罗马人传播知识一样，叙利亚人向他们的征服者阿拉伯人传播知识和文化。这一时期阿拉伯语言语法研究兴起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与新穆斯林渴望学习《古兰经》以及掌握阿拉伯语以及在政府中谋得职务等社会现象不无关系。阿拉伯语经历了缓慢长期的发展过程，并深受希腊逻辑学与梵语语言学的影响。词典编辑学与语文文献学是这时期发展起来的另一对姊妹学科。这两门学科以及在这时期兴起的另一学科圣训学都是在研究《古兰经》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古兰经》及其圣训研究还为伊斯兰神学及法学奠定了基础。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拉伯历史学开始出现。作为阿拉伯史学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主要是关于阿拉伯部落的研究和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弟子们的事迹的搜集、整理，还有对伊斯兰征服运动的研究。各种类型的公开演讲在伍麦叶时期达到较高水平，甚至有人认为，后世中无任何时代与伍麦叶王朝时期的演讲

艺术相媲美。阿拉伯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大师哈查只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伊斯兰教诞生之后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由于忙于征服和扩张,没有诗歌等创作出现。伍麦叶人获得政权后,爱情诗、讽刺诗等开始出现,其中被誉为爱情诗大王的欧麦尔·伊本·拉比耳和诗中三杰——法拉兹德格、杰里尔和艾赫塔勒最为著名。他们属于赞颂诗人和讽刺诗人,写下不少歌功颂德的政治诗,深得统治者的赏识。

阿拉伯科学技术的基础是希腊人的科学技术。阿拉伯人科学的开端是医学。伍麦叶王朝时期,医学论文及著作开始从希腊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一时期在医学实践上,已能够诊断出麻风病,并将患者进行隔离。对失明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进行登记,并给予特殊对待。据传,欧麦尔二世执政时,曾把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学校搬迁到安条克和豪兰。

伍麦叶王朝存在不足百年,加之内战与对外征服运动,帝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并不稳定,因此伍麦叶王朝时期的叙利亚文化成就并不显著。但是伍麦叶王朝却是阿拉伯文明蓬勃发展的酝酿时期,而叙利亚则是这个酝酿时期各种不同文化交往与融合的摇篮,是沟通古希腊、罗马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桥梁。

伍麦叶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宗教派别活动活跃。首先出现的是盖德里叶派,它是日后曾对伊斯兰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穆尔太齐赖派的先驱。盖德里叶派是最早研究希腊哲学的伊斯兰学派,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来自叙利亚基督徒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公元 675 - 749 年)。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是叙利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曾担任伍麦叶王朝宫廷和政府的顾问。作为基督徒他与穆斯林们讨论神学问题,并编撰对话录,强调基督的神性

和人类意志的自由。受此影响,盖德里叶派反对宿命论的前定说,主张人类的意志自由。公元8世纪后,盖德里叶派发展成为穆尔太齐穆派,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伍麦叶王朝穆阿威叶二世及叶齐德三世曾极力推崇和赞助盖德里叶派的宗教理念。另一个有影响的宗教派别运动是哈瓦利吉派,又称军事民主派。这一派别从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队伍中分裂出来,在信仰上十分严格,重视捍卫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性,提倡原始的民主和平等,反对哈里发必须出自古莱什家族的特权,限制各种奢侈行为,禁止崇拜圣经和朝拜陵墓。哈瓦利吉派与阿里哈里发发生过严重冲突,暗杀了阿里,也刺伤过穆阿威叶。在伍麦叶王朝时期曾多次发动起义和叛乱。

在各种宗教派别中,什叶派影响最为突出。什叶派是伊斯兰教内与逊尼派相对立的一大教派。它虽然产生于麦地那,形成于伊拉克,但伍麦叶王朝的叙利亚及黎巴嫩地区有众多什叶派信徒。它产生于争夺哈里发继承权的斗争中,由拥护阿里的集团逐渐发展演变而成。它在阿里的儿子侯赛因殉难后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宗教派别和神学派别,直到阿拔斯王朝时才最后定型。什叶派虽以伊拉克为主要活动区域,但它曾挑战伍麦叶王朝的统治政权,在争夺哈里发地位乃至推翻伍麦叶王朝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叙利亚被征服的近半个世纪中,穆斯林们聚礼朝拜的场所是原本为教堂的地方,起初并未兴建新的穆斯林清真寺。在大马士革,穆斯林和基督徒是在同一个教堂中聚礼,只是与基督徒分别在教堂的不同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和基督教信徒们都从一个门进入教堂,基督徒进门后向左边汇集,而穆斯林则向右汇集。哈马、

霍姆斯及阿勒颇的清真寺原本也都是基督教教堂，被穆斯林征服后，这些教堂改为清真寺。在叙利亚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清真寺，是哈里发阿卜杜尔·马立克于691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盘石上的圆顶清真寺。哈里发马立克修建该寺的目的是想改变叙利亚穆斯林去麦加朝觐的传统，因为麦加当时控制在反对伍麦叶哈里发的阿里家族后裔阿卜杜拉的手中。另一个目的也许是要以此掩盖圣墓大教堂及其他教堂的光彩。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是叙利亚地区另一个著名的清真寺。它原为浸信会教友圣约翰大教堂。韦立德一世执政时，历时7年将它改建成清真寺。伍麦叶清真寺不仅是一个宗教圣地，更是一个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精品，在穆斯林世界享有盛誉。韦立德一世是伍麦叶王朝最具建筑艺术天分的哈里发，他还组织重建了麦地那清真寺，扩建了麦加清真寺。另外，在叙利亚他曾建立许多学校和医院。在他统治时期，大马士革人享受着和平与富足。

第四章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独立王朝和外族入侵

一、阿拔斯帝国前期的叙利亚

伍麦叶王朝的垮台

伍麦叶王朝在公元8世纪中叶，因腐朽的宫廷生活、激烈的内部派系斗争，导使哈里发威信扫地，统治力量削弱，王朝面临着崩溃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王朝统治下的其他地区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斗争日趋激烈，不满伍麦叶哈里发的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阿拔斯人和呼罗珊人结成反对派联盟。经过一系列宣传活动和起义暴动，以阿拔斯人为首的反对派联盟力量不断壮大。公元750年1月，伍麦叶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麦尔旺二世率政府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大扎卜河一带与阿拔斯王朝首任哈里发艾卜·阿拔斯的叔父阿卜杜拉指挥的军队及其他起义军展开决战。政府军不堪一击，仓皇败逃。麦尔旺二世辗转逃亡埃及，8月在卜绥尔城被杀身亡，伍麦叶王朝就此宣告结束。

伍麦叶王朝的垮台，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政治中心向东方的伊拉克转移。这意味着阿拉伯帝国重心从叙利亚转移到曾经是萨珊

王朝统治下的两河流域，即“从一个拜占庭的世袭王国变成了一个具有中东古代传统形式的帝国。古代东方的因素，突出的是波斯的因素，在这里与日俱增地起着作用”。而对于叙利亚来说，这却标志着叙利亚在阿拉伯历史上辉煌的时代就此结束，叙利亚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就此终结。在阿拔斯王朝统治前期一个多世纪的全盛时代，叙利亚沦为阿拔斯王朝的地方行省。

阿拔斯王朝在叙利亚的统治

叙利亚在阿拔斯王朝时代的首任统治者是哈里发艾卜·阿拔斯的叔父阿卜杜拉。但是阿卜杜拉执政时期并不长久。他成为与其侄子曼苏尔争夺哈里发职位斗争的牺牲品。曼苏尔是阿拔斯王朝真正的缔造者。其兄艾卜·阿拔斯任哈里发4年之后染病身亡，曼苏尔继承哈里发职位。曼苏尔继位后先后除掉了哈里发职位的竞争者其叔父阿卜杜拉和呼罗珊总督艾卜·穆斯林。随着阿拔斯王朝政治重心的东移，阿拉伯人的宿敌拜占庭帝国一度不再成为帝国的主要威胁。但是曼苏尔及其之后的历任哈里发不断巩固叙利亚地区的边关要塞，加强黎巴嫩沿海港口的防御力量，并借此防备叙利亚地区民众的反抗。公元759年，黎巴嫩基督徒由于不满阿拔斯人的统治，反对难以忍受的苛捐杂税，在拜占庭人的鼓动下发动起义。起义军在穆奈提拉首举义旗，并向贝卡谷地进发，后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困境中，遭到镇压。这是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对阿拔斯人统治的起义。此后，叙利亚人不断发动起义和暴动，试图恢复他们从前的势力与辉煌，但均以失败告终。阿拔斯王朝在对各地进行镇压并竭力建立其统治秩序的同时，挑起了早已存在的北阿拉伯人(盖斯人)和南阿拉伯

人(也门人)的纷争。大马士革地区一度成为双方激烈冲突的中心。公元795年,阿拔斯第五代哈里发赖世德任命一位伯尔麦克人为征讨军将领,平息了双方的争斗。哈里发赖世德及其儿子麦蒙执政期间,在大马士革任命了一些精干的总督,他们赢得了叙利亚人的好感。其中伊布拉欣·伊本·麦赫迪能够公平对待盖斯人和也门人。赖世德的去世,引发了争夺哈里发职位的斗争。这一斗争引起了叙利亚地区的骚动。忠诚于伍麦叶家族的叙利亚叛军一度占领了霍姆斯和大马士革。麦蒙(公元813-833年在位)哈里发平定了叙利亚人的反叛,并前往大马士革访问。公元829年出访时,他命令当地政府重新丈量土地以便从叙利亚增加他的国库收入。4年后他再访叙利亚,此次访问的目的是检查当地的司法活动。他曾下令所有的法官必须遵循穆尔太齐赖派的司法教义,否则不能担任法官职务。此后的哈里发中也曾有人在朝觐途中或远征拜占庭时途经叙利亚地区。

在麦蒙时代,叙利亚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哈里发瓦西格(公元842-847年在位)执政时期,叙利亚人享有较为安定的生活。瓦西格的兄弟穆台瓦基勒(公元847-861年在位)执政时,叙利亚平静的生活被打乱。穆台瓦基勒推行宗教同化和歧视政策。实际上,宗教歧视和同化政策在阿拔斯第三任哈里发执政时就已经开始。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伍麦叶王朝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叙利亚,但是在整个伍麦叶王朝时代,叙利亚依然显现出一些基督教国家的景象。阿拔斯王朝才真正开始了伊斯兰的征服。麦海迪执政时曾强制阿勒颇台努赫人信奉伊斯兰教,同时将所有的教堂夷为平地。哈里发赖世德与穆台瓦基勒更是两位褊狭的宗教狂。赖世德于公元807年曾下命捣毁穆斯林征服后又新建的教堂。穆台

瓦基勒更是制定歧视性法律，迫害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大马士革、霍姆斯分别于854年和855年爆发基督徒和新穆斯林的起义，并杀死阿拔斯人派驻的总督。起义招致阿拔斯极为残酷的报复。大马士革城惨遭洗劫，霍姆斯人民虽经抵抗，但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起义领导人或被斩首，或被鞭笞，或被钉死在城门的十字架上。

阿拔斯人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是叙利亚迅速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叙利亚人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改奉伊斯兰教。伊斯兰化的进程中，统治者的同化政策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排除改教者或出于个人利益，或避免侮辱性捐税，或逃避宗教歧视，甚至有些居民企盼社会地位、获得政治权力、享受自由和安全，从而逐渐改信伊斯兰教；但也有一些基督教信徒被迫迁移他乡。在阿拔斯帝国时期，历史上的塞姆人世界都逐渐阿拉伯化。叙利亚地区的自古以来的名称阿拉木，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被闪姆(al - Sham)所取代。阿拉伯语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逐步取代古叙利亚语，这是叙利亚阿拉伯化最重要的特征。尽管这一过程十分缓慢，直至阿拔斯王朝末叶阿拉伯语才真正成为帝国的通用语。与黎巴嫩相比，在叙利亚阿拉伯语取代阿拉米语的过程较为顺利。在黎巴嫩由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本地区古叙利亚语仍较为流行。但在整体上叙利亚地区阿拉米古叙利亚语已逐渐消失。

二、阿拔斯帝国中期统治叙利亚的独立王朝

阿拔斯王朝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度过了它的全盛时期

后，迅速走向衰落。阿拔斯帝国是一个主要通过武力征服而拼凑起来的多民族、多宗教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庞大而松散的联合体，即使在哈里发政权最强大的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对边远省区，更是鞭长莫及。至 9 世纪中叶，主要由于人民起义的打击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哈里发大权旁落，国势衰微，各行省总督和波斯人、突厥人等近卫军首领乘机扩大权势，或自立王朝，或直接控制朝廷，阿拔斯王朝分崩离析，帝国境内独立王朝群雄并起。叙利亚地区在阿拔期王朝中期走向分裂，先后经历了图伦、伊赫什德、法蒂玛、塞尔柱等王朝的统治。

图伦王朝

图伦王朝是公元 640 年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后第一个诞生于尼罗河流域并摆脱中央政府管辖的独立王朝，创立者名为艾哈默德·伊本·图伦(869－884 年在位)。公元 868 年他以省长助理的身份派往埃及，不久升任省长。大权独揽后，他将埃及作为独立的国家进行统治。在采取一系列强国富民措施的同时，伊本·图伦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禁卫军。这支军队成为他使行权力和开疆拓土的工具。艾哈默德·伊本·图伦于公元 877 年乘大马士革总督去世之机，出兵占领叙利亚。首先占领腊马拉，进而夺取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和安条克。公元 880 年，艾哈默德自任埃及叙利亚的统治者。至此，地跨亚非两地的图伦王朝建立起来。图伦王朝的建立对埃及与叙利亚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自托勒密王朝以来埃及重新获得独立地位。叙利亚则从此恢复了一千年前在希腊化时代被割断的与埃及的联系，在此后的数世纪中一直处于埃及的统治之下。

艾哈默德依靠强大的军事机器维系军事独裁统治。为了维持对叙利亚人控制，他在阿卡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埃及兴修水利，复兴农业，促进工商业发展，埃及地区因此逐渐繁荣起来。但是叙利亚却未受此恩惠，公元 884 年胡马拉韦子承父业，成为埃及叙利亚新的君主。胡马拉韦治国无才，却挥霍有方，致使国力耗尽。他把女儿许配给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并以每年 30 万第纳尔的贡赋换取哈里发准其继续执政。公元 895 年，胡马拉韦被暗杀。他的儿子们更加昏庸无能，导致王室内部争斗不休，外部军人干政和暴动四起。在叙利亚，兴起于库法的极端什叶派盖尔麦兑派趁机扩展势力，于公元 901 年攻克大马士革后，又连克霍姆斯、哈马等重镇。

公元 902 年哈里发发兵镇压盖尔麦兑派，挽救了叙利亚地区各诸侯联盟。公元 905 年 1 月，哈里发军队进抵弗斯塔特(开罗古名)，并捣毁图伦王朝首都格塔伊阿，图伦王朝灭亡。

伊赫什德王朝和哈姆丹王朝

图伦王朝倒台后，阿拔斯王朝在埃及和南叙利亚勉强维持了 30 余年的混乱统治。公元 935 年，穆罕默德·伊本·图埃只被委任为埃及总督(935－946 年在任)，并封以古代波斯王侯的高贵称号“伊赫什德”，因此他建立的王朝被称为伊赫什德王朝。伊赫什德以弗斯塔特为都城，在强化内政的同时，也像艾哈默德·伊本·图伦一样建立起强大的军队。他兼并埃及和南部叙利亚的同时，还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伊赫什德在位时叙利亚北部哈姆丹人势力崛起，占领摩苏尔和北叙利亚后，企图夺取大马士革并向南叙利亚推进。伊赫什德在确保南叙利亚与大马士革归属自己控制的情况

下，割让并承认阿勒颇和北叙利亚归哈姆丹王朝统治。伊赫什德王朝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伊赫什德本人死后，其子年幼无知，太师卡富尔专权。卡富尔一度经哈里发御准任埃及、叙利亚和汉志总督。卡富尔死后，法蒂玛王朝名将昭海尔占领埃及，灭伊赫什德王朝，并深入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中部，法蒂玛王朝由此继承了伊赫什德王朝的南部叙利亚遗产。

哈姆丹王朝兴起于10世纪的30年代，其祖先是伊拉克北部阿拉伯塔格利布部落的阿拉伯人。起初，哈姆丹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王朝，定都于毛绥里，今摩苏尔。公元944年，哈姆丹王子哈桑·哈姆丹尼从伊赫什德王朝夺取阿勒颇、安条克和霍姆斯。哈桑继续南进时，遭遇伊赫什德王朝太师卡富尔摄政的顽强抵抗。哈姆丹人被迫承认埃及的宗主权。公元945年，哈姆丹王朝在阿勒颇建立新国都，哈桑的兄弟赛义夫·道莱(946－967年)("国之宝剑"封于哈里发)巩固哈姆丹人统治，将版图扩展至整个北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及西里西亚一部分。哈姆丹王朝与北部强邻拜占庭不断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是十字军东征前阿拉伯人与基督教世界大规模冲突的前兆。公元962年，拜占庭人一度占领哈姆丹王朝的国都阿勒颇。公元967年，赛义夫·道莱去世，其子谢里夫，号称赛耳德·道莱继位(公元967－991年在位)。赛耳德的表兄著名诗人阿卜·费拉斯以霍姆斯为基地向王位发起挑战。拜占庭皇帝尼塞福罗斯趁哈姆丹人内讧之际抢占阿勒颇、安条克、霍姆斯(968年)等地。公元974年，拜占庭人又夺取拉塔基亚至贝鲁特的叙利亚沿海城市以及内陆地区的巴勒贝克。公元975年，赛耳德收复阿勒颇，但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仍然持续不断。赛耳德之子赛义德·道莱991年继位前后，正值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向叙利

亚扩张之际，赛义德与拜占庭人结盟。拜占庭人的援助虽然解除了法蒂玛人对阿勒颇的围困，但是哈姆丹人的国势已衰败不堪，不久后哈姆丹王朝灭亡。

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

在伊斯兰世界，什叶派的宗教、政治及军事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法蒂玛王朝的建立就是上述活动的一大胜利。公元909年，北非的阿格拉布王朝灭亡，仍在狱中的艾卜·欧贝德拉被拥立为哈里发，尊号"信士们的长官马赫迪"，并新建马赫迪城为都。他自称为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后代，因而该王朝史称法蒂玛王朝。法蒂玛王朝大将昭海尔于公元969年灭伊赫什德王朝，将埃及和叙利亚南部地区纳入法蒂玛王朝的控制之下。此后数年中，叙利亚成为北方哈姆丹王朝与法蒂玛王朝角逐的战场，同时盖尔麦兑派什叶派穆斯林以及拜占庭人、突厥人也卷入了争夺叙利亚的角逐之中。大马士革一度被盖尔麦兑派占领，后又落入突厥人之手，并成为突厥人进入其他地区的基地。法蒂玛王朝鼎盛时期的哈里发阿齐兹(公元975－996年在位)于公元977年亲率大军进军叙利亚，将法蒂玛王朝的势力扩展至阿勒颇以南广大地区，特别是在叙利亚沿海黎巴嫩地区确立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此后，哈姆丹王朝虽然收复了部分叙利亚北部地区，但是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中、南部统治却十分牢固，哈姆丹人被迫承认法蒂玛王朝的宗主权。

公元996年，哈基木继位。他继位时年仅11岁，因其反复无常的性格、蓝色的眼睛，有人把他尊为圣人；有人则认为他是精神变态者。哈基木执政长达25年，在他的统治下，叙利亚人经受了

严酷的宗教迫害。公元997年,提尔城的阿拉卡赫发动起义,宣布独立。哈基木不仅镇压了起义,而且将阿拉卡赫处死后,剥下他的皮,填满稻草在开罗示众。哈基木是极端的宗教狂,无端地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不仅重新恢复穆台瓦基勒时期迫害异教徒的法令,而且制定新的条法,加害少数民族。公元1009年,他下令摧毁众多教堂,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圣陵大教堂。他颁布禁酒令,禁止妇女上街,甚至禁止音乐、宴会等娱乐活动,还下令商人们白天闭门,夜晚开店。公元1021年哈基木遇刺身亡后,被追随者和信徒们神化,宣称他是能死后复生的"活主"。由此,伊斯兰什叶派伊司玛依派隐遁说逐渐流传形成。哈基木执政时期伊斯兰教另两个支派——德鲁兹派和努塞尔派在叙利亚形成。来自埃及的德鲁兹派信徒逐渐会集到黎巴嫩舒夫山区以及戈兰和豪兰地区。努塞尔派即此后的阿拉威派,逐渐聚集于拉塔基亚地区。

哈基木之后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多为懦弱无能之辈或年幼无知者,因而国势日见颓萎,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先后脱离法蒂玛王朝的统位。公元1023年,贝都因基拉卜部落的萨里赫·伊本·米尔达斯夺取阿勒颇,并建立米尔达斯王朝。米尔达斯先后与阿拉伯泰伊人部落和凯勒卜人部落结盟,将势力扩展至巴勒贝克和幼发拉底河。米尔达斯本人在太巴列湖附近与法蒂玛人作战时阵亡,其子西布尔·道莱继位后,也在哈马与法蒂玛人作战中阵亡。公元1079年,短命的米尔达斯王朝最终被法蒂玛人的残余势力摧毁。米尔达斯王朝时期是叙利亚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阿布·阿拉·麦阿里生活和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的时代。

公元1070年前后,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的统治遭遇到强劲对手塞尔柱人的进攻之后,开始走向终结。此前1060年埃及境内爆

发的大规模民众起义实际上已经宣告法蒂玛人在叙利亚的统治名存实亡。塞尔柱人原属突厥斯坦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乌古思部族，在其首领塞尔柱率领下，他们南下布哈拉，并热情地接受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信仰。公元 1055 年，衰弱不堪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嘎义木，像他的祖先哈里发穆斯台克菲迎接布韦希人那样，把塞尔柱突厥人当作救星迎进巴格达城。塞尔柱人以哈里发的名义发号施令，统治地跨中亚和西亚的大帝国近 3 个世纪。塞尔柱王国的缔造者塞格贝勒贝格于 1055 年 12 月进入巴格达。他被哈里发封为"东西方之王"，并第一个获得了"素丹"的称号。作为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他完成了创建塞尔柱帝国的伟业。公元 1063 年塞格贝勒贝格去世，他的继承人阿勒卜·阿尔斯兰(1063－1072 年在位)继续对外扩张。在向西方扩张时，其势力首先扩展到叙利亚和小亚地区。公元 1070 年，阿尔斯兰攻取米尔达斯王朝的首府阿勒颇，并南下巴勒斯坦，进占腊马拉、耶路撒冷直至阿什克伦。公元 1071 年，阿尔斯兰在曼齐卡特大败拜占庭军队，俘虏拜占庭皇帝，为突厥人和穆斯林在小亚地区开启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然而塞尔柱人在叙利亚的统治并不稳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土库曼人以及法蒂玛人的残余势力竞相角逐于叙利亚，叙利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库曼人将军阿特西兹在公元 1075 年从法蒂玛人手中夺回大马士革。两年后，阿尔斯兰的儿子突突什夺取大马士革，处死阿特西兹，继而在大马士革建立起独立的塞尔柱素丹国，突突什成为叙利亚塞尔柱王朝真正的奠基人。突突什在公元 1084 年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回安条克，1094 年占领阿勒颇，并将势力扩展到埃德萨、摩苏尔等城市。此外他还领有呼罗珊等原有领地。翌年，突突什战死疆场。他的两个王子列德旺和杜嘎格分别

成为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埃米尔。不久两位埃米尔发生内战，杜嘎格被迫承认列德旺的宗主权。公元 1097 年，当十字军东侵叙利亚时，安条克处于雅基·西彦塞尔柱埃米尔的统治之下。列德旺占有阿勒颇，杜嘎格占据大马士革，沿海地区阿卡、提尔、西顿及阿什克伦则在 1089 年时被法蒂玛人收复。同年，特里波利在什叶派贝尼阿马尔部族统治下宣布独立。公元 1098 年耶路撒冷也落入法蒂玛人之手。

阿尔斯兰及其继承人马立克沙在位时塞尔柱帝国正值鼎盛时期。公元 1092 年马立克沙去世后，塞尔柱帝国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名义上控制着巴格达的大塞尔柱王朝仍然是中央政府，但事实上帝国已经分裂。其中叙利亚的塞尔柱王朝最为短命，仅延续至 1117 年。

三、十字军东侵叙利亚与艾尤卜王朝

十字军东侵

十字军东侵是 1096－1291 年期间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对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在东方，阿拔斯王朝名存实亡。塞尔柱帝国在马立克沙死后四分五裂，日益没落，无力抵抗外敌的进攻，这给十字军以可乘之机。

1096 年秋，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西部的封建主和骑士为主力开始了第一次东侵。其矛头直指叙利亚及其沿海地区。在先后占领尼西亚、埃德萨、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等地后，十字军依照西欧

封建制度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及周围地区建立了拉丁化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特里波利伯国和埃德萨伯国。"耶路撒冷王国"是其中最大的王国,它包括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南部地区,其他3个小国名义上是耶路撒冷王国的附庸,但实际上都是各自独立的拉丁国。1099年,十字军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后进一步向周边及沿海地区扩张,在阿什克伦击败法蒂玛残余军队,继而又攻克雅法、海法,并在加利利建立小公国。耶路撒冷拉丁国第二任国王在意大利、挪威海军支援下,横扫地中海东岸,1101年占领艾尔夫、凯撒里亚,三年后再克阿卡,1110年贝鲁特、西顿陷落,1105年在死海南部建立卡拉克堡和邵伯克城,进而威胁大马士革至埃及、希贾兹商路。至此十字军第一次东侵叙利亚宣告结束。十字军占领地中海东岸的主要港口及靠近沿海的内陆城市,从而控制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贸易。但是叙利亚内陆地区并没有被十字军征服。阿勒颇、哈马、霍姆斯、巴勒贝克及以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市免遭十字军蹂躏。大马士革埃米尔杜嘎格1104年亡故后,摄政王突格特勤篡位,加封艾培伯克(太傅)尊号,其后代世袭大马士革的统治权直至1154年。阿勒颇的埃米尔列德旺的后代也是无能之辈,1117年阿勒颇屈服于抵抗十字军的英雄、土库曼人艾尔·加齐。

公元1127年,幼发拉底河上游摩苏尔地区塞尔柱人埃米尔伊马杜丁·赞吉聚集起强大力量,建立"赞吉王朝"。1112年,伊马杜丁将阿勒颇并入赞吉王朝,随后又将哈马、霍姆斯、巴勒贝克纳入自己的统治。与此同时,伊马杜丁向十字军大举进攻,1144年收复埃德萨。至此,叙利亚内陆地区多数重要城镇落入赞吉王朝之手。埃德萨失守后,其他拉丁国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埃德

萨伯国失守，罗马教皇尤金三世应耶路撒冷国王请求，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侵(1147－1149年)。第二次十字军东侵遭遇穆斯林顽强抵抗。此次十字军东侵前，塞尔柱突厥王朝内部四分五裂，外部与阿拉伯人、法蒂玛人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纠纷。在十字军的压迫下，各族穆斯林日趋团结，在伊马杜丁·赞吉及长子赛西丁和次子努尔丁的奋力抵抗下，第二次十字军东侵在叙利亚遭到惨败。第二次东侵的失败还缘于十字军内讧及十字军在拜占庭地区烧杀掳掠，致使拜占庭人暗中帮助穆斯林。另一方面也由于十字军是短期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已不是组织日益严密的穆斯林军队的对手。

第二次十字军在叙利亚失败后，赞吉人在叙利亚势力日渐壮大。此间努尔丁·赞吉在与其兄赛西丁·赞吉的争斗中占得上风，公元1154年，努尔丁从突格特勤家族手中夺取大马士革，成为叙利亚地区的统治者。此时正值埃及法蒂玛王朝两大贵族沙瓦尔和特尔阿木为争夺首相职位而发生内讧之际，努尔丁决定进兵埃及，以实现他多年觊觎埃及的野心。由于特尔阿木与十字军订立联合盟约，努尔丁派遣库尔德人大将施勒科及其侄子萨拉丁率大军进攻埃及。在里卜斯战役击败埃及军队后，努尔丁回师围攻耶路撒冷城。不久后努尔丁与十字军订立协定：双方均不能进入埃及。1169年耶路撒冷王国背叛协定，进攻埃及。施勒科及侄子萨拉丁被迫再次进兵埃及。叔侄二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退十字军。法蒂玛王朝哈里发艾迪德诛杀首相沙瓦尔，任命施勒科为相。3个月后施勒科亡故，萨拉丁继任。

萨拉丁艾尤卜王朝

萨拉丁原名萨拉尔丁·尤素福·伊本·艾尤卜。因其英勇抗击十字军侵略,被后人冠以“胜利的国王”之美称。公元1138年,他出生于底格里斯河塔格里特一个库尔德人家庭。1岁时随父移居巴勒贝克。萨拉丁的父亲及叔父施勒科均为叙利亚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的部将。成年后,萨拉丁随叔父征战埃及及叙利亚。1169年,继叔父出任埃及法蒂玛王朝首相时,他具有双重臣属的身份,一方面是埃及法蒂玛王朝的首相;另一方面是叙利亚国王努尔丁的部属。但是萨拉丁一朝大权在握,就开始建立以自己家族为主的独立王国。为了巩固在埃及的势力,他用尽种种手段争取埃及人民的拥护,他安置亲信及家族成员执掌国家关键机构,在国家上层建立起军事上和政治上效忠自己的核心力量。他将扰乱民众、效忠法蒂玛王朝的苏丹军队逐渐消灭,并屡次击败从海路与陆路来犯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十字军。萨拉丁割除什叶派贵族长老在军方的高级职位,代之以逊尼派贵族长老,并大力宣传逊尼派教义。公元1171年,萨拉丁正式废黜法蒂玛王朝,宣布拥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为“正统”,命令全国民众效忠哈里发。

1171年,萨拉丁建立艾尤卜王朝后,自封第一任“素丹”。1174年,趁突厥赞吉王朝统治者努尔丁逝世之际宣布独立。1175年5月,他沿用当时穆斯林统治者向哈里发讨封的惯例,要求已奄奄一息的阿拔斯哈里发正式授封他事实上已占有埃及、叙利亚、西阿拉伯和马格里布的“素丹”称号。萨拉丁即位后,迅速平息阿萨辛派叛乱,继而挥师北上,光复巴勒斯坦,统一叙利亚。1187年7月,首先攻取塔巴利叶,接着在该城以西赫淀村大败十字军,俘虏

耶路撒冷国王律西安及城防司令雷古纳德，并于同年 10 月攻陷耶路撒冷。穆斯林宣礼员赞主的招祷声重新回响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上空，盘石圆顶寺上的金质十字架被拆除。之后，萨拉丁长驱直入，收复巴勒斯坦、叙利亚大片领土。“耶路撒冷王国”不复存在，只有安条克、特里波利和提尔等城市仍在十字军手中。至此，叙利亚地区除部分十字军占领区外，实现了在艾尤卜王朝之下的统一。

“耶路撒冷王国”的陷落震撼了西欧封建主和罗马教廷，同时也由于萨拉丁在东方迅速扩展势力使西欧封建主和罗马教廷大为不满，从而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东侵。萨拉丁艾尤卜王朝的穆斯林军队与十字军作战多时，但相持不下，双方议和，1192 年缔结为期三年的休战条约，十字军第三次东侵无功而终。

公元 1193 年，萨拉丁在大马士革逝世。萨拉丁作为一代明主在挫败十字军东侵方面功勋卓著。同时，他在繁荣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他招贤纳士，善待学者，奖励对教义学的研究，积极促进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传播，被誉为“伊斯兰教高等学校的建设者”。他不但使爱资哈尔大学得到充实和发展，而且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地的大清真寺中开办学校。他还关心改善医疗条件，发展交通和工农业生产，保护伊斯兰文物。萨拉丁一生从政清廉，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只遗留下 47 个第尔汗和一个第纳尔”。所以，他一直是叙利亚和埃及人民爱戴的人物，是叙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并受到后人敬仰。

艾尤卜王朝的光辉，随着萨拉丁之死而黯然失色。他的家族中无人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才干，因而使国家陷于诸子纷争的分裂状态。就在萨拉丁的后继者们相互争斗之际，第四次十字军东侵爆发（1202 - 1204 年），初期其目标为埃及，后又改为进攻拜占

庭，于 1204 年 4 月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数次十字军东侵攻击目标完全转向埃及。事实上，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后，十字军的进攻势头已明显减弱，第七次东侵（1248－1254 年）前穆斯林军队利用十字军的内讧，于 1244 年夺取曾再度陷落的“圣地”耶路撒冷，并永久占领耶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人的进入。第七次东侵时十字军的进攻势头进一步削弱。在东方的十字军得不到西方的支持，处境日益孤立，他们的占领区相继被马木鲁克穆斯林军队收复。1263 年卡拉克，1265 年恺撒里亚，1268 年雅法相继被攻克。安条克于 1268 年 5 月投降。1289 年特里波利被收复。十字军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阿卡于 1291 年失守，同时，提尔、西顿、贝鲁特等被收复。至此，历时近 200 年的十字军东侵宣告彻底失败。

艾尤卜王朝的历史地位与十字军东侵的影响

艾尤卜王朝是在十字军第七次东侵时于 1250 年灭亡于自己的突厥奴隶军团——马木鲁克之手。艾尤卜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历时 79 年，它与赞吉王朝前后相继在叙利亚英勇抵抗外来侵略，虽然其抵抗十字军的未尽事业最终由马木鲁克王朝完成，但艾尤卜王朝的历代君主自萨拉丁至图兰沙，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抵抗十字军的战争之中。尽管艾尤卜王朝仅仅维持了 79 年，但是它反对外族侵略的精神和保卫东方文明的历史功绩却是永不磨灭的，时至今日叙利亚与埃及的穆斯林们仍把萨拉丁称颂为反抗侵略的伟大英雄，常常引证他英勇斗争的事迹来激励本国人民，更是把高耸于埃及莫干丹山上的萨拉丁堡看作民族精神的象征。艾尤卜王朝不仅把东方伊斯兰国家从十字军的侵略中拯救出来，而且大力促进叙利亚和埃及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艾尤卜王朝在战争的条件

下还不断致力于水利、灌溉系统的建造，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订立一系列贸易条约，推进了叙利亚、埃及的对外贸易。

十字军东侵的后果是严重的：叙利亚许多城市变为废墟，大量田庄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当地民众死于非命，无数钱财耗损于战争。不仅给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欧洲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封建主的愿望未能实现，罗马教廷的企图也完全落空。但是，十字军人东侵对于东西方贸易、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流，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取代黎巴嫩腓尼基人后代，确立了在地中海的商业优势。东西方贸易及运往西方的商品比以前大大增加。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具有传统优势的手工业制品，如纺织业、玻璃业、陶瓷业等，以及大量的奢侈品源源进入欧洲市场。特别是叙利亚等地的各种先进技术，如农业管理和水利灌溉方法、纺纱、印染和织布等工艺越来越多地传到西方。在贸易剧增的刺激下，西欧的城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十字军东侵也对西欧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马木鲁克王朝

马木鲁克王朝的建立与叙利亚的统一

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是阿拉伯中世纪最后一个王朝，是1250年由原艾尤卜王朝突厥人奴隶军团——马木鲁克禁卫军建立的奴隶王朝。公元1193年，萨拉丁去世后，艾尤卜王朝陷

人诸子相争的分裂状态。当时，萨拉丁的长子马立克占据大马士革并继任素丹，次子阿齐兹占据开罗，三子扎希尔占据阿勒颇。萨拉丁的弟弟阿迪勒初居卡拉克和邵伯克，后趁混乱局面，先后夺得埃及、叙利亚大部和美索不达米亚。1218年，阿迪勒去世，艾尤卜家族发生内乱，导致已从十字军手中夺回的贝鲁特、耶路撒冷等城市重新落入法兰克人之手。尽管后来艾尤卜王朝素丹撒列哈又收复了耶路撒冷，突兰沙把十字军赶出了埃及，但艾尤卜王朝气数已尽。撒列哈素丹死后，经其遗孀舍哲尔·杜尔短暂的统治，马木鲁克禁卫军各埃米尔公推艾伊贝克为素丹，1250年登基后，马木鲁克王朝正式建立。

马木鲁王朝初创时期内部纷争不已，王朝并不稳固。与此同时，马木鲁克王朝在外部面临十字军和蒙古人入侵的威胁。特别是在叙利亚，马木鲁克王朝在继承赞吉王朝和艾尤卜王朝抗击和驱逐十字军东侵未竟事业的同时，又奋起抗击横扫中亚，直逼西亚，并于1258年灭亡了阿拔斯王朝的蒙古人的大举入侵。13世纪下半期，历代马木鲁克王朝素丹与东西方外族入侵者的战争在叙利亚交替进行，在阿拉伯叙利亚抗击外族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马木鲁克王朝第四任素丹拜伯尔斯(1260－1277年在位)被认为是王朝最著名的素丹和王朝真正的奠基人。他对蒙古人作战的胜利和抗击十字军功劳名垂史册。1260年蒙古大军占领伊拉克后西进叙利亚，攻陷阿勒颇、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占领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大部地区，并进逼埃及。拜伯尔斯统领马木鲁克军队在耶路撒冷以北艾因·扎卢特迎击来犯的蒙古军队。经浴血苦战，击毙蒙古军统帅怯的不花，蒙古军队全线崩溃，从而阻止了蒙古军

的西进。在消除了对埃及的威胁的同时,拜伯尔斯与盖拉温等人率马木鲁克军团解放了落入蒙古人手中的叙利亚地区。艾因·扎卢特战役的胜利不仅为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重新合并开辟了道路,也为叙利亚的统一和完全解放奠定了基础。随后拜伯尔斯对十字军的战争也连获胜利,卡拉克(1263 年)、恺撒里亚(1265 年),雅法(1268 年)被收复。特别是安条克于 1268 年 5 月 21 日被迫投降具有重大意义,十字军因此锐气大挫。拜伯尔斯不仅具有很高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是贤能的君主。他重组陆军,再建海军,兴修水利,发展传统手工业。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同蒙古人和欧洲人缔结一系列盟约,确保了埃、叙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至此一个稳固、统一、强大的马木鲁克王朝在拜伯尔斯时代逐步形成。拜伯尔斯为使自己的王冠合法化,特为阿拔斯哈里发家族的后裔举行登基典礼。从 1261 年 6 月穆斯坦绥尔登基当上傀儡哈里发,到 1517 奥斯曼帝国素丹谢里姆从马木鲁克王朝手中夺取埃及,并把最后一任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带到君士坦丁堡,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名义上又存在了 250 多年。

盖拉温是马木鲁克王朝另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他在抗击蒙古人的入侵中取得辉煌战绩。1279 年他篡取政权,成为马木鲁克王朝第七代素丹。由于叙利亚地方官桑格尔拥兵自立,勾结意欲西进和南下的蒙古军,盖拉温发兵平叛。在北上追击叛军时,于 1281 年 10 月在霍姆斯与南下的蒙古军展开会战。盖拉温巧妙用兵,指挥优势兵力全线击溃蒙古军,取得了继艾因·扎卢特战役后又一次抗击蒙古军的重大胜利。盖拉温远交进攻,在与金帐汗国、拜占庭、意大利、法兰克、西亚诸国交好的同时,严惩曾协助蒙古军的亚美尼亚人和黎巴嫩北部的马龙派基督徒,并分别于 1285 年和

1289年攻陷麦尔盖尔卜和特里波利十字军占领区,为驱逐蒙古人和十字军,完成叙利亚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儿子艾什赖费(1290－1293年在位)于1291年又连连战胜十字军,收复了十字军最后的据点阿卡、提尔、西顿和贝鲁特,彻底消灭了十字军在东方的侵略势力。1303年盖拉温的三子纳绥尔素丹(1293－1340年在位)与蒙古军展开最后决战。同年4月20日,纳绥尔在大马士革以南32公里处的素菲尔草原迎击再次进入叙利亚并直扑大马士革的5万蒙古大军。经3昼夜血战,蒙古军大败,纳绥尔终于击溃了自阿拉伯统治西南亚以来最危险的敌人,并最终统一了叙利亚地区。蒙古人败退后,纳绥尔加强叙利亚的防卫,委派数位亲王率领卫戍部队,分别镇守霍姆斯、哈马、阿勒颇等重要城市。在抗击外族侵略时,马木鲁克王朝内部纷争也逐渐消除,从此一个地跨埃及、叙利亚两地,强大而统一的马木鲁克王朝进入了相对安定、繁荣的时期。当蒙古人"帖木儿旋风"再度席卷叙利亚时(1400－1401年)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然而,对叙利亚来说,马木鲁克王朝无疑也是一个外族统治政权。

叙利亚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马木鲁克王朝沿袭艾尤卜王朝政治体制,实行素丹集权制,全国军政大权掌握在素丹及亲近大臣手中。但王位并非世袭制,擅长计谋者往往自立为素丹。在各省区则由素丹委派的军事将领代理素丹行使管辖权。地方统治者多为奴隶出生,但却是具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人物,并非政治精英或知识界的上层人士。由于历史的原因,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成为王朝重要的政治中心。有些素丹直接在这里建立宫廷,并直接管辖叙利亚地区。黎巴嫩有所不同,

它由当地的政治或宗教精英统治。军队是马木鲁克王朝的国家支柱。马木鲁克王朝是由原禁卫军建立的，因此军队及军事将领在王朝自上而下的各种机构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朝建立后马木鲁克——禁卫军在内外军事斗争中发展成为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极强的军事力量，被称为“素丹的军队”。

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境内经常发生洪水、饥荒、瘟疫，加之数次地震灾害，致使叙利亚地区人口锐减。王朝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例如，饲养马匹也苛以重税。然而，经济上的困难在贸易方面得到弥补。拜伯尔斯、盖拉温等素丹授予欧洲商人特许权，以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据记载：叙利亚的丝织品以及香水等的奢侈品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其次，大马士革、特里波利、提尔等城市的手工业较为发达，同时也是手工艺品的交易中心。1336年至1341年，曾旅居叙利亚的德国牧师对大马士革以及阿卡等地方经济繁荣印象深刻。

叙利亚的铁制、铜制及玻璃制品等甚为精致。尤其是铜制器皿上雕饰与图案极为精美。大马士革的金银器皿享有盛誉。此外，瓶饰、香炉、《古兰经》精装本封饰等更是著称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些传统的行业，如制革业、造船业及刀剑制造业和纺织业在马木鲁克时期的叙利亚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马木鲁克王朝重视农业，在埃及地区发展农业的措施在叙利亚也得以执行，如建设小水坝、兴修水利等。由于叙利亚地区有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品种和产量均十分可观，如大豆、扁豆、小麦等。马木鲁克时代盛行分封制，分封不仅适用于土地，也适用于土地以外的税收。在埃及流行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在叙利亚也较流行。土地一般分为素丹占有的土地和大小埃

米尔占有的"封地"。另外清真寺和学校也占有土地(瓦克夫)。马木鲁克王朝时代的土地制度同以往各王朝一样,极为混乱,"封地"的税收从无定制。事实上自伊斯兰初期以来,经过历代王朝的变迁,由于土地辽阔、民族复杂、土地税收制千差万别,这也是迄今为止史学家们对阿拉伯封建制度难以厘清的主要原因。

马木鲁克王朝时代的社会阶层中,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商业和手工业者处于中下层。工商业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占有一定的资产。各级埃米尔们则高居社会顶层。他们同普通民众完全隔离,不通婚,不混居。居民中的知识分子,多从事教育、文化、文学及司法工作,较少介入政府机构。在叙利亚、埃及社会中,还存在突厥人和蒙古人,这些人多半来自河外地区。他们的前辈多为马木鲁克买来的奴隶,来到叙利亚、埃及后改信伊斯兰教,然后编入军队。这些人效忠马木鲁克上层,且骁勇善战,深受马木鲁克上层的宠爱和庇护,其中部分人士受到重用,青云直上,成为军事统帅,甚至成为素丹。如此循环、代代相传,形成了与马木鲁克联系紧密、自成一体的特殊社会群体。

马木鲁克王朝衰亡与叙利亚的陷落

14世纪中叶,马木鲁克王朝颇有作为的纳绥尔素丹去世后(公元1340年),王朝内乱四起,战祸不断,同时发生了持续七年的"黑死病"。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等地因瘟疫肆虐,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据说,当时阿勒颇瘟疫最严重时,一天之内死亡人数达五百余人。纳绥尔素丹时代马木鲁克王朝虽然经历了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他本人贪图安逸、生活奢移。他的亲信大臣们也竞尚豪华、挥霍无度。纳绥尔的后继者们多是软弱无能之辈,后被塞加西

亚人贝尔孤格取代。贝尔孤格上台后，开始了布尔吉系马木鲁克的统治（此前历任素丹为另一派系伯海里系马木鲁克）。布尔吉系素丹，绝大多数既专横跋扈又昏庸无能。他们当政时期，被认为是埃及和叙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由于天灾人祸，广大民众陷入灾难的深渊。此后不久，绕行好望角的海上航线开辟，马木鲁克王朝政府失去了转口贸易这一主要财政来源，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国力进一步衰退。

正当马木鲁克王朝内忧不断加剧之时，外患又接踵而至。14世纪中叶，东方又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蒙古旋风——帖木儿旋风向西亚袭来。崛起于撒马儿罕的帖木儿率蒙古大军在80和90年代分别征服波斯和伊拉克后，于1400年席卷叙利亚北方重镇阿勒颇等地。这座赞吉王朝、艾尤卜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叙利亚北方名城三日之内被夷为平地。据说，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2万余名穆斯林居民被屠杀，死者的头颅堆成了一座小山，接着哈马及巴勒贝克等城市亦纷纷陷落。1401年，大马士革落入帖木儿之手。蒙古大军肆意焚烧清真寺，践踏文化古迹，将大批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遣送到撒马儿罕。帖木儿以穆斯林统帅的身份进驻大马士革，迫使各清真寺教长屈服，并在聚礼日为他祈祷。1402年，帖木儿放弃进攻埃及的计划，转向进攻小亚地区，1404年回师向东进军中国，1405年死于途中。至此，埃及—叙利亚的危局暂告缓解。但是盘踞在小亚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对马木鲁克王朝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同时波斯的什叶派萨法维王朝也在虎视西亚。穆艾叶德·舍赫素丹（1412－1423年在位）继位后，调集军队向土耳其人进攻，要求土耳其承认他在埃及—叙利亚的权力，土耳其人被迫承认，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并未解除，日后奥斯曼土耳其人

成为马木鲁克王朝的掘墓人。穆艾叶德死后，素丹职位频繁更迭，仅甘骚·古里在位时间较长，其他素丹或在位时间极短或为无能之辈，因而无力治理国家。马木鲁克王朝国势日衰，日益走上覆灭的边缘。

15 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征服东欧，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1453 年将它定为新国都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于是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机器转向西亚，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互有胜负的激烈冲突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于 16 世纪首先向伊朗、伊拉克等地扩张，1516 年矛头转向叙利亚。马木鲁克王朝素丹甘骚·古里奋起抗击土耳其军队的进攻。8 月 24 日，马木鲁克军队在阿勒颇以北达比克草原与土耳其人决战。不料阿勒颇埃米尔海义尔贝叛国通敌，他指挥的左翼军团临阵脱逃，甘骚·古里率右翼军团孤军奋战。甘骚·古里年事已高，体力不支，在战场上坠马身亡。马木鲁克军队群龙无首、阵脚大乱，土耳其军大获全胜。继阿勒颇之后、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其他城市都向土耳其人敞开大门。土耳其军队统帅——素丹谢里姆一世率军一鼓作气征服叙利亚全境，并挥师南下，进攻埃及。1517 年 1 月，谢里姆一世抵达开罗城郊，经数日激战，占领开罗。至此存在了 267 年的马木鲁克王朝倾覆。1516 年谢里姆一世攻占阿勒颇时，俘获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名义上的哈里发穆台瓦基勒。1543 年当傀儡哈里发穆台瓦基勒获准返回开罗前，将哈里发职权移交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家族，至此麦加古莱什家族占据哈里发职位 800 余年的历史彻底结束。从此，奥斯曼帝国素丹开始使用哈里发称号，并兼有素丹国（君主国）与哈里发国（教长国）双重职能，统治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达 4 世纪之久。叙利

亚地区也从此进入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直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崩溃。

五、叙利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等以及毗邻相连的地区）后，伊斯兰教在这里广泛传播。在此后的9个世纪中，叙利亚地区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文化的中心之一，其历史地位不亚于安达卢西亚、埃及、伊拉克、伊朗等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开启了叙利亚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在经历了伍麦叶王朝短暂的酝酿时期之后，叙利亚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诗歌、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语言、古兰经注释、圣训学、教法学等众多领域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进而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宝库。

诗歌艺术

阿拉伯民族酷爱诗歌，素有“诗歌民族”的美誉。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也不例外，诗歌在他们的文学中占有突出位置。被称为诗歌三杰的法拉兹德格、杰里尔和艾赫塔勒是伍麦叶王朝时期叙利亚地区最著名的诗人。他们或歌功颂德或讽刺谩骂，他们的诗歌在帝国境内广为传咏。诗人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统治者的庇护和奖励。由于某些统治者本身就是诗人，诗人们又成为公众舆论的领袖。诗歌还成为政治竞争的媒介。诗歌以政治题材和演说形式表达拥护或反对政府的态度。伊斯兰教传入后，带来了新

的词汇、新的表达方式，特别是伟大的宗教经典——《古兰经》传入，使诗歌的题材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加纯熟，诗歌艺术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伍麦叶王朝时期毕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初创时期，诗歌等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

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叙利亚作为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被伊拉克取代，大马士革一度失去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主要文化中心的地位，但是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并未因此而完全消沉。公元9世纪在叙利亚地区新一代著名诗人不断崛起。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布·唐曼、布赫图利、阿塔比、阿布杜·伊本·拉格本等人。与前辈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致力于精美诗句及格律的同时，还对阿拉伯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诗人阿塔比不仅诗歌艺术造诣精深，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艺术评论家。阿布·唐曼是位多产的诗人，同时他还编集了诗集——哈马萨——《阿拉伯诗选》。布赫图利编辑的另一部诗选——哈马萨也是当时诗歌编辑中的重要著作。

这些诗人不再因袭前辈们旧体诗歌与题材，发展和创造了诗歌评论与分类法，他们既是诗人又是阿拉伯诗歌的评论家。某些人如阿塔比不仅是饮誉阿拉伯世界的著名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演说家和寓言作家。他们大都有过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阿布·唐曼早年是织布工，自幼聪明好学，依靠自学成为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他阅历广泛，曾先后游历埃及、波斯、亚美尼亚等地，在旅行中创作了大量描写名山大川和人生感悟的抒情诗和叙事诗。阿布·唐曼品德高尚、举止洒脱、谈吐文雅、知识渊博，被后辈尊为诗歌艺术的权威。同时阿布·唐曼还通晓历史，是公认的阿拉伯语言学和术语学权威。

阿布杜·伊本·拉格本又名狄克·金,出生于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一生未曾离开过这座城市。他的诗歌与雄辩的演说才能同样出众,在世时一直是霍姆斯当之无愧的代言人。他的诗歌主要表达了对一位婢女的爱情,但他出于妒忌怒杀了这位婢女,从此他的诗歌充满了忧郁与哀婉。

布赫图利出生于叙利亚北部的门比季。成名之后前往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成为著名的宫廷诗人。他是一位感情热烈,对人与自然有着深刻洞察力且想像力极为丰富的叙事诗大师。在他的笔下,宫殿、花园、建筑、池塘等,甚至一些猛兽如狮子、野狼以及骏马等都栩栩如生、生动感人。

阿拔斯王朝中期,叙利亚北部哈姆丹王国首都阿勒颇,是与巴格达齐名的文化中心。在国王赛义夫·道莱的宫廷中聚集了众多文学和艺术天才。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曾这样评论道:"由于赛义夫·道莱不朽的荣誉,诗人穆塔纳比、萨拉米、大马士革人阿尔瓦和伊本·努巴塔都为他而歌颂。他的华丽的宫廷中,聚集着著名的哲学家和音乐家法拉比、他的堂弟著名的诗人阿布·菲拉斯和文字语言学家伊本·哈拉韦赫等人。他的桌旁围坐着 24 名以上的名医"。

阿拉伯各地的诗人们慕名汇集到赛义夫·道莱的宫廷中。他们思想活跃,创作热情强烈,题材也更加广泛。一位名叫苏诺巴利的诗人终生致力于吟咏花卉和园圃的诗歌创作。据传,他一生共创作了 6000 余首吟唱花卉草木的诗词。赛义夫·道莱的堂弟——行侠仗义的阿布·菲拉斯更是用诗歌和利剑与拜占庭人作战。他被虏掠到君士坦丁堡,在囚禁期间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被赎回国后,不幸在内战中死于非命。他的诗词作品中充满了将士们英勇作战的战争场景和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而有些作品则感情真

挚，表现了人间真情与友善。他的诗歌与他的勇气和豪侠仗义被后人长久传颂。

这个时期的诗人们逐渐地不再关注华美的辞藻、繁琐的格律，而是寻求哲学的内涵和大气磅礴的思想。当时阿拉伯文坛最著名的诗人穆塔纳比以辉煌的诗体表现出人类的伟大智慧和哲学意境。他的代表性诗集是《狄文》。评论家们曾把他深邃的思想与智慧与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穆塔纳比的某些思想影响了数百年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而他的诗歌更是达到了10世纪阿拉伯诗歌艺术的顶峰。穆塔纳比出身贫寒，为了荣誉与地位，四处游历，广泛求学。但是他却不惧权贵，藐视帝王，有强烈的冒险精神，最终在其英年时期死于他所歌颂的利剑之下。

盲人诗人阿布·阿拉·麦阿利是11世纪时叙利亚最伟大的诗人，号称"诗中圣哲——哲中诗圣"。同时他还是著名的散文作家、阿拉伯语文法学家和韵律学家。他的诗歌作品意境深刻，思想深邃，文笔洗练，构思精巧，散文作品同样也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的代表作《赦免信札》等作品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间、天堂和地狱以及异教徒与自由思想家们的思想与理论。西方的文学史家们曾一度认为，《赦免信札》对但丁的《神曲》和密尔顿的《失乐园》的创作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此外，麦阿利的两位弟子伊本·哈发季和伊本·海育斯也是20世纪杰出的诗人。后者模仿阿布·唐曼创作了大量关于战争、武器和骏马等精彩诗篇。海育斯师承麦阿利，在语言学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

早期的翻译运动及哲学与历史学

阿拔斯王朝时期,巴格达的翻译运动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因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很少有人知晓在伍麦叶王朝时期,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哈里发们的资助下,首开翻译运动的先河。这是伍麦叶王朝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酝酿时期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来自埃及、希腊等地的史学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与叙利亚当地学者合作,将大量历史、哲学、天文学以及医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来自希腊、亚历山大里亚、波斯和印度等地学术精英的荟萃之地。伊斯兰世界建立的第一座伟大的图书馆大马士革图书馆成为阿拉伯最早的翻译运动中心。在众多的翻译家中,巴勒斯坦人库斯达·伊本·卢卡最具代表性。他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建筑学家和医生,同时还通晓古叙利亚阿拉米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的翻译运动中,部分各类古叙利亚语名著是此前从希腊等地的语言文字中翻译而来的。因此,叙利亚地区的学者们较早时就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古希腊哲学、历史学等。受此影响,叙利亚的学者们对哲学、史学等有较深刻、广泛的认识与研究。

在哲学、历史学方面,阿布·唐曼、哈姆丹宫廷诗人穆塔纳比以及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音乐艺术家的法拉比等人成就十分突出。阿布·唐曼通晓波斯历史,穆塔纳比对希腊哲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法拉比更是一位哲学大师,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研究尤为深刻。法拉比搜集、编撰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号称“亚里士多德著作诠释者”,是阿拉伯哲学体系真正的创立者,并对整

个哲学发展史有过重大影响。法拉比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有《论理智》、《论灵魂》、《论超然和差异》、《哲学问答》、《优越城居民意见书》等。法拉比关于国家、城市及家庭等思想对后世《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弗里有重要影响。正是由于在哲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他被后人称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亚圣"。11世纪与麦阿利的弟子海育斯同时代的两位历史学家伊本·纳斯拉尼和哈姆扎·塔米米分别撰写了各自所在城市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历史的著作。

公元13世纪，叙利亚地区涌现出众多著名的传记作家、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史专家。阿勒颇人伊本·阿迪木编写的多卷本叙利亚名人录，记载了从上古时期到伊斯兰纪元第七世纪(公元13世纪)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这部名人录是中世纪最有影响的阿拉伯世界历史人物百科全书。在他所著的其他著作中特别是关于阿勒颇历史的著作中，阿迪木详细记述了阿勒颇地区的风土人情、城市风貌以及教堂、清真寺等各种建筑物的风格与特征。

哈马人雅库特是同时代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和伟大的地理历史学家。他编集的《文学辞典》实际上是一部文学史专著，这部著作至今仍然是研究阿拉伯文学史必备的参考书。雅库特另一部著名著作是《地名辞典》。雅库特整理和收集了从阿拉伯帝国到大西洋沿岸所有国家已知和消亡的地理名称，并对河流、峡谷、山岳、丘陵、乡村、城镇和湖海江河做出了详细的记载。这部巨著的历史地理学价值主要在于，雅库特对各个地区的地理概况及地名名称的起源与演变、城市的兴衰与沿革、乡村的风俗与变化，分别从历史文献中、文学著作中以及从语言学和地区方言的发音发展变化中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地名辞典》资料之翔实、叙述之精确、内容之丰富令后人叹为观止。大马士革的大穆夫提伊本·哈里干在阿拉

伯—伊斯兰民族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也十分突出。他编写的《名人传略》是伊斯兰教形成后阿拉伯民族历史人物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是最早采用字母顺序编集名人传记的历史著作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代的另一位传记作家是《时代的镜子》的作者西布特·伊本·卓琪。《时代的镜子》是一部历史大事年表。萨拉丁艾尤卜王朝时期,被称为"十字军战史家"的伊本·艾西尔在他的12卷本《历史大全》中,对十字军东侵做了详细可靠的记载。阿布·沙马尔·迪马西克则完整地记录了艾尤卜王朝的历史。伊本·库夫提的《哲学家》汇编了自古以来众多希腊、罗马、波斯和阿拉伯哲学家的生平。伊本·阿比·尤素比亚则堪称当时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医学和医学历史学家。据说他编辑的药典及名医录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历史上第一部医学历史名著。

公元14世纪,叙利亚地区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出生于大马士革的达哈比。他撰写的历史巨著《伊斯兰教编年史》是伊斯兰世界最具权威和最完整的伊斯兰史学著作之一。此外,萨法第的《传记全集》、伊本·沙尔·克特比的《人物传记》等也都是较有影响的书籍。据传,有一位出生于哈马,名叫阿布尔·菲达的王子还撰写过一部世界史著作。在阿拉伯—伊斯兰时期撰写世界历史著作的史学家为数极少,阿布尔·菲达王子或许是叙利亚地区最早的一位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遗憾的是他编著的这部世界史早已失传。巴勒斯坦人马克利齐是少数叙利亚地区在考古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领域还包括国家制度、度量衡及税收和税制等方面。

公元15世纪,叙利亚先后经历了马木鲁克王朝的黑暗统治及蒙古人的入侵。叙利亚地区的文化发展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文化

与教育事业被严重削弱,学术研究几近停滞,学者们屡遭迫害,出走他乡。尽管如此,在这黑暗的时代里,仍出现了一些知名的学者,如伊本·卡迪尔·沙巴、伊本·希吉尔、提布·达赫沙、萨利赫·伊本·雅西尔、伊本·哈提布·纳西利亚等。

自 然 科 学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代的叙利亚地区,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自然科学家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文学家、史学家及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在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数学、化学、医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伍麦叶王朝时期及阿拔斯王朝初期,叙利亚地区的文化以文学、宗教学及翻译运动为主。自然科学不受重视,学术成果极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早期翻译运动中的译著。但是由于个别哈里发及地方统治者的鼓励,自然科学也有一定的进展。例如阿拔斯王朝著名的开明君主麦蒙由于怀念昔日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曾数度访问大马士革。在他的倡导下,大马士革建立了叙利亚地区有史以来第一座天文台。此后这座天文台发展为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星象学和天文学校。另外,"大马士革的约翰"——著名的哲学、神学和数学家也生活在这个年代。由于新的文化中心巴格达的兴起,众多学者陆续离开了大马士革。除诗歌、史学、哲学、宗教研究之外,叙利亚地区的自然科学沉寂了两个世纪,直到公元10世纪后才陆续出现了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成果。

如前所述,公元10世纪在叙利亚北部建立的哈姆丹王国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叙利亚地区文化发展史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国王赛义夫·道莱不仅钟爱文学,同时也积极鼓励各个领域的学术

研究，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在他执政时期，在叙利亚南部出现了两位极有天赋的地理学家伊本·霍克尔和马克迪西。这两位地理学家几乎游历了所有穆斯林国家。遗憾的是他们的著作没保存下来。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几位知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建筑学家和医学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大马士革的建筑学和数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哈利提，天文学家的代表是凯萨拉尼。叙利亚雅布鲁德地区的吉尔斯是著名的医学家。

十字军东征时期，叙利亚地区先进的文化与教育事业令入侵者惊叹不已，并在这里学习到许多关于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航海术及音乐方面的知识，借鉴了大量自然科学的术语，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在欧洲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发现许多沿用至今的科学术语。抗击十字军东侵的民族英雄萨拉丁，在推动叙利亚地区科学文化发展方面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据传，像历代君王一样，在他的宫廷内聚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们或通晓天文地理，或精于文学、历史与哲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都·哈康、比提阿西·伊本·纳卡西、伊本·巴苏赫、伊本·萨拉、伊本·穆特兰和大马士革的伊本·安宁。伊本·安宁是位天才的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天文学、数学和宗教领域的专家。

公元1258年(伊斯兰纪元656年)蒙古人几乎摧毁了巴格达城。亡命天涯的学子们来到叙利亚，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大马士革再度成为学子们汇集的中心之一。如前所述，这一世纪在叙利亚地区诞生了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迪木和历史地理学家雅库特。雅库特首先是伟大的地理学家。他编撰的四大册《地名辞典》是公认的地理学百科全书。这一世纪叙利亚人在医学领域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大马士革人伊本·纳菲斯提出了较完整的

肺脏血液循环理论,比欧洲人提出相同理论的时间早三个世纪。

宗教学研究与教育事业

阿拉伯人征服之初,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宗教学术活动日趋活跃。有史料记载:"叶基德上书欧麦尔道:叙利亚人急需教师们向他们传播古兰经,为他们解释教律。欧麦尔遂派遣穆阿士、俄巴德和艾布·达尔丹3人前往"。他们3人是叙利亚地区最早的正统伊斯兰教传播者,同时也是最早的宗教教育奠基人。继他们之后在叙利亚本土出现了一位伟大宗教学学者,即贝鲁特的阿布杜·拉赫曼·伊本·阿末尔·阿则。史料记载,他一生研究、考查并解决了7万多个宗教学问题。他创立的教法学派在叙利亚地区盛行了近200年,门徒遍及阿拉伯地区。他倡导的宗教学说赞美人类的正义和快乐,反对宗教教条和戒律,并以穆罕默德的名言"行善一时胜过祈祷千月"作为学派的格言。伍麦叶王朝时期的宗教研究是除诗歌、演说之外最重要的学术活动。由于备受哈里发的重视,在大马士革等地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他们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其中有些学者撰写的著作多达70余部。叙利亚地区的宗教学术研究并没有因为文化中心的转移而受影响。叙利亚人继续他们的古兰经注释、伊斯兰教法学和圣训学研究。其中最伟大的教法学家是穆罕默德·伊本·伊里斯·沙菲仪。叙利亚地区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学学者是生活在14世纪的伊本·塔米亚。他对教法和教律学研究都十分深入,并终生致力于宗教改革运动。他的宗教改革目的是恢复伊斯兰信仰的纯洁性,包括对古兰经的严格注释。由于不屈不挠的宗教改革信念与活动,致使他多次身陷囹圄。他的学术研究深入而精确,被认为是"一个未经

塔米亚承认的圣训就不是圣训”的圣训学权威。他生活的时代被称为教法学的“伊本·塔米亚时代”。

阿拉伯—伊斯兰时期的教育事业是与伊斯兰教传播、宗教学术活动及宗教寺院紧密相连的。城市与乡村的清真寺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兼有学校教育的职能。教育与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中心，同时也担负传播文化知识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地区逐渐地普遍建立起相当于小学教育的库塔卜。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与哈里发及开明地方官员的倡导与鼓励分不开的。在教育文化事业不断进步的同时，图书馆及书店作为保存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机构也发展起来。如前所述，伍麦叶王朝时期建立的大马士革图书馆以及 10 世纪在哈姆丹王国首府建立的阿勒颇国立图书馆等是中世纪叙利亚地区重要的图书资料中心。一些清真寺也藏有丰富的图书及文献资料，例如今天依然存在的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是历史最悠久、藏书量最大的宗教寺院之一。

公元 11 世纪后较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类似于今天的大学及学院等在叙利亚地区开始出现。公元 12 世纪在阿勒颇建立的逊尼派宗教圣训学院是宗教教育中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此后，高等学府的数量逐渐增多。一些较高等级的专科学校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区域分布上也日益广泛，除大马士革外，霍姆斯、哈马、拉塔基亚、贝鲁特等地都逐步成为文化教育中心。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学者逐渐从宗教学学者群中分离出来。医学、天文学、建筑学、工程学及数学和几何学等逐渐成为某些高等级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可以肯定地说，直到近现代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一直在阿拉伯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叙利亚地区的教育水平也普遍

高于西亚地区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叙利亚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世人公认的事实。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西方势力的渗透

一、16－18世纪的叙利亚、黎巴嫩

政治与经济

奥斯曼帝国征服叙利亚地区后，土耳其人将叙利亚地区划分为3个省，也称帕夏区：即阿勒颇省、大马士革省和特里波利省。阿勒颇省（帕夏区）以阿勒颇为首府，管辖叙利亚北部；大马士革省（闪姆帕夏区）以大马士革为首府，管辖叙利亚中部和南部，黎巴嫩的贝鲁特和西顿以及巴勒斯坦也划入该省；特里波利省（帕夏区）管辖叙利亚沿海地区和黎巴嫩山区，也包括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和哈马。土耳其语称这些行政区为"桑贾克"，直接隶属于叙利亚的土耳其总督（帕夏）管辖。帕夏（Pasha）是高级贵族爵位头衔。帕夏可以担任各高级文武长官，可以任省督和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军事长官。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人按古名称将上述3个地区统称为叙利亚。

奥斯曼帝国从国家体制上说，是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帝国的统治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封建主组成统治阶

级，素丹是国家元首，拥有全部军事和行政大权。从 1543 年起，素丹又兼有哈里发称号，即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因此素丹是伊斯兰国家的元首、护教者和神法的执行者。奥斯曼帝国表面上看是中央集权，而实际上又是地方分权制国家。国家既无内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又无民族统一，实质上是征服者用武力联合起来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混合体。奥斯曼帝国同时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军队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帝国政府在地方上实行军事封建采邑制，在包括叙利亚地区在内的被征服地区，对出征作战和提供骑兵的封建主，按其实力和军功大小封赐数量不等的军功田，由他们直接管理和统治。每一个行政区又是一个军区，居于其中的骑兵组成奥斯曼帝国骑兵的战斗单位。桑贾克的长官又称贝伊，既是军区的军事统领，也是骑兵民团的指挥。素丹的地方官在自己的领地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自己酌量确定和征收税款，分配领地，建立法庭，进行审判和判决。

为了确保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通常保留阿拉伯被征服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只是在某些方面稍作改变。例如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方面，与 1530 年《苏里曼法典》规定大体相同，把全部土地分成三个基本类型：官地，素丹为最高所有者；宗教寺院土地（叙利亚等地称“瓦克夫”）；私有土地。为数不多的私有土地所有者，多为大地主。他们占有的私有土地，由农民在分成制基础上租种。他们可以自己支配土地，国家还对私有土地征收土地税。非穆斯林要缴纳非穆斯林人丁税。伊斯兰教寺院封建主的瓦克夫土地是通过募捐形成的，免纳税收。世俗大封建主将大量地产赠与伊斯兰宗教机构清真寺、宗教学校、修道院、托钵僧寺院。中小农民也常常捐赠瓦克夫土地，以求得自己的土地免遭封建主

侵吞。拥有瓦克夫的伊斯兰宗教封建主是最大的封建剥削者和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官地制度大致分为两类:俸田和军功田。俸田指年收入不少于10万阿克切的大地产和庄园,为素丹王室所有,或分封给执行职务时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军功田分封给军事领主,可以终生占有,如战功卓著,死后可由儿子继承,但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赎金,以领取新的特许证。军事领主可免缴税收,但必须承担军务,按时接受阅兵,并与自己的后备军一起出征。俸田和军功田由农民耕种,这些农民绝大多数是纳税阶层——拉雅。他们从地主手中得到份地,但只有得到地主同意才能转让。实际上农民被固定在份地上,还承担繁多的赋税和劳役。信仰基督教的拉雅还要缴纳人丁税。

军功田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帕夏区(省)普遍实行。但是在黎巴嫩地区和叙利亚其他地区较多保留着原来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在叙利亚中南部地区,几乎全部土地仍为当地阿拉伯封建贵族占有。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长期保留有限度的自治权,由阿拉伯的埃米尔进行管理。16至17世纪时在麦阿尼德家族的统治之下,17世纪末起又由谢哈卜家族的埃米尔专权。他们自封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向素丹纳贡,但这里没有土耳其驻军。黎巴嫩是等级制封建社会,国家分为克鲁斯安、麦特恩和舒夫三个封邑。三个封邑主把封邑又分成较小的领地。在这些等级的最高层是土耳其帕夏,他们坐镇阿勒颇、大马士革,是阿拉伯埃米尔和帝国素丹之间的中介人。另外,叙利亚拉达克也是一个自治公国,它与叙利亚情况大体相同。

封邑主在封地上是绝对的统治者,埃米尔和谢赫依附于他们,

有纳贡义务,并为封邑的军队提供民兵,向居民征税。黎巴嫩的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是最富有的人,他的王宫豪华程度曾使欧洲的游行者们大感吃惊。

在叙利亚边远地区仍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许多长期以来逐渐封建化了的游牧与定居部落居住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长老谢赫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者,但封建社会中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民主残余。谢赫不但统帅骑兵,还要照管牲畜,与家庭成员一起劳作。

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委任的帕夏,更迭频繁。从1517-1697年的180年间,大马士革的帕夏就更换了133人。这些官吏中的多数人,实际上是用金钱买得官职。他们把做官看成是发财致富和取得荣誉的手段,因此只图搜刮,并不为民谋利。广大纳税阶层——拉雅是被人放牧的、供人剪毛的和挤奶的羊群。由于帝国地方当局的无序统治、封建纷争,特别是大封建土地所有与小农经济相结合条件下的简单再生产,不能创造丰足的物质储备以满足社会需要或抵抗自然灾害,致使广大农村地区土地荒芜,百业凋敝,民不聊生。17世纪,阿勒颇省约有3200个村庄,到18世纪末,只剩下400个。农村居民或饥饿而亡,或迁居城市。到18世纪中叶,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饶的平原已成荒漠。

土耳其人统治初期,西方势力开始渗入,特别是17-18世纪,西方势力利用通商特惠条约和治外法权侵入叙利亚、黎巴嫩地区。欧洲商人在一些大城市建立贸易机构,进行不等价交换,并在西顿、贝鲁特设立领事馆。在阿勒颇还逐渐形成了以经商为主的欧洲侨民区。18世纪后,法国人在阿勒颇及其他城市的商业活动日益普遍。英国人随后也进入叙利亚。欧洲人逐渐在奥斯曼帝国的

贸易中占居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的取得,首先是他们有较好的“经商素养”,拥有大量的资本、较好的业务及商品运输组织,经济实力等超过当地的阿拉伯商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不平等的特惠条约为欧洲商人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14世纪,奥斯曼帝国就向意大利商人单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并允许他们迁居帝国城市经商,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财产。1535年,苏里曼一世和弗朗西斯克一世签订了双边特惠条约,授予法国商人一系列特权。1604年,又与英国人和威尼斯人签署类似条约。直到20世纪前,这种条约被欧洲列强作为对阿拉伯国家殖民奴役的手段。在这一背景下,叙利亚城市中阿拉伯人工商业呈现出衰落的景象。

叙利亚等地区经济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15世纪末国际商路的改变。1498年从欧洲绕行好望角而至印度的海上商路的开辟,使地中海地区原有国际商业通道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取代了阿拉比亚、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成为西方世界商业贸易的掮客。叙利亚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的主要城市在16至17世纪更是显现出衰落的景象。虽然城乡间地方性商品交换的中心仍在逐渐发展,但国内贸易联系日益薄弱。

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总体上也开始出现衰落迹象,特别是在与欧洲先进国家的竞争中落伍。欧洲当时已实现向工场手工业过渡,此后又过渡到大机器生产;而在奥斯曼帝国仍然是建立在手工劳动上的行会工业。行会内部存在着职位等级,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传统与习俗。当时叙利亚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是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等内陆城市以及拉塔基亚、塔尔图斯、贝鲁特等沿海城市。18世纪以前,这里的手工制品还向欧洲出口,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推进,叙利亚的手工产品逐渐被排挤出欧洲市场。

叙利亚、黎巴嫩地区与其他阿拉伯地区一样，手工业和农业没有明确分工。例如，黎巴嫩细纱及毛织品直接产自农户家中。叙利亚的阿勒颇地区毛织品、棉纺品等也都产自农村。相反，许多城市居民，如大马士革地区，大多仍然从事农业耕种，特别是园艺业。

另外，在城市社会结构中还有众多非生产性阶层，其数量在某些城市还比较大。这些非生产阶层中，有离地地主、军人、宗教界人士、商人及奴仆。同时，并非所有手工业者都从事生产劳动，如行会中的澡堂老板、理发师、赶驴赶骆驼人、舞女、鼓手等。

奥斯曼封建制度下的叙利亚、黎巴嫩城市难以发展。地方商人无力与享受特惠条约的欧洲商人竞争，加之国际商路的改变，阿拉伯地区商品贸易难以再现昔日的繁荣。另外，各个城市又有各自的习俗和贸易法规，度量衡也不尽统一，各类关卡税收更是名目繁多，凡此种种都对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产生着阻碍作用。

人民运动与独立斗争

反对土耳其人的独立运动，其中心是巴尔干、外高加索和阿拉伯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则是阿拉伯地区的反土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1516年，谢里姆一世的军队占领黎巴嫩后，国家管理权交由原麦阿尼德王朝埃米尔法赫鲁丁一世掌管。在土耳其人与马木鲁克王朝夺争叙利亚时，法赫鲁丁作壁上观。当谢里姆一世凯旋归来时，他拜倒在土耳其人的足下，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欢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奥斯曼素丹谢里姆一世批准法赫鲁丁及其同僚和酋长们保持原有的封地，准许他们继续享有在前政权下享有的地方自治权，并征收较轻的年贡。他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封地可传给自己的子孙，并有不为素丹服兵役的特权。

1544年，法赫鲁丁一世在大马士革宫中被害，他的儿子基尔克马斯继位。1585年，基尔克马斯在土耳其人对黎巴嫩的讨伐战争中战死疆场。1590年，基尔马克斯的儿子——法赫鲁丁二世即位。法赫鲁丁二世以其充沛的精力、开明的思想和机敏的外交手腕，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的黎巴嫩历史上享有盛名。他虽是一个侏儒，但却胸怀大志：建立一个强大的黎巴嫩，割断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政府——最高波尔特的联系，使黎巴嫩走向上西方化道路。最初他向土耳其人国库上缴高额贡赋，与素丹共享战利品。通过这种方法，他不仅从素丹那里得到山区新的封地，而且从黎巴嫩沿海地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封地。

法赫鲁丁二世为了准备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斗争，开始与意大利谈判，并修筑要塞，加强军队。1613年他发动起义，黎巴嫩全民参战，但最终失败。法赫鲁丁二世被迫逃亡意大利。他试图联合法国、佛罗伦萨、梵蒂冈、马耳他骑士团，组织反对土耳其联盟，但未获成功。

1618年，奥斯曼帝国素丹奥斯曼二世即位，法赫鲁丁二世获得赦免，回到黎巴嫩。他恢复封地，并关心经济发展，鼓励对外贸易，加速国家的"欧化"进程，一批青年人被派往意大利等地学习。这为马龙派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欧洲阿拉伯学发展。1624年，奥斯曼最高波尔特承认他是阿拉比斯坦的统治者，他的统治地域从阿勒颇到埃及边界。此外，他还欢迎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以法国天主教为主的传教士在贝鲁特、西顿、特里波利、阿勒颇、大马士革，甚至在乡村地区建立了活动中心。法赫鲁丁二世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善待基督教及其他伊斯兰教少数派，如德鲁兹教派。30年代初，法赫鲁丁二世又发动起义，但遭到大马士革

帕夏军队的镇压，他本人及儿子被俘。1635 年 2 月他与儿子被绞死，他的自治国被摧毁。

黎巴嫩人的反土独立运动一直在继续。17 世纪时，两个黎巴嫩贵族集团互相敌对，不断进行斗争。一个以麦阿尼德为首，反对土耳其人统治，因而得到黎巴嫩农民的支持。另一个以出身亚拉马丁家族集团的埃米尔为首，得到土耳其人的支持。17 世纪末，麦阿尼德家族衰落，出身于谢哈卜家族的埃米尔逐步崛起。1710 年，土耳其人和亚拉马丁集团试图推翻谢哈卜埃米尔，将黎巴嫩变为土耳其的帕夏区。但在 1711 年艾因达拉战役中，土耳其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较长期土耳其人不再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黎巴嫩事实上又获得了自治地位。

在法赫鲁丁二世自治国被摧毁，以及黎巴嫩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纷争继续之时，叙利亚地区则处于土耳其帕夏的统治之下。18 世纪初，叙利亚本地阿拉伯贵族逐渐崛起。其中首先发迹的是阿兹姆家族的易司马仪·阿兹姆。易司马仪是大马士革人，1724 年被任命为大马士革省督。其子艾斯耳德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他在哈马和大马士革建造的公馆至今仍然是游客们必到的游览胜地。阿兹姆家族的成员，还被任命为西顿和特里波利的官吏。但是与黎巴嫩的封建主们不同，阿兹姆家族效忠奥斯曼帝国最高波尔特，然而他们并未得到善终。易司马仪被帝国政府下狱，并死于狱中。艾斯耳德于 1757 年，由帝国最高波尔特下令，被暗杀于澡堂中。

18 世纪中叶，叙利亚、黎巴嫩处于混乱状态。其原因，一方面是土耳其人无序统治，本地区内部纷争不已；另一方面也与阿拉伯地区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独立活动有密切关系。18 世纪初，埃及

的波尔特地方官被推翻，整个政权转到马木鲁克埃米尔手中，埃及成为独立国。1768年，埃及的阿里·卡比尔贝伊利用俄土战争(1768－1774年)，与俄国联盟，开始了进一步争取独立的斗争。同年11月，他驱逐波尔特地方官，中断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关系，并于1770年趁土耳其舰队被俄海军歼灭之际，宣布埃及独立。阿里贝伊在俄国舰队和巴勒斯坦谢赫扎希尔·奥马尔支持下，发兵北进，1771年6月夺取大马士革。由于马木鲁克将领的背叛行为，大马士革失守。1772年秋，俄土签订和约，俄舰队撤出叙利亚沿海，贝鲁特重新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773年，俄土结束战争，俄舰队又出现在叙利亚海岸，黎巴嫩的埃米尔尤素福·谢哈卜与土耳其人断绝关系，转而与俄国人和谢赫扎希尔结盟。1774年《库楚克—卡纳齐和约》签订后，俄舰队撤离叙利亚沿海。土耳其人趁俄国人撤离之机，出动兵力进攻巴勒斯坦谢赫扎希尔。1775年，扎希尔在阿卡被围，不久战死，起义被镇压。由于土耳其帕夏艾哈迈德·贾兹扎尔镇压扎希尔起义的特殊功劳，他被任命为西顿的谢赫。从此开始了叙利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贾兹扎尔出身于波斯尼亚，在被埃及的阿里贝伊雇用时，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打击尼罗河三角洲阿拉伯游牧民，因而得到了“屠夫”的诨名。在被任命为西顿的谢赫之后，又于1780年被奥斯曼帝国最高波尔特任命为特里波利和大马士革帕夏辖区的首长，从此成为整个叙利亚的全权统治者，并将阿卡城作为他自己领地的统治中心。贾兹扎尔以残酷与独裁留名于后世，他名义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权威，实际上自立为王，甚至将帝国素丹的钦差大臣处死。在被任命为西顿的谢赫之后，不断扩大势力，向北侵入北黎巴嫩、向南侵入巴勒斯坦。为了加强统治势力，他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即一

支由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兵团和一支由马格里布人组成的步兵军团，并在西顿等港口城市组织海军舰队。贾兹扎尔在叙利亚统治以残忍和恐怖著称。他对当地民族极尽搜刮和盘剥，对不驯服的家族和社会群体施以恐怖的手段，对不断发生的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1780年，黎巴嫩农民自发起义，反对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巴勒斯坦的贝都因人和西顿的费拉赫（农民）也发动反封建压迫的起义，但都遭到贾兹扎尔的残酷镇压。1788年黎巴嫩地区爆发了一次18世纪下半叶最大规模的起义。起义者夺取了贝鲁特、西顿、苏尔，逼近贾兹扎尔的老巢阿卡。由于部分封建首领被贾兹扎尔收买，起义失败。1790年，黎巴嫩地区由于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因封建主内讧又发生新的起义。1797年，黎巴嫩卓越有为的埃米尔伯什尔二世上台后，黎巴嫩地区连续不断的起义才逐渐平息下来。但翌年，大马士革又发生大暴乱，居民们拒绝向贾兹扎尔纳贡。奥斯曼帝国最高波尔特派任新的帕夏到达大马士革后，冲突才勉强平息，但骚动和混乱在叙利亚不断发生。1804年，“屠夫”贾兹扎尔染疾而亡，贾兹扎尔在叙利亚的残酷统治宣告结束。

实际上自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统治之初起，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各阿拉伯地区起义和暴动始终连续不断。在帝国其他地区如巴尔干及帝国本土小亚地区也是如此，加之封建统治者内讧不断，各地方封建主之间纷争不已，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已严重削弱。在帝国的统治区域内到处笼罩着封建无政府状态，叙利亚、黎巴嫩也不例外。人民运动和独立解放斗争，震撼着帝国腐朽的封建统治，奥斯曼封建制度已濒临于崩溃的边缘。

二、19 世纪初的叙利亚、黎巴嫩

法国侵略计划的破产

19 世纪初，叙利亚、黎巴嫩是奥斯曼帝国的边远省份，由地方专制封建主统治，但在形式上承认帝国的宗主权。18 世纪，叙利亚黎巴嫩阿拉伯人，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此同时，欧洲列强殖民争夺愈演愈烈，奥斯曼帝国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之一。18 世纪末叶，英法在埃及的商业竞争和在印度的斗争日趋激烈。在拿破仑远征埃及和争夺伊拉克的斗争期间，叙利亚和黎巴嫩等被迫卷入世界政治旋涡之中。

法国大革命时期，执政内阁就十分关心法国向东方扩展影响的问题，曾以所谓保护"东方基督教权利"作为它入侵叙利亚、巴勒斯坦，掩饰其东方扩张计划的借口。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经也把矛盾指向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打算联合当地的阿拉伯军队，与土耳其统治者和英国殖民者争夺叙利亚等地，但与阿拉伯人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统治叙利亚 20 余年的贾兹扎尔帕夏拥有无限的权力和财富，更不想与外来者分享其占有的权力和财富。黎巴嫩的埃米尔伯什尔二世则对此持观望态度，贾兹扎尔要求他增派军队到阿卡，贾兹扎尔得到的答复是黎巴嫩山区一片混乱，无暇他顾。然而，伯什尔和历史上黎巴嫩地方统治者一样，在各方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他向土耳其军队和法军都提供粮食援助，以取悦双方。此外，伯什尔还不得不顾忌到，在北黎巴嫩，特别是贝鲁特，从欧洲逃亡而来的神父和僧侣们在马龙派教徒中煽

动对法兰西共和国和对拿破仑的仇恨情绪。

1798年7月,法军攻占开罗。此时,英国根据它与土耳其帝国政府的协定,向埃及派兵并切断法军的海上通路,使法军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由于英军在阿布基尔海战的胜利结束了土耳其政府的动摇和犹豫,奥斯曼素丹谢里姆三世向法国宣战。同时,由于拿破仑向西亚地区,特别是向小亚地区扩张的企图,加之与法国隔断联系,拿破仑决定率军北上。1799年2月,拿破仑率3万大军北上占领阿里什、加沙、雅法和海法,3月逼迫贾兹扎尔的陪都阿卡。4月,法军在加利利击败大马士革帕夏派来的2万大军。但是法军围困阿卡70多天,未能得手。英军和谢里姆三世的土耳其正规军参战,援助贾兹扎尔帕夏,击败拿破仑多次进攻。同年6月,拿破仑军中鼠疫流行,拿破仑在叙利亚一无所获,只占领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海一些城镇,3个月后返回埃及。但是这一军事行动却使叙利亚情况复杂化,导致封建主之间新的纷争。

伯什尔二世在黎巴嫩的改革

法军撤退后,叙利亚帕夏贾兹扎尔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他与大马士革和特里波利帕夏不断进行战争。这时一个新的地方势力——黎巴嫩的埃米尔伯什尔·谢哈卜二世逐渐崛起。伯什尔以极端手段镇压了所属封建主的叛乱,结束了领地内封建主之间的内讧,将整个黎巴嫩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贾兹扎尔决定除去这一竞争者,但伯什尔得到土耳其最高波尔特的支持。谢里姆三世重申伯什尔拥有在其所属区,以及贝卡谷地、前黎巴嫩、朱拜勒和西顿近郊的权利。从此伯什尔直接从属于最高波尔特,这对贾兹扎尔是一个打击。

1804 年贾兹扎尔去世，伯什尔二世趁机加强黎巴嫩中央集权，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伯什尔的全部改革活动旨在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消灭封建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伯什尔大有振兴黎巴嫩、实现 100 年前法赫鲁丁二世强国富民的宏图大志。在掌权之初，他就着手消除在黎巴嫩最有影响的几个封建主的影响，将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19 世纪初，他继续与一些有权势的家族进行斗争，剥夺他们的采邑，安插自己的子弟和亲信。贾兹扎尔死后不久，他就吞并了朱拜勒，随之又兼并了素有粮仓之称的贝卡谷地。

伯什尔使用离间之计挑起封建主上层之间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他无情打击不甘臣服的宗教少数派首领，特别是剥夺南黎巴嫩德鲁兹大封建主的领地，将北方的马龙派农民迁移至此，并允许他们缴纳较少租金，鼓励种植桑树、纺织丝绸，个别富裕起来的佃户还向伯什尔赎买土地。为了保证国内贸易的安全，他下令打击劫掠行为。同时还限制封建主的苛捐杂锐，减轻农民的负担。他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鼓励农民发展丝织业。由于黎巴嫩地处山区地带，为了货畅其流，伯什尔修筑道路，扩建贝鲁特港口，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伯什尔二世执政时期，贝鲁特作为重要的海港和国际贸易重镇逐渐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占据优势地位。伯什尔二世招来外国资本家，开发黎巴嫩的工商业，黎巴嫩地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外国资本也逐渐把黎巴嫩变为外国资本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伯什尔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较其前辈法赫鲁丁二世更加向西方开放。他的宫廷里同时各有一座基督教教堂和清真寺，他欢迎西方传教士在黎巴嫩兴办学校。为了学习西方的医药科学，伯什尔派遣学子到开罗留学，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由于得到了

法国和基督教会的支持，伯什尔巧妙地控制了穆斯林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基督徒之间的纷争，存在已久的宗教教派冲突得以缓解。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黎巴嫩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一定的发展。他还曾作为埃及的开明君主穆罕默德·阿里二世的同盟者，反对奥斯曼帝国素丹和英、俄等对埃及事务的干涉。1831 年，埃及进犯叙利亚时，伯什尔的军队在阿卡、霍姆斯和大马士革与埃及人并肩作战，帮助埃及人赢得了胜利。

1840 年 9 月，英土军队在贝鲁特登陆，10 月伯什尔投降，他的埃米尔职位被其侄子取代。不久马龙派和德鲁兹人发生战斗。1847 年，帝国素丹提出和解方案。黎北部山区交由受法国支持的马龙派管辖，南部交由受英国庇护的德鲁兹人管辖。1850 年，伯什尔在伊斯坦布尔去世。

麦哈迈德二世改革时期的叙利亚和埃及的入侵

19 世纪 20－30 年代，奥斯曼帝国素丹麦哈迈德二世开展西方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状况恶化，对改革的抵触情绪上升，加之托钵僧的宣传，引发了席卷奥斯曼帝国各地的骚乱。叙利亚的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地骚乱的规模更大。

1825 年，在大马士革发生大规模暴动。起因是素丹发布关于货币流通规定的敕令。同年，在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等地也发生抗税暴动。1830 和 1831 年，纳布卢斯和大马士革相继爆发新的动乱。在大马士革，土耳其帕夏遵照帝国政府命令，对手工业作坊和小店铺进行登记，以便提高税收。这成为民族起义的信号，起义者烧毁帕夏的宫殿，包围卫戍部队的城堡。这种自发产生的暴乱和骚动，以及笼罩着叙利亚的不满情绪，被穆罕默德·阿里所利用。

当1831年埃及军队侵入叙利亚巴勒斯坦时，当地居民把他们视为救星。

穆罕默德·阿里是埃及近代史上著名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开明君主。他在位时在埃及国内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消灭了落后的中世纪残余，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客观上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增强了国力，维护了国家独立。阿里的改革促进了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为他对外扩张准备了条件。早在19世纪20年代，阿里根据土耳其素丹的命令，派遣两儿子分别侵入阿拉伯半岛和苏丹。1825年，阿里应素丹之邀，出兵镇压希腊人民起义，虽未成功，但土耳其素丹慑于阿里的实力，将叙利亚等地让予埃及。1831年，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在俄、英、法等列强干涉下，1833年4月，土耳其埃及签订和约，埃军撤出安纳托利亚，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宗主权，埃及有权占领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区。

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占领叙利亚后，安抚叙利亚民众，特别是对他们当中的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他推行社会改良，改革行政制度，加强司法管理，征收统一土地税，扶植工商业，兴办学校，引进欧洲技术等，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易卜拉欣巧立名目，增设新的苛税，将原来的赋税额提高两倍以上，并对丝绸等产品生产实行政府垄断。更为严重的是，埃及占领军解除当地地方武装，实行兵役制，这是当地封建主绝对不能接受的政策。特别是黎巴嫩地区，长期以来保持自治半自治状态，地方武装是外御强敌、内治社会的工具。兵役制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看来是最为屈辱的制度。1834年，巴勒斯坦爆发起义，并迅速蔓延到叙利亚全境。1840年6月，当黎巴嫩又爆发新的起义时，领导起义的封建主们在发布的宣言中，就把解除地方武装和实行兵役制列为反对埃及

占领军的首要原因。1839 年 4 月，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初期，埃军接连获胜。但英、俄、奥、普等列强支持土耳其，于 1840 年 9 月对埃及宣战，叙利亚、黎巴嫩等地人民也起而反对埃及人的统治。埃及战败后根据同年 11 月《英埃协定》，穆罕默德·阿里放弃在叙利亚的全部属地。埃及占领军在易卜拉欣的率领下于 12 月底撤离大马士革，取道加沙回国。埃及占领叙利亚等地的惟一结果是英国在东方利益加强；法国势力削弱。

三、旦齐马特时代

1840－1863 年的叙利亚、黎巴嫩

1839 年 6 月，在位长达 31 年之久的奥斯曼素丹麦哈迈德二世逝世，16 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位（1839－1861 年）。为拯救帝国，一些有远见的上层官僚制定了进一步改革的计划。1839 年 11 月 3 日，素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举行庄严典礼，所有达官显贵、伊斯坦布尔市民首领、非伊斯兰民族代表和外国使节齐聚玫瑰宫，由改革的倡导者、外交大臣雷希德宣读诏书。其中宣布了改革的纲领，诏书所预定的改革叫作“旦齐马特”，意为“卓越高尚的改革”。此后，整个改革时期（1839 年至 1876 年。学者们对截止时间有不同观点）被称为“旦齐马特”时代。“旦齐马特”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受到封建主、达官显贵和宗教界代表的抵制。特别是改革的影响仅限于帝国首都及帝国本土小亚地区。对阿拉伯等地区如叙利亚等边远地区影响不大。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等地区进一步加强统治，并对其统

治方式进行了一些调整。

穆罕默德·阿里撤出叙利亚后，这里又回到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最高波尔特着手重新安排这里的统治秩序。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仍逐步实行了一些新的法律。叙利亚帕夏辖区的省长们被剥夺了军事和财政特权，委派了特别财政官员——杰夫捷尔达尔（旦齐马特时代领导税收部门的官员）和直接从属于财政部门的姆哈色尔（旦齐马特时代管理桑贾克财政和税收部门的官员），但包税制实际上仍保留下来。旦齐马特军事改革后，在叙利亚派驻了正规部队，它独立于民政当局之外，正规军团的指挥官直接隶属于帝国军政部。

1841年，叙利亚进行了新的行政划分：西顿和特里波利帕夏辖区合并为一个省（帕夏辖区），中心移至贝鲁特。将曾隶属于西顿帕夏辖区的巴勒斯坦划出，成为贝鲁特省管制下的耶路撒冷桑贾克特区。这些细小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并未改变叙利亚封建统治制度的本质。50年代，叙利亚发生了一系列反封建统治的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50年的阿勒颇起义和1852－1853年的豪兰起义。

1840年后，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外国势力加紧渗入的时期。外国势力渗入的渠道之一是传教团的活动。40年代时，沉寂一时的传教团活动又急剧活跃起来。他们在叙利亚、黎巴嫩开办学校，建立慈善机构，宣传基督教教义，扩大在这里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团是东方最积极的传教团，它们的活动受梵蒂冈指派，并得到法国的支持。这些传教团在这里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宗教学校及宗教慈善机构。1820年时，第一批美国长老会传教团出现在贝鲁特，1860年时已

拥有30多所学校、印刷厂等。1866年,他们又开办叙利亚基督教新教中专学校,这是今天黎巴嫩很有影响的美国大学的前身。

自从拿破仑时代起,黎巴嫩一直处在埃米尔伯什尔二世的统治之下。1840年,奥斯曼帝国最高波尔特起用伯什尔二世的侄子取而代之。在伯什尔二世时期,穆斯林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基督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暂时得以缓和。伯什尔二世的侄子当政后无力控制局面,加之英法势力的竞争,两派矛盾激化。1841年,德鲁兹封建主首先发难,双方互相残杀持续6周,最后德鲁兹人占据了南黎巴嫩。最高波特尔借机进占黎巴嫩,并委派奥麦尔帕夏为省长。奥麦尔镇压了德鲁兹封建主,马龙派又回到南黎巴嫩。同时,土耳其最高波尔特取消了埃米尔制,对黎巴嫩实行直接统治。1845年,土耳其政府把黎巴嫩划分为两个辖区:基督徒聚居的北部,由一位基督教助理长官统治;基督徒和德鲁兹派混居的南部,由一位德鲁兹助理长官统治。两者均向西顿瓦里(省长)负责。1845年,两派又发生冲突,并相互残杀,后在外国领事的参与下,确立了新的管理体制,设立两个政权体系——全地区设两个省长,每个村设两个瓦基里(代表),每个卡伊马卡(区、县统治者)属下设一有司法职能的委员会。这些措施并未消除两派之间的矛盾。反而更加加深了宗教分歧,同时也为列强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克鲁斯安起义与贝鲁特、大马士革教派大屠杀

19世纪40－50年代,对外贸易和商品率的提高,加深了封建主和工商业者对黎巴嫩农民的盘剥。苛捐杂税和官员们的营私舞弊,使农村不满情绪逐渐高涨。1858年初,来自克鲁斯安(北黎巴嫩)的300多名代表向贝鲁特省长提交请愿书,要求取消部分封建

赋税，但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1859年1月，农民取出隐藏多年的武器，举行起义。起义领袖是马掌铁匠塔努斯·沙欣。起义农民赶走了马龙派封建主，夺得土地和财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最高波尔特不得不批准塔努斯·沙欣为卡伊马卡。

克鲁斯安起义浪潮扩及黎巴嫩其余地区，发展到德鲁兹地区马龙派农民聚集区。他们的行动受到马龙派宗教界的积极支持；德鲁兹封建主也开始武装德鲁兹民兵。1860年5月，起义演变成德鲁兹派与马龙派的械斗。贝鲁特的法国领事等人挑唆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场相互残杀的惨案，仅三天时间，贝鲁特附近地区就有60多个村庄被毁。6月，暴乱扩散到南黎巴嫩等地。德鲁兹农民包围天主教堂和传教士团，焚毁教堂，打死僧侣。7月，暴乱蔓延到大马士革，当地的穆斯林对基督徒进行大洗劫，杀死2万名基督徒，摧毁300多基督徒村庄，560间教堂，40所修道院。穆斯林也遭受很大损失。

法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干涉。1860年8月，拿破仑三世派7000余法军，占领黎巴嫩(次年6月撤走)。在列强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奉命赶到贝鲁特。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审判罪犯，确定赔偿金，并负责组织黎巴嫩新政府。福阿德任委员会主席，成员有法、英、普、奥、俄等国代表。委员会在贝鲁特起草了一项关于黎巴嫩自治的法令。1861年6月9日，法、英、普、奥、俄在伊斯坦布尔签署黎巴嫩组织法(3年后修订。1867年，意大利接受了修订后的组织法)，后经素丹麦吉德签署成为正式法令。该法令承认并保证黎巴嫩的自治，由最高波尔特委任一名基督教徒担任总督，执掌行政大权，但总督人选须经签字国同意。同时设立了一个由所有主要宗教团体代表组成的中央行政会议，协

助总督。此外分别设立警察部队和裁判机构。法令规定帝国军队不能驻扎山区，山区居民不服兵役，也不向素丹缴纳贡赋。第一任总督为亚美尼亚天主教徒杜德帕夏，并根据1864年修订后的组织法令实行自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黎巴嫩的自治才被土耳其政府废除。

1864年，奥斯曼帝国重新修订黎巴嫩组织法时还涉及到叙利亚。叙利亚被分为大马士革省和阿勒颇省，并各设总督一人，直接对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负责，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1887年，叙利亚又被划分为大马士革、阿勒颇、贝鲁特三个省，以及黎巴嫩、耶路撒冷两个特区。

阿拉伯民族主义启蒙运动

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是从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在19世纪中叶以前，它处于发轫和启蒙阶段。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其所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成为这一运动的发源地。外来的专制统治和殖民压迫，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传入，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的锐意改革，民族民主意识的萌发和教育文化的发展，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西方各国向叙利亚派遣传教团，怀有争夺这一地区的政治目的。但是，这些传教团的办学等活动客观上起到了提高阿拉伯人科学文化水平，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民族主义观念，加速阿拉伯民族觉醒的作用。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叙利亚的知识界，特别是黎巴嫩的基督教徒，纷纷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建

立印刷厂、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他们宣传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提倡研究阿拉伯历史和文化。复兴阿拉伯文化的启蒙运动是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几百年来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抗。它的主要宗旨是重建以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为基础的阿拉伯民族的一致性，从而把宗教一致性推到次要地位，而宗教正是奥斯曼帝国素丹能以哈里发身份骗取阿拉伯人对其效忠的一个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在一些中心城市如贝鲁特等地形成了相当大的商业资产阶级阶层。但是，民族及封建集团之间，众多宗教集团和派别之间自古以来的敌视态度，阻碍了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因此，反映商业资产阶级主张统一的许多思想家也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对宗教持宽容态度，号召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团结起来。

19 世纪中叶，叙利亚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是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 年）。布斯塔尼是基督教徒，毕业于马龙派中等宗教学校，通晓多种语言。1840 年，他结识美国的传教士，并信仰长老会教义。他主张热爱祖国和叙利亚人团结，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派别间的歧视，反对封建分立，反对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奴役妇女等。他是一个不倦的启蒙者、教育家、政治家和作家。1863 年，他在贝鲁特建立了第一所阿拉伯民族学校；1860 年，出版阿拉伯语周刊《纳菲尔·苏里亚》（《叙利亚号角》）；1870 年，出版杂志《真纳》（《小花园》）。这些刊物第一次向叙利亚读者提出政治、文化、文学问题，为建立新的阿拉伯标准语（即合乎语言规范的语言），为在阿拉伯知识分子当中传播欧洲知识做了大量工作。《阿拉伯语详解大词典》和 7 卷本《阿拉伯百科全书》是他留给世人

宝贵的文化财富。他终生致力于阿拉伯语和文化复兴,尽力在民众中倡导宗教和文化宽容。他的堂弟苏莱曼·布斯塔尼在他死后继续出版《阿拉伯百科全书》,还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译成阿文,并加注了许多学术性注解。

布斯塔尼最亲近的朋友和同志是纳希夫·雅济吉(1807－1871年)。他是伯什尔二世的宫廷诗人。他为推广阿拉伯标准语,研究阿拉伯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同布斯塔尼一样,雅济吉反对宗教狂热,号召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在共同的文化思想遗产基础上,建设未来的兄弟般共处的国家。

布斯塔尼和雅济吉将当时叙利亚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1857年,他们的追随者在贝鲁特建立了阿拉伯科学社团——"叙利亚科学协会",在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将不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但它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参加。布斯塔尼和雅济吉的各项活动只局限于启蒙活动,他们认为教育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惟一手段。1860年,叙利亚科学协会一度中断活动。1868年恢复活动后,新一代的协会成员们越来越多地讨论争取独立斗争等问题。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纳希夫·雅济吉的儿子——易卜拉欣·雅济吉朗诵了著名的爱国诗句:"起来,阿拉伯人民,觉醒吧!"这首诗后来在叙利亚广为流传。在诗中,易卜拉欣·雅济吉歌颂了阿拉伯的光荣历史,抨击宗教狂热,号召用武装起义摆脱土耳其的压迫。易卜拉欣说:"崇高的目的要用剑来达到,要想达到它,就去寻找(剑)吧!"

在叙利亚文化复兴运动中,新一代领导人物还有法利斯·尼穆尔和朱尔吉·宰丹。他们都被迫离开叙利亚,定居埃及。法利斯·尼穆尔创办《文摘》月刊和《穆克塔木日报》。朱尔吉·宰丹创办《新

月》杂志,还著有《伊斯兰教文化史》、《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等历史著作。作为作家,他的历史小说,想像力丰富,风格朴实,影响了许多读者,对以后这种文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第二代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贡献,是把阿拉伯民族觉醒从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叙利亚、黎巴嫩

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渗透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瓜分奥斯曼帝国、争夺亚洲阿拉伯各国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英、法对叙利亚、黎巴嫩的争夺逐渐演化为法国占据优势的局面。

事实上,早在奥斯曼帝国初期,法国就开始觊觎叙利亚和黎巴嫩。公元1536年,法国首先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获得外国人所获得的第一个特权:即取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天主教的保护权,以及法国商人在土耳其帝国境内经商的自由权。但是,法国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对天主教的保护权,而是企图充当基督教的保护人。17世纪后半期,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特权与日俱增,特别是在黎巴嫩,法国不仅成为天主教派的保护人,而且成为一切基督教派的保护人。与此同时,法国传教团在各地设立了传教和教育机构,教授法语,传播文化。18世纪末,拿破仑进攻埃及和叙利亚时,土耳其和法国的关系恶化。但在1802年,土法又重签协定,法国仍保持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天主教的保护权。

1831年,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进入叙利亚、黎巴嫩。英

法两国也借机在黎巴嫩展开争夺斗争,英国笼络伊斯兰德鲁兹派,法国支持马龙派,从此黎巴嫩两大教派内部冲突日趋激烈。法国谋求黎巴嫩归属埃及,而英国及其他列强则力主黎巴嫩仍归奥斯曼帝国统治。英法等列强势力介入埃土战争(第一次 1831 - 1833 年,第二次 1839 年春夏之交)的最终目的是争夺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地区政治、经济、宗教等霸权利益。第一次土埃战争后,英国不愿看到在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存在一个法国支持下的强大的埃及。因为法国支持下的埃及必将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侵害英国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势力范围。1838 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了"英土商务协定",阻碍了英国商业势力渗入埃及,英国唆使土耳其政府求和。同时,为了孤立法国,打击穆罕默德·阿里,英国拉拢俄、普、奥等国胁迫土耳其签订"解决近东事件的条约",即"伦敦条约"。由于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四列强最后通牒,英奥联合舰队封锁叙利亚海岸,炮轰贝鲁特港。1840 年 9 月英军登陆贝鲁特,11 月占领阿卡要塞,切断埃叙间联系。同时,叙利亚、黎巴嫩各地不断举行反抗埃及统治者的起义,埃及军队腹背受敌。而英军舰队开到亚历山大港,胁迫穆罕默德·阿里接受投降条件。阿里被迫屈服,1840 年 12 月撤离叙利亚。结果,英国在东方的势力明显加强,法国势力削弱。但法国保留在叙利亚,特别是在黎巴嫩的特权。

1860 年,在黎巴嫩的马腾和舒夫地区发生法国人挑起的教派屠杀,并蔓延到大马士革。惨案的发生为法国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拿破仑三世怂恿国际势力干涉黎巴嫩和叙利亚。经谈判,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决定,法国以国际名义派兵进驻黎巴嫩,但要求占领期不得超过 6 个月。然而,法国极力延长占领期。为此英国提

出，只有恢复土耳其对黎巴嫩的统治权，才能平息黎巴嫩的内乱。由于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帝国最高波尔特已经控制了局势，法军的存在已无确凿的理由，法军于1861年6月撤离。此后，列强在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分别召开国际会议，起草黎巴嫩组织法。这一法令经1864年重新修订后，在列强特别是在法国的保护下，在黎巴嫩山区地带的自治状态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19世纪末期，虽然德、俄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奥斯曼帝国争夺和渗透，但英、法两国仍保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然是法国主要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贸易、宗教等方面。19世纪初期时，法国在经济上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渗透已经十分明显。法国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变为自己廉价的农业原料产地，控制着叙利亚的生丝生产、销售和初级产品加工。法国企业雷诺公司掌握着叙利亚整个烟草种植，法国人在贝鲁特扩建港口，修建雅法—耶路撒冷—贝鲁特—大马士革铁路，在叙利亚主要城市设立法资银行。法国为了独霸叙利亚和黎巴嫩，反对其他列强干涉叙黎两地事务。1878年“柏林会议”上，法国极力阻止会议讨论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并宣称，任何国家如果干涉叙利亚和黎巴嫩便是侵害法国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势力已大为巩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成立法国铁路公司，修筑陆上交通，开办邮政，扩建海港。实际上，法国就是要以既定事实，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法国独家的势力范围。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及其民众反暴政斗争

19 世纪末叶是奥斯曼帝国日趋衰亡的时期,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1876 年 9 月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执政。他把“祖留姆”(专制暴政)维持了 30 年(1878 - 1908 年)之久。这一时期黎巴嫩地区,主要是山区地带在当地封建主的直接统治之下,并在外国势力的扶持之下保持着自治状态,但叙利亚仍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1864 年之后,叙利亚根据新组织法分为两个省。1887 年后,行政区划又有所变动,叙利亚被重新划分为 3 个省:大马士革省、阿勒颇省和贝鲁特省,由于直接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因而同帝国政府联系和交往密切。

19 世纪末,作为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土耳其,它的意义增加了。帝国外贸的增长很能说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30 年中,对外贸易额增长了 1 倍,其中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地约占帝国进口的 1/4,出口的 1/5。输入的主要是纺织品、布匹和纱线,而出口商品是生毛、生丝、皮革、烟草和水果等。法国已经在叙利亚、黎巴嫩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残酷的祖留姆制度和外国资本的渗入,引起广泛的不满,人民经受着外国资本和土耳其帕夏的双重压迫。他们认为,灾难来源是祖留姆制度。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广大民众憎恨祖留姆制,这种愤慨和不满表现为,阿拉伯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的反政府情绪和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行动。

1886 年,在黎巴嫩德鲁兹山区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领袖是出身德鲁兹显贵家族的纳布里·阿特拉什,他被称作“费拉赫(农民)的朋友”。在土耳其当局做出让步,阿特拉什被委任为德鲁兹

人的埃米尔后，起义才告结束。1896年，土耳其政府在德鲁兹地区实行兵役制，德鲁兹山区爆发新的起义。1899年，土耳其当局着手在德鲁兹山区的苏埃德修建军营时，又爆发起义。1895年和1903年先后在阿勒颇和贝鲁特等地爆发群众性风潮和骚动。

一批阿拉伯知识分子建立了反对祖留姆的秘密社团，阿拉伯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易卜拉欣·雅济吉以及法里斯·尼穆尔是社团的领导者。这个团体在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和苏埃德都建有分支机构。他们散发传单，宣传社团的宗旨和任务，并于1880年提出社团纲领，要求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承认阿拉伯语为国语，提出废除书刊检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等。由于脱离群众，活动逐渐停息，1885年社团解体。另一方面，由于残酷的军警镇压、暗探的跟踪监视，19世纪末叙利亚、黎巴嫩民族解放思想的形成和传播遇到很大阻碍，许多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逃往埃及、欧洲、北非等地，并在那里展开活动。

20世纪初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已丧失了非洲所有的阿拉伯行省。但亚洲的叙利亚、黎巴嫩等地仍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时期，不仅专制暴虐的哈米德二世统治地位已摇摇欲坠，而且奥斯曼帝国也已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列强争斗也愈演愈烈，特别是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这一争夺过程后，英德等在中东的利益斗争日趋尖锐。由于奥斯曼帝国的专制暴政，也由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争夺，阿拉伯民族日益觉醒。可以说，19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反对土耳其等外族统治导致阿拉伯民族传统的再发现和文化复兴；而民族传统的再发

现和文化复兴,反过来又推动了反对外族统治的斗争。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发轫于文化觉醒,最终发展为政治觉醒。20世纪初,阿拉伯民族的文化运动,终于转化为阿拉伯民族的政治解放运动。由于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区相对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及民族民主思想,以及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因此,叙、黎两地自近代以来一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文化启蒙、文化复兴的中心地区之一。到20世纪初,阿拉伯民族主义文化运动在叙利亚、黎巴嫩终于又演变为政治运动,叙、黎两地成为叙利亚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

1875年,叙利亚新教学院学生首先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其成员主要包括叙利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此后,叙利亚各城市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要求建立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所有阿拉伯人不分宗教、党派,都是平等的公民,而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

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但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仍然推行大土耳其主义,压制其他民族,阿拉伯民族运动转而采取隐蔽方式。这段时间建立了许多地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青年阿拉伯协会"(简称"青年会")。该协会于1911年由7位在巴黎求学的阿拉伯青年发起建立,1913年因大部分成员毕业而迁至贝鲁特,次年迁至大马士革。协会的最初目标是争取阿拉伯民族自治权,以后又立足于争取民族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青年会又提出反对在帝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主张,号召在西亚建立一个不受土耳其和西方列强控制的阿拉伯主权国家。该组织成员许

多人被土耳其政府杀害。在此之前，由纳吉布·阿祖里于1904年在巴黎创建的“阿拉伯祖国联盟”也有较大影响。它是20世纪初，阿拉伯社团中建立最早的一个。它的目标是使叙利亚等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阿祖里曾著有《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并出版《阿拉伯民族独立》月刊。阿祖里本人是叙利亚基督教马龙派教徒，该组织其他领导及其成员也大多是叙利亚人。

另外，1909年夏在伊斯坦布尔由阿拉伯职员、文学家和学生共同创立的“文学俱乐部”，1919年12月由阿拉伯著名人士在开罗创建的“奥斯曼地方分权党”等组织在叙利亚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文学俱乐部”表面上是文化启蒙组织，但宣传的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叙利亚等地，其成员达数千人。“文学俱乐部”为各地阿拉伯爱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交流思想的场所，并发行刊物，用诗歌、戏剧等颂扬阿拉伯民族的尊严。1915年该俱乐部被取缔。

另外两个值得一提的组织，是1909年由著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政论家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建立的“阿拉伯联盟”及1912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成立的“改革委员会”。两组织的成员中叙利亚人居多，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他们都要求在地方分权基础上进行改革，曾迫使土耳其政府做出一些让步。

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建立的同时，它们也在逐步走向联合。1913年4月，5名青年阿拉伯协会成员致函开罗地方分权党总部和叙利亚改革委员会，呼吁召开阿拉伯人大会。6月18－24日，大会在巴黎召开。来自叙利亚等地的正式代表24名，约有200多名来宾旁听。大会的主题是地方分权。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确认阿拉伯民族应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和对国家的管理权，要求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同为阿拉伯各省区的官方用语，并提

出警惕和制止外国干涉阿拉伯事务。决议送交土耳其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法国利用借款谈判机会，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政府派出统一进步委员会书记米德哈特·舒克里到法国，同阿拉伯人大会主席阿布德·哈米德·扎赫拉维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中央政府内阁中至少有 3 名阿拉伯部长，阿拉伯人应保持 5 个以上省长职位。阿拉伯语为阿拉伯行省官方语言和小学教学用语。但是，8 月 18 日土耳其政府敕令中否定了上述两项协议内容。后虽然任命了扎赫拉维为参议员，但却搭配了 4 个与民族运动毫不相干的阿拉伯封建主。

从大会的内部看，会议代表虽以叙利亚人为主，但也有其他不同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的代表背景不尽相同，思想观点也较为复杂，既有独立派，也有亲土派，还有亲西方派。大会决议更是各派政治主张妥协的产物，它的政治要求没有超出地方分权和民族文化自治的范围。但是，大会否定了泛伊斯兰主义，一致认为，阿拉伯人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阿拉伯人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不过，这次大会还是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统一了各派力量，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纲领不惜流血牺牲。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一大发展。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独立运动

一、战争中的叙利亚、黎巴嫩

叙利亚、黎巴嫩卷入战争与杰马尔帕夏的恐怖统治

1914年10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德国的盟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1月14日，奥斯曼帝国素丹以穆斯林领袖哈里发的名义，宣布保卫伊斯兰国家，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进行圣战。伊斯兰大穆夫提作出相应的费特瓦（法律决定），宣称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拒绝与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协约国合作。

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广大阿拉伯民族对这场战争反应不一。多数民族主义者把战争看成是建立统一和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天赐良机，他们站在协约国一边，试图借助协约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也有相当多的阿拉伯穆斯林支持泛伊斯兰主义，坚定地站在哈里发一边。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等肥沃的新月地带与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等地成为大战的东方战场，并卷入战争。德国帝国主义和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作为通往苏伊士运河的桥头

堡,加强军事存在;在政治上,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十分活跃,奥斯曼帝国在这里实行恐怖统治。因此,叙利亚和黎巴嫩深受战争之害。

奥斯曼帝国在大战开始后加入德国一方,将自己变成德意志帝国的财政和军事附庸。根据德国军事统帅部的规定,土耳其艾哈迈德·杰马尔帕夏统率的第四军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基地,利用这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攻打苏伊士运河区。1915 年,土耳其人从叙利亚和黎巴嫩征收军粮占当年收获量的 9/10。结果造成两地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处于饥饿状态,而当德土军事当局加紧勒索之时,叙黎两地又发生了罕见的蝗灾,并引发疾病蔓延。战争后三年,30 万叙利亚人和 15 万黎巴嫩人死于非命。

战争伊始,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黎巴嫩实行军事恐怖统治。起初,帝国政府曾选派一位阿拉伯将军统领第四军并全权管辖这里的各项事务。不久后,土政府又派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海军大臣艾哈迈德·杰马尔帕夏取而代之,执掌西里西亚、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希贾兹等行省的军政大权,指挥部设在大马士革。杰马尔虽然军事上才智平庸,但却是一位性格暴戾、喜怒无常的统治者。杰马尔设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由于战争带来的负担加重了经济上的困难,而蝗灾肆虐等导致饥荒遍野,各地不满情绪高涨。1916 年,德鲁兹山区、北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等地出现了阿拉伯游击队。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在战争初期虽然暂时停止了活动,但并未解散,也未放弃基本主张和原则,有些组织还在杰马尔的军队中开展活动。在杰马尔进攻苏伊士运河大败而归之后,军中盛传革命组织已遍布军队之中。生性多疑的杰马尔下令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恐怖手段控制因苏伊士运

河战役失败引发的叙利亚、黎巴嫩动荡的局势。1915 年 6 月，杰马尔首先下令查封报社，指控地方分权党、青年阿拉伯协会等组织的领袖及其其他一些阿拉伯著名活动家犯有“叛国罪”。先后逮捕并将 58 人判处死刑。其中阿布德·卡里勒、哈米顿·扎赫拉维等人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被执行绞刑。1916 年 5 月，杰马尔又将另一批叙利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送上军事法庭，其中 21 人被处死，罪名同样是背叛奥斯曼帝国，参与叙利亚等脱离帝国、建立独立国家的阴谋。

阿拉伯民族起义与大马士革的解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拉伯半岛爆发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大起义，其领导人是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叙利亚等地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为这次起义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起义提供了历史机遇，而民族大起义的兴起又为叙利亚、黎巴嫩反抗外族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创造了时机。

20 世纪初，叙利亚的青年阿拉伯协会等民族主义组织提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建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政治纲领，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叙利亚民族主义组织的力量薄弱，希望联合侯赛因共同行动。侯赛因也需要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此时，英国利用阿拉伯人与土耳其政府的矛盾打击在阿拉伯地区的德土势力。侯赛因便派三子费萨尔亲王与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青年阿拉伯协会建立联系。1915 年 7 月末，费萨尔秘密会见了该组织及阿赫德——“盟约会”的负责人。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力劝费萨尔利用战争与英国人合作以实现独立目标。费萨尔向他们通

报了与英国人接触的情况，并加入了这两个组织。但是，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担心在反对土耳其当局的同时，西方大国会乘机而入，于是商定了英阿合作的条件，史称《大马士革议定书》。主要内容是：1. 英国承认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版图是北起梅尔辛、阿达纳、乌尔法、马尔丁、阿马迪至伊朗边界一线，南到印度洋（亚丁除外），东起伊朗边界、波斯湾，西至红海、地中海沿岸。2. 废除治外法权制度。为此，同意签订英国和未来的阿拉伯国家间的防御同盟协定，向英国提供经济开发项目优先权。《大马士革议定书》反映了阿拉伯人要求独立和摆脱外国干涉的愿望，奠定了阿拉伯封建主和叙利亚等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合作的基础，壮大了民族运动的力量，在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大战爆发后，土耳其素丹以哈里发的名义，号召穆斯林同协约国一道进行所谓"圣战"。为了在东方战场上打击德土联盟，英国政府企图利用侯赛因进行反圣战。为此，英国与侯赛因进行了双方结为军事联盟的秘密接触。1914 年 11 月，英国驻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斯托尔斯曾三次致信侯赛因，指出"土耳其参战正是阿拉伯人实现自己愿望的良机"，希望侯赛因与英国合作。1915 年 7 月，费萨尔回到汉志后，侯赛因根据《大马士革议定书》内容，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以书信方式进行谈判。侯赛因在书信中明确表达了阿拉伯人发动反土起义的条件。此刻英国正与其盟国进行着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谈判，侯赛因根据《大马士革议定书》提出的领土要求使英国备感吃惊。英国不同意侯赛因的条件，然而麦克马洪在 8 月 30 日的复信中对合作条件不作明确表态，仅泛泛地给予阿拉伯独立的许诺，对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的版图，则以

战争之际讨论此事为时过早为遁词，避而不谈。

侯赛因对此答复十分不满，坚持要求英阿签署协定，并要求将承认未来阿拉伯国家的边界作为达成协定的基本条件。当时的战局促使英国与阿方达成协定。1915 年下半年，中近东各战线出现了对英国不利的形势，英国处于守势。危局当头，获取阿拉伯人合作与援助非常必要。因此，英国决定答应侯赛因的某些要求，换取阿拉伯人的合作。1915 年 10 月 24 日，麦克马洪复信侯赛因说，英国政府指令他以政府名义，保证承认在谢里夫·侯赛因确定的版图内的阿拉伯独立国家，但要除去下列领土：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一线以西的叙利亚地区，理由是那里不纯属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半岛与英国签有专门条约的一些酋长国或素丹国的领土应在阿拉伯国家的主权下，但转归英国管理，以免受到外来侵略。侯赛因对此答复虽不满意，但经双方数次书信协商，侯赛因迫于形势做出让步，同意将有争议的版图问题放在战后讨论。英方同意向侯赛因提供武器弹药及资金援助，承认和保护阿拉伯的独立；侯赛因则公开谴责土耳其人是伊斯兰的敌人，保证利用全部人力物力发动反土起义。这就是所谓的《英阿协定》，或称《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其实这一所谓的协定不过是双方的通信录，没有明确规定双方在战争中应承担的具体任务，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应，甚至可以说是英国政府玩弄的一场骗局。但是必须肯定的是，在书信中英国人做出的承诺，加速了阿拉伯民族大起义的爆发。

另一方面，土耳其当局的镇压和恐怖统治驱散了侯赛因最后的动摇。土耳其人统治当局拒绝了侯赛因关于赦免被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请求，并于 1916 年 4 月再次在叙利亚地区处决了一

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土耳其统治当局对侯赛因本人也不再信任，坐镇大马士革的杰马尔帕夏向汉志派遣援军，并准备选用宰德派系的后裔取代侯赛因，严峻的形势迫使侯赛因不得不举行起义。土耳其当局屠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暴行成为侯赛因宣布阿拉伯起义和独立的最有力因素之一。

1916年6月5日，希贾兹的阿拉伯军队向驻扎在麦加附近的土耳其军队发起进攻，宣告起义开始。10月，侯赛因宣布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自任国王。但1917年1月，英、法、意等国联合通知侯赛因，只承认他是希贾兹国王。1916年10月时，英国政府曾派遣劳伦斯到阿拉伯半岛，同阿拉伯人商讨作战部署工作。决定一面围困麦地那，一面由费萨尔率军北上，切断希贾兹铁路，阻止土耳其军队的军需物资运往麦地那。1917年1月25日，费萨尔率军攻占瓦季，7月劳伦斯攻占亚喀巴，8月19日费萨尔进驻亚喀巴，在与巴勒斯坦的英军司令艾伦比取得联系之后，包围马安。至此，进军叙利亚的条件已经具备。1918年9月，在英军配合下，阿拉伯军队向叙利亚推进。9月28日，费萨尔率领阿拉伯起义军占领叙利亚南部重镇德拉，30日抵达大马士革。10月3日，费萨尔在广大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升起了第一面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旗帜，并宣告奥斯曼帝国长达4个世纪的黑暗统治就此结束。随后10月30日，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议，包括驻扎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所有土耳其军队全部交由协约国管制，同时取消土耳其人的行政当局。阿拉伯地区获得解放。

阿拉伯民族大起义消除了土耳其素丹圣战号召的影响，拖住并消灭了东线土耳其杰马尔帕夏指挥的第四军和其他大量的土耳其军队，有力地配合了英军在西线的进攻，为协约国在东方战场取

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对叙利亚人民来说，起义军解放了叙利亚地区，叙利亚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一线曙光，并且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之向着独立与解放方向迈进。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列强用尽各种阴险狡诈的伎俩，背信弃义，违背了叙利亚人民渴求独立与解放的愿望，将叙利亚、黎巴嫩变成它们相互争夺殖民利益的对象，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阿拉伯民族大起义正在进行之时，英法等国也没有片刻停止争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争斗。

英法阴谋瓜分叙利亚和黎巴嫩

在麦克马洪与侯赛因之间的通信谈判尚未结束之前，英、法、俄等协约国成员就已经在背地里就瓜分包括阿拉伯诸省在内的奥斯曼帝国领土问题进行着肮脏的交易。它们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秘密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爆发，俄国就向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要求取得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区域及海峡西边的广大内陆地区。经过多次协商，1915 年春，英法勉强答应俄国的要求，以换取俄国同意承认英法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权利。

法国希望得到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黎巴嫩等广大地区。英国为维护它在埃及和波斯湾的既得利益，确保通往印度和远东的生命线，也竭力谋求从巴勒斯坦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法国认为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应归属于法国；英国以巴勒斯坦是圣地所在为由，反对法国独占，应实行特别管制。法国建议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及两城郊区组成特区，实行国际共管，巴勒斯坦其余地方仍为叙利亚的一部分。而英国要求得到巴勒斯坦两个沿

海城市海法和阿卡。英法两国几经讨价还价，拟定了一份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草案。

1916年3月，英国政府派遣东方问题专家赛克斯、法国派遣前贝鲁特总领事皮科与俄国政府对草案作进一步磋商，最后达成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协定规定，三方政府相互承认各方所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部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各方在其他两方势力范围内的利益应予以保证。按照协定，法国占有西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南安纳托利亚的利益。英国被许以包括巴格达和巴士拉在内的中、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海法及阿卡。协定同时规定，东叙利亚和伊拉克摩苏尔地区将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而从基尔库克至亚喀巴和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区域，则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至于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由于俄国的坚持，实行国际共管。为保持协约国各国间利益平衡，协定声称叙利亚西南部地区国际化。

显然，该协定是与《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精神截然相悖的，它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伪善行径和侵略目的。英法政府已对未来阿拉伯国家的命运作出了可耻的安排，而阿拉伯人却还蒙在鼓里。

英国和法国虽然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一致。其实，双方都想方设法扩充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1916年12月，英军转向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次年11月，英军几乎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克地区据为己有。法国对此深感不安，担心英国继续进攻叙利亚。因此，在英军尚未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前，法国也采取行动。法国的一些驻东方官员要求派军队到巴勒斯坦，"否则将什么都剩不下"了。

在此同时，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侨民中展开政治活动。

在巴黎建立了以黎巴嫩人米舍尔·萨姆奈为首的叙利亚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法国、叙利亚的接近而工作。1917 年 4 月,皮科在开罗召开旅埃黎巴嫩人会议,宣布法国将确立对黎巴嫩的保护关系。

皮科在开罗的活动引起侯赛因的忧虑。1917 年 5 月,赛克斯和皮科到汉志会见侯赛因,对阿拉伯地区的前途与英法利益关系进行密谈,但是赛克斯和皮科只字未提《赛克斯—皮科协定》一事。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公布了从沙皇政府档案中找到的一批秘密协定和条约,其中包括上述协定。这时侯赛因和阿拉伯人才得知这个瓜分阿拉伯领土的阴谋。为了继续欺骗阿拉伯人,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立即宣布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臆造”。1918 年 2 月,侯赛因接到一份贝尔福否定该协定存在的声明。英国人还表示:“坚决站在为建立一个用法制取代奥斯曼暴政的阿拉伯世界而战的阿拉伯人民一边。”侯赛因再次受骗,然而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已对英国的政策产生怀疑,正在进行战斗的起义军中出现了反英情绪。

英军占领叙利亚

1917 年 7 月间,劳伦斯率领英军借助阿拉伯人部落武装力量,占领战略要地亚喀巴。这为协约国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新的军事基地。由于阿拉伯起义军的参战及亚喀巴被占领后战争舞台的北移,较大地改变了两大军事集团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同时也打开了通往叙利亚的大门。8 月 19 日,费萨尔率领部队进驻亚喀巴后,以“解放阿拉伯人”的名义呼吁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不与土耳其当局合作,号召土军中的阿拉伯官兵调转枪

口，进行反土起义，这使土耳其后方及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大大增长。此时，费萨尔本想联合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借助英军的配合，直取叙利亚，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建立拟议中的阿拉伯国家。但是这并不符合英国人的战略计划和政治企图。费萨尔的军队成为从埃及进攻巴勒斯坦英军的右翼。为了保证英军右侧免遭土军袭击，费萨尔的军队奉命包围了亚喀巴东北的军事重镇马安。

在包围马安之前，艾伦比将军接任进攻巴勒斯坦英军总指挥职务。之后，他利用英军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向土耳其军队的防线发起进攻。此时，土耳其军队给养不足，军心动摇，许多阿拉伯士兵逃亡，或加入协约国部队，或组成游击队袭扰土耳其人，客观上有力地配合了英军的军事行动。10 月 31 日，英军突破巴勒斯坦南部的土耳其军队防线，向北占领雅法、伯利恒。12 月 9 日，英军攻入耶路撒冷。

1918 年 9 月，英军趁西方战线反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在东方战场巴勒斯坦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19 日英军攻克纳布卢斯以南土耳其阵线，进入拿撒勒，摧毁了设在该城的德土联军指挥部。在巴勒斯坦遭到惨败的土耳其军队撤至叙利亚和黎巴嫩。9 月 22 日，英军和费萨尔的军队占领了安曼和马安，并重创从马安撤离的土耳其部队。英阿军队乘胜追击，急速向北推进。9 月 30 日，费萨尔的先头部队进入大马士革。10 月 1 日，英国一支骑兵部队也赶到大马士革。10 月 3 日，艾伦比也在费萨尔之后抵达大马士革。10 月 8 日，英国在法国分遣部队的配合下占领贝鲁特，继而占领特里波利和霍姆斯。10 月 26 日，在阿拉伯军队的配合下，英军占领叙利亚北部最大城市阿勒颇，10 月底占领整个叙

利亚。

1918 年后，德国在西方战场上的迅速溃败加速了中东战事的结束。没有了德国军事援助，土耳其军队难以维持有效的抵抗。10 月 29 日，土耳其海军大臣劳夫贝伊率土耳其新政府代表团，登上停泊在利姆诺斯岛摩德洛斯港外的英国军舰"阿加美农"号，签署停战协定。协定第 16 款规定，完全取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阿西尔和也门的行政当局。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地区 400 多年的统治就此宣告彻底结束。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把土耳其在战争中的失败看作是土耳其人压迫的终止，并认为建立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有了真正的可能性。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英法军队无意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地区。就在 1918 年 9 月 30 日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当天，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阿拉伯东方占领制度的协定，将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最高权利交给了艾伦比，被占领土的民政管理权由盟国分担：黎巴嫩和西叙利亚交由法国管理，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东叙利亚和外约旦由埃米尔费萨尔管理（汉志被作为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土地在侯赛因的权力之下），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其他地区由英国管理。

二、法国吞并叙利亚、黎巴嫩

叙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摆脱土耳其人统治、获得解放的进程中，叙利亚地区的广大民众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他们独立进程中也曾对英法等大国

抱有幻想，特别是一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们也像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一样寄希望于列强们提供的保证。战争后期，一批旅居开罗的叙利亚民族主义人士曾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战后对他们国家的前途给予保证。英国政府为了联合阿拉伯人，确保战争的胜利，在所谓"对七人的宣言"中明确宣布，英国政府将为叙利亚和伊拉克脱离土耳其统治，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继续努力。在宣言中，英政府还保证，将不在这些地区设立不受欢迎的政体。在战争即将结束前，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战争目标是最后彻底解放在土耳其统治枷锁下的人民，并将根据广大民众的意愿，由民众自由选择建立民族政府。然而，战后的现实却是，英法两国完全违背民族主义者及广大阿拉伯民众的意愿，背弃诺言，着手在叙利亚、黎巴嫩建立殖民统治。当叙利亚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后，他们开始了新的争取独立的斗争。

广大叙利亚民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在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起义军中，特别是解放叙利亚的起义军中有大批来自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人。在费萨尔的起义军进驻亚喀巴后，费萨尔曾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军队整编活动。整编中，吸收了很多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在向叙利亚进军时，费萨尔与叙利亚德鲁兹山区热爱自由的德鲁兹民族主义人士取得了联系。许多英勇善战的德鲁兹民众加入起义军，并在占领德拉和解放大马士革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在汉志起义爆发时参入起义军的当地阿拉伯人这时已陆续离开了起义部队。

当阿拉伯起义军抵达大马士革时，受到当地民族的热烈欢迎。饱受土耳其杰马尔帕夏4年恐怖统治的叙利亚民众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发动起义，以此反抗杰马尔帕夏的暴政。在杰马尔帕夏

4年残暴统治下，也由于饥荒肆虐，约有50万叙利亚人被杀害、被驱逐或死于饥饿。而当时全叙利亚地区人口也不过400万。因此，在一次大战的4年期间，叙利亚是阿拉伯地区损失最为惨重的地区。因此，民众的反抗行动和反抗情绪也最为激烈。不仅大马士革，其他叙利亚城乡地区如贝鲁特、阿勒颇等地区都对费萨尔的阿拉伯起义军给予热烈的欢迎，欢呼叙利亚回到阿拉伯人的怀抱，欢呼土耳其人400年黑暗统治的结束，欢呼即将到来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1918年10月30日，摩德洛斯停战协议签订后，所谓天然的叙利亚——从西奈半岛到陶鲁斯山脉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叙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走到了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叙利亚人民等待着协约国实践它们对起义领袖和阿拉伯人民作出的诺言。

然而，英法列强无意实践它们的诺言，而是依照9月30日英法在伦敦达成的关于阿拉伯东方占领制度的协定，分区占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它们宣称整个天然叙利亚——从陶鲁斯山脉到亚喀巴湾地区是协约国的占领区。1918年末，英法协约国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作出行政区划安排，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南部行政区，包括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大部分，由英国管辖；西部行政区，包括黎巴嫩、拉塔基亚和亚历山大勒塔，由法国管辖，驻扎新登陆的法国军队；东部行政区，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德鲁兹山区和外约旦的一部分，由费萨尔管辖。费萨尔曾对此表示不满，而英法协约国则以这只是临时性安排予以搪塞。这一安排与此前《赛克斯—皮科协定》主要内容基本相符，但未能全部满足法国的企图——将全部叙利亚、黎巴嫩据为己有。法国决意废除以费萨尔为首的阿拉伯叙利亚人的民族管辖权，完

全吞并叙利亚和黎巴嫩。

1919年1月,费萨尔亲王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希望巴黎和会能够按照协约国多次发表的声明那样承认阿拉伯民族独立。然而,费萨尔痛苦和失望地发现:英法等协约国只关心各自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利益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夺取特权的企图。他发现《赛克斯—皮科协定》和支持犹太帝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是英法代表与他谈判时经常提及的话题。费萨尔在和会讨论阿拉伯问题的会议上严正提出阿拉伯独立的声明。为了让和会了解阿拉伯及叙利亚人民希望获得独立的愿望,费萨尔建议和会派遣四国调查团前往叙利亚进行实地考查。和会正式通过了这个建议,费萨尔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法国事后又拒绝了这一建议,英国虽然表面上接受,但态度十分冷漠,未派代表参加调查团。意大利对此漠不关心。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就地调查,并单方面派代表亨利·金和查尔斯·鲁·克伦,组成调查团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就是所谓“金—克伦调查团”。

“金—克伦调查团”到达叙利亚后,叙利亚民众表达了强烈要求独立的愿望,调查团收到约1800份请愿书和大量电报。调查团的目的是“征求当地居民对于未来政体的意见”,但实际上怀有加强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和影响的企图。9月初,调查团向威尔逊总统递交的调查报告建议:尊重叙利亚的统一,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只委任给一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最好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叙利亚实行君主立宪制,费萨尔为国王;彻底修改犹太帝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计划。然而巴黎和会根本没有讨论这份报告。事实上,这份报告的内容被公开,已是3年以后的事。当时,英法已经达成分赃协议,英国取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取得叙利亚

和黎巴嫩。

在叙利亚国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其民众也在继续努力,为实现独立而斗争。1919 年 2 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主义政党"阿拉伯独立党"宣告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阿拉伯协会"。"青年阿拉伯协会"并未因成立了公开政党而停止活动,而是以"阿拉伯独立党"这一合法身份进行公开活动。当"阿拉伯独立党"感到巴黎和会后可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实施托管制后,它建议于 1919 年 5 月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举行叙利亚国民大会选举。6 月 2 日,来自全国各地 58 名代表在大马士革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独立主权国家,拥戴费萨尔亲王为该独立国国王,拒绝《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反对拟议中的委任统治,谴责任何分裂叙利亚的企图,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法国援助。

1919 年秋,英国军队根据与法国的分赃协定,退出战争期间占领的叙利亚、黎巴嫩城市如贝鲁特、亚历山大勒塔等地。法国军队接防后,西部行政区完全归属法国控制,法国古罗将军成为协约国驻叙利亚的行政长官,至此完成了将叙利亚、黎巴嫩纳入其殖民统治的第一步。英法殖民者的分赃举动彻底粉碎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一切幻想,并引发许多城市民众的抗议游行,在西部行政区甚至出现了自发的游击活动。1919 年 11 月,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由东部行政区 250 名代表组成的国防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该委员会募集资金,购买武器,并组织志愿军,援助西部行政区的游击队。12 月 10 日,根据该委员会提议,成立叙利亚第一届民族政府,宣布叙利亚处于"合法防御状态",并立即投入到反对法国入侵的斗争中。

1920年1月,叙利亚另一个重要政党"叙利亚国民党"成立。这个政党主要由封建土地所有者——自由派地主代表人士组成。它的前身也是"青年阿拉伯协会",但属于该协会的右翼。该组织支持费萨尔亲王为叙利亚国王。受此影响,1920年3月8日第二届叙利亚国民大会在宣布叙利亚独立的同时,拥立费萨尔出任国王。该党派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并追随费萨尔的妥协政策。在此前后,叙利亚地区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政党组织,如进步党、自由正义党等。另外,阿赫德——"盟约会"等组织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等地有较大影响。这些政党和团体主要由叙利亚、黎巴嫩两地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及自由派地主代表组成,其中某些政党在以后的叙利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费萨尔亲王的妥协政策和法国的吞并

1920年3月8日,叙利亚第二届国民大会宣布了叙利亚国家的独立,向世界显示了争取独立自由的决心,并以"既成事实"回应英法殖民化分赃政策。这标志着阿拉伯民族运动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然而,在此之前深受叙利亚人民拥戴的费萨尔亲王已经开始向英法帝国主义者作出妥协。1919年费萨尔应英国首相邀请出访伦敦时,对英法两国瓜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计划,曾以书信的形式提过抗议。但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他施压,要求他与法国人直接谈判。1919年末、1920年初,法国总理克雷孟梭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胁迫费萨尔签订临时性"法阿协定",即所谓"费萨尔一克雷孟梭协定",费萨尔代表东部行政区——即由他管辖的叙利亚内陆地区(大马士革、阿勒颇、德鲁兹山区和外约旦的一部分)政府承认法国占领西部行政区——即黎巴嫩、拉塔基亚和亚历山

大勒塔等地的合法性,并保证以后向法国要求所需援助。同时,确认在最后决定作出之前这一协定为临时性协定。实际上这意味着法国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取得黎巴嫩的殖民统治权,它将继续向东部行政区扩展其殖民势力。日后的势态发展验证了法国攫取整个叙利亚的图谋。

费萨尔的妥协政策激起了叙利亚人民的愤怒,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民族政府拒绝批准该协定。费萨尔解散了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民族政府。但是迫于日益高涨的反法运动,费萨尔不得不于 1920 年 2 月召开第二次叙利亚全国大会。大会仍选举费萨尔为国王,但大会也反映出人民大众对屈服于法国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不满,在宣布叙利亚独立的同时,还成立叙利亚宪法起草委员会,计划制定宪法。这一行动充分显示出叙利亚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决心。

英法殖民者迫于形势,加快了瓜分殖民地、建立委任统治的步伐。3 月 18 日,英法首先宣布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的声明。4 月又在协约国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决定把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同时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交由英国托管)。托管制建议出笼后,立即激起整个阿拉伯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叙利亚各地民众爆发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游行,有些城市的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叙利亚人民深知,所谓托管制就是地地道道的殖民统治,它将是列强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殖民枷锁。接受托管制就意味着丧失自由,失去独立。5 月,以哈希姆·阿塔西为首的国防政府成立,并宣布全国戒严。同时,国防政府颁布了全国义务兵役制法令,着手建立民族武装和军队,准备抗击入侵者。7 月 10 日,全国大会通过决议,表示赞成武装斗争保卫祖国,赞成全国实

行戒严法。

7月14日,驻叙利亚、黎巴嫩的法军司令古罗将军向费萨尔及大马士革国防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4天之内无条件接受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制;废止全国义务兵役法令,裁减军队人数;采用1919年法国人开设的叙利亚黎巴嫩银行发行的货币;把东部行政区的铁路移交法军指挥部;允许占领军进驻阿勒颇、巴勒贝克、霍姆斯和哈马;惩办攻击法国行政当局机关和军队的"罪犯"。费萨尔及其政府被迫接受最后通牒。费萨尔政府的妥协行为,引起国民大会代表的强烈不满,国民大会通过决议撤换卖国政府。7月20日,响应国民大会的号召,大马士革成千上万的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武装抵抗。但费萨尔却强令军队驱散示威游行。在此同时,古罗将军借口最后通牒时限已过,率军直扑大马士革。21日,法军距离大马士革只有28公里。叙利亚民族英雄、陆军部长优素福·阿兹姆率领3000名志愿军在梅色隆隘口严阵以待,迎击法国侵略军。24日凌晨,法军向梅色隆发起进攻,10多架飞机向志愿军扼守的山头狂轰滥炸。志愿军装备低劣,寡不敌众,在抗击法军半天之后被击败,许多人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优素福·阿兹姆本人也光荣牺牲。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法定纪念日。

7月25日,法国军队占领大马士革,费萨尔组织投降政府换取法国的谅解以便保全王位。但法国政府命令古罗将军驱逐费萨尔亲王,费萨尔被迫离开大马士革。费萨尔及其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被无情地粉碎了,民族独立运动失败了。从土耳其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叙利亚、黎巴嫩人民没有获得所期望的自由与独立,而是落入了法国殖民统治的枷锁之中。随着费

萨尔的离去,现代叙利亚民族独立与统一的重要一页暂告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帷幕即将开启。

第七章　法国的委任统治

一、委任统治初期的叙利亚、黎巴嫩

委任统治制度的确立

依据1920年4月协约国圣雷莫协定，英法两国分别在所谓天然的叙利亚，即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地区实行委任统治。英国获得巴勒斯坦和约旦(当时称外约旦)，并建立起委任统治下的政府。这两个地区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脱离了自古以来与之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联系的叙利亚地区，并最终建立了今天的约旦哈希姆王国、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而叙利亚这一古老称谓所指称的地域范围也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缩小，主要泛指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地，而这两个地区在当时则按圣雷莫协定交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下的托管制。法国通过其全权代表——法国高级专员控制这里的行政权利。在1920年至1926年的委任统治初期，即法国委任当局直接统治时期，先后有三位法国将军充任高级专员。他们分别是古罗将军(1920－1922年)、魏刚将军(1922－1924年)和萨拉伊尔将军(1924年接任)。法国高级专员不仅是最高行政长官，他掌握着

委任当局的最高政治权利，同时又是委任统治当局的军事首领。在委任统治初期的1924年，在叙利亚、黎巴嫩两地驻扎着约7万余法国军队，在连绵不断的叙利亚各地反法民族起义斗争过程中及其之后，法国的驻军数量大大增加了。

在具体的统治政策上，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民族分治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分而治之的分化政策，把叙利亚、黎巴嫩划分为各自为政的地区，扶植分裂主义势力；二是收买本地区部分上层人物，支持宗教势力，拉拢少数民族，制造民族及宗教对立。

首先是将叙利亚和黎巴嫩进行人为的分割。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黎巴嫩已经处于自治或半自治状态。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分治的政策，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这一背景下，将黎巴嫩从叙利亚的行政区划中分割出来。1920年8月30日，法国高级专员古罗将军宣布：贝鲁特、特里波利、西顿、提尔（沿海地区，逊尼派占多数）、贝卡谷地（什叶派与基督教徒混居区）和巴勒贝克并入旧黎巴嫩省，组成大黎巴嫩。这样分割的后果之一是，把基督教的黎巴嫩与伊斯兰教的叙利亚对立起来，从而为日后黎巴嫩走向独立埋下了伏笔。而日后获得独立的黎巴嫩，其国家版图构成正是当初大黎巴嫩的地域版图。

与此同时，在宣布建立大黎巴嫩的同一天，委任当局在拉塔基亚穆斯林阿拉威派教徒聚集区建立阿拉威派国，又称“阿里教派国”。稍后，委任当局又宣布建立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独立区。1921年8月，委任统治当局宣布亚历山大勒塔为“自治区”，由法国委任当局任命的省长统治。1922年，委任当局又在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聚集区，宣布成立“杰贝尔德鲁兹国”。至此，叙利亚和黎巴嫩

被分割为各自分离的6个部分。1922年6月28日,法国高级专员署又在叙利亚地区宣布成立所谓“叙利亚联邦”,包括原大马士革区、阿勒颇区和“阿拉威派国”。1924年12月5日,法国高级专员署又重新把“阿拉威派国”从“联邦”中划出,恢复“阿拉威派国”。同时,仍将大马士革区和阿勒颇区合二为一,但改称叙利亚。亚历山大勒塔仍维持委任统治制度下的自治地位。叙利亚地区一分为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6年。1936年,法国当局与叙利亚民族政府协商和签订的法叙条约中,包括“在保持各自特殊的行政组织和财政制度的前提下,将阿拉威区(阿里教派国)和德鲁兹区(杰贝尔德鲁兹国)与叙利亚合并”的条款。但是法国执政当局拒绝了法叙条约,这一合并计划也因此搁浅。上述四个区域中,除亚历山大勒塔于1939年被分割出去,并入土耳其之外,其余部分构成了现代叙利亚国家版图的基本雏形。

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黎巴嫩,除法国高级专员掌握一切行政大权、主宰一切以外,在政府各部门都任用法国的行政顾问和技术顾问。在各自独立的行政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拉拢地方封建主、宗教教派领袖,特别是少数派部族或宗族领袖充当地方行政长官。这些地方行政长官往往是有名无实的法国占领者的傀儡,实权操在高级专员派遣的代表手中。为了巩固委任统治,法国委任当局极力培植亲法势力,在社会各阶层中培植拥护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委任统治建立不久后进行的田赋登记活动中,委任当局将大量原属土耳其帕夏们的土地及委任当局攫取的国有土地,分配给地方封建土地所有者。在这一时期,许多农村地区的原部族首领、土地占有者乘机扩大自己土地面积。委任当局还允许这些封建主们以及原先的部族首领们将公有土地据为己有。这些

封建地主阶层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势力逐渐壮大,并且逐渐成为叙利亚日后政治及社会中的重要力量。而法国委任当局对广大民众则施以暴政统治,令广大叙利亚人民联想起奥斯曼帝国的暴政统治。法国委任当局在委任区内建立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相结合的监督管理制度,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自由,禁止一切党派活动。

法国委任当局的政策,是狡猾的民族分化和宗教对立政策。把宗教信仰不同作为分割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借口之一,便是一个例证。法国委任当局刻意突出叙、黎两地的伊斯兰特性和基督教特性。1926 年 5 月 22 日,在法国高级专员授意下颁布的宪法中,就有意渲染两地之间的宗教差异。当依据这一宪法将黎巴嫩更名黎巴嫩共和国后,它的领导人总统和总理最初均由基督教徒即希腊正教徒和马龙派人士担任。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民族分化政策和宗教对立政策不仅成为叙利亚、黎巴嫩最终形成两个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在黎巴嫩地区以及独立后黎巴嫩国内持续不断的宗教教派纠纷埋下了隐患。

法国委任当局在阿拉威派聚居区建立独立的行政区域也是民族分化与宗教对立政策的具体体现。阿拉威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伊司玛仪派中一个很小的分支。阿拉威派遵循伊斯兰什叶派的基本教义,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受基督教的某些影响,在教义中带有基督教的某些痕迹,因而曾被认为是异教邪说。同时,也由于阿拉威派教徒长期居住在拉塔基亚偏远的山区地带,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政治上更是处于无权地位,因而长期以来备受民族和宗教歧视,甚至是屡遭迫害的对象。法国委任当局利用阿拉威人长期以来对外界的不满情绪,利用其内部十分团结及英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在政治上予以扶植,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在军事

上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鼓励广大阿拉威青年踊跃从军,并对他们进行正统的军事教育。由此,阿拉威派不仅在阿拉威地区成为政治上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整个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成为法国殖民者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阿拉威派逐渐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族群,尤其是在独立后的叙利亚政治生活中,阿拉威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委任当局在德鲁兹山区建立杰贝尔德鲁兹国,其意图也是出于民族分化和宗教对立的邪恶目的。但德鲁兹人不堪法国人的殖民统治,他们以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回敬殖民者的分化政策。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民族分化与宗教对立政策的另一个恶果之一是,1939 年亚历山大勒塔的分离,并最终被并入土耳其。虽然亚历山大勒塔的分离有其复杂的国内特别是国际背景,但是其根源则是委任治当局分而治之的民族分化和宗教对立政策。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叙利亚、黎巴嫩实行殖民统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叙利亚、黎巴嫩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文化上,法国当局一方面限制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保护法国自近代以来就已渗入本地区的宗教及教育文化活动,并将这一活动推向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极至,将其变成推行殖民主义的工具。在学校教育方面,法国委任当局强迫所有的公立学校从初级到高级采用法国的教学法和教学大纲,法文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法国历史在学校的课程中成为优先学习的科目。开设法文课程的公立及各类学校,备受法国委任当局鼓励与青睐,而使用阿拉伯语的学校及机关单位则遭冷遇,甚至排斥。法语成为官方的语言,通晓法语是公务员,特别是高级职员必备的条件。法国文化和法国生活方式在上层社会流行、蔓延,对本土社会

文化生活影响日益加深。

委任统治当局的经济控制与掠夺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政治上对叙利亚、黎巴嫩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的同时,在经济上对叙、黎两地进行全面控制。早在委任统治制度制定之前的1919年,法国人就在叙利亚开设以法资为主的叙利亚黎巴嫩银行。1920年7月,古罗将军向费萨尔亲王及其叙利亚民族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中,就包括在金融领域采用法资银行发行的货币的条款。委任统治制度建立后,委任当局确立了以法币为基础的金融货币体系,从而控制了叙利亚的金融货币体系和货币发行权。通过委任当局控制下的金融货币体系和以法资为主的叙利亚黎巴嫩银行垄断下的货币发行权,法国当局肆意掠夺叙利亚黎巴嫩原民族政府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据统计,在委任统治初期,约300万金里拉的外汇及储备被掠到法国。在控制金融体系和掠夺金融资财的同时,法国高级专员署完全控制了叙、黎两地区的海关、邮政、通信、交通、专卖公司以及社会福利部门,多达10亿法郎的法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叙利亚的铁路、港口、电力等国民经济的主干部门。同时,对自来水等市政民营企业也实施垄断控制。由于奥斯曼帝国崩溃后传统市场的丧失,以及国内市场的狭小,叙、黎两地的民族工商业无力与大量涌入的外国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竞争,法国仅在贝鲁特一处的贸易公司就多达15家。法国资本享有烟草专卖等特权。法国商品充斥着叙、黎两地的市场,本地区的工商企业受到严重挤压和排斥,特别是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各自独立的行政区都设立海关关卡,并以关税壁垒将原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割裂开来,从而破坏了民族工商业赖以生存的

统一的国内市场。叙利亚、黎巴嫩历史上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地区,在法国资本大举进入并排挤和打击本地工商业的同时,割断了本地区对外贸易的渠道,即使苟延生存的工商企业也不得不寻求法国的代理人以维系其商贸活动。

由于法国殖民当局竭泽而渔的控制及掠夺政策,致使叙利亚、黎巴嫩两地的工农业日益凋敝。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小麦产量,从战前的72.8万吨降到1922年的34.5万吨;大麦从45万吨减少到18.5万吨;1901-1910年,蚕茧平均年产量5200吨,1920-1925年下降到1800吨。1910-1911年,有194家纺织厂,到1922年只剩下45家。特别是纺织工业及其印染业曾经是叙利亚、黎巴嫩两地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但是随着纺织业的衰退和法国殖民主义者雇佣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劳工,致使大量本地纺织业工人失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织布工及其手工业者约有6.8万人,1926年时仅余2.6万人。

在农村地区,主要是叙利亚的农村地区,大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扶植下,迅速发展起来。在委任统治时期,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相结合是叙利亚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委任统治初期,农村经济也呈现出每况愈下的局面。由于农村地区大土地所有者为数不多,多数农村居民是无地和少地农民。他们常常不得不向封建土地所有者租佃土地,但条件非常苛刻。在许多情况下,地租高达收成的80%。耕地面积也不断减少。例如1921年,叙利亚仅耕种了可耕地面积的1/10。农业生产及产量总值低于战前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黎巴嫩两地的经济凋敝与一次大战的战争破坏有密切关系,但是法国殖民者的经济控制和掠夺政策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法国委任当局的掠夺政策等还表现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残酷压榨叙利亚人民,强迫叙利亚支付沉重的委任统治费用等方面。特别是强迫叙利亚支付大笔军事占领费。据统计,1919 年到 1923 年,法国驻军费用为 24.4 亿法郎,行政费用为 3.36 亿法郎。1924 - 1928 年,军费猛增至 50 亿法郎。如此巨额的费用最终均落到广大民众的身上。此外,法国殖民者还强令叙利亚偿还部分“奥斯曼债务”。为了更加便利地压榨叙利亚人民,法国委任当局不时调整和制订新的税收项目。例如 1925 年,委任当局曾以固定的货币税款替代过去作为收成一部分的土地税。

二、1925 - 1927 年反法起义及其政治协商

委任统治初期(1920 - 1925 年)的民族斗争

法军占领大马士革后,各地民众及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与法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这一时期,叙利亚的民族斗争多为自发性的,缺乏统一和有组织的领导。民族斗争的参与者也多为农民和城市下层人士。叙利亚的工人阶级 20 年代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人数较少,组织薄弱。在民族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封建地主阶层中的开明人士。

1920 年 8 月,即法军占领大马士革不久,在豪兰地区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延续一个月之久。法国委任当局派遣讨伐队进行镇压,并勒索罚金 10 万金里拉。1921 年初,阿勒颇、拉塔基亚两地也爆发农民起义。他们在伊卜拉希姆·海纳努和萨里赫·阿里的领导下曾一度战胜前来镇压的委任统治当局的讨伐队。1921 年 6

月，高级专员古罗等人前往德鲁兹地区首府库奈特拉活动，游击队在库奈特拉附近打伤了古罗将军及随行官员，法国当局对此惊恐万分。8月，德鲁兹游击队一度占领叙利亚东南重镇苏韦达市。1922年，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下，叙利亚人民反法斗争进一步加强，大马士革及其他重要城市屡次发生民众示威游行和工商业者及手工业者的罢工运动。4月，前金—克伦调查团成员美国人克伦访问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民众闻讯后组织抗议示威。示威群众提出撤出法国军队，废除托管制，实现叙利亚独立等要求。法国驻军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群众，逮捕民族主义运动领袖沙赫班德尔、哈桑·哈基姆等人。同时在全国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禁止一切游行示威，取消一切党派活动，在各地设立军事法庭，迫害爱国民主人士。

在国内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侨居国外的民族主义者与法国帝国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斗争。由于国内法国殖民当局的政治迫害，许多爱国者流亡国外，埃及开罗一度成为流亡者活动的中心。在那里民族主义活动分子组织了叙利亚联合党及阿拉伯独立党等政治组织。1921年9月1日，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党派代表在日内瓦召开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会，讨论统一组织、统一行动问题。大会选举联合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米歇尔·鲁特夫拉为主席。大会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一般称作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会址设在开罗，执委会主席由大会主席担任。该组织成立后，其主要政治活动包括向国际联盟、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提出给予叙利亚独立的要求，抗议法国占领当局在叙利亚、黎巴嫩的政治迫害等。国外的政治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国内斗争，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4年12月,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任命萨拉伊尔将军担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迫于形势,萨拉伊尔上任后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首先撤销了紧急状态,随后又释放被军事法庭判刑的叙利亚民族主义活动家,并开放党禁。在这一背景下,1925年2月9日以阿卜杜拉·拉赫曼·沙赫班德尔博士为首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合法的政党"人民党"。主席由沙赫班德尔博士担任,秘书长为另一著名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家哈桑·哈基姆。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和主要任务是"以合法的方法和手段"实现叙利亚独立和统一,获得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权利,人人享有完全自由,保护民族工业等。人民党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及其他城市建立了分部,并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会"执行委员会建立广泛的联系。

由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采用某些让步措施,特别是取消紧急状态、开放党禁等政策,叙利亚国内局势有所缓和。人民党及一些先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在叙利亚、黎巴嫩活跃起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叙利亚、黎巴嫩各地民众反法斗争致使法国占领者遭受巨大损失,1919至1925年法国占领军仅军费开支就高达25.9亿法郎。各地民众自发起义斗争此起彼伏。仅1922年一年叙利亚就发生了35次起义,法国占领军死伤的军官达250余人,士兵近5000人。为此,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并与叙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达成某些妥协。但是叙利亚、黎巴嫩人民的反法斗争并未因此停止,而是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法浪潮。

1925 年至 1927 年反法大起义

1925 年 7 月，德鲁兹地区爆发轰轰烈烈的反法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德鲁兹人民要求撤换法国驻“杰贝尔德鲁兹国”长官加比埃上校。

1923 年 7 月，加比埃以山区埃米尔赛里木·阿特拉什顾问的身份来到德鲁兹地区。9 月，赛里木去世，加比埃骗取山区代表会议选举他为正式长官，并经当时高级专员批准。山区谢赫们群起反对，要求按照 1921 年和法国达成的协议，任命本地人士为长官。

1925 年 5 月，加比埃回国休假。18 日，临时接替他的雷诺上校抵达苏韦达市。德鲁兹地区的谢赫们认为，这是赶走加比埃的好机会，并成立了委员会领导这一斗争。会址设在苏韦达，领导人为苏尔坦·阿特拉什。6 月 16 日，委员会派出 30 名代表到大马士革，向法国委任当局递交请愿书，要求任命雷诺取代加比埃，随后代表团赴贝鲁特。高级专员萨拉伊尔拒不接见，代表们忿忿而归。

7 月 11 日，萨拉伊尔密告驻大马士革的法国官员，将德鲁兹山区的代表诱骗到大马士革，以煽动骚乱罪予以扣留。当哈木德、阿卜杜·加法尔等代表到达大马士革后立即遭到逮捕，并流放台德木尔。苏尔坦·阿特拉什十分警惕，察觉到法国人的骗局，拒绝法国委任当局的“邀请”。当加比埃即将返回的消息传到山区后，苏尔坦·阿特拉什亲赴各乡镇发动群众，准备起义。7 月 18 日，起义爆发。起义军袭击苏韦达法军机场，烧毁法国飞机。20 日攻占萨勒哈德后，起义军乘胜进攻苏韦达，法军龟缩城堡内坚守待援。

德鲁兹人民反法起义的初步胜利，成为全国起义的先声。人民党派代表与德鲁兹起义者取得联系，组成叙利亚临时民族政府，

并积极准备在大马士革起义。8月23日,民族革命军总司令苏尔坦·阿特拉什发表文告,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赶走法国统治者,为叙利亚的自由独立而战。文告提出如下政治纲领:(1)法国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2)建立人民政府,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基本法;(3)撤退法国占领军,建立民族武装。文告指出,今后全叙利亚人民没有教派纷争,没有党派倾轧,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残暴的军事统治和外来的占领当局。文告要求伊斯兰的德鲁兹派、逊尼派、阿拉威派和基督教徒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8月26日,法国委任当局查封人民党总部,逮捕人民党党员,许多人逃亡到德鲁兹山区,与阿特拉什会合。

阿特拉什的讨法檄文,激励起成千上万的叙利亚民众参加战斗,起义军很快发展到4万人。农民、工人、职员、商人、律师和新闻记者有力地援助了起义。起义军得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为起义军购买枪支,并不断向全世界揭露法军的暴行;阿拉伯各国的叙利亚侨民为起义军提供了12万叙镑的资金援助。

10月,反法起义达到高潮。起义军一度占领了考卡巴、哈萨巴亚、马尔吉欧云和哈马。起义军和游击队迫使法军只能困守一些大城市。此时,起义的烽火也蔓延到黎巴嫩地区,在贝鲁特附近的活动十分活跃。但是,法国委任当局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组织力量向德鲁兹山区反扑。当法军猛攻德鲁兹山区时,阿特拉什等起义首领决定在大马士革郊区库塔和盖莱蒙山区组织游击队,把起义斗争引向大马士革。起义军很快在库塔地区建立起游击队。10月18日,一支400余人组成的游击队在纳西卜·贝克里率领下,潜入市内,准备在高级专员萨拉伊尔抵达阿兹姆宫时,将其活捉。起

义军在阿兹姆宫外与法军交火，法军溃败。起义军随后进攻市中心加比叶门，威胁政府大楼。18日下午，法国占领军开始反扑，连续炮轰大马士革市区48小时。城内许多民宅、商场变成废墟，无数市民惨遭不幸。历史文化古迹阿兹姆宫也未能幸免，宫中无数无价之宝或被抢劫，或毁于炮火。为了避免大马士革遭进一步破坏，游击队于19日晚撤离大马士革，返回库塔。

大马士革大屠杀，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法国人民的谴责。法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撤换了萨拉伊尔。12月2日新任高级专员戴·茹文尼尔到达贝鲁特。然而，戴·茹文尼尔是一个更为阴险狠毒的殖民主义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法国军政部增派5万员额的援兵，随后又亲赴伦敦，与英国政府商讨并达成两国在东方互相合作的协议。英国对法国委任当局的支持，对叙利亚反法起义极为不利。

法国高级专官署为了分化起义军，收买一些参加起义的封建主首领和部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挑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以此削弱民族主义的力量。法国委任当局组建了一些由伊司玛仪派、努塞尔派和马龙派人士组成的亲法地方武装，利用叙利亚人打叙利亚人，基督徒打基督徒。尤其险恶的是，法国委任当局在德鲁兹地区武装亲法德鲁兹人，挑起德鲁兹人内部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致使反法起义蒙受严重损失。

1926年4月下旬，法国占领军两万余人分3路进攻德鲁兹山区。25日，法国飞机狂轰滥炸苏韦达。经过激战，法军进入城内，沙赫班德尔率部分起义将士，转移到库塔，阿特拉什向艾因·哈沙拜撤退。至此，叙利亚临时民族政府解体。经6个月(5－10月)的较量，法国付出巨大代价后，在德鲁兹山区站稳脚跟。阿特拉什

率领部分起义军在山区坚持战斗，直到1927年5月。1927年7月18日，法军出动8000余人，依靠坦克、大炮，把起义军逐出库塔密林区，起义最终失败。

政治协商

1925年10月18日，法国殖民者对大马士革的野蛮轰炸，引起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愤慨与抗议，甚至国际联盟也不得不对叙利亚的法国委任当局的残酷统治加以遣责。为了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也为了进一步有效地控制托管区的形势，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戴·茹文尼尔及其法国委任当局转而与叙利亚黎巴嫩民族主义者进行谈判，对叙利亚民族资产阶级做出一些政治和经济让步和妥协。由此，法国委任统治从直接统治阶段(1920－1925年)向政治协商阶段(1926－1936年)过渡。

法国委任当局玩弄谈判和妥协政策的目的是，分化和削弱民族主义解放运动。这一政策首先在黎巴嫩付诸实施。1920年8月30日，法国在黎巴嫩宣布建立大黎巴嫩之后，黎巴嫩地区的反法斗争也十分激烈。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法国委任当局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协商两种手段。在镇压黎巴嫩人民反法斗争的同时，新任高级专员戴·茹文尼尔授意于1922年成立的高级专员享有全权的代表会议，于1926年5月22日颁布宪法，将大黎巴嫩更名为黎巴嫩共和国，并成立黎巴嫩民族政府，希腊正教徒查尔斯·达巴斯为总统，马龙派人士担任内阁总理。

在叙利亚，戴·茹文尼尔及法国委任当局在大马士革也组建了以艾哈麦德·纳米尔为首的叙民族政府。人民党派代表参加了民族政府。同时，委任当局承诺，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谈判签署

法国—叙利亚条约,实行大赦,建立民族军队,恢复叙利亚金本位金融体制。此前,茹文尼尔曾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取得联系,进行了初步的政治协商。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向戴·茹文尼尔提出撤出法国军队和给予叙利亚独立的要求,同时也承诺法国在叙利亚享有政治经济等特权。然而戴·茹文尼尔拒绝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委任会的妥协性要求。戴·茹文尼尔曾企图拉拢起义运动领导人苏尔坦·阿特拉什与法国人谈判,但遭到后者的拒绝。戴·茹文尼尔拒绝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后,为了表示抗议,民族政府的人民党成员提出辞职,民族政府陷入危机。法国委任当局与民族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

1927年,法国占领军彻底镇压了叙利亚全国大起义,但却无法迫使叙利亚人民放弃独立愿望。为了防止这种强烈的独立愿望再次变为革命行动,法国统治者又玩弄立宪手法。1926年,殖民主义老手蓬索接替在职仅7个月的戴·茹文尼尔出任法国委任当局高级专员。同年底,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向他提出召开立宪会议,要求以法国—叙利亚条约取代托管制,承认叙利亚独立,赔偿托管当局给叙利亚造成的损失。重新组建的民族政府首脑阿里·侯赛尼在施政纲领中也要求,实施宪法体制,废除军事管制和军事检查,实行广泛的特赦。在这一形势下,蓬索使出立宪手段。1928年2月15日,蓬索宣布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同时发布特赦令。但是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如法里斯·胡里、侯赛尼·阿里巴齐等并不在特赦名单中。法国委任当局的意图是把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排除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外。

4月24日,立宪会议选举正式举行。6月9日,立宪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民族联盟领袖哈希姆·阿塔西当选为立宪会议主席,

伊卜拉希姆·海纳努当选为宪法委员会主席，海纳努曾是1925－1927年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8月，宪法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叙利亚共和国。在制定宪法草案期间，由于民族联盟的妥协性，民族联盟曾表示不反对给予法国以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权。这一立场还得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会"执委会的支持。但是，殖民当局坚决反对这一宪法草案，尤其反对叙利亚独立统一、总统拥有自主管理国家的主权以及建立民族军队的条款。表面上，法国高级专员声称，这一宪法草案不可能得到国际联盟的批准；实际上，法国殖民当局极力维护与叙利亚的宗主国关系。立宪会议坚持宪法草案不得修改的立场，蓬索下令解散立宪会议。对此，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等城市民众以各种示威运动予以回敬。民族联盟领袖向国际联盟拍发电报，对法国委任局出尔反尔的行动表示抗议。至此，围绕宪法草案进行的政治协商陷入停顿。

经过近两年的停顿之后，1930年3月，法国高级专员提出宪法修改稿，并欲强行实施。宪法修改稿虽然以原宪法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草案为蓝本，但是对多达23项条款的内容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增加了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地位以及享有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利的条款。与此同时，委任当局在"杰贝尔德鲁兹国"，阿拉威区和亚历山大勒塔公布所谓的"基本法"。

1931年11月，委任当局解散侯赛尼过渡时期民族政府，宣布于12月20日举行议会初选，1932年1月5日举行复选。由于法国殖民当局极力扶持亲法分子，加之选举中舞弊事件频出，因而引起民族联盟和广大民众的不满。迫于形势，委任当局对民族联盟提出的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进行重新选举的要求做出让步。3月

20日和4月5日,两地重新选举。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亲法分子52人进入议会,民族联盟仅获17个席位。6月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了中间派穆罕默德·阿里·阿比德为总统、哈基·阿兹姆为总理的新一届民族政府,并成立委任统治下的共和国。民族联盟只有两人进入内阁。民族联盟并未因议会选举受挫而气馁,而是再次提出与法国谈判签订法国—叙利亚条约,以法叙条约取代委任托管制,以此确立叙利亚的独立地位。民族联盟以退出议会向委任统治当局施压。高级专员蓬索拖延时间,8个月后提出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以英伊(拉克)条约为蓝本。但是草案根本没有涉及叙利亚的独立问题,并明确规定把黎巴嫩、拉塔基亚和杰贝尔德鲁兹国排除在叙利亚共和国之外。1933年2月,民族主义者汇聚阿勒颇召开代表大会,会议发表公报称:这种旨在反对叙利亚独立和统一的条约是不能接受的。4月,民族联盟在大马士革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声明支持阿勒颇大会的公报。同时,决定召回议会议员和进入内阁的代表。10月,取代蓬索出任新高级专员的戴·马特尔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温和派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内阁接受条约草案。由于条约极大地伤害了叙利亚人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将黎巴嫩等从叙利亚分割出去的企图,致使亲法分子组成的议会也对条约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最终该条约被议会拒绝。戴·马特尔无可奈何,下令无限期解散议会,解散政府,停止实施宪法。至此,法国委任统治下的政治协商时期宣告结束。

反法斗争新高潮与1936年叙法条约

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也波及到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叙利亚经济恶化,致使大批中小企

业和手工业者破产。叙利亚农业生产也下降了1/2到1/3。而殖民主义者不断加强经济掠夺，特别是法国垄断资本一方面攫取新的租让权，在"经济改良"的谎言下在叙利亚取得修建机场、公路等特权；另一方面，向叙利亚转嫁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在解散议会和民族政府之后，委任统治当局又加强政治压迫，实施更加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由此，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1936年1月，积蓄已久的反法情绪开始爆发。领导运动的仍然是地主资产阶级反法党派民族联盟。1924年成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也参加了运动。

1月20日，叙利亚爆发全国总罢工，商店罢市，学校罢课，公共事业单位停工，全国经济及社会生活濒于瘫痪。妇女第一次走上街头参加示威，准军事部队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打击法国军警，临时民族政府宣布总辞职。面对持续混乱的局势，法国高级专员戴·马特尔在采取高压政策未能奏效后，于2月25日宣布同意大赦政治犯，并立即开始关于签订法叙条约的新一轮谈判。3月1日，戴·马特尔与民族联盟在贝鲁特就叙利亚独立问题和未来法叙条约的主要内容达成协议。至此，已持续近50天的反法总罢工随之结束。3月26日，以哈希姆·阿塔西为团长的叙利亚谈判代表团启程，4月2日到达巴黎。经过数月谈判，法国雷昂·勃鲁姆政府答应了叙利亚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并承诺给予民族联盟一定的政治地位，代表团随即与法国政府妥协。9月9日，双方签订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法国承认叙利亚的统一和独立。(2)双方和平友好，结成军事同盟。(3)5年内，法国有权在拉塔基亚和德鲁兹山区驻军。(4)法国有权在叙利亚建立4个军事基地，可以随时使用大马士革附近的麦泽机场和阿勒颇附近的尼拉卜机

场。(5)法国向叙利亚民族军派遣军事代表团,民族军的教官和顾问由法国人担任,武器装备与法军一致。(6)叙利亚聘请法国人担任外交顾问和外交官。在涉及双方外交事务中,叙利亚和法国应通过协商,采取共同行动。(7)阿拉威区和德鲁兹区与叙利亚合并,但各自保持特殊的行政机构和财政制度。条约被冠名为《法叙友好援助条约》,并规定3年内应经双方议会批准,有效期25年。

条约的签订受到叙利亚国内普遍欢迎,乐观主义情绪一时滋长并蔓延开来。实际上,条约本身已经为法国殖民者保留了许多军事及外交特权,待时机成熟时,法国殖民者将进一步攫取政治经济特权。更何况,法国殖民主义者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法叙条约能否得到法国议会批准仍是一个未知数。

在一片乐观情绪中,1936年11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民族联盟获得绝对优势。12月21日,议会选举阿塔西为共和国总统,杰米勒·马尔丹出任政府总理,法里斯·胡利任议长。同时,议会批准了法叙条约。同月,“杰贝尔德鲁兹国”和拉塔基亚并入叙利亚版图。

在叙利亚人民反法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同时,黎巴嫩人民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并迫使法国政府于1936年11月15日签订了类似法叙条约的法国黎巴嫩《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法国须在3年内承认黎巴嫩独立,黎巴嫩尊重法国的利益,法军仍可驻扎黎巴嫩。该条约虽然也是不平等条约,但最终也未获得法国国会的批准。不过,黎巴嫩在形式上还是获得了独立。这一条约签订的主要背景,是1933－1936年间黎巴嫩人民反对烟草专卖权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起因是黎巴嫩民族工商企业及民族主义者反对法国恢复烟草垄断企业“列日德塔巴”的大规模抵制运

动。法资垄断企业在黎巴嫩的烟草专卖权已于1930年期满，但法国委任当局1933年强行延长列日德塔巴公司的专卖权。在叙利亚反法斗争影响下，反对延长烟草专卖权的斗争逐渐演变为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前，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下，马龙派基督教徒艾米勒·埃迪成为总统，逊尼派穆斯林海尔丁·艾赫达布为总理。从此，开始了总统、总理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担任的先例，并一直沿袭下来。

叙利亚新政府成立后立即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困难，法国政府虽然在形式上遵守法叙条约，但实际上竭力利用一切机会，保持在叙利亚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特权。法方以拒绝批准法叙条约相威胁，压迫新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做出新的让步。叙利亚民族政府被迫同意法国资本为主的叙利亚黎巴嫩银行延长货币发行权和金融垄断权，并且同意法国公司获得在叙利亚的石油租让权。此外，还强迫叙利亚采取措施扩大对法贸易，接受法国银行的财政“援助”。在政治上，则要求新的民族政府扩大德鲁兹地区、拉塔基亚以及阿尔—吉齐拉省的自治权，要求上述3个地区省行政当局聘请法国顾问协助管理。同时，法方还强行要求叙利亚政府承认法国对少数派基督教社团拥有“宗教保护权”。对叙利亚政府及其人民最致命的打击和伤害，是法国殖民者对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处理。

亚历山大勒塔自古以来就是所谓天然的叙利亚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经济、宗教、文化等与叙利亚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大战后，它被纳入法国殖民托管制之下，只是由于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的政策，1921年8月，它被单独列为法国委任统治下的“自治区”。

一次大战以后，叙利亚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从未放弃包括与黎巴嫩、亚历山大勒塔以及阿拉威、德鲁兹山区等实现统一的斗争。姑且不论业已盛行的民族自治权原则，单论亚历山大勒塔地区的人口结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及文化习俗，亚历山大勒塔理应回归叙利亚。在法叙条约谈判过程中，叙利亚代表团据理力争，但最终这一问题被搁置一边。但这并不等于叙利亚放弃了与亚历山大勒塔统一的愿望。1936年，土耳其政府提出对亚历山大勒塔的主权要求。当时叙利亚民族政府对土耳其的要求予以驳斥，并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但是国际联盟却在没有叙利亚民族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于1937年讨论亚历山大勒塔的前途问题，并决定把这里置于法国和土耳其的共管之下。1938年，根据国际联盟的决议，土耳其军队开进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区，并举行所谓的“普选”。同时，在法方和土耳其安排下制定区域自治宪法，规定在法国和土耳其联合监督下实行完全自治。这一举措无疑是分割亚历山大勒塔十分危险的步骤。为此，叙利亚成立了保卫亚历山大勒塔全国委员会，发动全国性抗议示威。法国殖民者并未因叙利亚人民的抗议而停止分割亚历山大勒塔的步伐。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法国与英国出于拉拢土耳其的目的，不断向土耳其做出让步；土耳其则开始在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区采用土耳其法律、货币以及设立海关及税收制度。英国与土耳其签订《友好条约》后，法国开始撤离军队。1939年7月23日，法土签订亚历山大勒塔划归土耳其的协定，亚历山大勒塔正式并入土耳其，并沿用土耳其对该地区的称谓，将亚历山大勒塔称为“伊斯坎德伦”省。法英殖民主义者出卖叙利亚的利益，达到了土耳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目的，但却严重违背该地区占人口60%的阿拉伯人的意愿，

更是违背了叙利亚人民的意愿，严重伤害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民族感情和统一计划。虽然 1936 年 12 月成立的民族政府在 1939 年 2 月已辞职，但是殖民者此前分割亚历山大勒塔的一系列举措无疑是民族政府垮台的主要因素之一。

1939 年 2 月，叙利亚民族政府提出辞职，直接原因是法国议会于一个月前拒绝批准法叙条约，以及法国驻叙高级专员皮奥和法国近东总司令魏刚要求在叙利亚恢复法国委任当局直接统治。1939 年 1 月，法国议会以多数票反对，拒绝了法叙条约。实际上自条约签订以来，法国就以拖延手段一再推迟法叙条约在国会的表决。民族政府在叙利亚议会批准法叙条约后，一直在努力活动并不断做出让步，希望条约得到法方的最终批准。当法国议会拒绝法叙条约后，法国决定在叙利亚重新恢复委任当局下的直接统治。由于此时欧洲政治局势日趋紧张，战争的喧嚣声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密布于欧洲上空。同时，英法德意等在中东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土耳其，英法把亚历山大勒塔作为牺牲品。而法国为巩固在中东的利益，决定恢复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直接统治。为此，2 月 18 日，皮奥与魏刚以对大马士革实施完全的军事占领相威胁，逼迫叙利亚政府完全服从委任当局。由于法国殖民当局步步紧逼，不断攫取政治经济等殖民特权，也由于亚历山大勒塔的被分割，特别是法叙条约的破产，叙利亚人民为之奋斗了 16 年才于 1936 年争得的形式上的独立又要丧失，叙利亚民族政府已失去民意，并招致以沙赫班德尔等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们极大的不满。加之，委任当局以武力相威胁，民族政府愤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政府辞职后，委任当局以民族联盟以外的亲法民族主义者拼凑新的政府。同时，宣布杰贝尔德鲁兹、拉塔基亚阿拉威区和阿

尔一吉齐拉三省正式脱离叙利亚。即使刚刚成立的亲法新政府对法国委任当局这一行动也表现出强烈不满,并很快提出辞职。共和国总统阿塔西面对这一局势也声明:在目前的状况下,他不能继续担任总统职务,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随后高级专员皮奥宣布解散议会,中止宪法,拼凑"执政委员会"代替民族政府,叙利亚重新回到法国委任当局直接统治之下。叙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统一的斗争,历经近20年的艰难历程,最终以失败告终。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山雨欲来,叙利亚人民即将迎来民族解放与独立斗争的新时期。

三、现代化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动

现代化的缓慢启动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黎巴嫩两地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缓慢启动。首先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和比利时公司陆续建设了一批发电站,为大马士革等主要城市提供照明用电等,同时也为30年代初出现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电力能源。30年代初以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一方面免除对机械、燃料等进口商品的关税;另一方面逐渐提高纺织品等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保护新兴的纺织工业,促进本地工业的发展。30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进行国际结算的外汇十分拮据,以及海外移民的回归刺激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投资建设工业企业的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截止1932年,叙利亚已建立148家小型现代工业企业,主要生产

丝织、轧棉、针织、火柴、香烟、面粉和水泥等制品。这些企业多数由当地工商业者开办经营，但技术人员主要由外国人担任。这些企业规模十分有限，它们一方面面向国内市场，同时也向殖民宗主国提供原料。这一时期叙利亚、黎巴嫩现代工业仍处于萌芽状态，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经济的色彩。例如叙利亚的轧花工业、装配工业以及黎巴嫩的硝皮工业等都是为殖民宗主国提供原料才发展起来的。至 30 年代后期，在叙利亚、黎巴嫩传统工业领域包括传统手工业及现代工业中，就业人数比奥斯曼帝国后期时的数量还有所减少。1913 年在叙利亚、黎巴嫩传统工业领域就业的人数为 309525 人。1937 年，传统及现代工业总共雇佣工人为 203927 人，其中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就业的总人数仅为 33149 人。他们中间一半以上又是汽车司机及与运输业有关的搬运工等辅助人员。多数企业即便是现代企业都是传统的手工业作坊式的小型企业，雇佣的工人大多也在 10 至 15 人以下。因此，在工业领域虽然出现了现代企业群体，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手工业作坊。自一战后至 30 年代末，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传统工业处于衰退趋势。仅从上述工业领域就业人数的下降几近 1/3 就可略见一斑，其中衰落甚至破产的主要集中于传统工业领域。另外，30 年代中期，法国石油公司在叙利亚获得石油勘探租让权，计划在叙利亚进行石油勘探。在 30 年代初，英属伊拉克石油公司在叙利亚铺设石油管线，这一工程曾一度雇佣 5000 余名叙利亚人。其次，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投巨资在叙、黎两地建设公路交通网，通讯设施也得到一定改善。在叙利亚、黎巴嫩城市和一些乡村城镇，现代交通工具——汽车开始取代牛车和驼队。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即便是地处沿海的黎巴嫩地区，现代交通工具的数量也都非常有限。然而现代

交通工具的使用,叙、黎两地的中心城市与偏远地区的联系得以加强,也促进了贝都因人的定居。现代邮政通讯业,特别是电报、电话以及其他服务业等开始在叙利亚、黎巴嫩中心城市出现。尽管其数量及使用范围有限,但却向落后的社会及民众展示了现代技术,起到了现代文明的示范效应。第三,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现代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有较大发展,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平均每年建立 17 所小学,入学人数扩大了三倍以上。除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之外,又增加了私立学校、宗教社团乃至村社主办的世俗性学校。然而,独立的以及宗教社团主办的小学有浓厚的教派、种族特征,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并被殖民当局所控制。总体上看,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小学生的入学率仅占适龄儿童的 1/4,当时的叙利亚地区拥有人口 300 余万,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只有 13 所中学及大马士革法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中学入学人数到 1934 年时也仅为 5000 余人,而全国的文盲率高达 80%以上。

农村社会与土地所有制关系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农村社会结构及土地制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20 年代中期,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叙利亚地区进行土地调查、测量和进行土地所有权登记。这是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惟一的一次土地改革方面的举措。这一举措的目的是,鼓励农业私有大庄园经济的成长,促进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调查与强行登记,确认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但并不问及土地的原属所有权。部分大土地所有者通过欺诈、瞒报的土地也得到了确认。对原属国家公有土地即原奥斯曼素丹的土地,登记为国有土地。与此同时,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 20 年代中期制定了一系列

法规，将确定为国家所有的土地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允许将国有土地出售或租让给大土地所有者以及社会名流，鼓励将瓦克夫土地出售给大庄园主。在阿尔一吉齐拉及幼发拉底河地区，国有土地所有权被授予部族首领，而这些土地原本为部族公有土地。由此，部落首领们摇身一变成为大土地私有者。法国委任统治者扩大大土地所有制的政策，促使大地主阶级发展壮大，而他们正是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维持其殖民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到30年代末，在叙利亚形成了一批大土地所有者和拥有可观土地数量的离地地主。在较偏远的德鲁兹、阿拉威山区和豪兰地区，小土地所有制仍占主导地位，但这些地区的小土地所有者在人口等因素的压力下，其处境与佃农们相差无几。

大土地庄园经济的出现，特别是大土地所有制的被认可，在长期盛行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叙利亚，出现具了有现代意义的农业资本主义因素。但是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村社土地所有制仍然占很大比重。在这一制度下，土地属村社所有，但不限时地将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给农民进行耕作。这一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土地在家庭内部不断分化，缺乏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土地不断贫瘠化。土地登记制并没有针对土地村社所有制的种种弊端，同时，它的执行也很不顺利。在20年代就提出的计划未能获得执行，此后又计划于1933年完成，但直到1942年，只有不足一半以上的土地完成了强行登记。

法国委任当局不可能对农业的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叙利亚地区原本拥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但因缺乏水利灌溉等条件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与一战前相比，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更加恶化。法国一家研究机构曾在委任统治当局

的主持下，对奥沦河、幼发拉底河及雅尔姆克河的灌溉和开发进行了可行性调查和研究。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兴办的惟一一项灌溉工程是古霍姆斯水库大坝加高工程，这一工程将原灌溉面积扩大到15000公顷。30年代时，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几乎没有引进任何现代农业机械，至1942年末全叙利亚的拖拉机数量不超过30台。叙利亚农业耕作方式的主体仍然是落后的，甚至是中世纪的。

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批准下，叙利亚成立了国家农业银行。它的贷款对象是大土地所有者及庄园主，但是他们不是直接投资于农业，而是以更高的利息将它们借贷给急需资金的农民——费拉赫。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农民无法从国家农业银行取得借款，于是转向高利贷者、商人和大地主。由于利息过高，有时甚至超过150%，当遭遇歉收年份，农民们无力还贷，只得以土地作为抵押，进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由于资金投入不足，30年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落后，生产歉收，农民破产较为普遍。有些自耕农甚至沦落为农奴。而大地主和离地地主们不是从土地上获利而是靠剥夺农民获利。另一方面，30年代末40年初，由于资本主义农业因素的出现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技术、化学农药及现代运输工业的运用，使依靠传统方式进行生产的农民及小土地所有者受到现代农业的排挤，农业领域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农民的分成收入及农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明显下降。30年代中，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下降至1929年收入水平的一半左右，甚至1/3。

委任统治当局控制下的叙利亚民族政府迫于动荡的国内政局，无力关注农村日益恶化的形势，无任何法律措施改善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对农村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也未实施任何措施

进行调整和改革。广大农民的赋税沉重,但同时又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政府的服务与帮助。劳动保障、医疗保健等服务根本涉及不到广大农村地区。沙眼、肺结核等传染病普遍流行,农村地区一片凋敝败落的景象。

四、叙利亚、黎巴嫩实现独立

战争期间的叙利亚、黎巴嫩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战争爆发时,战火尚未越过地中海燃烧到英法主宰的中东地区。因此,在大部分中东人看来,战争依然是欧洲人的游戏。然而,绝大多数分别处于英法委任统治下的殖民地中东国家,尚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中醒来,就被绑在英法的战车上冲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流中。但是,第二世界大战却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国家提供了摆脱殖民统治的机遇。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叙利亚、黎巴嫩终于摆脱委任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与独立。

大战爆发后,法国殖民者加强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控制,以防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起义。战争前夕,法国委任当局已经用"执政委员会"取代了民族政府,叙利亚重新回到了委任当局的直接统治之下。战争爆发后,法国驻近东总司令魏刚在黎巴嫩中止了宪法,解散了议会,任命了新的政府人员,但法国顾问直接掌握着黎巴嫩政府各部门的权力。1940年夏,法国战败投降,法国维希政府根据停战协定把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由德意委员会管辖,德意委员会实际上是通过已隶属于维希政府的委任当局共同管理叙、黎两个

殖民地。叙利亚、黎巴嫩落入了法西斯德意委员会与法国委任当局的双重统治之下。

法西斯德意委员会和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为了战争的需要，在经济上加重了赋税和对战争物资的征集，因此，加重了叙、黎两地的经济危机。到1941年初，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展开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要求减轻日益加重的负担。2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工人、手工业者和商人举行罢工和罢市，反对苛捐杂税和暴力镇压。与此同时，黎巴嫩也出现了席卷全境的反饥饿抗议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和罢课。

1941年6月，戴高乐将军命令卡特鲁将军率领一支自由法国分遣队，进攻叙利亚和黎巴嫩。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最终迫使维希政府军队投降，同时也把轴心国势力从新月地带铲除。由于当时纳粹德国正忙于征服巴尔干，并为发动侵苏战争做准备，因而对维希法国中东殖民当局支持不力。英法联军攻占叙、黎两地后，自由法国立即接过委任统治的权杖。卡特鲁将军起初宣称，法国准备放弃委任统治，允许叙利亚、黎巴嫩独立，并准许阿尔弗雷德·纳卡什为黎巴嫩总统和塔杰丁为叙利亚总统，但是自由法国又同时任命新的法国总代表，监督两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为了把法国势力排挤出叙黎两地，私下鼓励叙利亚和黎巴嫩民族主义者反对法国统治，并宣布把这两个殖民地的货币纳入英镑区。美国罗斯福总统则强调“民族自决”原则，要求法国放弃殖民统治。自由法国当局四面楚歌，被迫宣布恢复两地宪法，允许进行议会选举，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但是，自由法国比维希法国采取更加严厉的高压控制措施，把宣布独立搞成了一场笑话。

1943年8月17日，叙利亚议会以122票对两票选举民族联

盟党团领袖舒克里·库阿特里为总统;9月21日,黎巴嫩议会选举扈利为总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里亚德·索勒赫为总理。民族主义者在两地执政后,立即要求法国交还他们继续管理的政府部门,并建议从两国宪法中取消强加于他们的一切限制。埃及、伊拉克以及沙特阿拉伯承认了黎巴嫩的独立。以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著称的黎巴嫩总理于10月7日宣称:"我们不希望黎巴嫩成为外国人进行剥削的场所,也不愿让它成为帝国主义征服者的通道"。11月8日,黎巴嫩议会不顾法国总代表伊夫埃勒的反对,以48票对零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废除宪法中法国在黎巴嫩享有特权的条款。叙、黎两地的独立行动激怒了素以在近东国家具有历史性的"传播文明的使命"为己任的戴高乐和法国驻叙黎两地总代表伊夫埃勒。特别是11月8日黎巴嫩议会的宪法修正案,动摇了法国在黎巴嫩的殖民统治地位。法国为了扑灭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再次宣布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并颁布戒严令。11月11日,在戴高乐的同意下,伊夫埃勒不顾英国驻近东国家代表斯皮尔斯的劝阻,逮捕黎巴嫩总统、总理和全体内阁人员。法国当局的蛮横镇压,激怒了黎巴嫩各阶层和各教派集团,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反法示威,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武装斗争,黎巴嫩陷于瘫痪状态之中。

英国和美国政府害怕黎巴嫩人民的斗争引起阿拉伯国家的连锁反应,影响整个中东局势,强烈要求法国做出让步。英国为了维护战时中东基地的安全,立即向伊夫埃勒递交一份照会,要求法国当局立即恢复秩序,否则英国军队将进行干涉。法国殖民当局对此不屑一顾,事态进一步恶化,黎巴嫩处于民族大起义的前夜。当此危机之时,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凯西于19日递交给自由法国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在22日上午10时前释放被捕人员。11

月22日,无可奈何的自由法国殖民当局释放了扣押人员。整个黎巴嫩对此“激动万分,欢欣若狂”,法国三色旗从政府大厦上被扯下,民族主义者的红白红三色旗高高飘扬。11月22日黎巴嫩议会举行会议,选出了第一任正式总统。这一天被定为黎巴嫩的独立日。与此同时,法国殖民当局在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被迫于1943年12月同意叙利亚独立。

法国被迫同意叙利亚、黎巴嫩独立后,1944年美、英、苏等大国及其同盟国相继予以承认。1945年2月27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资格对轴心国宣战,并积极争取参加筹组中的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会议上,英、法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表资格,叙利亚、黎巴嫩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

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也是战后中东各附属国人民争取完全独立的预演。叙利亚、黎巴嫩两国民族解放和独立步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大加快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放弃它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地位,英法两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并且支持亲法势力,进行分裂活动,这一切都阻碍了新成立的民族政府行使他们的权力。虽然叙利亚、黎巴嫩人民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距离完全摆脱英法控制,取得彻底独立,尚有一段荆棘满途的历程。

叙利亚、黎巴嫩取得完全独立

1943年底,法国委任当局开始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民族政府移交一些权力,但拒不交出特种部队的指挥权,同时在叙、黎两国继

续保留为数不等的军队。当民族政府提出扩充和装备自己控制的宪兵部队要求时，法国当局表示坚决反对，企图继续将叙、黎两国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由此，叙利亚、黎巴嫩民族政府及其人民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日益激化的矛盾终于以1945年1月25日大马士革人民举行大规模示威的形式爆发出来。

1945年5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法国违背诺言，仍想继续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5月7日，法国政府总代表贝内将军带着"和平方案"从巴黎返回黎巴嫩。与他同行的是两支法国增援部队。法国人的增兵行动激怒了叙、黎两国人民，两国民族政府拒绝在胁迫下与法国总代表进行谈判。5月下旬，大马士革、贝鲁特、特里波利等地人民罢工、罢市，示威游行，以示抗议。法国当局完全无视叙、黎人民渴望独立的愿望，出动飞机和野战炮轰击大马士革，造成2000余人伤亡的重大惨案。同时，贝鲁特的示威游行也演变为与法军的流血冲突。英国出于排挤法国势力、将叙黎两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再次出面干涉。6月1日当地英军向法军递交一份包括8项内容的命令后，强行将桀骜不驯的法军押送到大马士革城外的营地，血腥的军事镇压暂告结束。

6月21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民族政府在大马士革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免去法国人在两国政府中担任的职务，要求撤出所有的法国军队。10月，两国政府正式向英法政府提出要求：立即撤出占领军。叙利亚总统舒凯里·库阿特里发表声明：除非法国人离开叙利亚和黎巴嫩，否则必将重新发生流血事件。但是，英、法两国迟迟不予理睬，直到12月13日英、法两国政府才派出代表前往贝鲁特磋商黎巴嫩和叙利亚局势问题，21日达成协议。但协议拒绝撤

出军队。英、法两国的顽固态度再次激起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法国政府再度增派部队,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叙利亚、黎巴嫩局势再度紧张起来。1946 年 2 月 5 日,叙利亚、黎巴嫩政府就英、法拒绝撤出占领军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告,但是安理会被美、英、法等国控制,对英、法撤军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这时,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加高涨。阿拉伯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也积极支援两国人民的斗争。在此形势下,英、法政府才被迫考虑撤军问题。1946 年 3 月 1 日,英、法两国就撤军问题在巴黎举行会谈,最后达成一项两国军队同时撤出的决议。4 月 17 日,英、法占领军开始从叙利亚撤出,但法国军队仍保留一小部分兵力。5 月 3 日,英、法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两国准备年底以前撤出驻扎叙利亚和黎巴嫩人的所有军队。8 月,英、法占领军开始从黎巴嫩撤军。1947 年 1 月 1 日,最后一批英、法军队撤出黎巴嫩。至此,两国人民取得了完全的独立。为了庆祝两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叙利亚、黎巴嫩分别将英、法撤军日定为国庆日。

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历经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宣告了殖民统治的彻底结束。叙利亚、黎巴嫩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民族独立主权国家。现代民族独立主权国家的建立对于叙、黎两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叙利亚、黎巴嫩两国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自古以来它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帝国和国家,至多是获得一些自治权利。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客观上结束了自古以来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叙利亚、黎巴嫩以民族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跻身于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为民族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建设

开创了广阔的前景。两国人民从此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叙利亚、黎巴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还标志着中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伟大胜利,它推动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第八章　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历程

一、殖民主义时期叙利亚现代政治的萌生

君主立宪制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素丹王冠的落地,延续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统治在叙利亚也随之宣告结束。叙利亚民族独立的曙光初照,叙利亚人民终于看到了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阿拉伯民族大起义领袖之一的费萨尔亲王于1918年10月抵达大马士革后,开始了建立叙利亚独立国家的尝试。1918年10月3日,即阿拉伯起义军占领大马士革3天之后,费萨尔亲王郑重宣布成立"完全独立的包括全叙利亚的政府"。实际上,费萨尔亲王的民族政府管辖范围只局限于一战结束时,英军驻中东地区总司令艾伦比将军,根据英法两国协定划分并建立的三个军事行政区之一的东部占领区。这一地区只包括叙利亚内陆地区和部分外约旦地区(见第7章第一节)。在这一区域内,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的事业。但是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叙利亚人民争取建立独立国家的努力和计划屡屡受挫。费萨尔民族政府仅维持了22

个月，便于1920年7月被法国占领军驱逐。然而，在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下，费萨尔领导的民族政府当政时，已着手建立与民族独立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政治体制。

费萨尔领导的民族政府，事实上只是一个自治政府，它并没有得到英、法列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但这并不妨碍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建立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尝试。1919年初，青年阿拉伯协会（即法塔特）的分支组织阿拉伯独立党，向自治政府倡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此，自治政府按战前奥斯曼帝国时期代表选举方式选出了代表。自治政府控制区以外，巴勒斯坦、黎巴嫩的代表由当地的士绅贵族人士推举。因为英法占领当局禁止进行选举。1919年7月2日，全国代表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大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统称为大会纲领的决议和文件。大会纲领号召叙利亚在其天然疆界之内——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实现完全的独立，并提出在叙利亚建立民主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大会纲领完全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拒绝法国对黎巴嫩的宗主权，反对拟议中的委任统治和任何外国在政治上控制独立的叙利亚国家。这一纲领极力倡导阿拉伯统一原则，要求叙利亚与独立的伊拉克在经济上实现统一。大会纲领突出的重点是，建立独立与统一的叙利亚国家。同时，大会纲领还提出起草宪法。大会纲领曾在叙利亚全国公开发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金—克伦调查团在叙利亚活动时，国民大会曾将大会纲领递交调查团。在后来公布的报告中，调查团承认，国民大会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并确认大会纲领得到了民众的拥护。1919年秋冬季，叙利亚民众和民族主义者反对拟议中的委任统治进入新的高潮。由于费萨尔亲王在巴黎和会上的妥协政策招致民众的反对，特别是12月大马

士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对费萨尔亲王妥协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为此费萨尔亲王暂时中止了叙利亚国民大会的活动。次年2月,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费萨尔重新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即第二届叙利亚国民代表大会。此时,全国民众要求立即宣布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代表大会这时已经演变为实际上的国民议会。3月8日,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叙利亚独立,宣布叙利亚为以费萨尔为国王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宣布即将成立叙利亚民族政府。由于费萨尔已与法国总理克雷孟梭签订妥协性"法阿协定",即"费萨尔—克雷孟梭协定",加之3月18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叙利亚国民大会的独立声明,同时协约国圣雷莫会议的委任统治计划即将出笼,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被迫组建以哈希姆·阿塔西为首的民族政府。独立声明的宣布和民族政府的成立,极大地振奋了叙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此时,在国民代表大会内部形成的两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派别起草了宪法草案。该草案规定叙利亚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建立选举基础上的立法体制。该宪法草案在7月10日全国代表大国上获得一致通过。

宪法草案的通过及国民大会宣布在联邦制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是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在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探索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然而,这一尝试因殖民主义委任统治制度的确立而夭折。1920年4月28日,协约国圣雷莫会议的委任统治决议出笼,授权法国在一战结束时划分的三个占领区中的西部行政区,即大致包括今天的黎巴嫩地区和东部占领区,即叙利亚民族政府领导的地区合二为一,交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7月14日,法国向费萨尔亲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与民族政府无条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费萨尔

亲王屈膝妥协，接受了法国人的最后通牒，并拼凑新的民族政府。但国民大会拒绝了费萨尔亲王的决定，决定以武力抵抗法国人的入侵，费萨尔因此解散了国民大会。至此，叙利亚民族独立运动暂时失去了实际上的领导机构和领导力量。费萨尔亲王的妥协政策最终换来的是被废黜、被驱逐的命运。

委任统治初期，法国当局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首先组建所谓大黎巴嫩，随后又设立阿拉威区、大马士革区、阿勒颇、德鲁兹区和亚历山大勒塔特别区，并将这些地区分别称为"国家"。1924 年，委任当局将大马士革区和阿勒颇区合并，冠以"叙利亚国家"的称谓。这些地区行政长官，除"叙利亚国家"外，均由法国最高委任当局任命，其中多数为法国人。委任当局派遣大批高级专员的代表顾问，到各地方机构监督"协助"地方官。而在各行政区之上则是法国委任当局高级专员署，它设在贝鲁特大皇宫内，高级专员是委任统治地区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是法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至此，一套完整的殖民政治统治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根据 1922 年 7 月 22 日国际联盟理事会新的关于叙利亚、黎巴嫩委任统治决议之第一款内容规定："委任统治当局应在委任统治实施后 3 年内拟定叙利亚、黎巴嫩基本法，基本法的拟定应得到地方民族政府的同意，应考虑在区域内民众的权利、利益和愿望，委任当局应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叙利亚、黎巴嫩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国家"，并同时鼓励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新的委任统治决议承诺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拟定宪法，并承诺叙利亚、黎巴嫩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国家。然而委任统治当局并未兑现在 3 年内制定宪法的承诺，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推进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进程。反而在 1925 年至 1927 年大起义期间进一步加强殖民统治和镇压措施。

1925年2月9日,法国委任当局一度开放党禁,叙利亚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宣告成立。同年5月,该党通过自己的政治纲领,把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手段”促使法国承认叙利亚的民族独立作为首要任务。人民党的要求遭到拒绝,叙利亚民族资产阶级继而转向支持全民反殖大起义。1927年春,人民起义被镇压。这次几乎遍及叙利亚全国的大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委任统治当局,委任当局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并抛出所谓在自治条件下的立宪计划,以期巩固其委任统治。

1930年宪法

1928年4月,经两级选举选出制宪会议代表。同年6月9日,第一次立宪会议正式举行。由于人民党等民族主义领导人流亡国外,代表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民族联盟(1927年元月成立)在选举中获胜。联盟领袖之一,即费萨尔时期的民族政府总理哈希姆·阿塔西当选制宪会议主席。同年8月,制宪会议完成宪法起草工作,并获得制宪会议的一致通过。该宪法草案首要条款是,不承认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坚持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法国委任当局拒绝了宪法草案,并解散制宪会议。1930年3月,法国高级专员提出宪法修改稿,5月强行实施。修改后的宪法仍坚持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位,宣称叙利亚为委任统治下的共和国。然而,法国委任当局强行实施的宪法虽然对原宪法草案进行多达23处的修改,但是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却奠定了委任统治时期乃至独立初期叙利亚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在独立之后于1950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之前的20年中,这部宪法虽然被委任当局几度中止执行,但基本上为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国

家政体与国体,即政治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并成为影响日后叙利亚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该宪法的重要意义在于规定了叙利亚的国家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宣布叙利亚国家政治体制为共和制政体;建立一院制议会,议会经选举产生;国家元首为总统,其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并经议会选举产生,但不向议会负责;总统任命内阁成员,但内阁不向总统而是向议会负责;实施以地域和教派为基础的议会选举制,以确保少数派社团的权利。1930 年宪法是法国委任当局强加给叙利亚人民的,法国委任当局是超越宪法之上的太上皇。叙利亚人民虽然获得了宪法赋予的一些权利,但仍然未能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自 1930 年宪法实施后,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被初步纳入宪法轨道。1931 年 11 月,法国委任当局解散过渡民族政府,宣布于 12 月及次年 1 月进行议会选举。1932 年 1 月复选中,由于舞弊事件,选举于 3 月和 4 月才最终完成。6 月,议会选举中间派穆罕默德·阿里·阿比德为总统,哈基·阿兹姆任总理的首届宪政体制下的民族政府。1936 年,叙利亚国民议会再度举行选举,曾于 1932 年议会选举中失利的民族联盟获得优势,叙利亚著名政治家,此前曾参与叙法条约谈判的叙方代表团团长哈希姆·阿塔西当选总统。这届议会最主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是批准经艰苦谈判达成的叙法条约。在叙方看来,叙法条约的目的是取代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制度,实现叙利亚的统一和独立。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围绕着制定宪法的斗争结束之后,争取通过谈判签订叙法条约并最终获得统一和独立,始终是政治斗争的中心议题。但是,尽管由于叙方的妥协,法国在条约中仍保留许多特权,法国最终还是拒绝该条约。1939 年,委任统治当局因战争日益迫近,以及因叙利亚人民对法国割让

亚历山大勒塔和拒绝法叙条约的强烈不满，中止了宪法，解散了议会，拼凑所谓“执政委员会”取代民族政府。实际上叙利亚民族不仅没有得到渴望已久的民族独立与统一，反而回到了法国委任当局的直接统治之下。1940年，“自由法国”当局迫于国际形势及叙利亚国内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于6月8日在名义上允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自由和独立，结束法国的委任统治，并于同年9月2日，正式宣布叙利亚有条件独立。塔杰丁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统，并组建民族政府。但是被中止的宪法并没有恢复，实际上叙利亚并没获得真正的独立。直到1943年，法国当局才被迫同意恢复共和国宪法，并同意进行议会选举。同年7月，“民族爱国同盟”(前身为民族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该党领袖舒克里·库阿特里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0月，叙利亚议会取消宪法中关于法国委任托管的条款。尽管叙利亚于1946年才真正实现独立，但从宪法的意义上讲，叙利亚自此已成为独立的共和制国家。至此，法国委任当局强迫接纳的1930年宪法，客观上成为叙利亚国家独立后的根本大法，直至1950年被废止。

1930年宪法是殖民统治时期特殊的政治产物，它是在叙利亚民族资产阶级尚不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萌芽状态，在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十分强烈，有着长期的政教合一政治宗教背景的社会中被强行移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及宗教教派上层人士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被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所默认、所接纳，更何况它本来就是以1928年制宪会议起草的宪法草案为蓝本。它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烙印，带有浓烈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色彩。尽管它是由殖民当局强制推行的，但它奠定了现代叙利亚宪政体制的

基础，是现代叙利亚国家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叙利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阶段，它标志着叙利亚现代政治的萌生。

二、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艰难历程

独立初期的政治生态

1946 年叙利亚获得彻底独立。叙利亚国家体制延续了 1930 年宪法基础上的宪政体制——一院制民主共和制政体。这一体制脱胎于殖民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色彩。1943 年 10 月，宪法修正案取消委任托管制条款后，宪法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内容继续保留，在修正后的宪法及宪政体制下，叙利亚政治发展进入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体制动荡与渐变的过程。

独立后，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们继续扮演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以库阿特里为代首的民族同盟（民族爱国同盟）实际上成为独立初期叙利亚的执政党。民族同盟是城镇工商业者、乡村及地主阶层利益的代表。1947 年，叙利亚举行独立后首次议会选举。选举前夕，民族同盟分裂为国民党和人民党。国民党领导人是库阿特里、阿尔·阿萨里等人。原民族同盟反库阿特里派、来自阿勒颇及霍姆斯的纳兹姆·库达西、拉西迪·基克亚以及阿塔西家族人士成为人民党的领袖。人民党代表了北方以阿勒颇、霍姆斯为中心地区的工商界及大地主阶级利益。国民党和人民党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党派，但它们带有明显的部族和家族色彩。尽管两党均反对传统封建主义，具有工业资产阶级及商业资产阶级倾向性，但它们的政治纲领没有明显区别。民族同盟分裂的根源是

部族及家族利益的分歧。

独立初期,两个新兴的政治党派——阿拉伯社会党和阿拉伯复兴党开始崛起。阿拉伯社会党组建于1945年,其领袖是日后对叙利亚政治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的阿克拉姆·胡拉尼。胡拉尼1936年加入安东·萨阿达领导的叙利亚民族党,1941年参与伊拉克拉西德·阿里发动的大起义,1943年在哈马竞选议会议员获胜,1945年组建阿拉伯社会党。该党虽然于1950年才正式向外宣告成立,但在独立初期已有一定影响力。阿拉伯社会党政治纲领是:消除封建主义,推行土地改革,将国有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革除宗教教派纷争,推动妇女解放,实施义务教育,建立专业技术学校。该党坚决主张国家的外交主权独立,拥护宪政体制下的议会共和制。胡拉尼接受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统一理念,但反对建立泛阿拉伯性质的政党。他认为阿拉伯世界在没有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获得彻底解放之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各个国家尚未实现统一之前,泛阿拉伯统一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阿拉伯复兴党组建于1943年,1947年正式宣布成立,其创始人是米切米·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阿拉伯复兴党是一个泛阿拉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该党拥有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其思想和主张主要反映在该党坚持的三大目标:“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之中。关于独立初期的国家政治,复兴党坚持宪政体制下的议会民主制,坚持民族的现代化和国家的世俗化,并认为伊斯兰教应世俗化,应逐步转化为阿拉伯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所有宗教、社团、部族、种族及地区派别及阶层应融和于一个民族的熔炉之中;主张推进现代教育,妇女应被赋予公民权。由于复兴党将阿拉伯统一置于政治斗争的首位,因而它的主张具有浓重的泛阿拉伯性质,但是把

复兴社会主义作为立国原则在这一时期尚未明确。从阿拉伯社会党政治主张及阿拉伯复兴党 1947 年 4 月第一次泛阿拉伯代表大会的成员组成及政治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代表着社会中下阶层的政治利益。胡拉尼十分同情家乡哈马地区的农民,特别是佃农的处境。1943 年进入议会后,他便开始在议会中为农民的利益进行活动。胡拉尼首先在议会提出改变议会两级选举制,认为两级议会选举制便于乡村地主阶层控制农民的选票,当选的议员们不能反映农民的呼声。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叙利亚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扩展,农民处境日益恶化,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因而阿拉伯社会党赢得了广泛支持并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复兴党基本成员的政治、社会、宗教背景,是城市中的逊尼派穆斯林及阿拉伯基督徒,以及农村中的中产阶层,特别是德鲁兹地区(如阿特拉什家族)和拉塔基亚的阿拉威派中农阶层和城镇小工商业者。因此,复兴党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农及较富裕的农民。同时复兴党也赢得了学生及军事院校士官生的拥戴。不过在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穆斯林兄弟会及日后的阿拉伯民族英雄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影响日益扩大。

1949 年军事政变

1948 年,叙利亚国内政局开始动荡。起因首先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政客及军队将领们互相指责对方应承担责任;其次,执政党分裂后在议会中的纷争日趋激烈;第三,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滥用巴勒斯坦基金。国民党政府不久后被迫辞职,哈利德·阿兹姆接手组建了新政府。新政府意欲缓和国内金融动荡的压力,与法国谈判贷款事宜。同时,新政府与美国政府协商恢复阿拉伯输油

管公司在叙利亚重新敷设油管工程。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阿兹姆政府的举动招致民众及议会的强烈反对。英国反对敷设油管工程,美政府发觉后策动政变。1949 年 3 月 30 日,叙军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上校发动政变。这是叙利亚独立后的第一次政变。然而,时隔数月,在英国的策动下,另一位军事将领萨米·兴纳维发动第二次政变,推翻扎伊姆政权,处决扎伊姆及内阁总理。12 月 19 日,美国支持的阿迪布·施舍克里上校领导军人集团再次发动第三次政变。一年之内三次政变既是西方新殖民主义插手的结果,更是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的产物。从此,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发生逆转,国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初露端倪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受到冲击,国家政治体制显露出向军政体制演变的倾向。扎伊姆上台后,自任元帅和总统,将议会选举的总统库阿特里驱逐出境,同时解散议会和政府,对内实施严格的军事检查,禁止游行示威和民众集会,封闭报社和俱乐部,取缔一切政治党派。扎伊姆还独断地批准了美国公司恢复横贯叙利亚国境的输油管建设协定。兴纳维政变后,处死扎伊姆和总理,自封叙军总司令,委任人民党成员阿塔西组织政府,宣布扎伊姆批准的油管建设协定无效。兴纳维是亲英派军人,他上台后意欲与伊拉克合并统一,并准备实施英国支持的、哈希姆家族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由此,亲美派军人施舍克里再度发动政变。三次政变动摇了仍然十分脆弱的宪政体制,破坏了叙利亚的政治发展进程,叙利亚国家政治生态由此进入了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

然而,另一方面宪政体制并没有被彻底抛弃,兴纳维还政于民、敦促军队退出政坛,组建以哈希姆·阿塔西为首的人民党新政府,撤销党禁。除共产党及极右翼党派社会合作党外,其他党派均

重新获得合法地位。阿拉伯社会党领袖阿克拉姆·胡拉尼和复兴党创始人阿弗拉克分别担任新政府的农业部长和教育部长。同时,宣布于11月15日举行宪法会议选举,将起草独立后的第一部叙利亚国家大法——宪法的工作提上正式议程。在立宪议会选举中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选举中,人民党获得多数。国民党尽管抵制选举,但也有13位代表进入立宪会议。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复兴党及穆斯林兄弟会各赢得一个席位,但阿弗拉克落选。在兴纳维授意下,新政府总理阿塔西被立宪会议选为新的共和国总统,并组织领导制定新宪法。12月19日,再次发生施舍克里领导的军人集团政变,但他上台后发表的第一项声明明确宣布,议会政治将继续存在。关于制定宪法的工作也并未因发生新的政变而停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施舍克里实际上拥有所谓"监督权",在幕后控制议会和阿塔西总统。

1950年宪法

1950年5月,经过曲折和反复,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宪法宣称:叙利亚是"具有充分主权的阿拉伯民主议会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政体,由议会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同时,宪法认为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期待着阿拉伯民族将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部宪法共规定了28项公民民主自由的条款,保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同时,对公民的经济及社会权利——如就业权、免费义务教育权及社会福利等——予以确认。在制定宪法过程中,立宪会议曾在世俗化等议题和条款上发生激烈争论。立宪会议最终拒绝了在宪法中确认

伊斯兰教和宣布伊斯兰法为司法及法律主要依据的要求,但立宪会议接受了共和国总统应当是穆斯林的条款。

1950年宪法在现代叙利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带有1930年宪法的明显痕迹,但它确立了战后10多年叙利亚国家政治制度与政体的基本模式——议会民主共和制政体,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此后,虽然叙利亚多次制定新的宪法,但是大多以这部宪法为蓝本。这部宪法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世俗化共和制政体的基础,它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及其义务至少在理论上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性质。

1950年宪法的颁布,并未缓解不断动荡的国内政治局势,施舍克里实际上仍以军事强人的角色影响着国内政治。亲美倾向的施舍克里与人民党政府及人民党控制下的议会分歧不断加深。人民党挑战军人集团,坚持由内政部管辖宪兵部队,要求文职人员担任国防部长。1951年秋,美国向叙利亚施压,迫其参加"中东司令部"。由此,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并引发政府危机。11月19日,施舍克里第二次发动政变,并从幕后走上前台,开始了近3年的军人独裁统治。

施舍克里第二次政变后,一改表面上拥护民主政治的外衣,解散议会,驱逐阿塔西总统,实行党禁,包括曾支持他的复兴党及阿拉伯社会党等党派均遭取缔。他还压制新闻自由,禁止工人、教师、学生及政府文职人员参与政治活动,并逮捕人民党议员和内阁成员。共产党、复兴党领导人也成为逮捕对象。更为甚者,施舍克里居然废除了最高法院。施舍克里的统治是专制的,他无视宪法,墨迹未干的1950年宪法形同虚设,宪政体制遭到又一次破坏。施舍克里希望加快国家现代进程的步伐,并达到真正的内部统一。

为此，他对宗教少数派及少数民族强制实行同化政策，废除部族酋长及贵族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特权，并强行将外国人及私人开办的学校及教育机构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下。1953年7月，施舍克里为了获得宪法上的合法性，着手制定新宪法，并在他操纵下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这部宪法与1950年宪法最大的不同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在其他方面则基本照搬了1950年宪法的内容。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改变了以往总统由议会选举的制度，这是叙利亚由议会民主共和制向总统共和制转变的一次预演。在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的同时，施舍克里以惟一的总统候选人当选总统。10月9日，议会选举前，施舍克里开放党禁，但只允许他个人创建的阿拉伯解放运动、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及极右翼党派社会合作党参加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阿拉伯解放运动获得议会中82个议席中的72席。其他10个议席除一个议席由叙利亚社会民族党获得外，其余9席由独立候选人获得。

施舍克里的独裁统治早已引起各方不满。6月间，仍处于非法地位的各政治党派团体和独立政治人士在霍姆斯召开国民大会。民族党、人民党、复兴党、阿拉伯社会党及共产党的代表共同签署了民族公约，决定推翻施舍克里的独裁统治。上述各党派在政治观点和立场等方面分歧严重，但此时联合起来，对施舍克里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同年12月，反对独裁统治的浪潮再次高涨，并向全国蔓延。1954年1月，在德鲁兹山区首先爆发反独裁起义，2月25日阿勒颇驻军在穆斯塔法·哈姆敦的领导下发动兵变。随后，除大马士革以外的所有卫戍部队积极响应，施舍克里被迫辞职，流亡国外。28日，阿塔西复任总统之职。

中外学者中多数人认为，施舍克里的下台是一次政变的结果，

但实质上它应是一次反独裁运动的结果。与以往军事政变不同，这是一次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广大民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青年大中学生、工人、农民以及中下层官兵都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正如时任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的哈勒德·巴格塔什所指出的："以前一切政变的发生都是少数人密谋的结果，这些人是脱离人民的。但施舍克里独裁的崩溃是广大民众运动的结果，在这次运动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民、士兵群众和正直军官的友爱团结"。1954 年 3 月 1 日，阿塔西总统颁布成立新政府法令，宣布废除军事独裁时期的宪法（1953 年宪法），恢复 1950 年宪法。同时重新召集 1950 年宪法颁布后由立宪议会转变而成的共和国议会。新组建的政府是人民党、国民党及独立人士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但人民党实际上控制着政府和议会。

1953 年时，阿拉伯社会党和阿拉伯复兴党两党合并。上述两党合并对日后叙利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党的合并使复兴党（全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但通常仍称复兴党）获得了新的政治资源，使复兴党在农村地区及军队中的影响力上升，特别是军事学院中贫苦出身的士官生们逐渐成为复兴党积极的追随者和骨干力量，而他们在此后叙利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

1954 年大选

新政府上台后，积极准备新议会选举。在预定的 1954 年 9 月选举之前，政治党派活动日趋活跃。在推翻施舍克里独裁统治之前形成的各党派联盟此时开始分裂。前总统库阿特里经数年政治

流亡之后返回国内,试图组建保守的联合阵线,角逐议会选举。但他被视为旧制度崩溃的象征,失信于民,因而组建联盟的计划失败。施舍克里执政时组建的阿拉伯解放运动积极准备参加选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开展竞选活动,哈利德·阿兹姆联合独立人士组成民主联盟,以实现工农业现代化、拒绝与任何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西方政府合作等为竞选纲领,参与选举。共产党在被复兴党拒绝之后,与阿兹姆民主联盟联手。9月份,在看守政府主持下,大选如期举行。尽管只有40%的合法选民参加投票,但这次选举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公正和自由的选举。这次选举标志着叙利亚政治发展又回到了民主政治的轨道,脆弱的宪政体制又得到恢复。

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叙利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政治力量——人民党及国民党在选举中受挫,所获席位明显下降;而新兴左翼党派及中派独立人士在选举中所获席位上升。如复兴党共获得16个议席。中间派阿兹姆领导的民主联盟获得38席。共产党总书记巴格塔什代表共产党获得一个议席,这是叙利亚历史上共产党第一次进入议会。此外,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及施舍克里的追随者阿拉伯解放运动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传统政治力量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退出叙利亚政坛。阿兹姆力图组建新兴政治力量为主体的新政府时,各派别政治分歧难以弥合,组阁计划失败。结果以人民党为主体、以77岁高龄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法里斯·克哈里为首的保守派联合政府登台执政。1955年8月,叙利亚国民议会选举库阿特里为总统更说明,国民党等传统政治力量仍然具有较大影响。而复兴党及民主联盟支持下的总统候选人落败则表明,新兴政治力量仍处于成长阶段。库

阿特里当选与人民党在关键时刻倒戈支持库阿特里有关，但库阿特里受到纳赛尔及沙特阿拉伯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也是其当选的重要原因。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

埃及1952年革命后，纳赛尔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叙利亚普通民众敬仰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各政治党派中，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国民党等派别以及复兴党领导层把纳赛尔视为阿拉伯民族的革命领袖。库阿特里长期流亡开罗，与纳赛尔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埃及和沙特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目的，也出于反对巴格达条约等目的，极力将叙利亚拉入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以北叙利亚为基地的人民党则主张与英国支持的伊拉克实现联合。1956年初，伊拉克取得美英两国默契之后，在叙利亚策动政变，意欲消除复兴党及共产党势力。阴谋败露后，叙利亚军情局控告人民党领导人等47名政治家，其中包括人民党主要领导人以及阿德南·阿塔西(哈希姆·阿塔西之子)、德鲁兹部族领袖哈桑·阿特拉什(苏尔坦·阿特拉什之子)等人。遭此打击，人民党势力严重削弱。尽管人民党仍在议会中占居多数，但已失去昔日的影响力。而主张与埃及合作的左翼新兴力量影响力上升。在随后的政府改组中，人民党被排挤出政府，阿兹姆应邀担任国防部长(此前曾担任经济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而此前于6月15日成立的民族联合政府，复兴党已经进入内阁并获得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两个关键职位。复兴党进入内阁的条件之一是，启动与埃及统一的谈判。随后，议会通过决议成立专责与埃及谈判统一的委员会。

1957年末,叙埃统一的步伐加快。11月,埃及议会代表团访问大马士革,与叙利亚议会共同请求两国政府尽快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统一。然而,开罗的媒体声称,未来的谈判将是"完全统一的谈判"。复兴党领导人之一比塔尔赞同"完全统一",而其他领导人胡拉尼等则认为统一应是"邦联制统一"。这时,身为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的阿兹姆被任命为副总理,复兴党认为阿兹姆派在未来的1958年议会选举中将是自己强劲的对手,因而急切希望与埃及实现统一。1958年1月12日,14人组成的军事代表团秘密前往开罗,请求纳赛尔首先实现两国军队的统一,以此作为两国统一的前奏。代表团通报政府后,比塔尔受命前往开罗以探寻纳赛尔的真实意图。然而,比塔尔背弃使命加入军事代表团的行动。纳赛尔向代表团及比塔尔宣布统一的条件:无条件的完全统一,取消所有政治党派(包括积极支持统一的复兴党),军队完全放弃政治活动。国内以阿兹姆为首的政治家们呼吁议会及政府认真协商统一事宜,但库阿特里总统接受了统一的条件。2月1日,纳赛尔总统和库阿特里总统在开罗阿伯丁宫正式宣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成立。5日,两国议会同时批准合并协议生效。21日,两国全民公决确认合并决议,并以99.5%的绝对多数选举纳赛尔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库阿特里为副总统。

阿联的建立再一次改变了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自独立以来脆弱的、在曲折与艰难中向前迈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体制又一次发生逆转,叙利亚政治发展历程开始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58年3月5日,纳赛尔颁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临时宪法。临时宪法规定,阿联实行总统民主制;国家总统在他委任的各部部长协助下行使职权;各部部长对总统负责;设立统一的国民议

会行使立法权。但是纳赛尔政府禁止党派活动，以“民族联盟”取而代之，实行一党专政。在叙利亚，纳赛尔排挤、打压叙利亚党派领袖和政治家，国务活动由纳赛尔的全权代表控制，所有政府要害部门均被埃及人把持。实际上叙利亚的独立主权地位已被抹煞。埃及人的强权统治，损害了叙利亚人的民族自尊。加之，阿联的开罗政府在叙利亚强行推行土改和国有化等政策，致使叙利亚政界人士、农村地主及工商业社会阶层产生不满和反感。1961 年 9 月 28 日，叙利亚资产阶级地方集团及右翼军官发动政变，宣布脱离阿联，成立独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在经历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大动荡后，自独立以来屡遭挫折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即将走到尽头。

三、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终结

脱离“阿联”

1961 年 9 月 28 日政变的主要领导人是阿布代尔·凯里米·纳赫拉维中校和空军旅长马瓦法克·阿萨萨等人。政变成功后，纳赫拉维等人提出在阿联内部实行自治，并未要求脱离阿联。纳赛尔拒绝自治要求，在动用军事手段以挫败分离行动失败后，纳赛尔又开动一切宣传工具，抨击、诋毁叙利亚人，宣称分裂阿联是一小撮“封建主义者和反动派违背叙利亚人民意志”的行动。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发动抵制叙利亚的冷战。他本人声称，除非叙利亚人民能够在公正自由的大选之后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否则决不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地位。纳赫拉维军人集团在这一背景下，正式宣布

终止与埃及的统一。为了表示仍然忠实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变领导人将国家更名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合并前称叙利亚共和国)。

脱离阿联的政治事件，引起叙利亚国内政治力量新一轮分化组合。首先，本已在1954年议会选举之后逐渐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主导力量之一，在推动叙埃合并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在阿联时期遭到排挤打压，甚至被取缔后仍痴心不改忠实于阿联的复兴党发生严重分裂。自1953年合并以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内部就一直存在的左右翼两个派别，在是否脱离阿联问题上出现分歧。以胡拉尼为首的复兴党左翼坚决支持脱离阿联，胡拉尼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对纳赛尔怀有不满情绪，他是叙利亚政治家中最坚定的反对纳赛尔人士。到60年代初，复兴党左翼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尽管与阿弗拉克和比塔尔领导的右翼正式分裂发生于1962年5月。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在脱离阿联问题上持不同态度。比塔尔赞同脱离，并在宣言上签名；阿弗拉克拒绝签名。当复兴党民族指挥部抨击脱离行动后，比塔尔又转变态度，声明签名无效。复兴党另一位领袖萨米·苏凡对胡拉尼和比塔尔的行为表示愤慨，宣布脱党，另组亲纳赛尔的社会主义联盟运动。阿联时期在埃及成立的军事委员会，保持独立地位并处于秘密状态。返回叙利亚后，军事委员会支持脱离阿联。但在纳赫拉维的清洗运动中，由于部分成员被免去军职，军事委员会转而又反对脱离阿联，甚至密谋推翻所谓“分裂者政府”。复兴党人对叙埃统一怀有真诚的愿望，但他们反对任何将叙利亚变为埃及附庸的企图和行动。其次，纳赛尔主义者成为叙利亚统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政变后，他们不仅把持着国家机关的重要职位，而且在此后叙利亚政治生态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第三,叙利亚传统政治力量,即以国民党和人民党为代表的传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政变后再次被推上政治生活的前台。阿联期间,纳赛尔政治清洗运动使传统政治力量遭到排挤。不切实际的土地改革与国有化,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严重伤害。但是以库阿特里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力量,在阿联期间政治地位有所加强。当右翼军官集团的代表人物纳赫拉维发动政变后,叙利亚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极力拥护纳赫拉维军人集团。纳赫拉维军人集团选择库兹巴里出任总理,组成了以国民党及人民党为主体的新政府。另外,传统政治力量中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及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同年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不俗成绩。

1961年11月议会选举

库兹巴里新政府组成后,叙利亚民众的民主政治热情高涨。新政府承诺恢复政治自由,解除言论出版等禁忌,废除紧急状态,保护工人及农民的正当权益。纳赫拉维军人集团一度宣称,军人将退出政治生活,但是纳赫拉维很快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实上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11月中,新政府颁布临时宪法,同时宣布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并规定议会将指定共和国总统,在议会中同时成立立宪会议,在6个月内起草正式宪法。在正式宪法颁布前,新政府将依照1950年宪法行使职权。议会选举原计划4个月之后举行,但军人集团匆忙宣布举行选举,并附加许多限制条件。选举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举行的,政治党派活动被严格禁止,因而选举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但国内民众政治热情高涨,民众积极参加投票,投票率高达50%～

60%，高于以往任何一次投票选举。尽管军人集团强行要求各方政治家签署限制政治选举活动的国民联盟协定，承诺不参与政治党派纷争，但政治家仍以极大热情投入选举活动，同时，还以97%的高比例通过了新的共和国宪法。著名政治活动家哈利德·阿兹姆及胡拉尼等人以高票当选。胡拉尼领导的复兴党左派获得15个议席。复兴党右翼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则全部落选。此次选举与1954年议会选举有相似之处，人民党获得33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议会党团，国民党获21席，穆斯林兄弟会获10席，其他席位均被独立候选人获得。临时政府总理库兹巴里当选议长。人民党领导人马拉夫·达瓦利比和纳兹姆·库德西分别出任政府总理和共和国总统。

此次议会选举及新政府的组成极大地激发了国内民众的政治热情。政治家、实业家及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等热烈讨论国家经济建设及土改和国有化问题。舆论普遍认为，私营经济在仍不发达的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有企业应与私人企业合作；政府应集中财力用于重大经济项目，对幼发拉底河大坝工程、石油工业、交通通信及基础工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私人企业无力在上述经济领域投资，可以重点发展消费品生产及轻工业。议会中，国有化和土改问题成为广泛争论的议题。议会讨论通过了取消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计划将阿联时期部分国有化的企业归还给私人业主。政府希望对金融行业实行部分国有化的决议在议会遭否决。此间，议会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焦点议题是实现政治民主。阿兹姆及胡拉尼等政治家强烈要求取消实施多年的紧急状态法，停止新闻检查等限制民主生活的法律条文。迫于压力，达瓦利比政府同意议会讨论上述问题；议会则要求达瓦利比辞职，为组建新

的国民联合政府铺平道路。1962 年 3 月 25 日，达瓦利比辞去总理职务，并承诺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政治民主自由。但是，各方协商组建新政府的过程，却被三次军事政变所打断。

三 次 政 变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一周之内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和阿勒颇分别发生了三次军人未遂政变。三次政变加速了议会民主政治的衰亡，政变军人尽管代表不同方面的政治利益，但共同的目标之一是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极大地损害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同时，军人频繁干预政治，宪政体制几近崩溃。政变军人另一个目的是恢复土地改革进程和国有化运动。复兴党人及纳赛尔主义者是农村中产阶级及贫苦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特别是复兴党中以军事委员会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大多来自德鲁兹山区和拉塔基亚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他们强烈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有化。三次政变之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不得不屈服压力，立即恢复对大私营企业的国有化，其中包括叙利亚著名的“五人公司”，并对土改政策稍作修改后，立即恢复土地改革运动。同时颁布法令对所有外国银行实行国有化，规定叙政府在所有银行中占有 25% 的股份。第三次军人政变名义上赞同恢复阿联，实际上除纳赛尔主义者之外，军人力图干预政治，实现军队直接统治。以阿克拉姆·胡拉尼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提出“民主优先于阿联”，新闻媒体中也出现了“不与独裁者统一”的口号，反纳赛尔主义者的呼声日益高涨。亲纳赛尔人士及其政治派别陆续退出政府，并逐步趋向联合。名义上处于非法状态的党派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前总理达瓦利比、哈利德·阿兹姆等提出恢复法律秩序的要求，百余名议员签名请

愿，要求恢复议会和政治民主。5月，复兴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驱逐胡拉尼，复兴党左右两翼正式分裂。这次代表大会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复兴党民族指挥部与叙利亚复兴党地区领导人在党的组织原则、重建复兴党等问题上发生分歧，特别是重新选举民族指挥部领导机构的要求被大会拒绝。这是复兴党日后内部纷争的开端。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开罗对复兴党的攻击减少，分裂后以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为首的复兴党（仍保留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名称）采取与纳赛尔主义者及埃及政府合作的态度，并与纳赛尔主义者一道参与了企图推翻阿兹姆临时政府的未遂政变。三次政变后日益活跃的党派活动中，在叙利亚政坛中一直较有影响的工会组织及劳工运动也日趋活跃。叙利亚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阿联期间被亲开罗人士所把持，脱离阿联后，执委员鼓动工人罢工游行，要求推翻"分裂主义者"政府，回归阿联。同时，工会方面也要求施行政治民主，取消新闻检查，保证工人就业权。临时政府采纳了工会的部分要求，颁布法令，禁止任意解雇工人，但是工会中纳赛尔主义者回归阿联的要求遭到政府回绝。实际上，工会中的广大会员对回归阿联并无热心，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权利。7月，纳赛尔主义者及复兴党人策划政变，计划在政变成功后组成以比塔尔为首的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政权。政变策划者与开罗之间的电文被政府破译，政变流产。此间正值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在什陶拉（黎巴嫩）参加阿盟会议，在会上叙政府代表控诉埃及的颠覆活动，这是叙利亚政府第一次在国际上强烈谴责埃及的举动。什陶拉会议后，叙利亚临时政府邀请各方知名人士讨论制定政党组织活动条例。该条例意在取缔以宗教名义及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党派参与政治活动。依照此条例，叙利亚社会民主

党、共产党及穆斯林兄弟会，尤其是纳赛尔主义者均在取缔之列。至此，三次政变后一度兴起的政治民主化要求再遭重创。

阿兹姆政府与议会民主制的终结

1962年9月14日，叙利亚宪政体制下最后一届国民议会在各方呼吁下复会。在通过宪法修正案——政府总理及新政府需通过议会信任投票——之后，哈利德·阿兹姆赢得议会信任表决，组建各党派联合政府，复兴党及纳赛尔主义者和共产党被排除在外。阿兹姆作为叙利亚政坛上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在组建新政府过程中曾得到各党派支持，甚至共产党也给予有保留的支持。然而，新政府上台伊始便受到政府内部各派系纷争的困扰，穆斯林兄弟会与大地主阶级代表及资本家阶层联手，阻挠阿兹姆政府的改革政策。复兴党人与纳赛尔主义者则与开罗的舆论攻势相呼应，谴责阿兹姆政府。阿兹姆政府致力于恢复和推动民主制度，承诺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民主机制，筹备新议会选举，鼓励私营资本参与经济建设，提高工人及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阿兹姆政府的第一个改革举措是，免除土改中受益农民10%的土地转让金，加速土改进程。同时，采取措施重树工商业者的投资信心，吸引逃离叙利亚的私人资本回国参与经济建设，在确保工人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向私人资本家承诺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国有化。阿兹姆政府着手与西德政府谈判贷款，修建幼发拉底河大坝工程，设立专门机构研究组建国家石油总公司，开发杰齐拉油田，筹备塔尔图斯海港扩建工程，甚至与英国公司签订了建设粮仓的贷款协议。同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交往也活跃起来，先后与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贷款协定，从波兰购进了国有化之后国营企业急需的工业设备。阿

兹姆本人曾几度出任政府经济、财政部长以及政府总理，在他的部长及总理任内，阿兹姆重视国家的经济建设，强调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许多措施推进工农业的现代化，因而阿兹姆有叙利亚现代工业之父的美誉。

在推进民主、恢复民主政治机制方面，阿兹姆遇到巨大阻力。取消紧急状态法的动议在政府内部右翼力量及军方压力下被迫延后。12 月 22 日，阿兹姆政府最终取消了紧急状态法。政府还承诺制定新的政党法，次年 7 月举行全国大选。在此背景下，政党活动又趋活跃，但此时叙利亚政治舞台已是阴云密布。穆斯林兄弟会此前与纳赛尔主义者联手逐步取得对各级工会的控制权，并通过工会向政府挑战，同时与社会主义党派及共产党矛盾也日益加深；穆斯林兄弟会的反世俗化倾向日益明显，加之纳赛尔主义者与开罗政府在舆论上的冷战攻势遥相呼应，使得阿兹姆政府推进民主的进程阻力重重。阿兹姆政府建立的本身对怀有野心的军人及先后被清洗、被驱逐的军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阿兹姆历来反对军人干政，并力图铲除军队干政的温床。作为一个坦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蔑视军队中的小集团，在其政治生涯中也从不结党营私。在处理军官参与政治的问题上，他主张依照宪法妥善解决。阿兹姆的主张遭到军人集团的反对，1963 年 1 月初，纳赫拉维及其追随者回国，与军方反政府人士磋商，向阿兹姆政府施压，要求恢复被清洗军官的军职，重建最高指挥部；举行全民公决，实现与埃及的再统一。虽然纳赫拉维的行动被政府断然回绝，纳赫拉维也被再次逐出国境，但纳赛尔主义者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在大马士革及豪兰等地发动暴乱，阿兹姆民族联合政府中的穆斯林兄弟会及社会主义者党派的部长们因各种分歧首先退出内阁。

2月8日，伊拉克复兴党及纳赛尔主义者策动政变，卡赛姆政权倒台。这一事件在叙利亚引起很大反响，阿兹姆政府危机加深，先后又有6名部长退出政府。由于阿兹姆本人此时重病缠身，阿兹姆政府群龙无首，已无力控制国内局势。来自不同派别的军人集团借机密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政变军人分属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军人。赛义德·哈里里少校成为事实上的政变领导人。正当纳赛尔主义者观望不决之际，哈里里率先于3月8日发动政变。复兴党人是政变的策划和配合者。推翻阿兹姆政府后，政变军人立即组建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立即实施紧急状态法，禁止议会活动，关闭新闻报刊(除三家亲军方及复兴党报刊)，对所有自脱离阿联以来较活跃的政治家、新闻记者、知识分子等实行软禁和隔离，逮捕数百名知名政治及社会活动家。但是，这次政变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并轻易得手。从表面上看，这次政变与以往历次政变没有明显不同，但它却宣告了在动荡不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脆弱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结束了自独立初期以来军人不断干预政治的历史，开启了军人直接主政的历史。至此，叙利亚国家政治进程和政治体制开始向军政体制转变。

四、党政合一政治体制的确立

复兴党军事委员会

1963年3月8日政变被后来的复兴党及其领导下的叙利亚国家称之为“三·八革命”。从政治意义上讲，它不是一场革命，但

这次政变却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政变策划过程及组织者角度看，传统的复兴党领导层无人参与此次政变，参与政变的复兴党人士是复兴党秘密组织军事委员会成员及其追随者。政变主谋哈里里少校及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员没有共同的纲领和组织联系。政变成功后，复兴党人特别是以军事委员会为代表的复兴党新生代逐渐在一系列政治角逐中崛起，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并初步确立起复兴党党政合一的军政体制，从而彻底改变了叙利亚政治历程的发展方向。

政变成功后，复兴党领导层承认并接受军事委员会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在军队之外没有影响力，没有有效的组织系统，军事委员会借助复兴党及其影响力扩大和发展力量。复兴党领导层成员参加了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比塔尔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一位并不知名的人士鲁亚·阿塔西出任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哈里里担任军队总参谋长，复兴党人阿明·哈菲兹应邀回国出任代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和内政部长。纳赛尔主义者也参加了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纳赛尔主义者政治团体主要包括阿拉伯民族运动、统一阿拉伯阵线和前复兴党领导之一萨米·苏凡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运动等组织。复兴党人实际上占据了革命指挥委员会、政府及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关键职位，而纳赛尔主义者及哈里里很快遭到排挤。推翻阿兹姆政权后，纳赛尔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实现与埃及的再统一。在复兴党默认下，叙埃双方代表起草了新的阿联宪章。但纳赛尔诋毁复兴党人，声称要与真正代表叙利亚人民的政府统一，不与复兴党统一。复兴党居主导地位的叙利亚政府则以即将举行大选为由延后 25 个月执行新阿联宪章。纳赛尔主义者对此极为不满，在阿勒颇发动暴乱，复兴党借机清除

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纳赛尔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的离去为建立清一色复兴党政权铺平了道路。7月18日,纳赛尔主义者又在大马士革策划政变,但遭到阿明·哈菲兹领导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武力镇压。至此,纳赛尔主义者在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此前,3月8日政变主谋哈里里出访阿尔及利亚期间被剥夺了刚刚担任的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参谋长之职,并被派往华盛顿出任使馆武官。军事管制委员会代理主席阿明·哈菲兹接任代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同时担任政府副总理和内政部长。7月18日,纳赛尔主义者未遂政变后,以复兴党军事委员会为主要力量,推举阿明·哈菲兹出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标志着复兴党人彻底取得了一党专政的执政地位。复兴党人自1947年正式成立以来历经10多年奋斗,终于登上了国家政治权力的顶峰,最终成为叙利亚当代政治、社会、经济等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

阿明·哈菲兹的崛起看似出乎意料,但是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的崛起反映出复兴党内部及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暂时相互妥协的基本现实。哈菲兹加入复兴党并不是因为他认同阿弗拉克及比塔尔等人的政治思想纲领,而是因为他对胡拉尼的钦佩和敬仰。他出生于阿勒颇一个逊尼派中产阶级地主家庭,与日后崛起的以阿拉威派、德鲁兹派为主体的复兴党新生代没有部族和血缘上的联系。在50年代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作为一个较低级的军官他没有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在1961年9月政变后一系列清洗运动中,他与众多中下级军官一道被排挤出军队,他本人被派往阿根廷大使馆担任武官处随员。"三·八革命"前,他与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没有联系。但是阿明·哈菲兹坦诚直率、刚直不阿、胆略过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誉。哈

菲兹在政治上温和、理性，主张民族和解、党派妥协，不仅是国内务实派力量能够接受的人选，更是复兴党内部传统派和新生代可以实现妥协的理想人物。

"三·八革命"后，复兴党军事委员会逐步融入复兴党主体之中，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它仍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在"三·八革命"后的清洗运动中以及在驱逐纳赛尔主义者的过程中，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占据了军队中的关键职位，从而将军队牢牢控制在军事委员会手中，特别是军事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萨拉赫·贾迪德出任叙军军官事务总局和军队人事总局局长之职，为军事委员会控制军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贾迪德同属阿拉威派的哈菲兹·阿萨德、穆罕默德·乌马兰等军事委员会成员均被安排到军中关键职位上。军事委员会实际已成为军队的代言人，它利用其强有力的和相对自主独立的地位，推进军队的复兴党意识形态化，并将大批来自阿拉威、德鲁兹等地区贫苦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同时铲除军队中的小集团，使军队成为复兴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效忠于复兴党的政治工具。

复兴党新生代的崛起

1963年复兴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其内部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两种趋势。其一，传统的改革主义者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复兴党右翼继续推崇阿拉伯统一，将阿拉伯统一置于优先地位。其二，复兴党中青年党员，尤以军事委员会为代表的青年军官们热中于社会主义思想，关注国内社会经济等问题。前者仍以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为代表；后者代表人物是"三位医生"——尤赛夫·扎亚因、伊卜拉欣·马胡斯、努尔·阿尔丁·阿塔西和萨拉赫·贾

迪德等人。三位医生亲历阿尔及利亚革命并深受影响，逐渐与复兴党军事委员会结盟并形成为复兴党第二代新生力量的重要成员。由于受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复兴党第二代新生力量成为党内新的左派。新左派力量在 1963 年 9 月召开的复兴党叙利亚地区代表大会正式登场，新左派人士在地区指挥部中开始占据多数。同年 10 月，复兴党第 6 次民族代表大会后，党的基本纲领受新左派的影响日益激进化，复兴党党纲接受了所谓"阶级斗争"的理念，宣称阶级斗争将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甚至宣称将在叙利亚推行科学社会主义。在传统复兴党人反对下，科学社会主义理念被置于阿拉伯统一的原则之下，但新左派以复兴党地区主义者为主在党内影响显著上升。复兴党第 6 次民族代表大会后，复兴党政治纲领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以及推行集体农场等新政策，特别是将私营资本归入所谓"新殖民主义者的同盟"等政策激怒了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比塔尔政府内部也因政策主张相左而发生危机。哈菲兹接管政府出任总理，至此阿明·哈菲兹已握有 7 个政府及军队关键职位，乌马兰出任副总理和副总参谋长，贾迪德任总参谋长。新政府既包括民族指挥部成员，也包括地区指挥部成员。1964 年 2 月，复兴党叙利亚地区指挥部领导机构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重新选举地区指挥部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 7 位成员进入 15 人组成的地区指挥部领导机构，以阿弗拉克为首的民族指挥部慑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会在叙利亚重演，支持并赋予地区指挥部更大的权力，从而使复兴党叙利亚地区指挥部成为实际上的叙利亚国家事务最高决策机构，并且初步构筑起复兴党领导下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

1964 年初，叙利亚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经济危机初露端倪，复

兴党政权激进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措施是导致危机的根源。1963年5月,政府重新推行国有化,致使私人资本信心动摇,大量外逃,自“三·八革命”后至1964年初,居然没有一家新的企业注册成立,现有企业也因种种原因纷纷破产。大企业被国有化后效益低下,利润锐减,政府支出却有增无减,政府不得不削减国家机关文职人员及其工资。至1964年初,市场供应日益短缺,物价高涨,失业率上升,至1964年4月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教派及社团矛盾日益突出,逊尼派与阿拉威派教派冲突在军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逊尼派反政府活动不断蔓延,穆斯林兄弟会及被逐出国家领导层的纳赛尔主义者趁机兴风作浪,哈马地区反政府游行演变成暴乱,哈非兹政府动用军队暴乱才得以平定。到4月下旬,叙利亚国内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发生了抗议活动和罢工罢市。

4月危机使复兴党政权陷入孤立境地,也使复兴党政权受到极大震动,并促使复兴党新左派地区主义者深信,只有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才能打破孤立,稳定政局。哈非兹政府首先从政治上采取措施,其措施之一是颁布新宪法。新宪法规定,要扩大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新成员要包括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和非剥削资本家;决定将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更名为全国革命委员会,并赋予它立法的最高权力。哈非兹政府甚至承诺要邀请非复兴党人士进入该委员会。宪法还规定,在全国革命委员会中建立5人主席团(又称总统委员会),由该主席团行使最高行政权。阿明·哈菲兹担任主席团主席,比塔尔再度出任政府总理。新宪法明确确认叙利亚存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种所有制形式;保证私人财产不被没收,除非国家因特殊需要或因公共利益而采取的国有措施,但强调,国有经济与私营部门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比塔尔出任总理招致复兴党地区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同年10月，比塔尔被迫辞职，并退出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哈菲兹再度出任总理后，组成地区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新政府，复兴党地区主义者萨拉赫·贾迪德和尤赛夫·扎亚因进入主席团。地区主义者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政府，经过一段时期酝酿，于1964年底前后大力推进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激进的伊司玛仪派信徒阿布代尔·卡里米·琼迪上校出任土地改革部长，并在他的领导下，加速土改步伐。12月，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与外国公司及外资签订石油开采租让协议，并将石油工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1965年1月，政府又进一步加大国有化力度，所有具有现代工业特征的企业完全国有化，甚至将一些手工业工场也实行国有化，共有106家大工业企业被国有化，国家完全掌握了现代工业企业。大规模国有化，使城市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中小私营资本，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传统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彻底铲除，使传统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屡遭冲击并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背景下，在经济上又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时期的国有化运动，还扩展到对外贸易等领域，国有经济成为农业领域以外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角。

围绕国有化运动，复兴党民族指挥部领导层与地区指挥部领导层产生分歧，同时伴随着复兴党因地区主义者影响力上升就已经存在的党内矛盾开始激化。阿弗拉克等人虽未公开反对国有化运动，但在党内指责国有化是掩盖党内及国内危机的"花招"，并指出党内危机的根源是军人与文官官僚之间的冲突。1965年4月，复兴党第八次民族代表大会召开，阿弗拉克辞去复兴党总书记职务，约旦人马尼夫·拉扎兹当选新的总书记。阿弗拉克辞职的本意是以此向新左派做出让步，以便弥合党内分歧，但是新的政治冲突

又随即产生。阿明·哈菲兹与萨拉赫·贾迪德之间权力之争开始公开化。同年7月,复兴党地区紧急代表大会召开,本次会议旨在消除党内不和,但是选举出的地区指挥部领导机构成员中支持哈菲兹和贾迪德的人士各占一半,党内冲突陷入僵局。这次代表大会进一步使党的政治纲领激进化,提出将分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实行人民民主。8月23日,新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共由95名委员组成,包括复兴党民族指挥部和地区指挥部领导机构成员。9月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并选出5人主席团,其中三位为地区主义者,哈菲兹仍担任主席团主席。由于民族指挥部与地区指挥部领导机构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贾迪德的强硬立场,包括阿弗拉克、比塔尔和贾迪德等13位成员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在哈菲兹的压力下,贾迪德被迫辞去军队总参谋长职务,但很快又被选为复兴党叙利亚地区指挥部副总书记。贾迪德赢得地区指挥部支持后猛烈抨击哈菲兹,名义上地区主义者指责哈菲兹政府向纳赛尔献媚,实际上是因为哈菲兹已经开始倾向于复兴党民族指挥部。哈菲兹参加卡萨布兰卡阿盟首领会议回国后,他的总理职位被尤赛夫·扎亚因取代。贾迪德等复兴党地区领导成员的抨击,促使哈菲兹更加向民族指挥部靠拢,因而致使党内危机进一步加深。哈菲兹与民族指挥部领导机构联手,决意清除地区主义者,割断他们与军队的联系。11月,民族指挥部要求所有地区指挥部成员辞去军职。地区指挥部新生代复兴党人(或称新复兴党人)早已控制军队,在军队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早已构筑起坚实的组织基础。军队中的新复兴党人决意以武力相对抗,驻霍姆斯叙军装甲旅参谋长穆斯塔法·塔拉斯逮捕效忠哈菲兹的军官。民族指挥部认为塔拉斯的行动是一次未遂政变,决定解散地区指挥部。在哈菲兹的认

可下，民族指挥部再度任命比塔尔担任总理，取代新复兴党人尤赛夫·扎亚因。比塔尔为了摆脱复兴党政权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孤立处境，邀请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协商和对话，释放在押政治犯，任命专家委员会研究国有化问题。与此同时，民族指挥部加强和巩固自身地位，对全国革命委员会进行清洗，扩大其成员达 134 人。将效忠于民族指挥部的传统复兴党人安插到关键岗位，筹备新的复兴党地区代表大会，企图选出新的地区指挥部成员，同时决定解散拥护地区指挥部的国民卫队，将部分贾迪德的追随者调离军队。

1966 年 2 月 23 日政变

复兴党民族指挥部上述举动导致又一次军事政变，即 1966 年 2 月 23 日政变。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哈菲兹、总理比塔尔、副总理乌马兰及其他民族指挥部成员被投入监狱，阿弗拉克、比塔尔等人以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叛徒等罪名驱出复兴党，并判处死刑。新复兴党人废除 1964 年宪法，重组国家政权机构，将国家权力完全置于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控制之下，使其享有任命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的充分权力，并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此后，新复兴党人重组复兴党民族指挥部，将民族指挥部变成没有实际权力的虚设机构，政治强人萨拉赫·贾迪德以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副总书记身份在幕后操纵党政大权。阿萨德继续担任空军司令并兼任国防部长，艾哈迈德·斯维丹尼出任叙军总参谋长。三位医生努尔·阿尔丁·阿塔西担任国家元首（即总统会议主席），尤赛夫·扎亚因任总理，伊卜拉欣·马胡斯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至此新复兴党人一党专

政政治体制建立起来。

新复兴党人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执行新的对内对外政策，以此巩固其执政地位。内政方面，新复兴党政权修正时断时续的土地改革政策，放宽农民土地占有数量，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推进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的发展。上述政策使农村中产阶层获益匪浅，使原本就在农村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复兴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同时，新复兴党政权进一步确认国有化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加速建立国有经济，使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所有环节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私营资本进一步遭到打击，以城市为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在经济上的影响力进一步衰退，自“三·八革命”以来屡遭打击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政客逐渐退出叙利亚政治舞台。宗教政治化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城镇及乡村逊尼派穆斯林中还保持一定影响，并若明若暗地批评指责复兴党政权，但是共产党支持复兴党政权。由于共产党是组织上较严密的社会主义政党，复兴党政权采取与之合作的态度，复兴党破天荒地第一次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内阁部长，但是另一方面复兴党政权也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新复兴党人的分裂与“纠正运动”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作为阿拉伯前线国家和反以阵线的重要成员，叙利亚卷入战争，但遭到惨败。战争的失败对叙利亚国内政局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冲击。国内民众对战争的失败深感震惊，指责复兴党政府及复兴党领导下的军队对战争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指责军方对战争准备不足，指挥失当，公布错误信息，甚至遣责军方将最精锐的部队撤离战场保卫首都的政

府机关，是对国家生死存亡不负责任的行为。至此，广大民众对复兴党政权不信任情绪高涨。为了安抚国内民众反政府情绪，叙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更加强硬的不妥协立场，与美、英、西德等国断交，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抵制，鼓动并参与对西方的石油禁运，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叙政府对阿拉伯亲西方国家沙特等采取强硬政策，拒不参加喀土穆阿盟首脑会议，声称决不与封建主义反动政府为伍。在国内，叙政府暂时软化强硬立场，在拒绝承担责任的同时，默认所谓进步力量运动要求建立民族进步阵线的要求。“六·五”战争后，一度沉寂的党派活动又活跃起来。共产党、阿拉伯民族运动、胡拉尼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统一运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共同发起建立民族进步阵线。在各派强烈要求下，复兴党决定参加进步阵线。1968 年 5 月，进步阵线正式建立并发表民族宪章。但该宪章指控复兴党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因为复兴党冒进政策和舆论导向为以色列冒险发动战争提供了口实，战争前叙政府政治军事激进路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无谓的挑衅行为使国家及阿拉伯人陷入没有充分准备的战争之中。宪章同时要求，复兴党政权允许各政治派别分享民主政治权利，组建民族联合政府。由于进步阵线内部各党派间的异质性，以及面临政权危机等，复兴党政权转而采取高压手段。胡拉尼社会主义者运动发生分裂，胡拉尼本人在大逮捕中幸免逃脱。埃及总统纳赛尔与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合作，使得社会主义统一运动等亲纳赛尔主义者组织大失所望，政治热情大为低落。1968 年 7 月，伊拉克的复兴党夺回政权，进步阵线内部分歧更加突出。有些组织主张与伊拉克复兴党合作，反对叙利亚新复兴党人政权；有些组织则反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加之新复兴党

人的不合作态度等因素，进步阵线很快便名存实亡。以贾迪德为核心的复兴党政权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统治权力。但是贾迪德政治上的专制激进政策、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引起新复兴党人内部以哈菲兹·阿萨德为首的务实派复兴党人的不满，复兴党内部一场新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1967年战争后，复兴党内部分裂渐趋明朗化。复兴党内以贾迪德为核心，包括扎亚因、阿塔西等政治领导人为一派，以阿萨德、塔拉斯为首的军方领导人为另一派形成了政治、军事主张相左的两个阵营。表面上，两个阵营的政治、军事等分歧是军人与文职官员的政治纷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上的权力之争。实际上，两个阵营的出现并非复兴党内原有分歧的重现，而是复兴党内激进派日益失去人心，务实派影响上升的结果。事实上，两个阵营中都包括军人和文职官员。务实派军方领导人以阿萨德为核心，包括新任叙军总参谋长穆斯塔法·塔拉斯等人。两个阵营的分歧主要源于对"六·五"战争失败的认识以及对战后叙利亚对内对外政策主张的不同。

"六·五"战争后初期，民众的批评指向复兴党政权，而复兴党领导下的军队首当其冲。军方与政治领导人之间也相互指责对方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军方领导人国防部长阿萨德认为，政治领导人屡次对军队的清洗削弱了军队作战能力，因此，要求将军队置于优先地位，拒绝党对军队的一切干预，并要求军方在抵抗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方面握有绝对主导权。因为部分半军事化组织国民卫队及巴解组织中亲叙利亚组织时常不受军方的管辖，自行其是，特别是针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招致以军的报复。军方还希望与约旦、伊拉克等国结成东方阵线。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副总书记贾迪德和

总理扎亚因等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确保充分的准备解放我们被占领土”。阿萨德此后接受了发展经济确保战争胜利的主张,提出推行战时经济,既发展经济又增强军力。但是政治领导人对人民战争深信不疑,特别是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方面,复兴党领导人建立亲叙巴解组织,支持法塔赫,赞同给予巴解组织有行动自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贾迪德等人极力主张党领导军队,保持军队的政治纯洁性,反对与反动国家约旦等结成军事联盟,继续号召在阿拉伯世界开展阶级斗争。阿萨德对上述复兴党政治军事主张不以为然,提出旨在摆脱国内外孤立境地,团结阿拉伯国家加强军事地位的建议。这一建议要求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事务中采取温和立场,参加阿盟首脑会议。在内政方面,阿萨德提出扩大与非复兴党左派政治力量的合作,重建全国进步阵线,召回被清洗的非复兴党军官,增强军队的战术指挥能力。1968 年 9 月,第四次复兴党叙利亚地区代表大会召开,阿萨德等将上述建议作为政策纲领向大会提出。大会虽然拒绝了阿萨德提出的建议,但复兴党领导层受到基层代表的批评。大会之后,复兴党重组政府,扎亚因总理和外长马胡斯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虽然国家元首努尔·阿尔丁·阿塔西兼任总理,但阿萨德为首的军方官员有 6 人进入政府,包括塔拉斯等三位阿萨德的亲密助手,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等要职。代表大会之前,阿萨德已经控制了准军事部队国民卫队,已经招回了部分被清洗的军官。至此,阿萨德在军政部门的地位显著增强,党内两个阵营初步形成。

1969 年 2 月 25 日,以色列空军空袭大马士革附近村庄,阿萨德利用军事戒严之机,调动军队占领首都战略要地和广播电台,调换政府机关报——革命报和党报复兴报主编,释放政治犯。上述

行动被认为是阿萨德发动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复兴党政治领导人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军队反党武装叛乱,要求国防部长撤销行动命令。复兴党及政府官员多数支持政治领导人的立场,社会团体也在复兴党号召下声援政治领导人,反对军队干预政治。贾迪德阵营实际上仍然控制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政府部门以及社会民众团体。但是阿萨德军方阵营,在3月召开的第4次地区紧急代表大会之前和期间广泛开展活动,说服党内中上层干部。慑于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本次大会接受了阿萨德的政治军事主张,决定建立阿拉伯东方指挥部,缓和对所谓阿拉伯反动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代理人政府的舆论攻势,与国内其他进步力量团结合作,制定新的临时宪法。大会选举新的地区指挥部成员,两个阵营均有代表人物入选。但是这次会议决定设立9人政治局,决定9人政治局是叙利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虽然其成员分别来自地区指挥部和民族指挥部,但贾迪德却未能进入9人政治局,其核心成员是阿萨德、塔拉斯和阿塔西等人。这次大会成为党内两大阵营力量平衡的转折点,阿萨德务实派主张逐渐在党及政府中占据上风。通过新的临时宪法后,新政府成立。新政府包括共产党、社会主义联盟运动、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原胡拉尼社会主义者)等非复兴党左派政党。复兴党政治局在扩大党的合作基础的同时,还着力克服贾迪德推行激进政策在国内造成的孤立局面,特别是由于城镇居民恐惧复兴党严厉的国有化等政策,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宗教政治化的影响,广大民众对复兴党持怀疑和抵制态度。阿萨德等务实派关注城镇工商业者的利益,承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将重视私人工商业者的作用。尽管这一时期上述政策主张不可能完全实施,但是新政府的务实态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占总人口40%以上城市居

民的反政府态度。

在阿萨德等人的影响下，叙利亚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阿萨德力主建立东方阵线的努力得到伊拉克、约旦及埃及的响应。尽管各国彼此之间深怀疑虑，东方阵线只是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也从未采取过具体行动，但对叙利亚来说，它在外交上有重要意义。在面临以色列的军事压力下，东方阵线有助于加强叙利亚军事战略地位，有助于提高叙军的士气。在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方面，叙利亚展示了合作与友好姿态，与南也门互派大使，与科威特改善关系。科威特向叙提供少量经济发展援助。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方面，叙政府继续给予大力支持，赋予巴解游击队从戈兰高地出击以军的充分权力。但另一方面，巴解军事行动开始受到叙军方的制约，不再任其自由行动。10月，巴解在黎巴嫩与黎政府军发生军事冲突，叙政府关闭叙黎边界，在叙政府调解下，双方实现停火。叙政府在舆论上继续宣传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但是对以战略有所调整。尽管对政治解决叙以冲突不抱奢望，却也表示欢迎政治解决方案。对阿拉伯国家态度最大的转变是，叙利亚决定参加1969年12月拉巴特阿盟首脑会议。虽然叙利亚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获得财政援助——未能实现，但自1967年战争以来，沉寂多时的叙利亚外交活跃起来。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产油国发展关系的另一个目标之一是，争取石油美元援助。为此叙利亚邀请阿拉伯私营资本到叙利亚投资，并保证提供优惠条件和资本投资安全。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叙政府取消了对美、英、西德等国游客的禁令。在对以立场方面，叙利亚仍坚持强硬立场。1969年以来，特别是1970年上半年，叙以边界冲突时有发生。不过叙方对一些偶发事件也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克制态度。

1969年8月下旬,巴解组织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客机到大马士革,叙政府善待乘客中的两名以色列人,最终以交换叙方战俘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劫持飞机事件。1970年约旦爆发政府军镇压驻约旦巴解组织的所谓“黑9月事件”。关于叙利亚在“黑9月事件”中的举动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中外学者多有研究。普遍认为,叙方内部在干预“黑9月事件”上的意见分歧及其采取的不同措施,是导致叙利亚复兴党内部矛盾激化,并最终引发阿萨德发动政变的主要根源。然而从叙方干预及其后续影响的全过程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9月17日,约旦政府基于对巴解组织在约旦逐步扩展势力的担忧,借口巴解分支组织劫持民用客机,向安曼巴解游击队驻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血战持续一周,巴解向阿拉伯国家求援,但只有叙利亚出兵援助。出兵干预是包括阿萨德、塔拉斯在内的复兴党叙利亚地区指挥部的集体决定。身为国防部长的阿萨德亲自指挥了出兵干预的军事行动。军事干预从初期开始就将其地域范围严格控制在约旦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巴解游击队的目标也是力图在这里建立所谓“解放区”。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迫于压力,阿萨德作为国防部长下令撤军。在撤军过程中,由于没有实施空中掩护,地面部队遭受一定损失。有报道认为,阿萨德本人在整个过程中都对干预行动持反对态度,因而拒绝派遣空军支援,进而导致叙军干预的失败。从阿萨德本人所担任的国防部长和空军司令等军政要职来看,阿萨德的立场举足轻重。如果阿萨德坚持反对立场,军事干预就不大可能发生。而且国防部副部长塔拉斯作为阿萨德的亲密助手,自1967年战争后,一贯坚定地支持阿萨德。另外,从事后阿萨德对军事干预的评价看,他也不大可能完全反对这次军事行动。他认为这次军事行

动“是一次在阿拉伯民众中使复兴党的声誉越来越高的胜利”。至于为什么叙军地面部队失去空军的掩护，或许是军事上一个无法揭开的谜。但较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首先叙军的敌人以色列空军有强大的空中优势，在叙以双方严重的军事对峙背景下，叙军更多的是关注以军动向。以军长期以来侵扰叙以边界，1970 年上半年，双方空战时有发生。其次，国防部对形势的判断出现误差，误认为叙军的撤离迅速有效，当形势逆转时，已经延误了必要的军事部署。因此客观地判断，干预“黑 9 月事件”并不完全是复兴党党内两大阵营决裂的转折点，也不完全是阿萨德等人在 11 月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的直接根源。

1969 年 3 月复兴党第 4 次地区紧急代表大会之后，叙利亚实际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为背景的两个权力中心。两个阵营都希望消除这一不正常的政治状况。1970 年 9 月 28 日，纳赛尔病逝间接地促使阿萨德采取行动。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改变以往谨慎地推进阿拉伯统一的态度，立即与利比亚、苏丹等国签订实现统一的协议。作为泛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旗手，叙利亚在阿萨德等人的影响下，渴望加入该协议，即的黎波里协议。阿萨德的主张赢得叙利亚民众的欢迎，更得到埃及等国的支持，阿萨德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加强。但是复兴党内以贾迪德为首的激进派宣称，阿萨德一贯推行投降政策。由于党内矛盾加剧，努尔·阿尔丁·阿塔西被迫于 10 月 18 日辞去总理和国家元首职务。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2 日，复兴党召开第 10 次民族代表大会，与在叙利亚地区指挥部的地位不同，阿萨德等人在民族代表大会中成为少数派。大会在贾迪德等人把持下，指责阿萨德等军方领导人是造成两个权力中心的始作俑者，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导致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执

行，指控阿萨德等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失败主义反革命路线，并做出将阿萨德和塔拉斯等调离党政领导岗位的决定。这是阿萨德等人再次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因为自1966年2月23日政变后，复兴党民族指挥部领导机构已被剥夺任命党政高级官员的权力，地区指挥部握有党政一切权力，因而复兴党民族代表大会无权做出上述决定，阿萨德等人以此为由反对该决定，并于13至16日调动军队占领党政机关，逮捕贾迪德等党政高级官员，再次上演了一幕不流血的军事政变。这次政变是叙利亚自独立以来最后一次政变。尽管阿萨德本人及复兴党传媒一再宣称，这一次行动不是政变而是“我们党内一个正常发展的结果”，是一场“纠正运动”。然而，无论其性质如何，这次“政变”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新的转折点。在阿萨德的领导下，复兴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在复兴党的领导下，叙利亚国家政治乃至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迎来了长期、稳定与相对繁荣发展的历史时代。

五、一党制总统共和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1970年11月16日，不流血政变后第3天，阿萨德宣布一系列改革承诺。关于政治改革，以阿萨德为首的临时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宣布，将重建国民议会和全国进步阵线，将颁布新的宪法等。上述政治改革承诺，实际上启动了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建过程。1971年，首先恢复了国民议会，1972年新的全国进步阵线建立起来，1973年颁布新宪法。在重建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复兴党民

族指挥部和地区指挥部在临时指挥部的领导下也进行重大改组。上述举动被认为是"纠正运动"后续的主要内容。政变后不久，阿萨德首先被临时地区指挥部任命为总理。1971 年 3 月，阿萨德在全民公决中被选为总统。同时，复兴党修改 1969 年临时宪法，将总理内阁制改变为总统制。

1971 年 3 月，阿萨德当选总统伊始，便开始推行总统制。在 1973 年新宪法制定之前，以修改 1969 年临时宪法的方式推行总统制。1973 年新宪法颁布后，进一步确认了叙利亚为"总统共和制"政体。根据 1973 年宪法，总统有职有权，既统又治，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同时兼任军队最高统帅。总统享有任命副总统、政府总理(又称部长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府部长副部长、军队将领和法院法官等最高权力。总理辅佐总统行使权力，领导政府日常活动，实现政府职能，向总统负责。总统向议会，又称人民议会，提出法律议案，议会通过后，由总统宣布法律生效。议会在理论上可以以 2/3 的多数否决总统的法律议案，但总统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在议会休会以及特殊情况下，总统可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自行颁布法令。宪法修正案需经议会 3/4 多数赞成和总统的批准方可生效。总统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 7 年，可连选连任。惟一的候选人在复兴党地区指挥部的建议下由议会提名。1973 年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复兴党总书记必须与总统及总统候选人相统一，但全国进步阵线宪章则规定了"共和国总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是民族进步阵线的主席"的内容。事实上，作为复兴党总书记和全国进步阵线主席，阿萨德自 1971 年直到 2000 年 6 月病逝一直是历次总统选举的惟一候选人和当选人。这一现象表明，自 1963 年复兴党"三·八革命"以来党政合一体制仍在延续。然而，明显不同

的是，在总统共和制的新体制下，总统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明显加强，此前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及其9人主席团(也称9人政治局)等党的集体领导模式被突破，国家元首——共和国总统的作用显著上升。

叙利亚政治体制重建中另一项重大事件，是1971年2月建立新的国民议会，又称人民议会。复兴党临时委员会任命了这届议会及议员。1973年首次进行普举。此后根据宪法，除特别情况外，每4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1971年2月重建的人民议会类似于1965年复兴党建立的国民议会。被任命的议会议员来自复兴党领导机构、军队代表、工会领袖、农会等行业工会领导人、进步市民代表以及社会名流等。与1965年国民议会成员来源不同的是，这次任命的议会成员包括了酝酿中的全国进步阵线各党派代表以及宗教界的知名人士。1973年颁布的新宪法对人民议会的职能在理论上做出了规定，其职能包括：提名共和国总统人选，通过法律，讨论内阁政策，通过国家预算和发展计划；批准有关国家安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决定大赦、接受和批准议员的辞呈，撤销对内阁成员的信任等。然而，实际上人民议会自建立之初起就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际立法权，仅有一定程度上的监督作用。自建立以来，人民议会处于政治决策过程的边缘，虽然宪法承认人民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但它本身没有立法创议权，立法创议权依据宪法属于总统的职权范围。同时宪法赋予总统制约议会的权力。人民议会建立后，还从未否决过任何总统或政府提出的立法议案。人民议会议员在1990年前共195人。1972年全国进步阵线建立后，议会议员按比例在进入进步阵线的各党派之间分配，但具体分配人数在选举前临时确定。复兴党是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的党

派。复兴党代表来自党的领导机构，包括民族指挥部和地区指挥部，来自政府关键部门的党员领导成员。军队中的复兴党高级将领在党的指派下代表复兴党领导下的军队竞选议会议员。另外，受复兴党控制的党的外围组织及社会团体，如工会、农协、商会、妇女联合会等也按复兴党的旨意选派代表进入议会，因此在人民议会中，复兴党议员有广泛的代表性。全国进步阵线各党派议员人数众寡不一。未加入进步阵线的党派不得参加议员选举，但可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独立参选人政治经济背景较为复杂，他们不完全代表党派和社会团体。知名学者、律师以及宗教神职人员等非党派人士也可参加议会选举。在每一届议会选举中，独立人士的数量变动很大，这与国内政治形势和政治改革紧密相关。例如1973年选举时，国内政治稳定、氛围宽松，进入议会的议员中有1/3为独立参选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政治气氛日趋紧张，1981年选举时，没有一位独立人士进入议会。90年代初，国内政治改革呼声高涨，随着80年代末经济改革与调整的不断深入，国家在政治方面也做出调整，在扩大议会议员总席位的同时，独立人士进入议会的人数明显增加。独立人士参加议会选举活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叙利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活跃与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生态的基本动向。因为他们不仅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也反映出地域、行业、宗教以及知识界的政治诉求。尽管人民议会实质上是一个不具备立法实权的咨询机构，但阿萨德政府毕竟在名誉上恢复了制宪与立法体制，结束了自"三·八革命"以来实际上不存在立法体制的状况。

1972年，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全国进步阵线成立。全国进步阵线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协商机构。根据进步阵线章程，

它承认并接受复兴党的领导地位,"共和国总统、复兴党总书记是进步阵线的主席。"参加全国进步阵线的党派主要有:叙利亚共产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社会主义统一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党、阿拉伯社会党等左派政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作为政治协商机构,全国进步阵线的作用表现在,团结各方爱国进步力量、扩大复兴党的民众基础、稳定国内政局等方面。上述复兴党以外的党派在进步阵线建立前曾被邀请参与政府工作,全国进步阵线成立后,各党派通过进步阵线实现了参政议政的目的,消除了多年来党派纷争的局面,叙利亚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非复兴党党派均处于从属地位,接受复兴党领导和复兴党政治纲领和主张。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阿萨德执政后进行了改组。阿萨德本人于1970年和1971年分别开始担任复兴党叙利亚地区指挥部和阿拉伯民族指挥部总书记。1973年宪法规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因此,宪法确定了复兴党一党执政的地位,是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三·八革命"后,复兴党以党夺权,此后便以党治国。1973年宪法更是进一步确认了复兴党一党执政的地位。至此,叙利亚一党制总统共和制政体确立起来,并延续至今无任何变动。一党制总统共和制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党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阿萨德从70年代初期起直至2000年6月去世,始终是复兴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全国进步阵线主席。政府、军队要害部门的领导职位均由复兴党党员出任,甚至社会团体,如工会、商会、学生会、行业工会及高等院校领导人也均由党员出任。复兴党建立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直至城镇村社一级,党的各级组织监督各级

政府，参与中央至地方基层各级政府政治经济等决策，并向党的中央机构——地区指挥部负责。同时，复兴党直接掌握军、警、特等机构，设立情报、安全局等，对各级军队、政府以及社会团体、文化教育部门、宗教组织等进行严密监控。

阿萨德其人及其执政后的对内政策

哈非兹·阿萨德在60年代中后期两次政变中脱颖而出，最终登上叙利亚国家的权力顶峰。他自1971年3月当选总统后至2000年6月10日病逝，一直担任国家、军队、复兴党及全国进步阵线最高领导人，是叙利亚自建国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也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在位历时最长的政治元老之一。阿萨德总统执政前，叙利亚政局长期动荡不定，是中东最不稳定的国家。阿萨德上台后，充分发挥他的精明与才干，扭转局势，依靠复兴党的力量，牢牢地掌握住政权。从此，叙利亚逐步走上稳定和发展的轨道，在风云变幻的中东政治舞台上，阿萨德更是充分地展示了他极为睿智、稳健和果敢的外交才干，成为中东政治及世界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1930年10月3日，阿萨德出生在叙利亚西部拉塔基亚省卡尔达哈一个阿拉威派穆斯林农民家庭。他是家中长子，在卡尔达哈读完小学，进入拉塔基亚中学学习。1946年，阿萨德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法国殖民主义者逮捕，一直到叙利亚独立时才获释出狱。1952年，阿萨德入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后成为空军中尉。他以高超的飞行技巧受到广泛赞赏，并获得特技飞行冠军的称号。1958年阿萨德赴苏联学习空军夜战技术。1959年，叙利亚和埃及合并成立阿联后，

他任阿联空军中队长，同时担任了叙利亚军官秘密组织“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1961 年 9 月叙利亚退出阿联后，“军事委员会”成为复兴党内部一支日益重要的力量。后因反对叙利亚脱离阿联，阿萨德被免去军职，转入政府部门工作。1963 年 3 月 8 日，阿萨德作为核心成员之一参与策动所谓“三·八革命”。此后，他进入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出任大马士革空军基地司令。1964 年 3 月，他被选为复兴党地区指挥部领导成员，同年年底晋升少将，任空军司令。1966 年 2 月 23 日，阿萨德参与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副总书记萨拉赫·贾迪德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阿明·哈菲兹中将的政权。1967 年战争后，阿萨德与贾迪德因政治等分歧，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并多次发生公开斗争。最后在国防部副部长塔拉斯等人支持下，发动以“纠正运动”为名的不流血军事政变。

阿萨德当政后，首先改革、调整或恢复国家政权机构和国家政治体制，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扩大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政治基础，缓和复兴党与其他党派组织的政治矛盾。其次，阿萨德纠正过去几届政府采取的过激政策，废除戒严法，放宽对新闻及大众传媒的限制；制定新的宪法及其新的法律，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允许国民自由出入国境，取消公民在外国银行存款的限制；鼓励侨居国外的叙利亚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工作；赦免 1949 年以来一系列政变中流亡国外的政治家和其他政治犯；吸收其他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参加政府等。第三，阿萨德特别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由于叙利亚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由于叙利亚身处与以色列军事等对抗的前沿阵线，由于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在阿萨德的领导下，叙利亚建立起了一支拥有各种先进和重型武器装备的多军兵种的现代化军队，并亲自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阿萨德身材高大，脊背微驼，双肩下垂，前额宽阔，相貌和善，举止文雅。他从不发表过激的言论，他的讲话条理清晰，富有哲理。他既无逼人的锐气，更不露半点锋芒，虽有一双综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但根本不具有如同他的名字“狮子”（阿萨德一词阿拉伯语含义为“狮子”）般的威风。

阿萨德执政后，在大力推进“纠正运动”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和推进经济的发展。阿萨德实行比较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寻求外援，鼓励外国投资，国有化措施基本停止下来。外资投入增加，民族私营资本开始活跃，经济一度出现较大发展。1975 - 1979 年每年增长率 13.4%，纯国民收入增长 8.6%。同时通过增加在政府部门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对物价进行补贴等措施，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进而促进了政局的相对稳定。1973 年“十月战争”，叙利亚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联手，取得自阿以冲突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叙利亚恢复了被以色列占领的部分土地。阿萨德政府还着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打破了多年来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处境。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加之在军事上的胜利，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政权在国内统治基础显著加强，阿萨德的政治声望明显提高，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在国际舞台上，阿萨德以其稳健、睿智的外交手腕，周旋于风云变幻的中东及世界政治舞台之上。叙利亚并未追随埃及，驱逐苏联的政治军事势力，而是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关系，但并不受制于苏联中东乃至世界与美国争霸的政策。“十月战争”后，阿萨德调整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政策。在基辛格的调解下，收复部分失地，并成功地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叙利亚。阿萨德的务实外交政策，重新开启了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的大门，特别是与

阿拉伯温和派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的关系开始改善，获得了政治与经济支持和援助。从此，叙利亚在中东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阿萨德作为中东政治外交强人，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崭露头角。

80年代的社会动荡

1978年2月，阿萨德在全民投票中获胜首次连任总统。然而在此前后叙利亚社会开始出现不稳定迹象。其原因首先是长期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庞大以及70年代中期以来叙利亚越来越深地卷入黎巴嫩内战；其次，经济工作中的弊端及农业歉收等原因，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一度曾达到30%左右，贫富两极分化开始出现。在这一背景下，阶级矛盾与教派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各种矛盾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特别是广大民众对阿萨德任用亲信，党政军高级职位多为阿拉威派人士所把持甚为不满。1979年6月，60余名军方官员被暗杀，据报道其中多数是阿拉威派穆斯林。叙利亚官方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暗杀的幕后主使者。1982年2月，哈马地区逊尼派穆斯林发动叛乱，提出结束复兴党一党专政等要求。政府派重兵围剿20多天后，骚乱才得以平息。这是阿萨德执政1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反政府事件，被称为"哈马事件"或"哈马血案"。当时西方舆论报道，有2万多人在事件中被屠杀，哈马城被摧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次事件是150余名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的军方非阿拉威派军官发动的。策划阴谋活动的军官们，显然对1970年以来政府任人唯亲的政策不满，而广大哈马民众的参与则与70年代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怀有不满情绪。加之穆斯林兄弟会的鼓动，以及哈马地区原本就是一个

反对中央政府的中心区域，当条件适宜时，骚乱便顺势而发。这次事件引起阿萨德政府的高度警觉，当局深刻地认识到，其统治基础有可能发生动摇。政府开始执行严厉的政治统治手段，国内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为此叙利亚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专制警察国家”。

当国内政局出现动荡之时，阿萨德政权内部因阿萨德突发心脏病而引发权力之争。1983 年 11 月，阿萨德总统因长期劳累突发心脏病。尽管阿萨德的病情很快好转，但是他孱弱的病体刺激了阿萨德身边亲信之间对权力宝座的觊觎。阿萨德患病期间，其胞弟、叙军精锐部队总统卫戍旅司令里法特·阿萨德重新部署军队于大马士革市区内外的要害部位，甚至与其他部队发生军事摩擦。1984 年 4 月阿萨德总统恢复工作后，首先改组政府，同时破天荒地任命了 3 位副总统。名誉上，阿萨德的目的是减轻工作负担，但其真实意图是在可能的继任者之间实现权力制衡。里法特虽然被提升为副总统，但是明升暗降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里法特的职责是领导军队和国家安全事务，但是军队大权则牢牢地控制在阿萨德另一位亲密战友谢哈比将军的手中。同年 6 月，里法特以及其他两位在阿萨德患病期间被怀疑有不轨行为的将军阿里·海达尔（叙利亚特种兵总司令）和沙菲克·法耶德（第三装甲旅司令）作为军事代表团成员被派往莫斯科。当代表团返叙时，上述 3 人未被允许回国，转往欧洲其他国家。同年底，里法特最终返回国内，但总统卫戍部队被编入其他部队，里法特只负责安全事务，不再直接掌管军队。1985 年 1 月 5 日至 21 日，复兴党叙利亚地区指挥部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次大会调整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对党、政部门和群众组织的领导。2 月，阿萨德第二次连任总统。此前 1 月，阿萨德总统宣布大赦，部分被监禁的穆斯林兄弟

会成员出狱,部分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士返回国内。4月,阿萨德总统再次改组政府,至此一度失控的局势表面上被重新控制。然而1986年3月13日,大马士革又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事件中60余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国内形势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4月15日,叙利亚5个城市同时发生炸弹袭击事件。官方公布的数字为:死亡144人,伤149人。根据设在黎巴嫩的"黎巴嫩之声"电台的报道,伤亡人数高于叙官方的统计。该电台称,上述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是一个自称为"解放叙利亚人民十月运动"的组织所为。这一不太知名的组织带有浓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带有强烈的亲伊拉克倾向。

在国内政局动荡的同时,叙利亚经济出现危机迹象。80年代中期,因外汇短缺引发的经济危机日趋明显。为了应对经济不断恶化的局面,阿萨德总统于1987年11月大幅度改组政府。长期担任政府首脑的卡西姆总理因腐败和无能率全体内阁集体辞职。实际上在政府总辞职之前,卡西姆政府就不断遭到各方面的指责,有4位部长因工作不力已经在人民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中被迫辞职。11月1日,人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祖阿比被任命为政府总理,祖阿比新政府出现了15位新面孔。大幅度改组政府显示了阿萨德等国家领导人应对经济困境的决心。祖阿比政府不辱使命,通过渐进的调整与改革政策,经数年努力,经济形势改观,特别是以1991年5月"10号法令"为标志,叙利亚经济调整与改革又向更为广泛的经济对外开放转化,90年代初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经济形势的改善促进了国内政治的稳定,80年代以来不安定的政治形势也得以改善。

举步维艰的改革进程

80年代末，随着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推进和政治形势趋于稳定，国内形势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又对叙利亚形成了新的冲击。前苏联的解体，在阿以冲突中一向依靠苏联支持的叙利亚，失去了强有力的后盾。而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蜕变又对一向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叙利亚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大马士革街头，出现了打倒闪姆(叙利亚的古称和俗称)的齐奥塞斯库等口号和标语。一些要求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推行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主张出现在私下的议论和传单中。为此，阿萨德及其党和政府领导人不断重申并认为，叙利亚的社会主义是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它与东欧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叙利亚推行的是"民众社会主义"，它实现了政治多元主义，而全国进步阵线是叙利亚特色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最具体、最完整的体现。1990 年 5 月，新一届人民议会举行选举。这一届议会议席从原有的 195 席大幅度增加到 250 席。尽管复兴党人占据了 250 个议席中的 134 席，但从总的比例来看，复兴党人所占议席比 1986 年上一届议会议席有较明显下降，其比例从 66%下降至 54%。全国进步阵线中各党派在新一届议会中获得 32 席，其席位虽无明显增加，但独立候选人所获议席明显增加，达到 84 席。各选区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前所未有的 60%的高比率。选民投票踊跃反映出国家及政府在政治上的控制有所松动，民众的参政议政热情在升温。而独立人士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则主要是由于自 70 年代初期以来，私营经济不断发展，私人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

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而在政治上参政议政的企望值上升。国内政治气氛的日益活跃，对此国内外舆论普遍猜测，阿萨德总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政治自由化政策。1991 年 11 月，政府大赦 2814 名政治犯。1992 年 3 月，阿萨德在人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暗示，将来会有新的政党组织建立。上述新的政治动向，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将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印象。但是阿萨德严辞拒绝了按西方模式推进政治改革的设想，认为“外国的民主模式是与叙利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的”。6 月，祖阿比政府进行了新的改组，这次改组几乎完全保留了原内阁的主要成员，不过新政府坚持了推进经济改革的政策，经济形势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各方面引颈企盼的政治改革并未启动，甚至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控制。1994 年年初，阿萨德总统的长子和政治继承人巴希勒在车祸中丧生。为了加强统治地位，避免可能出现暂时的政治真空，阿萨德将 16 位高级党政军领导人调离原工作岗位。据此，舆论界认为，叙利亚政治自由化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在失去原苏联的支持，难以与以色列保持军事、政治“战略平衡”的背景下，稳健持重的阿萨德总统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巨大的变化，缺乏应变能力的祖阿比政府无力面对国内各项挑战。祖阿比政府尽管坚持经济改革政策，但是其改革措施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缺乏完整的改革方案。尽管总体上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台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因而不能有效地前后呼应、平衡推进经济的全面改革。更严重的是，叙利亚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官僚主义盛行，政府机构臃肿庞杂，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步伐，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是

遥不可及，以至于叙利亚被视为中东地区最封闭的国家之一。1996年，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塔基亚等城市连续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叙利亚官方则一再否认。约旦等媒体甚至报道，少数逊尼派军官策划了一次未遂政变。未遂政变并未得到证实。如若属实，这将是阿萨德执政25年来第一次未遂军事政变。自1995年以后，政府部长屡屡被更换。直至1998年年初，多年赋闲在家的副总统、阿萨德的胞弟里法特·阿萨德被解除副总统职务。里法特被解职在国际上引起一定的反响，西方媒体甚至借机炒作，但国内对此却反应平静。国内舆论认为里法特的去职是十分自然的事。里法特的去职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为权力交接铺平道路，但是政府部长，特别是主管经济、交通、电力等部门高级官员的频繁更迭，则反映出相关部门推进改革政策不力，未能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90年代后期，叙利亚经济又跌入低谷，至90年代末经济增长再度徘徊不前。重振经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需要大量的外来投资，但叙利亚国内经济立法严重滞后，金融和银行系统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国家对外汇的严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90年代中期以来，叙利亚社会不安定因素又开始上升，社会各界对国家和政府不能有效地扭转经济发展的颓势表现出不满。

1999年3月，阿萨德第4次连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阿萨德总统雄心勃勃地提出加大改革力度的口号，并在言语中流露出对政府工作的不满。2000年2月，阿萨德主持复兴党地区指挥机构成员会议，并在会上谈到两个重要问题：国内问题和与以色列和谈问题。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阿萨德表示，必须根据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及反腐败斗争之需要进行改革，以顺乎民意。3月7日，担

任总理长达13年之久的祖阿比总理辞职,13日以米罗为新总理的新政府名单正式公布。米罗新政府的组成,是阿萨德以改组求改革以推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新举措。不过人们也发现,新政府成员名单中保留了原政府中大部分主要部门的部长。现任外长沙雷、国防部长塔拉斯等人依然留任,这意味着叙利亚将仍然以谨慎稳健的姿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在短期内叙利亚的国内外政策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阿萨德的政治遗产

2000年6月10日,中东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雄狮阿萨德溘然长逝。作为20世纪叙利亚最著名的政治领袖人物,在近30年的执政生涯中,阿萨德竭尽全力致力于叙利亚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进步。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叙利亚国家基本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在积极推进国家繁荣与进步的同时,阿萨德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其精明老道的外交策略活跃于中东国际舞台,使叙利亚在中东地区树立起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形象。特别是在叙利亚与以色列数十年的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抗中,阿萨德表现出坚忍不拔、但又不失灵活的外交强人的风范,在阿以冲突以及阿以和平进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积极作用,是继埃及之后以色列最为棘手的对手,在阿拉伯世界和广大民众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树立起中东政治雄狮的牢固形象。正当叙利亚国家和人民迎接新的世纪之时,阿萨德的去世无疑是叙利亚国家的巨大损失。

自1983年11月阿萨德第一次突发心脏病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受到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关注。同时,围绕阿萨德继承人问题的种种猜测也持续不断。1994年1月,国内外普遍认定的继

承人，阿萨德的长子巴希勒在车祸中身亡。一夜之间叙利亚国家最高权力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接，引起国内各界的普遍忧虑和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正当人们为此议论纷纷时，阿萨德的次子巴沙尔中断在英国的学业，应召回国。经数年精心培养，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甚至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渴望成为一名牙科医生的青年学子巴沙尔，在政治上日趋成熟，逐渐成为叙利亚政坛上一颗政治新星。尽管阿萨德本人到去世为止，以及复兴党和国家领导机构从未正式宣布巴沙尔将是最高权力的继承人，但人们普遍认为，巴沙尔在阿萨德的数年苦心栽培下已是确定无疑的接班人。

90年代中期以来，疾病缠身的阿萨德总统已明显显露出垂暮之年的老态形象。1999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相继去世后，各方人士对阿萨德的健康状况发表各种猜测。阿萨德本人或许也感受到选择接班人的紧迫性。观察家们注意到，仅仅担任全国进步阵线副主席的巴沙尔，在国内各项重大国务活动中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米罗新政府酝酿和组建过程中，巴沙尔向阿萨德推荐了不少人选，特别是一些老臣的留任与巴沙尔的推荐有直接关系。据舆论认定，巴沙尔对新政府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就在祖阿比政府辞职当晚，巴沙尔接受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报《生活报》的采访。他表示，国家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变化的时候了，“不仅是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某些传统和习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包括经济、信息、教育体制、技术等所有领域需要变化，而且叙利亚与世界的关系也需要变化。”在谈到他的政治前途时，巴沙尔表示，他的未来取决于个人的准备和复兴党的决定，他将时刻准备响应人民的需要。实际上巴沙尔的上述表述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将接过国家最高领导的权杖。阿萨德去世后，

全国进步阵线立即将巴沙尔推上主席的职位。数日后，人民议会修改宪法，将担任总统的年龄从 40 周岁放宽至 35 岁，巴沙尔顺利登上权力的顶峰，担任总统。至此，长达 30 年的阿萨德时代宣告结束。

第九章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对外关系

一、维护国家独立与反美联苏的对外政策

独立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1946年4月17日，英、法占领军正式撤出叙利亚，叙利亚获得彻底独立。此前，于1943年12月叙利亚已正式宣告独立，由于英法两国当时均不打算撤出驻扎在叙利亚的占领军，致使叙利亚获得彻底独立又延迟了两年零4个月。但是，1943年12月正式宣告独立后，叙利亚民族主义政府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争取彻底独立的民族斗争；另一方面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积极参加国际事务。1944年，叙利亚的独立先后得到苏联和美国的承认。1945年2月27日，叙利亚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资格对轴心国宣战，并积极争取参加筹组中的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会议上，叙利亚参加建立联合国的活动虽然遭到英、法两国的极力阻挠，但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在美、苏两国的支持下，叙利亚的代表资格获得承认，并最终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

叙利亚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祥地之一。叙利亚的阿拉

伯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自诩叙利亚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长久以来,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与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共有的愿望是建立统一的“大阿拉伯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西方列强对奥斯曼遗产的瓜分,使建立“大阿拉伯国家”的希望彻底破灭。但是,叙利亚等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也有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愿望,但是这种统一的思想和愿望往往与统治者个人或家族的扩张欲望交织在一起。二战爆发后,德、意轴心国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希望取得独立和统一的心理,拉拢和煽动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英国等出于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动机,安抚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宣称支持阿拉伯统一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与英国关系密切的伊拉克和外约旦分别提出两个统一方案,即所谓“大叙利亚”计划。这两个方案都主张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组成一个“大叙利亚”,然后再与伊拉克联合组成一个“阿拉伯联盟”,其他国家可以加入这一联盟。不同的是,伊拉克的方案认为,这个联盟应由伊拉克领导,而外约旦的方案则认为,它的国王阿卜杜拉应该掌握联盟的最高权力。由于当时伊拉克和外约旦的统治者都属于哈希姆家族,因此这两个方案被认为是哈希姆家族扩大自身势力的计划,因而受到叙利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对叙利亚来说,首先,经过20余年争得的独立地位来之不易,建立“大叙利亚”国家必将失去独立主权的地位。其次,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都主张实行共和制,反对君主制,因而哈希姆家族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受到叙利亚广大民族主义者及其民众的一致反对。然而,广大阿拉伯国家抵制“大叙利亚”计划的同时,也在探索新的实现统一的途径。但

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其各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要想很快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纳入到一个政府的领导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各国倾向于先建立一个尊重各国独立和主权的、松散的国家联盟。1944 年 10 月,埃及、叙利亚等 7 个国家代表在埃及经两周协商讨论后,发表了《亚历山大议定书》,决定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自愿参加,接受联盟决议的约束,在外交政策等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在议定书的基础上,各国代表又制定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1945 年 3 月 22 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 7 国外长在开罗正式签署该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盟,但它却是当代国际社会中最早出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之一,并对此后近半个世纪的中东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叙利亚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资格积极参与了阿盟的创立过程,显示了叙利亚独立后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姿态,并在此后阿盟的一系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中东战争

叙利亚获得彻底独立后不久,就立即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中东国际局势,其中最突出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问题更是日益复杂化。英国政府无力控制局势,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于 1947 年 4 月宣布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联合国 181 号决议。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对分治方案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联合国无

权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声称对分治决议“将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正在开罗举行会议的阿盟 7 国总理和外长发表声明，认为分治决议“违背了公理和正义原则以及民族自决原则”，表示阿拉伯国家“决心为反对这个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叙利亚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和阿盟重要会员国，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并在联合国和阿盟等国际组织中积极活动，反对该决议的实施。分治决议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后，大马士革等叙利亚城市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甚至出现暴力活动。叙利亚反对分治决议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叙利亚民族政府及其民族主义者把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视为阿拉伯世界获得彻底解放运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对美英等新老殖民主义者干涉阿拉伯事务，尤其反对西方列强在巴勒斯坦扶持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其次，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及其广大民众历来把巴勒斯坦视为叙利亚“天然的南部疆域”，任何时候获得独立的巴勒斯坦必将成为大叙利亚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一战后，殖民主义人为地把黎巴嫩和亚历山大勒塔(今土耳其伊斯埃德伦)从“天然的叙利亚”分割出去后，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决不能容忍天然的叙利亚再次被分割。当美国及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把犹太人国家强加在巴勒斯坦时，叙利亚人的民族情绪更为激烈。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国高级专员和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巴勒斯坦的当天下午，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领导人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宣告以色列犹太国家诞生。翌日，叙利亚等 5 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对以色列犹太国家发起“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阿拉伯方面占居优势，总兵力达成 4.2 万人，其中叙利亚

出兵5000余人。阿拉伯国家军队从东北南三个方面进攻以色列。叙利亚军队与黎巴嫩穆斯林志愿者武装从北部进入巴勒斯坦,并占领加利利地区。但是,阿拉伯国家各怀异志,军事行动难以协同一致;而以色列则万众一心,殊死抵抗。与此同时,以色列展开外交攻势,全力争取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援助,甚至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的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以色列通过美、苏、英等国在联合国安排下实现了两次停火,以色列得到了喘息时间,赢得了“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的时机,从而聚集起强大的力量,一举扭转了战争局势;而阿拉伯阵营此时却陷入了争吵和分裂之中,以色列趁机对阿方军队实行各个击破。10月底,以色列把加利利地区的叙利亚军队驱逐出境。战场上的失败迫使阿方同意停战,并于1949年分别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停战谈判于1949年4月12日开始。叙利亚提出的保留叙方占领的三小块地区的建议遭到以方拒绝,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来在代理调解专员提出折中方案,建议叙以之间建立非军事区,由联合国监督,双方最终于7月20日签订停战协定。叙利亚是最后一个与以色列签署停战协定的阿拉伯国家,至此第一次中东战争以阿拉伯国家失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

美、英干涉叙利亚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叙利亚虽然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土,但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影响到国内政局的稳定。叙国内政客及军队将领们开始相互指责对方造成战争的失败,军队开始干预政治,加之其他因素,国内政局开始动荡。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与美、英两国的矛

盾激化。阿拉伯人认为,是美国和英国造成了巴勒斯坦的悲剧。叙利亚人民对美、英两国极度愤慨。但美、英出于各自的战略目的,并不愿放弃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而美、英之间也产生了利益冲突,美国尤其想把英国排挤出中东地区。美、英把叙利亚作为它们争夺的对象之一,趁叙利亚政局动荡之机于1949年连续策划了三次政变,严重干涉了叙利亚内政。

1949年3月30日,叙军总参谋长扎伊姆上校发动第一次政变。其背景是叙利亚政府与美国协商美国公司在叙利亚敷设输入油管道。叙政府的举动遭到民众及议会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受到英国的指责,美国政府便在幕后策划这次政变。英国对此并不甘心,时隔数月,支持亲英派军人兴纳维发动第二次政变,推翻扎伊姆政权,处决扎伊姆及内阁总理。然而不甘失败的美国政府于12月19日,支持施舍克里再次发动第三次政变。这使得本已动荡不定的叙利亚政局更加严峻。三次政变尽管有其国内政治矛盾的背景,美、英两国的干涉及插手无疑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于对叙利亚独立初期初步形成的议会民主政体受到严重冲击并发生逆转。

然而,叙利亚的对外政策在50年代始终坚持反美立场,并未因政府频繁更迭而发生明显转变。在50年代中期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叙利亚积极支持纳赛尔政府,并逐步与苏联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1957年当艾森豪威尔主义正式出笼时,叙利亚断然拒绝。50年代叙利亚上述政策与中东国际局势及叙利亚国内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阿以矛盾的加深,叙利亚民众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50年代以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新左派政治力量影响力上升,叙利亚政府中亲美派势力失势,而在50年代中期后,随

着苏联逐步进入中东，叙利亚在对外政策及关系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联系，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逐步深入。另一方面，随着纳赛尔主义及纳赛尔本人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以及叙埃共同的反美立场，叙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直至 1958 年，叙利亚和埃及合并，共同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

反对美英筹组中东军事联盟

战后，美国和英国在中东地区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中东各族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是苏联企图进入中东。美、英企图利用亲西方政权，在中东建立区域性军事—政治集团，以应对这两个挑战。

1950 年 5 月，英、美、法三国外长在伦敦开会，协调中东政策，决定建立中东军事联盟——中东司令部。拟议中的中东司令部，不仅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而且还将邀请远在千里之外、与中东毫不相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种族主义国家南非联邦(今南非共和国)参加。这一军事集团的目的实际上只针对所谓“外来侵略”的危险——即“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威胁”。这一明显侵犯中东国家主权和独立的中东军事联盟计划一宣布，立即遭到中东各国人民的反对。当时的叙利亚政府曾不顾人民的意愿，同意参加中东司令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很快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最终放弃了参加中东司令部的计划。中东司令部的计划在中东国家反对下夭折后，美、英两国并不死心，继续策划新的军事集团。1952 年 10 月，又拟订了一个所谓“中东防务组织”的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改换了名称，但它是中东司令部

的翻版。这个正在幕后策划的中东军事联盟,还没有正式出笼,就立即遭到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国家的一致反对。由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敢于公开支持这一计划,该计划落得个胎死腹中的命运。

50年代以来,中东各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伊朗的大规模石油国有化运动和埃及1951年废除1936年奴役性英埃同盟条约,特别是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7·23革命"。上述民族运动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曾因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而受到挫折)逐渐恢复和不断扩大。这一现象再次引起美、英两国的关注。在所谓"区域防御"名义下几度筹组军事联盟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准备采取迂回策略,利用中东外部的力量,用双边军事协定方式来拼凑新的中东军事联盟,起初该联盟称为"北层联盟"。在"北层联盟"筹划和推进过程中,1954年4月2日首先在美英撮合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缔结了《促进共同合作条约》,4月21日美国与伊拉克签订军事援助协定。随后1954年夏和1995年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总理先后赴中东各国游说。经美、英政府施压,伊拉克和土耳其于1955年2月24日缔结互助合作公约,这一条约通常被称作巴格达条约。伊土巴格达条约为"北层军事联盟"铺平了道路。同年4月5日、9月23日英国和巴基斯坦加入该条约。在美国的种种压力下,伊朗于11月3日宣布加入。11月22日,参加条约的国家在巴格达举行第一次理事会,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东"北层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正式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的重要目的是,遏制苏联势力进入地中海和

中东，在中东与苏联毗邻的中东北部国家中，组成一道防止"共产主义威胁"的篱笆。巴格达条约组织虽然是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但中东国家人民对美英等新老殖民主义者玩弄的建立军事集团以便控制中东的伎俩并不陌生，他们十分珍视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特别是在5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巴格达条约组织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遭到中东各国人民的反对，多数中东国家政府都对它持抵制或反对态度。

巴格达条约的签订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是战后继美国支持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犹太国之后，在中东出现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它对当时已经形成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和中东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叙利亚对巴格达条约及其组织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并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积极配合反击美英违背广大中东各国人民意愿的行动。1955年3月3日，在纳赛尔的积极活动下，叙利亚与埃及签订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协定》，并发表公报表示：不参加巴格达条约或任何其他相类似的军事联盟；建立阿拉伯国家的防务和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司令部，其成员在未征得同意时，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双边经济、政治和军事协定。3月5日，沙特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埃及和叙利亚的立场。美国深怕埃、叙、沙等国的态度会破坏它的计划，在用经济和军事援助诱使埃及改变立场的同时，3月14日美国大使向叙政府递交一份照会，粗暴地要求叙政府放弃反对巴格达条约的立场，并威胁说，如果叙利亚拒绝参加巴格达条约，将会给它带来"不利影响"。英国也曾胁迫叙利亚加入巴格达条约，叙利亚政府并未屈服于压力。美国转而唆使土耳其曼德列斯政府向叙利亚施压，调遣军队在叙利亚边界举行军事演习。美国第六舰队进抵黎巴嫩、叙利亚沿海

炫耀武力。美国及土耳其的军事威胁，在叙利亚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应，各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学生和工人举行了连续不断的示威游行，爆发了强烈的反美浪潮。

1956年3月6－12日，叙利亚总统、沙特国王在开罗与纳赛尔专门讨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的问题。会后发表了“不参加外国军事条约”的声明。声明强调，三国首脑“决心保障阿拉伯世界不受冷战的毒害，而是使阿拉伯世界置于冷战的各种潮流之外，并且对国际冲突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巴格达条约组织“是为牺牲阿拉伯国家利益和愿望、并且破坏阿拉伯国家团结的大国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巴格达条约组织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在中东阿拉伯国家陷于孤立状态，而主谋者——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中也越来越孤立，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对的对象。巴格达条约组织策划者们完全没有预料到阿拉伯世界反对该条约组织的立场如此坚定。更加事与愿违的是，作为围堵苏联势力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极大地刺激了苏联。苏联迅速改变以往在中东地区“守株待兔”的政策，采取了进攻性战略。苏联的第一个重大的反击措施是，在1955年利用美、英拒绝向埃及提供武器的机会，以极其慷慨的条件与埃及达成了军火贸易协定，不久又与叙利亚签订同样的协定，在打破西方控制中东武器供应垄断地位的同时，苏联势力开始全面进入中东，并逐渐站稳脚跟，与美国在中东形成了对抗争夺的局面。

叙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美、英的争夺，叙利亚在1949年连

续发生3次政变,1951年再次发生政变。这4次政变后,叙利亚政局陷入长期动荡之中,而政变后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1954年2月阿塔西政府组成后,在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执行和平中立的政策,以及反对参加西方策划的军事联盟、拒绝与美英签订任何政治和军事性条约的同时,主张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此时正值苏联意欲进入中东之时,苏联在与埃及发展关系的同时,也表示愿意与叙利亚建立关系,特别是也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提供军事等援助。之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1955年7月,叙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是战后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第一个中东阿拉伯国家议会代表团。11月,两国政府决定将双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1956年6月22日,苏联外长访问叙利亚,与叙利亚领导人举行会谈。不久,两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叙利亚是第二个接受苏联军援的阿拉伯国家。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对叙利亚进行回访。在英、法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东局势极度紧张时,苏联邀请叙利亚总统于11月初访苏,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据事后透露,苏联向叙方作出提供所需防御武器的保证。

1957年中东形势的发展进一步促使叙利亚向苏联靠拢。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关于美国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称,中东国家面临"来自共产主义方面的危险",要求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保卫"中东,向中东国家提供"援助",要"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当这一被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计划出笼时立即遭到中东绝大数国家的反对。1月10日,叙利亚政府发明声明,措辞激烈地指出:"保卫中东的和平纯粹是中东地区人民的责任"。叙利亚坚决拒绝这样的

论据:“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使得它们有权干预这个地区的事务以保障这些利益”。同时驳斥了艾森豪威尔关于中东地区的“势力真空”的论点。叙利亚政府的态度,使美国“强烈怀疑共产党已控制了(叙利亚)政府”,认为“必须防患于未然”,否则将“危及美国”。8、9月间,美国再次唆使土耳其,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并保证提供武器。在美国的唆使下,土耳其在叙边界集结兵力,向叙利亚施加军事压力。苏联利用这一机会,在外交上极力支持叙利亚政府的立场,并向土耳其政府发出警告:“如果土耳其参加侵略,苏联决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支持叙利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苏外长为此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如果土耳其破坏叙利亚边境和平,联合国应立即给叙利亚必要的武装援助以制止侵略。”“在土耳其对叙利亚进攻的情况下,苏联准备派自己的武装部队前去参加镇压侵略和惩罚和平的破坏者”。后在阿拉伯联盟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下,土耳其从边境撤军,美土军事威胁破产。叙利亚与苏联靠拢还表现在双方经济等领域的合作。1957年7月,叙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讨论经济合作问题。10月28日,两国签订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在7年内帮助叙利亚修建水电站和灌溉系统,勘察石油和矿物资源,以及勘察铁路线等。整个投资估计为20亿叙镑(约5.3亿美元)。同时苏联决定向叙利亚提供6亿叙镑(约1.6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年息2.5%),这是苏联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第一笔金额最大的经济援助。

1958年后,叙苏关系发展出现困难。原因是叙利亚与埃及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东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阿拉伯统一复兴运动,一部分阿拉伯

民族解放领导人认为,阿拉伯人只有统一和团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能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资源财富,才能发展民族经济,改变阿拉伯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和任人宰割的局面。阿联的成立是这一思想和主张的具体体现。然而,苏联认为,泛阿拉伯主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动思潮,历史上各种反动势力曾利用泛阿拉伯主义来维护阿拉伯封建制度和殖民主义的统治,阻碍了阿拉伯社会的进步。美、英在战后就不断设法利用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策划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苏联尤其关注其境内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与穆斯林世界保持联系,避免受到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因此,苏联一贯对阿拉伯统一行动和言论持反对态度。1958 年 2 月,叙利亚与埃及宣布合并成立阿联,并准备“邀请”伊拉克加入。苏联对此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和不满。另外,苏联与叙利亚近几年关系发展顺利,双边关系友好,但阿联的建立妨碍了苏联在叙利亚建立长期影响的努力,威胁到苏联势力在叙利亚的存在。苏联与埃及因苏方指责泛阿拉伯统一运动是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势力奴役人民和镇压进步力量的工具,致使双边关系恶化。阿联成立后,埃及反对苏联继续在叙利亚的援建计划。由于纳赛尔等人掌握着阿联的最高权力,叙利亚作为阿联的一个地区,无法与苏联顺利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但叙利亚地区领导人仍希望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希望苏联恢复对叙的援助。1958 年 9 月,阿联政府拟订“叙利亚地区 1958 - 1968 年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在执行中发生困难。经过谈判,叙、苏于 1960 年 9 月签订了新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议定书,恢复了原来的经济援助,并对原有的协定内容作了修改。新协定的主要

援建项目有化肥厂、炼油和石化工业、石油勘察、修建铁路，以及设计幼发拉底河水利资源开发工程等。

走向“阿联”

1958年初，叙利亚与埃及合并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50年代叙利亚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东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建立阿联既有长久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不断追求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内在动因，更有国际政治不断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外在客观因素。在50年代后期这一特定时期建立阿联则更直接的因素是中东国际政治的变化。

1957年1月，“艾森豪威主义”出笼时，遭到叙利亚、埃及等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严辞拒绝。8月至10月，美国为迫使叙利亚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和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策划颠覆叙利亚政权的阴谋。阴谋被揭穿后，激起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反对，埃及和沙特表示全力支持叙利亚。叙政府撤换了一批亲美军官，并驱逐3名美外交官。美国为此对叙实施报复，命令第6舰队再次驶往东地中海，美国空军也奉命处于戒备状态。在美国的唆使下，土耳其在土叙边界集结重兵，土空军飞机不断侵犯叙领空。10月，埃及根据埃叙共同防务协定，派出5000人的军队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登陆，以支持叙利亚反击土耳其的军事威胁。在阿盟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下，土耳其被迫撤军。由于美国的颠覆阴谋和叙、土双方的军事政治对抗，叙国内要求同埃及合并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在纳赛尔的极力促使下，在叙利亚总统库阿特里的积极配合下，在复兴党等左派民族主义政党的大力推动下，叙埃两国实现合并。阿联的成立暂时缓和了叙利亚国内国际困难，但仓促的联合，

结果并不理想。两个地理位置分开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各异，加之一些政策的执行没有考虑到叙利亚的特定条件，引起叙利亚不同阶层和集团的不满。1961年9月，叙利亚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宣布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及政府及纳赛尔本人对此极为不满，并曾派军队阻止，但未获成功。至此，叙埃关系彻底破裂，直至60年代中期双边紧张关系才逐渐缓解。

二、叙利亚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阿以冲突的激化

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中东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战争使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大片土地，从此阿以冲突成为中东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是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不断加剧所致。进入60年代后，美国为了扭转50年代在中东节节失利的局面，支持和武装以色列，利用以色列来打击埃及和叙利亚等亲苏国家，遏制以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削弱苏联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正是美、苏的激烈争夺，构成了“六·五”战争爆发的国际根源。另一方面，60年代阿以冲突不断激化，特别是60年代中期后，阿以争端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

进入60年代后，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立和开展反以武装斗争，阿以冲突日趋尖锐化。1964年5月28日，在阿盟的支持下，来自各地的巴勒斯坦各界代表在耶路撒冷旧城召开第一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宣布成立领导抵抗运动的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同年9月，在埃及召开的第一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阿拉伯国家将通过阿盟向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力量提供财政援助。此后，巴解力量日益壮大，并以阿拉伯前线国家为基地，打击以色列。另一方面，自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在积极扩军备战。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一直把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不断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削弱以色列。以色列为了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打击阿拉伯国家和摆脱国内困境，也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从1965年起，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前线国家与以色列军事对峙不断加剧，冲突日趋升级。

面对战争威胁，埃及和叙利亚重修旧好，于1966年10月互派大使。11月4日，两国政府签订共同防御协定。1967年春，以色列同叙利亚之间的军事冲突日渐增多。4月7日，以色列蓄意挑起事端，派人员进入叙以非军事区强行耕种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结果引起叙以双方武装冲突。以军出动大量飞机扫射叙军阵地，并在空战中重创叙空军。叙以空战后，全面战争爆发的迹象日益明显。5月11日，以总理艾希科尔挑衅地宣称："以军将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进攻叙利亚"。为了威慑以色列，减轻叙利亚的压力，埃及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并于16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7日，叙利亚也宣布其军队已作了总动员。22日埃及政府关闭蒂朗海峡，封锁亚喀巴湾，禁止以色列船只和为以色列运送战略物资的外国船只通行。埃及的举动使阿以对抗骤然紧张起来。翌日，以总理艾希科尔声称，封锁亚喀巴湾是"对以色列的侵略"。当日，以色列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

在美苏频频施压和联合国寻求外交努力的情况下，埃及、叙利

亚等阿拉伯国家放松戒备;而以色列则在一系列外交活动掩护下,完成了发动战争的最后准备。6月1日,以情报部长先后同美国中情局长和国防部长密谋后,报告以政府称,美国已默认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6月2日,艾希科尔收到美总统信函。尽管信中仍然告诫以色列不要单独行动,但同时信中也表示,“以色列应采取的行动取决于自己”。以政府摸清美国已经“默许”它采取军事行动,看出苏联色厉内荏,而埃及、叙利亚等国已放松了戒备,便于6月3日批准了进攻计划。次日,以内阁会议经7个小时的讨论后,决定开战。

“六·五”战争及其结果

6月5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全面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基地及其他设施。

在开战的头一天,以色列摧毁了埃、叙、约三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从而使“六·五”战争的大局已定。掌握制空权后,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分北、中、南三路开始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8日,整个西奈半岛随之陷落。当晚,埃及和以色列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停火决议。在突袭埃及并占领西奈半岛的同时,以军还向约旦河西岸地区展开进攻。7日,以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旧城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下午8时,约旦和以色列双方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

以色列在基本实现对埃及和约旦的作战目标后,于9日上午集中兵力向叙利亚戈兰高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以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戈兰高地,并以戈兰高地北部为主攻目标。北路以军由“戈兰尼”步兵旅和西奈战场调来的一个装甲旅担任主攻。9日下午叙利亚扎乌拉和卡拉两镇被以军曼德勒旅攻占,10日上午以军向叙

利亚戈兰高地首府库奈特拉进军。“戈兰尼”旅攻下叙军重要阵地提尔法尔后，又于10日上午进攻戈兰高地重镇巴尼亚斯，并向谢赫山南坡的艾因菲特和马萨达推进。以军5日上午摧毁叙空军后，其地面进攻主要集中在埃及和约旦方面。9日上午之前，叙以之间地面战尚未打响。9日上午后，在打垮埃及和约旦的地面部队后，以军调头主攻叙利亚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平均海拔1000米，俯瞰以色列加利利平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叙军为此拼死抵抗。由于以军的强大攻势，9日下午叙开始退却。10日，叙军指挥部误发信息，称戈兰高地已失守，正在前线作战的部队认为已陷入包围，故慌忙后撤；而以军在新的增援部队配合下大举推进，特别是北路以军成弧形攻势对戈兰高地实施包围，10日下午占领戈兰高地首府库奈特拉和谢赫山的一些战略据点。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通过阿以停火协议，规定于当天下午18时30分生效。以色列抢在停火时间之前，攻占包括库奈特拉城等戈兰高地许多重要战略目标。6月11日，叙利亚与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

第三次中东战争历时6天，也称“六天战争”或“六·五”战争。战争中，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遭受重大损失，共阵亡4296人，负伤6121人，被俘和失踪7550人，损失坦克9652辆、飞机429架；以色列仅阵亡983人，伤4517人，被俘和失踪15人，损失坦克394辆、飞机40架。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1200平方公里）以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总面积达81600平方公里，是其原有面积的4倍。

“六·五”战争的影响

战争结束后,美苏为了维护各自在中东的利益,进行了紧张的活动,竭力争取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导权。实际上在战前及战争期间,美苏两国从未停止过干预行动。战前,美苏两国都曾向埃及施压,阻止阿方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在战前向以色列运交大量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美国第 6 舰队出动飞机保护以色列领空,掩护以军地面作战等。美国的行动激怒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集体决定对美实行石油禁运。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相继与美国断交。苏联对战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惧怕卷入战争后与美国迎头相撞,对阿方要求提供武器装备的要求敷衍推诿。苏联的步步退缩和袖手旁观,使得以色列敢于放手大干。不仅如此,苏联还同美国合伙策划阿以停火,并保持频繁的“热线”联系。美苏两国在安理会先后两次操纵通过各自提出的“立即实现停火”和“限期停火”的决议。阿拉伯国家在遭受严重损失、丧失大片土地的情况下,被迫无条件接受停火。

为了平息阿拉伯国家的不满情绪,苏联于 6 月 10 日与以色列断交。13 日,在苏联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苏联代表提出一项谴责以色列侵略,并要求它从停火线一侧后撤的议案,但遭美国否决。15 日联大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期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等出访埃及,表示愿意帮助它克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挽回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六·五”战争后的一年里苏联向埃及、叙利亚等提供了 17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 1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为了挽回因支持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日益下降的声誉,积极采取行动,以安抚阿拉伯人。6 月 19 日,美

总统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建议”。该建议没有明确提及以色列撤军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等关键性问题。不过建议内容也有一些积极因素,后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的蓝本。1967 年 9 月,第 22 届联大开会期间,中东问题被列为优先讨论的问题。由于各方意见分歧太大,安理会始终没有通过有关提案。在此情况下,英国代表主张通过“私下磋商”解决中东问题,并在“五点建议”基础上提出折中方案。几经磋商后,安理会于 11 月 22 日表决通过提案,即安理会 242 号决议。决议的内容是:强调不容许以战争获取领土和必须致力于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军队撤出中东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终止一切好战言论和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不受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保证该地区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公正解决难民问题。

242 号决议既照顾到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军的强烈愿望,又照顾到以色列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其生存权利,具有积极意义,并成为此后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但是它也有严重的缺陷,如没有明确要求以色列撤出“六·五”战争中占领的土地,致使以色列得以长期霸占“被占领土”,其中包括戈兰高地。由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模棱两可,使得阿以双方各执己见,未能真正找到一项为各方所接受的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办法。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叙利亚当时拒绝接受该决议。

“六·五”战争给阿拉伯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整个民族背负了极大的屈辱。但是,这次战争也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增强了反以斗争的力量和信心。战争刚一结束,13 个阿拉伯国家外长就于 6 月 17 日至 18 日汇集

科威特商讨制订共同战略。8月29日至9月1日，阿拉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会议。会议消除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些分歧；埃及、叙利亚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财政援助。会议一致确定了对以"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不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叙利亚当时因与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沙特等关系紧张，以不与封建反动政府为伍为理由，抵制了喀土穆阿盟首脑会议，但接受了对以"三不政策"，并与多数阿拉伯国家在此后20余年中始终坚持这一强硬的不妥协立场，直到90年代初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后，叙利亚这一立场才开始松动。"六·五"战争是阿以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失败的屈辱，促使阿拉伯民族团结一致，决心以武力夺取失地、恢复民族尊严。从此，阿以矛盾更加激化了。

三、70年代中东国际事务中的叙利亚

"十月战争"

1970年11月16日，叙利亚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哈菲兹·阿萨德登台执政。阿萨德上台后，在国内大力推进"纠正运动"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上作出调整，并开始积极参与中东国际事务。此后的30年中，在这位近代以来最强有力的领导人领导下，叙利亚逐步崛起为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外交大国，并在中东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阿萨德执政后，叙利亚仍然面临严峻的中东国际形势。"六·五"战争结束后，阿以冲突并未停止，双方处于不战不和的对峙中。

“不战不和”的局面与美苏各自大力武装阿以双方及美苏干预中东事务,并展开激烈争夺有极大关系。“六·五”战争后,美国继续大力武装、援助以色列。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又进一步加快武装、援助以色列的步伐。1969年至1972年,尼克松在其执政头三年中所给予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超过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以援助的总和。阿拉伯国家对苏联在“六·五”战争中的表现十分不满,但为了重建军队、收复失地,仍不得不依靠苏联提供武器装备。苏联趁机向埃及、叙利亚等前线国家扩展。苏联在特别加紧向埃及渗透的同时,也极力扩大在叙利亚的影响。从1968年初开始,苏联在6个月内不仅迅速补充了叙利亚在“六·五”战争中损失的装备,而且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同时,大批苏联军事人员进入叙利亚。1972年9月,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中规定,苏联帮助叙利亚提高防御能力,叙利亚则提供港口给苏海军使用。美英两国的上述行为,使中东局势更加紧张。

1970年,纳赛尔逝世,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继任后,力主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以战促和”。在埃及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希望以武力收复失地的过程中,叙利亚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并进行了成功的合作。自“六·五”战争以来,在埃以之间的消耗战持续不断的同时,叙以之间的军事冲突和摩擦也时有发生。自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后,叙利亚一直面临着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叙利亚政府希望打破中东不战不和局面的同时,更希望血洗前耻,夺取被占领土戈兰高地。

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势力之后,便开始在政治、外交领域进行更加积极的战争准备。与此同时,埃及与叙利亚展开了具体的军事合作行动。1973年1月31日,叙、埃两国决定组成武装

部队联合司令部，决定在军事上采取统一行动。8月，两国军事部门最后审定了联合作战计划。9月，叙、埃两国与约旦达成协议，一旦战争爆发，约旦将陈兵西北部边境，牵制以军，以配合叙利亚方面作战。之后，埃及叙利亚先后恢复了与约旦中断的外交关系。10月初，埃、叙两国决定10月6日为开战日。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埃、叙两国在开战前制造了一系列假象，迷惑对方。而以色列则陶醉在“六·五”战争的军事胜利之中，迷信自己的军事优势，自认为“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不可能被突破。10月6日凌晨4时，以情报机构才摸清埃及和叙利亚将于当天傍晚发起进攻。

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战争。这次战争被称为“十月战争”或者第四次中东战争。另外由于这年10月是伊斯兰教的斋月和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战争打响后，埃及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抢渡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取得了初步胜利。在运河战线战役进行的同时，北线叙军3个机械化步兵师、1000多辆坦克，在15000门火炮和100架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向戈兰高地以军阵地发起攻击。到9日，叙军攻占巴萨达、菲克，并包围了戈兰高地重镇库奈特拉，收复了戈兰高地东部大片土地，叙军初战告捷。

战争初期，叙、埃两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优势，而且在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发声明支持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派出数万人的军队，配合叙埃作战，并提供了22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阿拉伯产油国根据战前计划，以石油为武器，采用提价、减产、禁运、国有化和增加本国股权等措施，打击以色列

及其支持者美国等西方国家。战后,石油斗争进入新的高潮,并取得明显成效。

叙、埃两国的战略思想是打一场“有限战争”,在取得一定进展后,希望联合国或美苏出面调解,通过谈判收复失地。因此初战告捷后,叙、埃两国停止了进攻,等待谈判的到来,因而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成果,从而给以色列以喘息之机。以色列依靠美国源源不断的军火补充,利用叙埃停止进攻的“战斗间歇”,从10月10日起,实施了先北后西对叙埃各个击破的反攻。12日,北线以军重新占领整个戈兰高地后,越过1967年叙以停火线,深入叙境内距大马士革仅35公里处。此后,战事重点转到西线。16日,以军偷渡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岸埃及本土作战,切断了前线埃军与后方的联系。至此,整个战争局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战争爆发后,美苏两国立即进行紧张的活动,企图控制局势,并极力谋求各自的战略优势。美苏几经磋商,于10月20日基本按照美国提出的方案就阿以停火达成一致。22日,安理会通过了美苏联合提出的中东问题的决议草案,即联合国安理会338号决议。338号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要求现有战争的各方,不迟于12小时在他们目前占领的地点,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的军事活动;2.要求各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3.决定由各有关方面于停火的同时,在适当方面主持下开始进行谈判,旨在建立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由于超级大国的压力,加上军事上受挫,叙、埃分别于22日和24日宣布接受停火。至此历时18天的十月战争结束。十月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现代化战争。这次战争阿以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余万,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和戈兰高地

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激战。战争初期埃叙取得胜利，但战争后期由于战略错误，埃叙遭受巨大损失。叙利亚不仅在军事上遭受严重损失，而且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得而复失。另外又丧失了高地以东440平方公里的领土。以色列最终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是赢家。埃叙等阿拉伯国家不顾超级大国的阻挠，冲破“不战不和”的局面，通过初期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恢复了民族自尊和自信；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石油武器的应用，促使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其中东政策，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创造了条件。

叙美、叙苏关系的演变

十月战争及其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的应用，对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国震动极为强烈。战后，美国逐步调整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从日内瓦中东和会到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美国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叙利亚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叙美关系一改十月战争前长期紧张的局面。但是随着美国积极促成戴维营协议，叙美关系又出现困难。十月战争后，叙苏关系一度出现裂痕，此后又因埃以单独媾和等因素得到修补，直到1980年10月叙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叙苏结成密切的盟友。

根据安理会338号决议，阿以停战后，十月战争相关国家及美苏等国，于1973年12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中东和会。但是，主要当事国叙利亚却拒绝参加会议。会议召开前(18日)，叙政府发表的声明表明了其立场：“鉴于目前的形势所提供了种种迹象表明，正在玩弄一些要为以色列利益服务，要使会议讨论局部问题。这种局部问题的讨论……，其目的是要冻结(以色列)完全撤出

1967年被占领土的时间表和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权利的具体方案的实质性问题。鉴于所有这一切,兹决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将不参加12月21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实际上日内瓦和会正如基辛格所预言的,由于阿以双方分歧太大,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鉴于这种形势,在尼克松总统的同意下,基辛格于1974年1月10日启程赴中东,开始他的"穿梭外交"。基辛格运用他的"魅力"和外交才能,使阿以谈判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计划进行。他首先促成了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签订。随后,基辛格转向叙利亚与以色列脱离军事接触的问题。但是,叙、以的脱离军事接触谈判却十分困难,因为以色列方面除不愿放弃它所占领的戈兰高地外,还因为以色列军队在十月战争中向叙利亚领土纵深推进到距大马士革只有35公里的地段。叙利亚政府表示,在以军未从叙领土撤离之前,拒绝释放以战俘。在基辛格的奔波下,叙、以双方作出让步,1974年5月,以、叙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占领的叙利亚土地,包括库奈特拉城;在叙以军队之间设立一条1.6-6.4公里宽的缓冲区,由联合国军驻扎;叙利亚释放以战俘,交还以军阵亡士兵尸体等。

基辛格促成叙以脱离接触协议,成为叙美关系改善的契机。数日后6月6日,尼克松动身出访中东,并访问了大马士革。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叙利亚。尼克松的来访标志着自50年代初期以来叙美关系的坚冰被打破。在与阿萨德总统会谈时,尼克松保证美国在阿以争端中保持公正立场,并称愿向叙利亚提供经济等援助。叙美之间尽管仍存在许多分歧,但双方关系因叙利亚调整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政策而有一定的发

展。叙利亚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改变经济上主要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来往的局面,加强与美国等在经济上的联系。这一政策在叙利亚的对外关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阿萨德政府采取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尽可能保持经济关系,以争取更多的美援。1974年到1979年,叙利亚从美国获得4亿多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美国对叙的出口从1974年的4000万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2.7亿美元。叙利亚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也不断扩大,其中与法国和西德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个国家在70年代中期向叙利亚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援助。

叙利亚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一度使叙苏关系出现的裂痕加深。但是中东国际形势的严峻环境,并未动摇叙苏关系的基础。自60年代初期以来,虽然叙国内政局动荡不已,但历届政府基本坚持与苏联发展关系的立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重视叙利亚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加强对叙关系。1966年两国签订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合作领域主要包括地质勘探、资源开发、修建铁路和兴修水利等,其中包括援建幼发拉底河高坝工程。这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援建的仅次于阿斯旺高坝的巨大工程之一。在地质勘探和石油矿业开采方面苏联给予叙利亚很大的援助,使叙利亚成为完全在苏联援助下开采石油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并从1972年开始向苏联输出石油。据不完全统计,自60年代初至1980年,苏联对叙利亚的经援约8.14亿美元,援助项目约50多个。

苏联对叙利亚的援助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叙利亚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接受苏联军援的阿拉伯国家。6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府更加重视叙利亚的战略地位;而叙利亚反美抗以立场更需要苏

联的支持，双方关系更加密切。1966年，“二·二三”政变后的复兴党新政府与苏联签订了2.3亿美元的军火协定，1969年7月，叙、苏又签订价值2亿美元的新协定。“六·五”战争后到70年代初，苏联援助的武器使叙利亚大部分装备得到更新。与此同时，大批苏联军事顾问进入叙利亚。1972年7月，当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被逐出埃及时，苏联通过支援的名义把一部分军事专家转移到叙利亚。苏联海军在“六·五”战争前，已开始使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十月战争前夕及战争期间，苏联反对阿拉伯人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惧怕卷入战争会与美国迎头相撞，极力压制埃叙两国，甚至拒绝向埃及提供武器。为此，叙利亚对苏联产生怀疑。美国积极调整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叙利亚也改变以往完全依靠苏东国家的对外立场，加强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取得明显的进展。特别是美国在十月战争后基本主导了中东和谈的进程，苏联一度被抛在一边，这使叙苏关系产生裂痕。但从中东整体战略考虑，苏联不愿再失去叙利亚；而叙利亚在战争中及战后急需苏方的军火，在基辛格促成埃以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后，叙利亚对埃及与美国不断加强关系，以及埃及有可能与以色列单独实现和谈的举动深感忧虑。同时，阿萨德又力求在中东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促使叙苏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些波动后又重新加强。因此苏联不仅在十月战争中及时运送了叙利亚急需的武器，而且战后又及时补充的大量武器装备，不但弥补了武器损失，而且使叙利亚的军力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在叙以军事对抗和战略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78年10月，阿萨德总统先后7次访苏，叙利亚成为苏联在中东的“盟友”。

苏联势力在埃及遭驱逐后，勃列日涅夫曾亲自向叙利亚领导人提出缔结友好条约的建议。苏联认为条约签订后，它可依据条约保证叙利亚的安全和提供全面的援助。但叙利亚当时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深怕叙苏缔约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的不满，从而使叙利亚再度陷于60年代被阿拉伯世界孤立的困境，因而拒绝了苏方的建议。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8年9月，埃及同美、以签署戴维营协议，为埃、以缔结和约铺平了道路。萨达特的做法，立即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谴责。10月，拒绝阵线国家领导人召开会议，商讨对付埃、以媾和的对策。会议上，有领导人建议，只有通过建立明确的阿拉伯—苏联联盟关系，才能对付埃、以、美联盟，要求叙利亚与苏联建立联盟关系。但直到此时，叙利亚仍反对与苏联结盟。阿萨德在会上指出，"如果与苏联结盟，将使我们孤立于大部分有影响的阿拉伯国家之外，那么这种结盟有什么益处？"然而，1979年3月26日，埃及与以色列最终签订了和约。这一严峻的现实终于改变了叙利亚的立场。叙利亚严重地感到，埃、以媾和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将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军事力量上失去平衡。更加可怕的是，今后以色列的军事压力都将施加在叙利亚身上，叙利亚只有从苏联取得大规模军事援助，才能与以色列保持军事战略的平衡。因此，叙利亚多次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但苏联拒绝满足叙利亚的要求，表示只有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后，苏联才有"义务"在军事上给予叙利亚全力支持。如果叙利亚需要先进武器，可以用阿拉伯产油国捐赠的美元向苏联购货。

埃以和约的签订，使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也使阿拉伯国家曾指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取得可以接

受的解决办法的最后希望破灭。拒绝阵线国家再次催促叙利亚与苏联结盟，海湾国家也被迫表示谅解，这便为叙利亚与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铺平了道路。

1980年10月8日，叙利亚和苏联缔结了为期20年的叙苏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明确地表示了苏叙在军事上合作的立场。条约的前言说，两国"决心坚决回击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推行的侵略政策，继续反对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主张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条约第十条规定："缔约双方将继续根据双方缔结的相应协定发展军事方面的合作，以便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至此，叙苏盟友关系正式形成。

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

6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激进的对外政策，叙利亚在国际上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处境一直十分孤立。同时，也由于剧烈的内部政治纷争，叙利亚无暇顾及对外关系。1966年2月23日新复兴党人政变执政后，主动出击，采取行动打破外交困境。首先，新复兴党政权一改反对纳赛尔的立场，与埃及和解，把与埃及的合作视为"实现阿拉伯进步，达到最终统一的第一步"。此后两国复交，埃及5年来首次正式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地位。同时，叙利亚与阿尔及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修复外交关系，初步改善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处境。其次，叙利亚新政府大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扶植"闪电"等亲叙利亚的巴解组织，号召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解放巴勒斯坦的人民战争。叙利亚自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及政治派别和社会力量一贯坚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扩张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历来

认为，巴勒斯坦是天然的叙利亚南部疆域，应回归叙利亚的怀抱。由于这一因素，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协调反以立场方面，时有分歧和冲突发生。新复兴党执政后，采取更加激进的对以立场，赢得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同时，也引起约旦等国的担忧。另一方面，叙利亚的反以强硬立场也引起以色列的强烈反弹，原本就已十分尖锐的叙以矛盾进一步加深，直至卷入“六·五”战争。第三，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努力促进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运动。1961 年阿联的解体，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它未能阻止阿拉伯民族统一思想的继续发展。早在 1963 年初，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相继取得政权后，两国代表就前往开罗，同埃及谈判签订了三方统一协定，决定成立一个由三地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由于相互极不信任，纳赛尔又宣称只同叙利亚联合，而不同复兴党联合，协定墨迹未干，三方关系就陷于破裂。60 年代末，新复兴党政府继续坚持阿拉伯统一立场，当 1970 年 11 月，埃及、利比亚和苏丹再次达成建立联邦协定两周后，叙利亚宣布加入该协定。1971 年 4 月 17 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拟订组成阿拉伯共和国联邦的方案，这一联邦被三国认为是“阿拉伯统一的核心”。10 月，联邦的三国领导人在开罗开会，萨达特当选为联邦总统，开罗为联邦首都，把 1972 年 1 月 1 日定为正式成立日。不过该联邦后因埃、利关系恶化而失败。1978 年，叙利亚和伊拉克达成实现联合的协议。由于两国复兴党之间的争吵，该协议未及实行便告流产。

70 年代，叙利亚是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前线国家之一，特别是在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之后，叙利亚成为对抗以色列最重要的前线国家，因此叙军费开支庞大，再加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需要

大量资金,在经济上急需外国援助。历年来叙接受的外援约占国家预算 30% - 40%,而这些外援主要来自阿拉伯产油国。从 1974 年到 1978 年,叙利亚每年接受的外援多达 10 亿美元,其中阿拉伯国家赠送的金额约为 5 - 6 亿美元。1979 年,据说为了资助叙利亚购买武器,各阿拉伯产油国向叙利亚赠送了 13 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政府积极改善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并在对外政策上注意这些国家的意见。叙利亚与沙特阿拉伯曾在 1962 年发生争吵,双方召回各自大使,外交关系陷于中断。70 年代初以后,阿萨德政府重视并注意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1973 年 4 月,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互派大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1 年 5 月,叙利亚从沙特阿拉伯接受的财政援助累计达 11 亿美元。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特别是 70 年代后叙利亚不再抵制阿盟首脑会议,使它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阿拉伯国家为了支持叙利亚的抗以斗争,在 1974 年阿盟首脑会议上决定每年向叙提供 10 亿美元援助。1978 年阿盟首脑会议将援助金额提高到 18 亿美元。

十月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乃至经济上积极合作的典范,叙利亚和埃及的合作尤为成功。然而,十月战争后,特别是 1975 年 9 月埃及与以色列签署第二阶段脱离军事接触协议后,埃及同叙利亚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分歧逐渐加深。叙利亚认为,埃以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的签订,为埃及同以色列单独媾和铺平了道路。

1977 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决心“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在美国的积极撮合下,在萨达特决心采取强有力的主动行动打破阿以僵局的前提下,以及埃及也获悉以色列政府也“希望和平”并邀请萨达特访问以色列的情况下,埃及宣布萨达特将于 11 月 19 -

21 日访问以色列。在萨达特访以前夕，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巴解组织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紧急磋商。会议发表的《的黎波里公报》谴责萨达特背叛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并决定采取坚决的对抗行动。上述国家和组织宣布成立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的"阿拉伯坚定与抵抗阵线"(亦称"拒绝阵线")。1978 年 9 月 17 日，美、埃、以三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谈判之后，终于达成了被称之为《戴维营协议》的两项文件。《戴维营协议》签订后数日，即 9 月 20 - 23 日，阿拉伯拒绝阵线在大马士革召开首脑会议，讨论该协议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应对政策。主席阿萨德总统在开幕词中愤怒指责美国策划《戴维营协议》，认为"《戴维营协议》是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一个无穷的灾难"，它"无疑是我们将要经历的一个痛苦阶段"，最让阿拉伯人痛心的是"我们的埃及兄弟离开了阿拉伯怀抱，这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胜利"。会议发表的公报特别谴责了美国破坏阿拉伯团结的阴谋，并宣布说，阿拉伯拒绝阵线国家"谴责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和萨达特政权结盟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要美国对《戴维营协议》已经和正在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负责"。1979 年 3 月 26 日，埃以和平条约签订后，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会议当即通过对埃及实行集体制裁的决议。会后，17 个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埃及逐出阿拉伯联盟，阿拉伯世界陷于分裂。而叙利亚与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彻底断绝了外交关系。其后果之一是，叙利亚成为惟一有实力与以色列相抗衡的阿拉伯前线国家，进而使叙利亚在阿以对抗中处于更加艰险的境地。

四、叙利亚与中东国际冲突

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内战

70年代初期以来，叙利亚采取积极介入中东国际事务的对外政策，并在与自身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际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系列介入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叙利亚干预黎巴嫩内战最为引人注目。黎巴嫩内战根源于黎内部各教派及政治力量的冲突，但是由于巴解组织、以色列以及叙利亚作为外部力量介入，使内战国际化，并成为叙以政治军事角逐的场所。

1975年4月13日，旷日持久的黎内战爆发。起初叙利亚仅仅使用其政治影响，在各派之间进行斡旋，当黎内部各派冲突难以化解，外部政治调解难以奏效之际，叙利亚便以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的名义，以军事手段介入黎内战。1975年12月前，叙利亚在支持黎巴嫩穆斯林要求改革现行政体的同时，主要是在穆斯林“全国运动”和基督教“黎巴嫩阵线”之间进行调解。其目的是防止黎巴嫩政治制度彻底崩溃。到12月时，此项政策未能奏效，黎内部冲突越演越烈。基督教长枪党向穆斯林发动大规模进攻，欲将穆斯林赶出传统的基督教势力范围黎巴嫩山区。1976年1月，叙利亚向黎巴嫩派出以叙为基地的“巴勒斯坦解放军”支援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装，并于1月21日促成黎两派实现停火。同年3月和4月，当黎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装获得军事主动权，“控制了全国70%的地区”，要求完全征服基督教马龙派时，叙利亚于5月底直接派出军队进行干预，支持马龙派，“制止左翼势力的前进”。叙部

队由于缺乏准备,初期作战失利;7月与黎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装进行第二次较量时获全胜。叙利亚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叙利亚想“既防止黎巴嫩的分治,又防止黎巴嫩各派别的完全失败”,“不让一方取得对另一方的完全胜利”。

1977年阿以冲突格局出现新变化,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开始了埃以和谈的进程。为了加强拒绝阵线的力量和团结,叙利亚恢复了与巴解组织和黎穆斯林的关系,联合巴解抵制埃以和谈,在黎两派冲突中,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又侧重支持穆斯林势力。1978年和1979年,叙在黎巴嫩采取维持现状的办法。1979年,参加阿拉伯维和部队的沙特、苏丹、阿联酋等国部队相继从黎撤出,叙利亚部队仍留在原地。1980年1月,叙宣布重新部署其在黎的部队,把贝鲁特和沿海地区的部队东撤至贝卡谷地,加强对贝卡谷地的防御,保护自己的侧翼。撤出地区交由巴解组织接管。

70年代中后期,叙利亚逐步卷入黎巴嫩事务,其意图是:1.要在叙、黎之间建立并保持某种“特殊关系”。叙总统阿萨德曾强调,叙、黎之间“有着历史上的不可分割性”,要“通过条约关系的形式”确保叙利亚的影响;2.从本国安全考虑,要使黎成为叙以对抗缓冲地带,不想使黎出现“分治”或“左派掌权”的局面,避免给以色列侵黎的口实;3.利用在黎举足轻重的影响,增加叙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解决被以色列吞并的戈兰高地问题。此后,叙利亚一直积极介入黎内战,直至90年代初内战结束。

叙以导弹危机

叙利亚1976年出兵黎巴嫩时,在美国的调解下,与以色列达成某种默契:以色列同意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干预,但干预范围要有

所限制,“叙利亚不把部队派往利塔尼河以南,不使用空军,不在黎巴嫩领土内部署地对空导弹”。这就是以色列常说的黎巴嫩的“红线”。起初几年,叙以双方都注意遵守此默契,尽量避免直接接触,1979年后,双方时有冲突发生,但当时未酿成危机。

1978年3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黎基督教长枪党开始得到以色列的支持,其实力大增,随后于1980年底开始把势力深入到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特别是控制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的要冲——贝卡省首府扎赫勒市。叙利亚认为这是对叙在黎地位的严重挑战,于是作出激烈反应。叙部队先是夺占扎赫勒市郊萨宁山,后围攻市区,猛烈炮击市区长枪党民兵。叙部队在夺占萨宁山时使用了直升机。以色列认为,叙利亚使用直升机打击长枪党违背了双方1976年的默契,以色列向黎基督教“黎巴嫩阵线”作出承诺:它对叙使用空军不会等闲视之。此后,以色列派出飞机对黎长枪党民兵进行策应。1981年4月28日,以空军在扎赫勒市附近轰炸叙军阵地,并击落叙利亚武装直升机2架。翌日,叙军增派7000人部队,同时把几个连的苏制萨姆-6防空导弹部署到贝卡谷地。以色列当局认为,叙利亚在黎部署导弹给以色列安全造成了威胁,要求叙限期撤出。叙利亚则表示这是它的“合法防御权利”,决不撤出。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从而导致了叙以直接对抗的导弹危机。

导弹危机发生后,苏美之间展开了紧张的角逐。苏外交部5月6日向叙利亚保证:“莫斯科支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立场,包括在贝卡谷地部署导弹的权利”,如果叙在贝卡谷地的导弹被以色列摧毁,苏将立即予以补充。但苏联也要求叙利亚保持一定克制,不使苏美迎头相撞。美国从保住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出发,力图稳住

局势,平息冲突,防止苏联插手,特别是怕事态扩大后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对抗,导致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打乱美国在中东与苏联争夺的战略格局。因此,美国派出特使哈比卜从5月7日起在叙、以、黎之间穿梭调解,7月24日,促成叙、以导弹危机暂时化解。解决方式是:长枪党撤离扎赫勒市,改由黎政府军进驻;叙利亚部队解除对扎赫勒市的包围,但不撤出导弹;以色列保证不对叙导弹基地采取军事行动。

导弹危机的暂时解决明显有利于叙利亚,使叙利亚在黎的军事存在得以继续存在的同时,叙利亚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赢得了暂时的先机。但是,导弹危机只是暂时得到控制,叙以之间在黎巴嫩的对抗态势并未缓解。随着以色列贝京政府在中东对外扩张野心的日益暴露,特别是1981年12月14日,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关于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的法案,非法吞并戈兰高地,引起叙利亚的极度愤慨,叙以之间在黎巴嫩的对抗急剧升温。

以色列侵黎战争中的叙以军事冲突

1982年6月初,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大使在伦敦遇刺,决定向黎巴嫩发动名为"加利利和平"的军事入侵。它声称,该行动的目的是"使加利利地区所有居民远离来自黎巴嫩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炮火的射程",把巴勒斯坦武装赶离以色列边境40公里以外。6月6日11时,以色列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以军通过突然袭击,在6天内(即在6月12日同巴解达成第一次停火协议之前)深入黎巴嫩境内90公里,占领了黎巴嫩1/4领土,攻陷了巴解组织30多个军事设施和营地,俘获6000多名巴解战士,摧毁巴解70多个武器库。以色列的入侵给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

重大损失，许多城市遭破坏，一些村庄化为焦土。

在入侵开始时，以色列诡称其目标只是巴解游击队。它还要美国告诉叙利亚，“以军不会进攻叙利亚部队，除非叙部队进攻以军”。以色列以此麻痹叙军，欺骗国际舆论。当它摧毁大部分巴解组织基地后，便腾出手来向叙利亚驻黎部队开战。

6 月 9 日，以军沿杰津—贝特丁一线向贝鲁特—大马士革国际公路方向运动时，首先在贝卡谷地南端地区同叙军第 85 装甲旅交火。叙以两军投入大量坦克，叙利亚首次出动先进的苏制 T－72 型坦克；而以色列则以美、英制造的坦克对抗，战斗十分激烈。以军在作战中，战术运用灵活，正面受阻后，不断从侧翼发动进攻，叙利亚部队被迫连续后撤，以军逼进贝卡谷地。为了保卫在贝卡谷地的萨姆－6 防空导弹基地，叙军增派部队 1.6 万，使叙利亚驻黎部队总数达 4 万人，并向贝卡谷地增派 3 个萨姆－6 防空导弹连，使该地区叙防空导弹连达到 19 个。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彻底摧毁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6 月 9 日 14 时，以色列借口叙利亚增派导弹部队和空袭以地面部队，对叙导弹基地实施大规模空袭。以空军从发起攻击到全部摧毁叙利亚 19 个导弹连仅用时 6 分钟。在袭击叙利亚导弹基地的同时，叙以双方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激烈空战。6 月 10 日，双方再次进行大规模空战。两天中，以方共出动约 300 架次飞机，叙利亚出动 200 多架次飞机，这是中东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空战结果是以色列占据上风。6 月 10 日，叙利亚地面部队又处于以色列的钳形攻势下，处境岌岌可危。叙利亚于是“给莫斯科施加强大压力，莫斯科就压华盛顿，华盛顿从它自己的利益出发压以色列政府同意停火”。11 日，叙以分别宣布从

即日中午起停火。

挫败黎以撤军协议

叙以6月11日分别宣布停火后,以军调头围攻贝鲁特西区,即穆斯林及巴解武装聚集的地区。21日,叙以军队在贝鲁特东南部重镇卜哈姆爆发以军侵黎战争以来第二次坦克大战。在这次坦克战中,叙军损失300多辆坦克。随后以军完成了对贝鲁特西区包围,并对贝鲁特西区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最终在美国特使哈比卜的调解下,迫使巴解武装主力于8月下旬撤离贝鲁特,叙利亚军队也同时撤出。同时由美、法、意军队组成的多国部队进驻贝鲁特。8月21日至9月1日,巴解武装分15批分别撤往8个阿拉伯国家。30日,叙利亚第85旅撤往贝卡谷地。9月10日至13日,多国部队完成了监督巴解撤离后,也相继离开黎巴嫩,它们的阵地交黎政府军接管。9月14日,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次日,以军以此为借口兵分三路又向贝鲁特推进,并包围了南郊巴勒斯坦难民营。16日至18日,在以军支持和配合下,黎长枪党民兵组织中的激进分子对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难民营中1000多名无辜巴勒斯坦难民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国际社会的大屠杀事件。大屠杀事件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愤慨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以色列国内也引起巨大的抗议浪潮。以色列尽管勉强接受安理会关于增派联合国观察员的决议,同意美、法、意多国部队再次进驻贝鲁特,以军也从贝鲁特西区撤出,但它仍赖在黎巴嫩其他地区不走,继续制造事端,并派飞机袭击叙利亚驻贝卡谷地的叙军阵地。以军的继续驻扎使黎内战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一背景下,由美国撮合,1982年底黎巴嫩和以色列开始举行撤

军谈判。

黎巴嫩政府为恢复黎领土完整和主权,强烈要求以色列以及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并强调一切外国军队撤离的关键是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黎以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以色列提出种种苛刻撤军条件,致使谈判经历了 33 轮,时间持续 4 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

为了打破僵局,美国特使哈比卜进一步作出努力,并提出分三个阶段撤军的方案,但立即遭到叙利亚的反对。叙利亚表示,它的安全和黎巴嫩安全密切相关,“将不接受在黎巴嫩作出有损于叙利亚安全的任何安排”。在此情况下,美国务卿舒尔茨于 1983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8 日紧急出访中东 6 国。经舒尔茨斡旋,黎以双方达成了撤军协议,5 月 17 日正式签署。

黎以撤军协议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但黎方做出了更大让步。黎同意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安全区”,接纳以色列扶植的哈达德为“安全区”部队副司令;同意以军军官参加“安全区”治安工作。以方让步是,协议未涉及双方“关系正常化”;不在协议中要求叙利亚和巴解武装撤离。协议使以色列侵黎目的基本达成,尤其是同黎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事实上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带有某种和约性质,是继埃以协议之后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打开的“另一个突破口”。正因为如此,该协议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更是遭到叙利亚的激烈抨击。

叙利亚强烈反对黎以撤军协议,阿萨德总统表示,协议“对叙利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叙外长哈达姆对此表态说,“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叙利亚政府都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叙一再重申,叙军是应黎政府邀请进驻黎巴嫩的,同以军撤离无关;叙军将继续留黎,

即使黎政府提出要求，它也不撤军。叙利亚还向美国提出5项撤军条件，包括：黎以撤军协议应看作是“结束战争状态的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黎同叙签署一项与黎以协议相似的协议，明确叙在黎境内的安全要求；美国作出书面保证，确保就以色列所占领土戈兰高地问题重新进行谈判。

黎以协议使黎巴嫩国内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教派固有矛盾激化。德鲁兹派领导人、社会进步党和“全国运动”主席琼布拉特等对协议表示强烈不满。5月14日，黎各反对派酝酿成立反对黎以协议的“民族阵线”，并向叙总统阿萨德通报情况，得到叙利亚的全力支持。7月23日，黎国内10多个穆斯林“左”翼组织正式宣布成立反政府联盟“民族拯救阵线”，要求现政府辞职和废除黎以协议。由于叙利亚和巴解组织不同意撤军，以色列又一再坚持如果叙利亚不撤军，以色列也不撤军，并威胁要“中止”协议。同时，由于黎国内反对派不断施加压力，黎政府不敢与以色列互换协议文本，协议因而搁浅。

在国内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杰马耶勒总统转而寻求国际支持。特别是希望美国同意修改协议。美国的回应是，黎以协议是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最好和最可行的基础”。1983年底和1984年初，黎巴嫩、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三国外长先后在大马士革、利雅得等地举行会议，讨论黎巴嫩问题。由于黎外长主张讨论安全计划，叙外长坚持先讨论废除黎以协议，结果三次会议无果而终。1984年2月上旬，黎巴嫩局势急转直下，政府军同穆斯林德鲁兹等什叶派民兵在舒夫山区、贝鲁特西区及南郊展开猛烈的对攻战。瓦赞总理及三名穆斯林政府部长相继辞职。杰马耶勒总统在此困境下被迫表示：“一切都可以重新讨论”，“可以为任何解决

办法效劳”。

为了解决危机，沙特阿拉伯进行了紧急调解，提出8点计划：废除黎以协议；以军和叙军同时逐步撤出黎巴嫩；由联合国部队取代多国部队；制定保证以色列北部“安全”的措施。杰马耶勒表示接受，但叙利亚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黎政府终于改变主要依靠美国的政策，转而寻求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叙利亚的支持。2月底，杰马耶勒执政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同阿萨德总统讨论了废除黎以协议和解决黎巴嫩危机的途径。这次访问是叙黎关系的重大转折。3月2日，黎反对派领导人在大马士革同叙利亚外长会谈，协调同叙利亚的立场。3月5日，黎巴嫩政府举行特别会议正式宣布废除黎以撤军协议。

黎以协议的废除在黎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黎巴嫩穆斯林各派一致欢迎废除该协议。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普遍表示欢迎。叙总统阿萨德更是表示说，这是黎巴嫩、叙利亚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胜利。以色列则指责叙利亚破坏黎以协议。黎以协议的废除，对美国和以色列是一个打击，同时更意味着叙利亚在黎巴嫩地位的增强和在中东影响的扩大。

叙利亚与两伊战争

1980年9月，伊拉克与伊朗因长期存在的民族纠葛、教派矛盾和边界争端等，爆发了旷日持久、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自埃以媾和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力量又一次分化组合。叙利亚对两伊战争的态度引人注目，它不像多数阿拉伯国家那样支持伊拉克或保持中立，而是支持伊朗，反对伊拉克。但是随着战局的变化，叙利亚的立场也有所

变化。

叙利亚在两伊战争初期反对伊拉克的立场，与叙利亚与伊拉克两国两党在历史上的恩怨有关。1958 年以前，叙利亚与费萨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关系紧张。1958 年，卡塞姆军人集团政变后，叙伊(拉克)两国关系改善。1963 年 2 月 8 日，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政权，建立以复兴党为主的政权。一个月后，叙利亚复兴党也取得政权，两国自此开始了复兴党共同执政的历史。但不久之后，党外人士阿里夫总统逐渐将复兴党排挤出伊拉克政府。1968 年 7 月，复兴党又在伊拉克第二次取得政权。但是，由于叙利亚复兴党创始人阿弗拉克被叙复兴党人驱逐，辗转来到伊拉克后受到伊拉克复兴党的善待，从此，两党关系恶化，并分别成立了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1973 年十月战争时，伊拉克曾派兵援叙，两国关系缓和。1978 - 1979 年阿萨德总统曾两次访问伊拉克，双方还签署了《民族联合行动宪章》，并成立"最高政治委员会"。1980 年伊拉克又指责叙支持反萨达姆集团，双方关系恶化，最终导致两国相互关闭使馆。两国关系不和还有教派因素，例如，伊拉克是由逊尼派执政，叙利亚则由什叶派的阿拉威派执政。另外，两国都想称雄阿拉伯世界。因此，叙利亚与伊拉克长期关系紧张。而叙利亚与伊朗在均属于什叶派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是更重要的是，叙利亚意图借两伊战争，削弱伊拉克这个在中东国际舞台上与其争雄的对手。因此，叙利亚冒着开罪阿拉伯世界的危险，站到伊朗一边，并宣称"革命的伊朗是战略盟友"。为此，叙利亚在战争初期不断为伊朗提供和转手输送武器，并一度在边界集结重兵，牵制伊拉克，配合伊朗反攻。为了在经济上打击伊拉克，叙利亚还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于 1982 年 4 月先后关闭了叙

伊(拉克)边界和伊拉克经叙利亚通往地中海港口的输油管道。叙利亚的立场遭到阿拉伯海湾六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海湾国家沙特等逐步减少并停止向叙利亚提供经济援助。海湾产油国减少并停止经援,给叙利亚财政造成了不少困难。

1982 年下半年两伊战争发生变化,伊朗攻入伊拉克境内。同年 9 月,第 12 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非斯召开,会议重申"保卫所有阿拉伯领土的义务",声明称,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侵略都是对全体阿拉伯人的侵略,并向伊朗发出严重警告。在战争中极力支持伊朗的叙利亚至此调整立场,对伊朗进攻伊拉克本土表示了不予支持,甚至反对的态度。1986 年叙利亚鉴于国内压力,在与伊朗保持战略盟友关系的同时,决定冰释与伊拉克的关系,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到 1987 年 1 月,叙利亚针对伊朗发动"卡尔巴拉 - 5"攻势明确表示,反对伊朗对伊拉克领土的占领,并声称"叙利亚将像保卫自己的领土一样保卫伊拉克"。4 月上旬,阿萨德和萨达姆在约旦秘密会晤,商讨了两国和解的事宜。

1988 年 7 月 22 日,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乃至压力下,终于宣布"希望在 598 号决议(1987 年 7 月 20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要求两伊停火的决议)范围内实现持久的和平"。8 月 20 日两伊战争正式宣告结束。两伊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世界一度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和解气氛。1989 年,埃及重返阿拉伯联盟,并同其他阿拉伯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叙利亚与埃及的和解,为 90 年代两国在海湾危机及海湾战争中密切合作和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密切配合铺平了道路。两伊战争结束,消除了叙利亚等激进国家与海湾温和派国家在中东国际问题上合作的障碍,叙利亚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开始恢复并得到发展。在这一气氛

下，叙伊(拉克)两国关系也有所恢复。叙利亚与伊朗关系，虽因两伊战争后期叙方转变立场而出现困难，但叙利亚努力保持与伊朗的关系。1989 年，另一个对叙利亚来说极为重要的事件是，黎巴嫩内战即将结束，而在黎巴嫩内部和解进程中，叙利亚发挥了重要作用。

《塔伊夫协议》与叙黎特殊关系

1989 年，中东地区除去阿以冲突外，所有热点问题一度出现降温趋势，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少有的和解气氛，惟有黎巴嫩内战枪声不断，而且政治军事危机还有加深的趋势。1988 年 9 月 23 日，黎总统杰马耶勒任期届满，在新总统无法选出的情况下，他匆忙任命米切尔·奥恩(时任黎政府军司令)为首的临时军政府。而代总理胡斯则声称以他为首的现政府仍是合法政府。这样，黎巴嫩出现了没有国家元首，而又存在相对立的两个政府的奇特现象。由此，黎巴嫩政治危机加深。

在此背景下，1989 年 5 月 22 日，阿拉伯国家召开特别首脑会议，讨论黎巴嫩问题。会议一致同意成立由摩洛哥国王、沙特国王和阿尔及利亚总统组成三方委员会，负责调解，以便尽快结束持续 15 年的黎内战。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多数阿拉伯国家配合下，9 月 30 日至 10 月 22 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通过了由三方委员会提出的全国和解文件，即《塔伊夫协议》。

《塔伊夫协议》的签订是黎巴嫩内部各派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更是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叙利亚作为阿拉伯世界中卷入黎巴嫩事务最深的国家，作为中东地区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大国，由于它的积极配合，对协议的签订起到了促进作用。当

然，叙利亚的积极配合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1989年9月8日，阿萨德总统就三方委员会的和解方案提出了5点要求，主要内容是：三方委员会应放弃要求叙同黎政府签订关于贝卡谷地叙军规模及驻军时间表协定；放弃要求就叙黎关系性质的前途划出框框。对此，黎基督教派提出异议，要求叙军队撤离黎巴嫩。10月18日，沙特外交大臣紧急出访叙利亚后，叙方做出让步，22日参加《塔伊夫协议》磋商的基督教派议员同意了修改后的全国和解文件。11月7日，协议得到黎议会批准，并正式生效。

《塔伊夫协议》包括4项基本内容。除第一项总则及政治改革内容外，其他3项内容均涉及到叙利亚。首先是关于叙驻军问题。协议未制订出撤军时间表，也未限制驻军数量，只含糊提到在黎选出总统两年后，叙军将集结于贝卡谷地。塔伊夫会议期间，基督教派别议员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阿拉伯国家监督叙军撤离，建立叙黎军事委员会，研究确定叙军在贝卡谷地集结和驻扎期限。但修改后的协议未确定叙军撤离的具体时间。与此同时，叙政府改变了不协助黎政府军行使权利的态度，同意帮助黎合法政府行使国家权力。事实上，叙利亚驻军积极参与了平息各派冲突，以及收缴武器的行动，特别是在挫败奥恩临时军政府及其武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阵营改变了多年来一直要求叙军撤离的态度，不再提及全面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其次，协议在关于以色列在南黎地区设立"安全区"、占领黎巴嫩领土问题上也涉及到叙利亚。协议要求以色列撤离"安全区"，归还被占领土，但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叙军驻扎黎巴嫩，威胁到它的安全利益。由于叙军继续驻扎，以色列一再声称，如果叙军撤出，黎巴嫩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军也将撤离。第三点，也是叙利亚最

为关心的一点，即协议认为黎巴嫩是具有阿拉伯属性的国家，与所有阿拉伯国家有着友好和兄弟般的关系，黎叙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黎巴嫩都不应威胁叙利亚的安全，也决不成为威胁叙利亚安全的任何国家、武装和组织的走廊和根据地。

叙利亚作为黎境内最大的外来势力和对黎巴嫩事务影响最深的国家，无疑是塔伊夫协议最大的受益者。从塔伊夫协议形成的全过程及内容看，叙利亚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基本达到，即在政治、军事及对外关系和阿以冲突等方面对黎巴嫩实施全面的影响。1991 年 5 月 21 日和 9 月 1 日，叙黎两国先后签署了《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防务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将在各个领域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和协调。此后，两国合作不断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 90 年代中东和平进程中，叙黎两国采取统一立场，不与以色列单独谈判、媾和。90 年代初期，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订许多相关合作协议。1993 年 9 月，叙总理率领包括 12 名部长在内的庞大代表团访黎，双方签署了包括经济、卫生、农业、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协议，成立了最高委员会秘书处。1994 年黎总理率团访叙，双方签署了文化、劳工、运输和奥沦河水资源分配等 42 项协议。1996 年黎总统和总理 5 次访叙，议长 3 次访叙，就两国国内国际问题协调立场，加强双边关系。1997 年，黎总统 3 次、总理 12 次访叙。叙副总统、总理也分别于 6 月和 10 月访黎。1998 年黎总统 6 次、总理 2 次、议长 5 次、外长 2 次访叙。同年 3 月叙外长，7 月叙副总统，10 月和 12 月阿萨德之子巴沙尔，12 月叙总理先后访黎，双方就广泛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上述一系列访问说明，自《塔伊夫协议》后，叙黎之间不仅确立了特殊关系，而且这种特殊关系在此后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后冷战时期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叙利亚

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正当苏东剧变，美苏缓和，两极格局趋向解体，冷战时代即将走向终结之际，在中东爆发了一场震动国际社会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突然大举入侵科威特，并继而宣布将科威特吞并。伊拉克的行径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粗暴地践踏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一致谴责。联合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对伊拉克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封锁、经济制裁，力压伊拉克撤军。然而，萨达姆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把海湾地区拖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在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军事打击下，伊拉克被逐出科威特，科威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恢复。

叙利亚政府和阿萨德总统对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伊拉克对一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的侵吞。危机之初，叙政府立即宣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并进行军事演习和防空演习，同时宣布派兵前往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但是，当初阿萨德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这是机会，可以打击老对手——伊拉克，还可以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真有什么不妥。然而，阿萨德深感与埃及、沙特等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需要得到海湾产油国的财政援助。经过最初的观察后，叙利亚作出明确声明，要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合作，反对伊

拉克的侵略行径,出兵沙特等国,保卫海湾国家。8月10日,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召开,埃及和海湾国家起草了谴责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的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权,呼吁美国派兵保卫沙特;决定阿拉伯国家派军队前往沙特。在表决时,叙利亚与其他11个阿拉伯国家投了赞成票。次日,叙利亚等国军队开赴沙特。9月4日,叙利亚军队还进驻到阿联酋。8月25日,叙利亚又联合伊朗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并于10月7日宣布,叙利亚将增派军队前往海湾,以保卫沙特等不受侵犯。1991年1月1日,沙特、埃及、叙利亚三国发表联合公报,拒绝"基于从科威特部分撤军或给侵略者得到好处的任何解决办法"。虽然伊拉克的入侵行动一度使阿拉伯世界重新陷入分裂,但自1990年8月中下旬后,逐步形成了以埃及、叙利亚、沙特三国为核心的阿拉伯反伊拉克阵营,并且态度日益强硬。叙利亚态度转趋强硬还有另一个因素。当国际社会强烈要求伊拉克撤军、停止侵略行径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提出了三个条件。条件之一是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对此极为不满。

伊拉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拒绝接受安理会要求它撤军的决议,对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要求停止侵略行动的强烈要求不予理睬,终于把海湾地区拖入到战争之中。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空袭行动,海湾战争打响。2月24日,多国部队又发动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战。叙利亚军队参加了地面作战。经过100个小时的海、空、地立体进攻后,多国部队解放了科威特。2月28日战斗结束,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正式结束。

积极拓展对外关系

战争结束后，叙利亚与埃及和海湾国家立即展开磋商，以便重新建立海湾地区的安全安排。3月16日，海湾6国和埃及、叙利亚外长聚会大马士革，商讨共同关心的安全政策。会上，上述8国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倡议共同合作加强海湾地区安全，计划由海湾6国出资，埃及、叙利亚出人作为“骨干力量”，组建一支海湾维和部队，以维护海湾安全。宣言承诺海湾国家将向叙、埃两国提供经济援助。此后，沙特等海湾国家恢复了对叙利亚的经济援助，科威特等国还相继免除了叙利亚所欠的部分债务。叙利亚得到丰厚的战争红利。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叙利亚恢复了因两伊战争以来，以及因长期干涉黎巴嫩等，与海湾温和派国家长期冷淡的关系。《大马士革宣言》后因海湾国家与埃叙之间的矛盾而被搁置，但它毕竟显示了叙利亚作为中东政治大国的影响力。

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为叙利亚拓展外交局面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叙美、叙埃关系得到明显改善。70年代后期以来，叙利亚与超级大国美国以及与阿拉伯世界大国埃及的关系一直处于困境之中。通过在海湾危机及战争中的合作，双边关系中一致点增多。90年代初，当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后，叙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特别是美国发起中东和谈进程时，叙利亚给予相应的配合。1991年10月，经美国斡旋，叙利亚终于同意出席在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随后，两国为磋商中东和平问题而进行的交往不断增多。1994年初，阿萨德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在日内瓦会晤，10月克林顿回访叙利亚。两国总统就阿以和谈和叙以

和谈交换了意见。克林顿访叙是2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叙。1996年,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上台执政,中东和平进程逆转并陷入停顿,叙以和谈也再次陷入僵局。美国坚持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重新引起叙利亚的不满,虽经美国务卿多次斡旋,双方关系仍然面临困难。另外,美国一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这也成为叙美难以顺利发展关系的破坏性因素,并影响到双方文化、经贸等交往。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大国。埃及因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而被逐出阿盟。1989年埃及回归阿盟,并迅速与阿拉伯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叙埃两国于1989年12月复交。此后,埃及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逐步恢复。叙利亚在海湾危机及战争中,与埃及展开了积极的合作,双方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持共同的反对立场。海湾战争后,叙利亚与埃及进一步加强合作。埃及完全支持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立场,双方政治合作关系因而不断加强。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双方领导人互访十分频繁。1996年4月、6月、11月穆巴拉克总统三次访叙。而阿萨德不顾年迈多病,于6月、8月两次访埃。1997年2月、7月穆巴拉克两度访叙,5月、9月阿萨德又两次回访。1998年,穆巴拉克和阿萨德又进行了多次互访。这一系列互访的中心议题是陷入困顿中的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以及双边及多边国际问题。1998年10月,叙利亚和土耳其因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事件,爆发危机。为此穆巴拉克进行了积极斡旋,并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11月后,两国间建立了以两国总理为首的“最高混合委员会”,并定期就加强和发展在经济等领域的关系举行会议。2000年5月8日,在阿萨德去世前一个月,阿萨德抱着病弱之躯最后一次访问了埃及。此次访问颇

有对阿拉伯世界重要领袖穆巴拉克"托孤"之意。由此可见,叙埃关系的重要性。

叙利亚同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肇事国伊拉克的关系,因叙利亚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支持安理会关于制裁伊拉克的决议,以及参加多国部队,"保卫沙特、解放科威特"等立场和行动而再次彻底陷入僵局。但是叙利亚并不赞成以武力摧毁伊拉克,希望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得到保障。对 90 年代美英两国不断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也表示过异议,并对国际制裁下的伊拉克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1997 年叙伊(拉克)关系开始松动。5 月,叙利亚经济代表团首次访问伊拉克。8 月,伊拉克贸易部长回访叙利亚。这是 17 年来第一位伊部长访叙。此后,双方宣布开放边境通道,关闭对方反对派设在本土的电台。11 月伊副总理阿齐兹率高级代表团访叙,两国关系开始改善。1998 年 2 月,伊外长萨哈夫访叙,受到阿萨德总统接见。这是 17 年来首位伊外长访叙。1999 年 2 月 21 日,萨哈夫再访大马士革,双方讨论了伊拉克同联合国的分歧问题。

叙利亚以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为转机,在战后积极拓展对外关系,取得了成效。叙利亚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变了 80 年代因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以及长期干涉黎巴嫩事务而受到本地区国家孤立的局面,增强了在中东地区政治外交大国的地位,巩固了在中东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外交基础,为叙以和平谈判赢得了有利的条件。

和平进程中的叙以和谈

阿以冲突是中东国际关系中最具全局性影响的重大问题,它

贯穿了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影响着中东国际局势的发展。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1979年两国实现全面和平，从1948年开始的阿以冲突终于走上了和平之路，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启动。此后，和平进程时断时续，艰难前行。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东解体，海湾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的发展给阿以和平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正如在阿以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样，叙利亚在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中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

1991年10月，在有关各方长期的艰苦努力下，中东和会终于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中东和平进程再次启动。在美国的极力斡旋下，叙利亚同意出席马德里中东和会。叙利亚和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对中东和会的基本立场是：坚持以“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接受并坚持以联合国242号和338号等决议为基础解决阿以冲突，要求以色列撤出目前占领的阿拉伯领土。11月3日至4日，阿以双方进行了第一轮谈判。12月10日至18日，举行第二轮分组谈判，由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联合代表团分别与以色列同时进行谈判。叙、以谈判的焦点是戈兰高地问题。叙方主张以和平换土地，“先撤后谈”，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从戈兰高地撤军。以方坚持“先和后谈”，要求叙利亚首先同以色列签订和约，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然后再谈有关问题。由于沙米尔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政府的僵硬立场，叙以以及阿以谈判截止第五轮谈判（1992年4月27日）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1992年6日，以拉宾为首的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赢得胜利，登台执政。拉宾政府在中东和谈问题上一改前政府的僵硬立场，宣布愿意在联合国242号决议基础上实现“土地换和平”，并首次表示242号决议为基础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适用于戈兰高地问

题，愿意通过部分撤出加部分购买的方式，在有充分国际保障的前提下与叙利亚解决这一争端；只要叙方愿意与以色列缔结和约，结束对以战争状态，放弃对以政治、经济抵制，承认以色列并建立外交关系，戈兰高地问题“还有进一步商量的余地”。由于以色列对阿以和谈立场的调整，第六轮谈判(1992 年 8 月 24 至 9 月 24 日)气氛明显缓和，并且在巴以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叙以双方终因歧见太深，谈判继续在原地踏步。叙利亚仍主张以军先撤出戈兰高地，以此换取双方签订一项全面和平条约。以色列则要求叙方明确“全面和平”的含义，即是否包括建立外交等关系，否则拒绝讨论戈兰高地问题。叙方回应是，除非以方作出全面撤军承诺并拟订具体时间表，否则拒绝讨论签订和约问题。由此，双方谈判在“撤军”与“和平”孰先孰后问题上再度陷入僵局，直至第十轮谈判(1993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 日)，和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1993 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为了推动中东和谈进程，美国宣布将以“正式伙伴”身份参加和谈。在美国的推动下，以及阿以双方经过十轮谈判，相互之间增加了交流和了解，在随后进行的第十一轮(1993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4 日)和第十二轮(1994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3 日)谈判中，巴以和约以和谈取得重大进展；但叙以谈判仍处于难以化解的困顿之中。1994 年 1 月 16 日，美叙两国总统在日内瓦实现“历史性”会晤。克林顿敦促阿萨德做出“历史性举措”。由于阿萨德出色的外交才能，迫使“缺乏外交经验”的克林顿在会谈中承认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意叙利亚在阿以和谈中坚持的全面解决问题、实现全面和平的原则。此后，叙利亚继续坚持原有立场，表示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叙以和平决不能在以色列仍占领叙领土的情况下实现。由于美国等

国际社会的努力，以及拉宾政府试图早日打破叙以谈判僵局，以方提出8年内分阶段撤军，撤军与以叙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步进行。以方建议遭到叙利亚的拒绝。

为了打破僵局，国际社会再次展开大量的游说工作。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先后邀请以色列总理、外长访埃，并对叙利亚进行闪电式访问。美国则以"完全伙伴"身份直接介入叙以会谈，1994年4月，美国务卿奔走游说于叙以之间；而叙以双方也都向对方发出呼吁，希望对方采取灵活、务实态度，实现"勇敢者的和平"。7月14日，以外长佩雷斯27年来第一次承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佩雷斯的表态顿使叙以和谈再现生机。8月8日，美国务卿提出新建议，主张3年内以色列完成撤军，第一阶段撤军后，叙利亚采取具体的关系正常化步骤。美方建议的内容还包括由美国明确保证以军撤出戈兰高地，条件是叙利亚接受美军驻扎戈兰高地，并建立预警系统和"无敌意"观察站。与此同时，叙利亚为促进和谈也采取了不少和平姿态，如允许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境，客观报道以约签署《华盛顿宣言》仪式，叙外长会见美籍犹太人领袖，接受以色列记者采访。特别引起以色列注意的是，阿萨德在9月新议会开幕式上说，和平是叙利亚的"战略选择"，叙准备为和平"接受客观提出的要求"。外电报道，叙利亚已表示"从戈兰高地撤军可以在合理的能够接受的期限内进行讨论"，主张以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即在1996年以大选前完成撤军工作。这表明，叙利亚实际上已不反对分阶段解决办法，较之原有立场已有所松动，但叙利亚对美方3年内撤军的建议当时未置可否。10月3日，拉宾在议会就叙以谈判发表4点政策声明。从4点声明内容看，拉宾政府接受了3年撤军的建议，声称"以军第一阶段撤出后，用3年时间检验

关系正常化”。这是叙以和谈以来，双方立场最为接近的一次。特别是以外长承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这似乎为最终解决叙以戈兰高地之争展现了光明的前景。但双方积怨太深，宿怨难解，双方和谈的任何一点举动都牵动着双方矛盾的全局。拉宾在暗示接受3年撤军建议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不得不安抚国内的反对派。在发表4点声明的同时，又宣称安全安排等需要进行“相互连结、并行执行”的谈判，如果签订和约需作出重大撤退(即暗示从戈兰撤军，但拉宾从不使用“从戈兰撤军”这个词语)，将付诸全民公决。拉宾政府关于“全民公决”的政策，无疑使刚刚露出一线光明的叙以和谈复杂化。叙利亚据此再度采取强硬立场，和谈又步入死胡同。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为他的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的行动付出了血的代价，被以国内右翼极端分子刺杀。1994年12月和1995年6月，叙以双方进行了两次总参谋长会谈，除此之外叙以双方没有任何其他公开的接触。有报道称，叙以双方曾有过秘密谈判，甚至几乎达成协议，但是受拉宾遇刺以及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大肆骚扰以北部边境等因素以及被严重毒化的和谈气氛和环境，使得叙以和谈难以走出困境。1996年4月，佩雷斯看守政府对真主党势力不断的骚扰以北部边境的行动进行大规模报复。佩雷斯政府本欲以打促谈，但是此举不仅恶化了叙以和黎以的关系，而且以国内的阿拉伯人倒戈，使佩雷斯这位积极倡导与阿拉伯人和谈的工党领导人失去了总理宝座，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以极其微弱的多数赢得大选，登台执政。当选总理后，内塔尼亚胡立即改变前政府的立场，并提出不建立巴勒斯坦国，不撤出戈兰高地，不讨论东耶路撒冷最终地位的“三不政策”。已经陷入停顿的阿以和谈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叙以

谈判也未能幸免而受到冲击。内塔尼亚胡不仅否定前政府的立场，声称叙以和谈必须从头开始，并否认叙以之间的秘密会谈。叙利亚则回应道，谈判从哪里停止就从哪里开始。在此后的4年中，叙以谈判一直陷入于停顿，直到巴拉克领导的工党再次执政，叙以和谈才重新启动。

1999年7月，以色列素有小拉宾之称的工党新任领袖巴拉克上台执政后，表示了愿意尽快恢复阿以和谈的立场，并声言一年内全面解决问题。由此，中断4年的叙以和谈在美国的撮合下，于1999年12月在美国的谢泼兹敦恢复。双方共进行了三轮会谈。由于分歧难以弥合，第三轮谈判结束时，双方宣布和谈无限期推迟，此后一直未能恢复。从会后透露的情况看，双方的分歧依旧：第一，撤军与签约孰先孰后。叙方认为：撤军是消灭侵略痕迹，执行安理会的决议；撤军后，以色列表明了和平诚意，叙愿意签订和约，此种安排合理合情。以方认为：必须先签订有约束力的和约，以色列安全得到保证后方能撤军。第二，撤军撤到哪一条线。撤军界线所涉及的领土并不很大，但却涉及双方至关重要的水资源问题。因此双方都表示不能让步。当以叙和谈再度陷入僵局时，以色列将和谈重点转向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谈判。2000年6月10日阿萨德总统去世后，以色列认为，在阿萨德的继承人初掌政权时，不大可能在和谈乃至对外关系方面作出有力的举措，因此以色列有将以叙和谈的日程向后推延的意图。美国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把调解工作的重点转向以巴和谈。

叙以和谈还涉及黎以和谈问题。1991年以来，叙黎特殊关系不断加强。在阿以和谈问题上，双方商定对以和谈要采取一致立场，即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捆绑进行。叙黎两国始终坚持这一立

场，并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例如，2000 年 3 月，阿盟外长会议就曾再次重申，黎以和平必须与叙以和平同时进行。叙利亚认为，叙黎两国的统一立场能够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有利于中东问题全面解决。谢泼兹敦以叙和谈再陷僵局后，以色列希望从黎巴嫩打开缺口，并于 3 月 5 日宣布将从南黎巴嫩安全区撤退。表面上看，以色列此举是要兑现巴拉克执政之初在"一年之内实现全面和平"的诺言。但此时提出撤军的目的，却有更为深层的意图。其意图是"一石二鸟"，即首先摆脱多年来因占领黎南部并设立安全区而引起的国际国内压力。早在 1978 年 3 月 19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要求以色列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425 号决议。长期以来，以色列借口为了维护其北部边境安全和叙利亚驻黎部队必须撤出等原因，始终赖在黎南部拒不撤军，因而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90 年代中期后，以国内虽然对真主党势力不断骚扰以方边境安全一致表示谴责，但同时主流舆论也逐步达成基本共识，即"安全区"不能保证安全，而为此又付出巨大财政乃至生命代价，不如尽早撤军，尽快与黎巴嫩实现和平。1998 年 4 月，内塔尼亚胡政府首次正式表示接受 425 号决议。巴拉克上台后也多次表示一年之内撤出黎巴嫩。其次，为了推动阿以和谈，巴拉克政府决心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在巴以、约以签订和约后，叙以和黎以和谈一直处于僵局之中。谢泼兹敦会谈后，以叙和谈又成"死棋"，而叙黎两国则始终坚持与以色列和谈必须捆绑进行的共同立场。为了解开叙以、黎以和谈的死结，以色列出此"险棋"，既可拆散叙黎联手，使黎巴嫩失去因以军占领其南部领土而不与其和谈的"托辞"，又可使叙军失去留驻黎巴嫩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试图绕过叙利亚，与黎巴嫩首先实现和平，并以此敲开以叙和谈

的大门。2000年2月27日,巴拉克再度明确表示,他愿意满足叙利亚方面提出的恢复和谈的条件——从戈兰高地全面撤军。当天,在一次为时7小时的内阁会议上,巴拉克对与会部长们说,如果某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色列将全部撤出戈兰高地。然而,紧接着3月5日,以色列内阁即通过从黎巴嫩撤军的决定。舆论认为,巴拉克此举旨在促进以叙尽快恢复和谈。此后,美国等大力斡旋叙以恢复谈判。3月底,阿萨德亲赴日内瓦与克林顿会谈,双方都宣称叙以和谈大门没有关死。事后,叙、美、以也表现出一些积极姿态,但和谈并没有恢复。6月10日,阿萨德去世,人们普遍感到,没有了阿萨德这位政治外交强人,叙以和谈在短期取得突破,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十章　现代叙利亚经济

一、经济发展的战略

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

1946年4月17日，叙利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最终结束了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叙利亚地处肥沃的新月地带，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世纪时，它以地中海沿岸的“粮仓”和棉花重要产地而著称于世界。16世纪以后，叙利亚被奥斯曼帝国所占领，20世纪初又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异族的长期占领和殖民主义者的肆意掠夺，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叙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直到独立初期，叙利亚仍然是一个农业和原料生产国。农产品在商品生产中占四分之三，在出口总额中至少占80%－85%；而在国民收入中，农业占三分之一，制造业仅占12%－15%。在工业中，手工业和小手工作坊占主导地位。

但是，叙利亚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矿产资源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已有的工业基础和比较充裕的人力资源等，都为其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叙利亚狭长的地中海沿岸、中北部的阿勒颇高原和许多大小河谷地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灌溉条件比较有利，适宜各种谷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东南部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自古以来是发展畜牧业的地方；东北部，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另外，叙利亚工业虽然不发达，并且以手工业和手工作坊为主，但仍然具备纺织、食品、建筑材料和皮革加工等工业基础。有些工业产品和半成品，除提供国内消费外，还能输出到毗邻的阿拉伯国家。

上述条件为叙利亚发展多样化的初级产品生产和输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此，选择和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和进口替代结合的战略，成为 50 年代以来叙利亚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模式。

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

叙利亚所谓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和进口替代相结合，中心问题是在发展传统农业产品生产和输出的同时，大力发展石油、磷酸盐等矿产品的加工生产和出口，以便增加外汇收入，积累资金，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

叙利亚在种植棉花方面历史悠久，中世纪曾是地中海地区重要产棉区之一。其主要产地有阿勒颇、哈马、德尔祖尔、腊卡，哈塞克和伊德利卜等省。叙利亚曾是法国等欧洲列强棉花原料的供应地，棉花在其出口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独立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一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例如，1955 年棉花出口收入占本年度外贸总收入的 58%，到 1970 年时仍占 40%。70 年代以来，

由于石油出口量的增加和原油的大幅度提价，石油在外贸收入中开始取代棉花，居于首位。但是，在叙利亚的经济发展中，棉花生产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因为棉花不仅为提供了仅次于石油的出口收入，而且还为它的纺织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所以，发展棉花的生产和输出，一直是叙利亚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的一个重点。

在发展棉花生产方面，叙利亚采取扩大种植面积，引进新的良种，推广现代技术，增加灌溉设施和施用化学肥料等措施，使棉花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46 年时叙利亚的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 2 万公顷，产量为 1.4 万吨。1950 年棉田面积增加到 7.8 万公顷，产量达到 10 万吨。1970 年棉田面积猛增到 24.9 万公顷，产量也相应增加到 38.2 万吨。70 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的跌落和自然灾害造成歉收等原因，叙利亚的棉田面积减少到 16 万公顷左右，产量保持在 33－35 万吨上下。

随着棉花生产的迅速发展，其棉花出口量和出口额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增加。1955 年，叙利亚棉花出口量和出口收入都获得了相应的增加。1955 年，叙利亚棉花出口量为 8.9 万吨，收入为 2.6 亿叙镑。60 年代以后，棉花出口量一直保持在十多万吨，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 年棉花收入增加到 3.1 亿叙镑，1979 年达到 8.29 亿叙镑。

60 年代末，叙利亚的油田正式投产，这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积极开发石油资源和发展原油出口，是叙利亚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战略的第二个重点。

70 年代末，叙利亚有三个主要油田：苏埃基亚油田、卡拉乔克油田和鲁麦兰油田。这些油田都分布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彼此相

距不远。勘探开发始于 50 年代中期,喷油投产则在 60 年代末。1968 年是叙利亚开始生产石油的第一年,石油产量为 103 万吨,第二年增加到 320 万吨,1973 年产量达到 554.3 万吨,1975 年为 642.6 万吨,1976 年达到了最高峰,为 1004 万吨。但 1976 年以后至 90 年代初,它的石油产量一直未超过 1000 万吨。1980 - 1984 年,产量分别为 920.3 万吨、949.3 万吨、901 万吨、840 万吨和 805 万吨。石油生产处于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叙利亚的石油储量有限。

叙利亚所生产的石油,因国内消费有限以及为了换取硬通货,大部分供应出口。1968 年,即开始生产石油的第一年,其原油出口量为 84 万吨,占总产量的 81%,1970 年出口量上升到 355.7 万吨,占当年总产量的 82%。1976 年以后,虽然产量趋于下降,国内消费量也有较大增长,但出口量仍占一半左右。1980 年石油产量为 920.3 万吨,除国内消费的 470 万吨外,其余全供出口。自 1974 年“石油危机”之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大幅度提高,叙利亚的石油收入也随之增加。1973 年,叙利亚原油出口量为 450 万吨,收入为 2.91 亿叙镑,占当年外贸收入总额的 21.7%。1974 年原油出口量增加不大,但收入猛增到 16.08 亿叙镑,占外贸收入总额的 55%。1976 年收入继续增加到 25.86 亿叙镑,占外贸收入总额的 62.4%。1979 至 1980 年的石油危机,使叙利亚的石油收入再度成倍增加。1980 年叙利亚原油出口量为 450.3 吨,收入达到 50.44 亿叙镑,占外贸收入总额的 63%。至此,在对外贸易中,石油取代棉花而居于首位,一直占出口收入总额 50% 以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发展磷酸盐的采掘和输出是叙利亚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

战略的第三个重点。磷酸盐的生产主要在帕尔米拉地区,储量大约为10亿吨。叙利亚于1971年在霍姆斯附近建立了第一个磷酸盐加工厂,最初产量为20万吨。1974年,又有两个磷酸盐工厂建成投产。在随后的几年中,相继建立了一些新的干燥厂,并对原有设备进行了更新和改造,磷酸盐的产量增长很快。1978年达80万吨。1979年至1982年,其产量分别为120万吨、130万吨、132万吨和146万吨。磷酸盐的出口收入也相应地从1980年的8900万叙镑增加到1981年的1.29亿叙镑。80年代初,叙利亚对科奈费斯地区的三个磷酸盐矿进行了扩建,同时在塔尔图斯修建了储藏设施,在霍姆斯新建了一个高级磷肥厂,1983年该厂的产量为330万吨。另外,叙利亚还发现了新的磷酸盐矿床。到1985年,磷酸盐的产量提高到550万吨,磷酸盐的收入增至5.8亿叙镑。

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战略的重点,叙利亚的棉花、石油和磷酸盐的生产在迅速发展,出口量也在不断增长,并成为国家的三大出口产品。此外,叙利亚还逐步扩大了其他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量,如食品、蔬菜、烟草、皮革、橄榄油、纺织品、玻璃制品和建筑材料等。在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同时,出口产品的去向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从前,叙利亚的出口主要面向东欧和阿拉伯国家。自70年代后期,逐渐扩大到西欧和美国。在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叙利亚的外贸收入增长很快。1970年,叙利亚的外贸收入总额为7亿多叙镑,1979年增加到64.53亿叙镑,1982年又上升到79.54亿叙镑。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合理地使用这些外汇收入,必须有计划地减少消费品的进口。因此,在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多样化的过程中,叙利亚同时努力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结合实行进口替代

的战略。

独立之后，为了增强民族工业企业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地位，叙利亚于1950年废除了“叙利亚—黎巴嫩关税同盟”，确立自己的关税自主权和叙利亚货币对外币的相对独立性，实行低税进口工业设备和高税进口本国已能生产的各种产品。到1956年底，叙利亚把近4000种进口商品，主要是同本国产品竞争的商品以及奢侈消费品的进口税由10%提高到50%。

同时，叙利亚颁发了工业发展条例，对新建的民族企业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规定新建企业在6年内免付执照税和按“固定资产”应缴纳的所得税。

另外，还采取措施限制外国资本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和管理权限；鼓励它们开发经营叙利亚国内尚无条件经营的新的工业部门。政府规定外国资本只能参与混合公司，而在这些混合公司，叙利亚人的资本投资额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并在公司管理机构中占有多数席位。

自1961年开始，叙利亚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在每个五年计划中，都把发展工业放在重要地位。在1966－1970年的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叙利亚的工业投资总额为4亿叙镑。1971－1975年第3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投资增加到11.73亿叙镑，占国家总投资的18.2%。1976－1980年的第4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投资猛增到112.98亿叙镑，占国家总投资的20%。1981－1985年的第5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投资上升到168.99亿叙镑，占国家总投资的16%。

几十年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叙利亚的工业发展比较迅速。1970－1978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1979年曾下

降到7.4%,但1981年又上升到20.09%。如果以1980年的工业指数为100计算,那么工业指数从1975年的77上升到1982年的112。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60年代以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占30%,工业所占比重不到15%。70年代,工业所占比例增加到19.5%,农业下降到19.1%。据《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在1982年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已占30%,农业占19%。

应当指出的是,在叙利亚的工业部门中,制造业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制造业包括纺织、食品、制糖、化学、机械和建筑材料等六个主要部门。60年代以后,叙利亚一方面对原有的部分工厂,特别是纺织部门的工厂,不断地进行改造、扩建,更新设备与技术;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后建成了许多新的工厂,主要有氮肥厂、轧钢厂、化工厂、造纸厂、机械厂、水泥厂、橡胶制品厂、汽车拖拉机装配厂和组装电冰箱、黑白电视机工厂等。按197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1970年制造业的增加值为5.75亿美元(折合23亿叙镑),到1981年,达13.18亿美元(折合52.72亿叙镑)。在1981－1985年的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制造业年增长率为15.3%,居经济各部门之首。到1985年,制造业的生产值达到102.1亿叙镑。

叙利亚工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一些基础工业特别是水电工业的发展。70年代以前,叙利亚主要依靠火电站发电。到80年代初,全国发展电量的70%以上是靠水电站提供的。全国总发电量从1950年的1.16亿度增加到1980年的40.2亿度。1966－1976年,每年电力的增长率为14%,是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之一。尤其是幼发拉底河水电工程,它对叙利亚的工农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该工程于1968年动工,包括修建一个长4600米、高60米、宽500米的拦河大坝(其蓄水量为120亿立方米,可长期灌溉64万公顷的土地)和一个装有8台涡轮机组的水力发电站。这项水利工程耗资巨大。部分资金和主要技术力量由苏联提供。1971－1975年的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它的投资额为15.93亿叙镑,占全国公共投资额的24.7%。第4个五年计划对它的投资为74.39亿叙镑,占公共投资总额的16.6%。该工程于1978年竣工。发电能力为60万千瓦时,是叙利亚当时全国最大的发电站。由于它的建成,叙利亚的电力一度供过于求,部分电力出口到毗邻的阿拉伯国家。1976年的电力出口曾达12.59亿度。

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叙利亚的进口替代程度不断提高。但替代商品主要还是一些轻工产品,仍然没有以机器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许多先进设备还得依赖进口。尽管如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叙利亚毕竟形成了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并具有一定生产水平的工业体系,这为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发展的措施

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

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间叙利亚在工农业方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叙利亚于1958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根据土改法的规定,土地的最高占有额为80公顷水地或300公顷旱地。这样,国家便从地主手中获得150万公顷

的土地，并把它分配给 25 万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 1963－1969 年期间，国家对土改法作出多次修改，把土地的最高占有额降低到 15－55 公顷水地或 80－200 公顷旱地。在土改过程中，国家又推行了合作化，建立农业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主要是那些少地的农民。1968 年，叙利亚全国共有 981 个合作社，1971 年发展到 1670 个。当时在全国农产品的生产中，合作社约占 40%。60 年代，因政治因素的干扰，土改屡经反复。70 年代初土改运动才接近尾声。

叙利亚独立后，即采取赎买的办法，把殖民地行政当局所拥有的，以及租让给外国垄断资本的企业收归国有。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又对烟草公司、铁路、电话和货币发行银行实行了国有化。1963 年，叙利亚的国有化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国家通过法令，把已经国有化的叙利亚商业银行和六家外国银行合并为五家大银行，由国家直接控制。1964 年又对七家最大的纺织公司和一家木器公司实行国有化。同时颁布了国家在十五家工业公司中参与 25%股份的法令。1965 年，叙利亚基本上对国内所有大中型企业和部分外贸机构实行了国有化。据统计，共有 106 家大中型企业被国有化，从而削弱了外国资本及私人资本在叙利亚的影响，并且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但是，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化运动，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却由于计划不周、经验不足以及缺乏经营管理和科技人员等问题，特别是一些政策过于武断以及腐败现象滋生，使一些国有化企业的生产效率不高。有些单位甚至长期亏损，成为国家的包袱，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重视私人资本、实行对外开放

在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叙利亚政府逐渐认识到，在国有企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对私营企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经历了 60 年代土改和国有化的阵痛之后，对私营经济有了新的认识。1974 年，叙利亚颁布了有关对经济放松控制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法令。在这一法令的指导下，也放松了对外汇的控制，允许私人进口商品和机器设备。随后，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城市开辟了六个自由贸易经济区，许可当地私人企业从事进口、加工和再出口的经营活动。另外，通过减免税收和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国内外私人资本对叙利亚的制造业和其他急待发展的部门进行投资。70 年代末，叙利亚私营部门的生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它们经营的范围集中在纺织、食品、皮革、造纸、化学和电器等轻工部门。私人资本的发展和利用，对叙利亚经济的主体国有经济起到补充作用，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私人经济为辅、两者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

在实行上述政策法令的同时，叙利亚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实行叙镑的双重汇率制，开设平行外汇市场，打击黑市活动，减少资金外流，以利于吸收侨汇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70 年代初期后，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医治“十月战争”的创伤和平衡财政赤字，叙利亚在充分挖掘国内资金来源的同时，积极争取外资外援，特别是积极争取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对于叙利亚这样的前线国家，阿拉伯世界的富有国家给予了慷慨援助。1974 年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决定，每年向叙利亚提供 1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78 年 11 月的巴格达阿盟首脑会议，又决定对叙

利亚的年援助额增加到18.5亿美元。另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叙利亚每年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家获得大笔资金,仅从沙特阿拉伯所得到的援助就高达十多亿美元。

与此同时,叙利亚还积极争取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外国公司和企业家的援助和投资。1975－1979年,美国向叙利亚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为4.38亿美元。世界银行为叙利亚的灌溉、教育等工程项目提供了4亿美元援助。西欧国家每年向叙利亚所提供的援助为1000万美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对叙利亚提供了大量援助。

在引进先进设备和进行技术合作方面,叙利亚与西德汽车子公司合办了一个汽车装配厂,耗资2.5亿美元(约合10亿叙镑)。另外,还有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印度、苏联、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的企业公司,其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叙利亚的工矿部门。争取外资外援来发展和繁荣国家经济,是叙利亚的一个长期政策。在1981－1985年的第5个五年计划的预算中,国家投资总额为1010亿叙镑,其中有94亿叙镑,即占投资总额的9.3%是依靠国外投资的。

加大智力投资、发展教育事业

叙利亚在独立初期,绝大多数人是文盲,仅有少数特权阶层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独立后,国家便开始实行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60年代以后,又采用各种方式,开展广泛深入的扫盲运动。70年代以来,叙利亚把开发智力和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增加投资,兴办各类学校,普及和提高教育水平。1945－1963年的19年中,叙利亚的教育投

资合计为3.5亿叙镑。而1971年当年教育经费就增至2.45亿叙镑。在三、四、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用于教育事业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据报道，在1983年和1984年，普通教育经费的支出分别为2.5亿和2.76亿叙镑，高等教育的经费支出分别为3.32和3.95亿叙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费用约占7%－8%。此后，叙利亚政府始终坚持促进和发展教育事业的政策。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叙利亚的国民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叙利亚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改革旅游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加外汇收入。叙利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首都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周围、地中海沿岸、幼发拉底河和阿萨德湖区，有许多名胜古迹和游乐场所，是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源。经过改革，旅游业不再由国家专营，而是成立各种形式的公私合营的旅游服务公司，充分发挥集体和私人的积极性，使旅游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经济的调整与改革

80年代中期后的经济危机

叙利亚经济在70年代经历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近10个百分点。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金的高投人。70年代中后期，叙利亚从海湾产油国及前苏联获得了大量赠款与贷款，使得经济的高投入政策得以维系。但是，这些资金首先是用于军费开支方面。其次才是投入于工业发展等项目以及灌溉、交通、

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大量的赠款与贷款弥补了国家预算赤字，特别是弥补了外汇收入的不足。在获得大量赠款与贷款的同时，侨汇收入也不断增长。1973－1976 年叙利亚所获官方赠款累计约 21 亿美元。1977－1981 年累计约 70 亿美元。但军费支出占据了其中很大的份额。

80 年代初期后，国外赠款及贷款大幅度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石油跌价，阿拉伯产油国对外援助锐减；另一方面是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与海湾国家存在分歧，来自海湾产油国的资本输入明显减少，1982－1985 年来自海湾国家资本输入约为 33 亿美元。侨汇收入也因海湾地区削减投资而减少。加之经济生活中结构性矛盾及 1982 年和 1983 年严重旱灾，叙利亚经济开始出现衰退。

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是外汇收入不足，汇率动荡，外汇存底告罄。为此，叙利亚政府实施了限制进口，调整叙镑与美元汇率，鼓励私人企业利用国外存款扩大进口，取消部分限制私人企业参与出口贸易等措施。上述措施未达到预期效果。贝鲁特金融市场叙镑与美元汇率从 1985 年 7 月 10 叙镑兑换 1 美元跌至年底 18 叙镑兑换 1 美元。此后汇率又进一步大幅度下滑。1985 年官方资本援助减至 6 亿美元，外汇储备降至 3.57 亿美元，外债总额增至 31 亿美元(如包括前苏联军事援助外债总额达 136 亿美元)。由于债台高筑，外汇储备告罄，不仅无力支撑进口贸易，并且失去还本付息能力，世界银行停止贷款。外汇严重短缺，国内半数以上国有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因而导致国内市场供应不足；另一方面，80 年代初以来政府预算赤字猛增，政府被迫向中央银行举债。据统计 1980－1985 年借债总额增加 4 倍，因而国内通货急剧膨胀。1986 年、1987 年市场物价大幅上涨，根据官方统计分别为

36%和60%。但据有关专家估计实际膨胀不低于100%。更为严重的是，宏观经济形势全面恶化，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猛跌5个百分点，叙利亚经济危机已成定局，其主要特征是外汇危机。

此外，农业发展缓慢，特别是国防开支庞大也是经济衰退乃至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农业本来是叙利亚的优势产业，但60年代土改失误、70年代重点发展工业的政策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的发展已落后于其他部门。例如1965年至1973年农业增长为负0.7%。当然应当看到的是，直到70年代初农业生产基本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且还能提供部分出口。1972年，叙利亚谷物出口27.8万吨，收入0.842亿叙镑。然而自此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却已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要求。1973年到1984年叙利亚农业平均增长6.8%。但1973年以来，食品进口却逐年上升。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国家不得不花去大量外汇购进食品。1981年叙利亚谷物进口耗资7.94亿叙镑，1982年有所下降，为3.64亿叙镑。但1983、1984年猛增到13.27亿和15.95亿叙镑。1985年食品进口共耗资25.57亿叙镑。当然，叙利亚每年也有一部分食品出口，以1985年为例，出口为16.93亿叙镑，收支相抵，赤字仍为9.46亿叙镑。自80年代初以来，叙利亚的外汇短缺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每年耗费大量业已十分短缺的外汇购买粮食，势必要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压力。需要指出的是，第5个五年计划(1981－1985)叙利亚对农业的投资已上升为各项投资之首。但从上述统计数字以及在该计划结束时的情况看，不利的农业形势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例如1986年仅小麦进口就达到93万吨，粮食

短缺依然如故。

多年来,叙利亚的国防费用一直占国家经常性开支的60%,居各项开支之首。1979年竟高达70%。1980年以后虽有所下降,但仍占50%左右。1980－1984年用于购买武器的费用超过了500亿叙镑(125亿美元)。据叙利亚官方宣布的数字,1984年以来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下降到30%。1987年的国防开支据报道为35亿美元。巨额军费开支不仅挤占大量的建设资金,也加剧了财政赤字,同时使国家负债累累。据1987年底的有关资料估计,叙利亚的外债总额已接近14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购买武器装备所欠的外债。

调整与改革的措施

1987年叙利亚改组政府。但是新政府并不认为经济已陷入全面危机,仅认为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了“经济困难”,其部分原因是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损害了叙利亚经济。同时也认为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背离了现行计划,存在失误和缺点。新政府没有提出明确的改革方案,仅承诺对不平衡现象进行调整。与此同时国内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不平衡问题,认为现行经济体制是有效合理的。此时正值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备受国际社会青睐,发展中国家普遍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国际环境。叙政府及新闻界认为叙利亚并不需要苏联的“新思维”,认为叙利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保护和重视私人企业的作用,土地归私人所有,市场化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的手段。某些媒体甚至公开批评私人企业,抨击忽视国有经济的现象,指责在旅游业及农业领域推进公私合营的政策。

1990年东欧剧变后，叙利亚国内经济改革步伐加快，舆论逐渐转向支持私营经济，批评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但是经济体制本身没有受到政府授权的新闻媒体的批评。尽管对国有企业的批评日益尖锐，但是这些批评从未涉及当时发展中国家及苏联东欧地区普遍推行的私有化问题。应该看到的是，叙利亚新闻界受政府的严密控制，舆论导向的变化反映了政府立场与观点的变化。

从危机之初至90年代初，叙政府始终没有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由于经济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外汇不足、汇率狂泻、外汇储备告罄，因此政府先后出台的调整与改革措施主要是制止汇率下跌，鼓励扩大出口，重视发挥私人经济在扩大出口、增加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由此引发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再认识及其调整。从时间上看，经济调整与改革缺乏明显的阶段性，但从过程看有较明确的针对性。

第一，调整汇率。1987年政府正式宣布叙镑贬值，规定11.2叙镑兑换1美元。1989年政府供应部将本部门进口的消费商品所使用的外汇对叙镑的汇率调至40叙镑兑换1美元。同时，经济与外贸部正式承认参照美元对叙镑的市场价确定叙镑币值。部分农产品出口商被赋予以市场价向国家商业银行出售出口所获外汇的优惠条件。随后其他出口商也被赋予上述优惠条件。1990年，政府进一步放宽限制，允许所有私人出口商以市场价向政府出售外汇。外汇持有者可以通过国家商业银行将外汇转让给急需外汇的进口商。至1991年，私人及私营企业的外汇交易一律按市场价交换。1992年，叙政府又进一步撤销出口商必须把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出售给国家商业银行的规定。至此仅存的国家外汇管制措施是，出售外汇必须通过中央或国家商业银行，继续以官方汇率

(11.2:1)衡量国有企业的进出口值,并且继续以官方汇率作为国家经济统计的依据。1993年中,国有经济部门的外汇交易也逐渐向市场汇率制转变。至此,完全由国家控制外汇及汇率机制完成了又一次向双轨制的转变。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变为外汇中介机构。

第二,改革外贸管理体制,鼓励私人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80年代中期前,对外进出口贸易基本由国有企业独揽。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早在80年代初,叙政府已采取过一些措施。例如1983年政府曾规定私人制造业可以参与对外出口,并可以将出口所得外汇50%留备自行进口所用。1987年,为了鼓励私人企业扩大出口,叙政府解除制造业以外私人企业不得参与进出口贸易的禁令,并将部分出口商品外汇收入的提留部分提高至75%。同时大幅度放宽私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允许私人或非叙利亚人在商业银行开设外汇账户。另一项举措是,允许私人代理商为无力赚取外汇的国有企业进口原材料。1990年,又赋予侨居海外的叙利亚人进口资本货物和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权利,私人进出口商可以代表国家外援机构从事外贸采购活动,放弃国有进出口机构对进口及批发进口商品的垄断权,撤销国有进出口机构优先采购专供出口商品的特权,国家仅保留重要农产品及被认为是战略物资石油等的出口垄断,但相应提高收购价。

第三,发展私营经济,拓宽投资来源。70年代初纠正运动后,叙利亚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发生一系列变化,私营经济已有所发展,私营经济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国内贸易等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旅游业、运输业及农业领域又出现了公私合营企业。1986年经济危机之后,叙利亚政府所采取的

调整汇率、改革外贸体制的主要动机是为私人企业松绑,鼓励私人企业扩大出口赚取外汇。1986 年底,工业发展部大幅度调整 1981 年政府制订的允许私营经济可以参与的工业部类序列表。1988 年 12 月,工业发展部进一步调整该序列表。新序列表只规定 30 种工业部类由国有部门专营,4 种部类由公私合营企业专营,其他所有经济门类私营企业均可涉足。至此,私人企业的经营范围空前扩大。

80 年代初期以来叙利亚经济已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80 年代后期日益突出。为了鼓励私营企业扩大投资并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叙政府于 1991 年 5 月颁布 10 号投资法令。这是 80 年代中期以来叙利亚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措施。由此叙利亚经济调整与改革进入新的阶段。10 号投资法鼓励所有私人企业及非叙籍阿拉伯人及外国投资者在叙利亚所有经济领域进行投资。投资额不得低于 1000 万叙镑。所有投资项目由国家最高投资委员会统一审批、统筹管理。投资项目应有利于促进国家收入和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和转让技术。投资项目可享受 5－7 年免税优惠待遇,并保证有权将利润转往国外或收回投资。与 10 号法令相配套,叙政府还颁布 20 号法令等。

第四,转变经济模式,发展外向型经济。1988 年前后政府及舆论界仍然强调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强调自力更生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重要性。1990 年前后,政府态度及舆论导向开始发生变化,经济主管部门的调整及改革措施逐渐脱离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重视私营经济,把对外贸易置于优先地位,放弃国有银行职能。同时强调国有企业生产的外向化,要求国有企业适应国际市场,将国有企业的进口与出口联系起来,规定任何国有企业如不能赚取

外汇，中央银行及国家商业银行拒绝提供进口所需的外汇。国有企业不再固守以往只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保证社会稳定的原则。鼓励国有企业出口一切可以出口的产品，甚至不惜牺牲国内消费。1989年6月，叙利亚经济发展部公开指出："出口是我们今天经济领域工作的中心"。10号法令的颁布是叙利亚经济模式及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它同时表明，在经济不断外向化的同时，经济结构中私营经济成分被充分肯定，公私合营企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形成了国有、私营、公私合营三分天下的混合型经济结构。

调整与改革的初步成果

随着经济调整与改革措施的推进，90年代初叙利亚经济开始发生可喜的变化。如前所述，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个百分点。1987－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回升，年均增长达到4%。而1990年至1991年年均增长竟达到8%。截止1995年，年均增长保持在6%以上。上述数据说明，叙利亚经济已经摆脱危机。调整与改革的另一项业绩是对外贸易明显改善。1989－1991年连续3年实现贸易盈余。外贸收入的改善有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原油出口扩大的因素，但调整与改革措施显示出积极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987年私营经济出口占非石油出口份额的33%，1992年上升至70%。在非石油进口中1987年私营经济占25%，1992年达64%。80年代初，私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仅占10%，1986年也仅为20%，1990年上升至45%。从投资方面看，调整与改革措施也取得一定成效。叙政府原订，1991－1992年度预算投资总额为600亿叙镑。1991年10号投资法颁布后，截至1992年底私人投资高达934亿叙镑。私营经济投资创造了56000多个就业机

会。90年代初私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55%。其份额在农业领域高达98.6%,在制造业占44%,在交通运输业占72%,在国内贸易中占62%,在租赁业占59%,在建筑业占50%。1991年在私营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75%。

在1991年10号投资法的刺激下,各类投资项目成倍增加。至1992年底,项目申请732项。其中运输业297项,食品加工107项,纺织服装62项,化工及磷酸盐开采加工67项。这一势头持续至90年代中。据叙利亚经济部长估计,截止1994年上半年,新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约合38.5亿美元。农业形势的好转值得一提。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主体,但是农业发展长期以来滞后于其他部门。在80年代两个五年计划中,政府逐步扩大了对农业的投入。1986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在农业领域建立公私合营企业。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着手农产品价格改革。除棉花、小麦等以外,政府提高了多数农产品的收购价与销售价,使之接近于市场价。对化肥、种子及杀虫剂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补贴从50%降至30%以下。1990年以来农业及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初步改变了农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

经济好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石油工业的进步与原油出口收入的增长。1984年,在东北部地区发现了新的油田,1986年底开始规模性生产。到1992年石油日产量达到56万桶,其中2/3产自新油田,而10年前叙利亚石油日产量仅为20万桶。石油收入随着出口扩大而日益增加。1989年为10亿美元,1992年上升至20亿美元。此时恰逢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叙政府在危机与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使它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战争前一年,叙利亚从海湾产油国所获得的官方资本援助仅为1.27亿美元,1991年和

1992年海湾产油国对叙利亚资金援助猛增至25亿美元。石油收入和官方资本援助的恢复与扩大，大大改善了叙利亚的国际收支。

困难与问题

经济形势的好转为叙利亚经济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由于政治因素以及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1995年后叙利亚经济改革势头减弱，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弊端依然如故，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改革方案。在财政、金融方面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否确定联系汇率制，以及是否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等，政府决策部门议而不决、举棋不定。由于部分开放外汇管制，外汇汇率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加之国际收支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受外汇紧缺压力的影响，1994年叙镑再度贬值。

叙政府对市场经济怀有既喜又忧的矛盾心态。在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担心私营经济不断壮大以及由此形成对国有经济的冲击和压力，会使政府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因此，叙政府对国有经济依然采取保护措施，使之避免竞争压力；而对国有经济是否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则是疑虑重重，对私有化更是谈虎色变。国有经济改革进程缓慢，甚至止步不前的首要原因是政治因素。长期以来，叙政府认为国有经济具有战略性地位，国有经济是保证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叙政府认为，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国有经济是政府必须掌握的经济命脉，因而在对国有经济实施的任何改革都必须考量国际因素。叙利亚国内对改革的争论涉及到叙经济的方方面面，但各方对国有经济改革的意见分歧十分突出。而政府方面又提不出完整具体的措施。

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可以说在较大程度上取决政治因素和政治家及决策者的政治意愿,而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调整又是叙利亚经济全面改革与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外财政援助逐步恢复和增加,一定程度上使政治家及其政府对经济发展增强了信心。然而现实却是,90年代后期叙利亚经济改革不仅失去了动力,而且经济形势向不断恶化的方向发展。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又开始在低谷中徘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8%。据叙利亚著名经济学家穆罕默德·陶菲克估计,未来十年仅创造就业岗位就需要投入40亿美元。重建经济需要大量外资投入,但国内经济立法严重滞后,金融及银行系统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执政10多年的祖阿比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不仅无力推进改革,缺乏适应时代发展的应变能力,而且面对新的经济困难时显得力不从心。1999年3月,阿萨德连任总统后,雄心勃勃地誓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并对政府的工作表露出不满。2000年2月主持复兴党领导机构成员会议时阿萨德在国内问题上表示,必须根据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进行改革,以顺应民意。随后,与会的复兴党领导人讨论了政府改组和总理人选问题,并确定了以改组促改革的国内政治经济方针。3月13日,以米罗为首的新政府成立。新内阁成员中仍保留了原政府中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这意味着叙利亚将以谨慎而稳健的姿态推动经济改革,也意味着叙政府短期内的经济、政治等各项政策将不会有大的变化,其经济改革与振兴仍需进一步观察。

第十一章　黎巴嫩共和国的政治与经济

一、教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长期的教派割据

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中惟一的由信仰伊斯兰教和信仰基督教两大宗教居民组成的国家；到 80 年代初，前者人口约占 60%，后者约 40%。黎巴嫩国家是"建立在教派结构基础之上"的、更以教派分权为基本特色的教派分权制国家。这在当今世界是一种很特殊的国家组织形式。

黎巴嫩只有 300 多万人口、1.04 万平方公里面积，却有 100 多个党派团体、30 多支民兵武装和数十家电台，代表着不同的教派、家族和党派利益。但它们在总体上分别属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内又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基督教内又分为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和亚美尼亚天主教等派。家族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也有一定影响，一个教派往往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政党组织则附属于教派和家族，在政治地位上不显重要，至今还没有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

长期以来,教派和家族各据一方,各自为政。所有黎巴嫩人就“生活在家族和教派的结构网内”,对他们来说忠于教派和家族高于一切。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黎巴嫩是个国家,但却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能够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的力量。

这种特殊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黎巴嫩既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巴勒斯坦毗邻,又靠近伊斯兰教的诞生地麦加;境内多山谷,居民在历史上几乎总是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在长期的历史中还成为中东地区宗教“少数派”的“避难所”。一些教派在别的地方受压抑,就迁往黎巴嫩安身,在这里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例如:当今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的基督教马龙派,是在公元 7 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过程中从叙利亚移民黎巴嫩山区的,他们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社会组织,成了“伊斯兰大海中的一个孤岛”。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曾称他们是“荆棘中的玫瑰花”。近一个多世纪来在黎巴嫩政治舞台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德鲁兹派,则是 11 世纪时从什叶派分裂出来的一个旁支,由埃及移居黎巴嫩中部舒夫山区定居至

今。亚美尼亚人则是在20世纪初为逃脱土耳其人的迫害和屠杀从小亚地区迁居黎巴嫩的，1924年获得黎巴嫩公民权。这样，在黎巴嫩就形成了多种宗教教派杂处、各自为政的局面。

黎巴嫩的教派割据，也与黎巴嫩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长时期统治期间所享有的自治权密切相关。黎巴嫩7世纪中叶为阿拉伯帝国占领，16世纪并入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帝国伍麦叶哈里发政权在大马士革达到全盛时期，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也没有被迫服从伊斯兰教，而享有自己的封地。奥斯曼素丹同阿拉伯的哈里发一样，“集中精力去处理更重大和更迫切的问题，认为姑且让那些少数山民独立行事是有好处的。真正的危险是在波斯和埃及方面”。因此，席卷这个地区的征服风暴最后没有进入黎巴嫩山地，那里的人们还在固守着祖先的传统生活方式。黎巴嫩强有力的本国统治者如法赫鲁丁（卒于1635年）和谢哈卜家族的巴希尔（卒于1850年）甚至敢于抗拒土耳其政府，几乎独立地进行统治。19世纪40年代，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之间开始发生流血冲突，土耳其政府认为马龙派和德鲁兹派的合作已属不可能，于是在1843年明确规定：黎巴嫩山区为自治区，北部由一个马龙派人管辖，南部由一个德鲁兹派人管辖，两人均由居住在西顿的土耳其帕夏任命，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被定作分界线。这就促进了黎巴嫩教派割据局面的发展。

教派政治体制的确立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加紧瓦解、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利用黎巴嫩的上述独特形势，为其入侵中东服务。1858－1859年在黎北部深山里的雷冯村，在马龙派教徒中发生了

马掌铁匠领导农民剥夺封建主卡金家族地产的内部社会动乱事件。事件的成功鼓舞了南部马龙派教徒起来反对德鲁兹封建主。1860 年 4 月,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在马腾与舒夫的杂居地带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几个星期中,60 多个村庄化为灰烬。双方伤亡达 2 万多人。在冲突中,马龙派显得没有组织和没有领导,德鲁兹派则在共同的封建首领之下结成联合战线。法国与黎巴嫩马龙派早有联系,而且以马龙派的保护者自居,此时就借口保护黎基督教徒,派出 7000 名军队登陆贝鲁特。法国军队追击德鲁兹派武装人员直至南部山区和贝卡谷地。接着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商讨组织黎巴嫩新政府的方案。

1861 年 6 月 9 日,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共同签署了黎巴嫩组织法,规定黎巴嫩为奥斯曼帝国内的一个"自治区",土耳其军队不再驻扎境内,黎公民没有服兵役和向土耳其政府进贡的义务。组织法令规定黎巴嫩"由土耳其政府任命的、并经签字国同意的一个信基督教的行政长官来统治",并规定"成立一个由各教派代表 12 人组成的民选行政参议会协助长官工作"。这就首次正式确立了黎巴嫩以教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根据 1920 年 4 月协约国圣雷莫会议的协议,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实施委任统治。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法国同年把当时属叙利亚的特里波利、贝卡谷地、西顿和提尔等地区并入黎巴嫩建立"大黎巴嫩",使黎疆域面积几乎增加一倍,人口由 40 多万扩至 62 万。扩大的人口中主要是什叶派及其他文化水平较低的穆斯林,这就使原来基督教徒占多数的状况改变成基教徒和穆斯林的人数大体平衡的状况。

1926年法国委任当局公布宪法，规定“设置一个民选的总统和议会”，“指明议会议员按各教派人数的比例分配”。这就发展为以教派人数分配权力的方式。当时还规定，总统由马龙派担任，总理由逊尼派担任（第一任总理当时仍是马龙派人士，此后改由逊尼派出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1926年宪法至今仍然是黎巴嫩的有效宪法。它确保了分权制的黎巴嫩政权统治形式沿袭至今。

1932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进行人口普查。黎巴嫩共有860829人，其中基督教徒452281人，占52%；穆斯林398079人，占45.5%。据此，黎巴嫩的政治和行政职务就按照6:5的比例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分配，同时还包括议会议席、内阁部长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1943年民族公约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马龙派领导人比沙拉·扈利和逊尼派领导人里亚德·索勒赫一起讨论了独立后的建国方针。他们达成的协议虽未写出明文，也未签字，但被称作“民族公约”，作为“黎宪法程序的基础”而遵行。鉴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对于黎巴嫩特性的认识有分歧（基督教徒主张保持和西方的关系，穆斯林主张完全具有阿拉伯的特性），扈利和索勒赫达成妥协，明确黎巴嫩“将和阿拉伯世界具有共同的特性，但将不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各教派之间的平衡，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应维持现状。因此，按教派分配政府权力的做法继续下来。公约规定国家3个最高职位（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仍依次分别由马龙派人、逊尼派人和什叶派人担任；军队司令由马龙派人担任；副总理和议长由第四大教派希腊东正教人担任；议会席位、内阁阁员和行

政机关人员同样以1932年的普查为基础,按6:5的比例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分配。这样中央军政大权掌握在马龙派手中。

扈利和索勒赫分别担任了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和总理。扈利成功地把各主要教派领导人吸收到政府里,从而"防止了黎巴嫩的分裂,保障了黎巴嫩作为独立国的存在",但他也"助长了教派主义","使教派主义以后成为黎巴嫩政治生活的标志"。他的政府中,外长是基督教徒,内政部长是逊尼派人,国防部长是德鲁兹派人。这也作为一种惯例沿袭下来。议会议席开始是55席,后增加到99席,《塔伊夫协议》后又增加至108席,1992年再次增加到128席。每次变动总是保持6:5的比例。

教派主义是黎巴嫩政治制度的基石,跨教派和跨地区的党派和团体不可能发展,各教派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他们传统的显赫地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由此黎巴嫩成为了一个多中心的国家。

1958年内乱

50年代,穆斯林随着其人口的增加,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权力的呼声开始上升,与基督教徒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他们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要求,以改变被压迫的处境。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纳赛尔的声望大增。在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鼓舞下,黎巴嫩穆斯林的要求更加强烈。而黎巴嫩夏蒙政府1957年却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夏蒙本人为使自己连任总统,遂决定修改宪法。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黎巴嫩国内局势骤然紧张。纳赛尔呼吁黎巴嫩人民"追随阿联的方针","迫使政府与西方决裂"。夏蒙则立即宣布黎巴嫩不会参加阿联或阿拉伯联邦。这样,在5月份由于特里波利和贝鲁特的暴

动和示威而引起反政府的穆斯林与亲政府的基督徒之间一场内战。穆斯林部分控制了首都贝鲁特、特里波利、西顿及北部和南部一大部分地区。贝鲁特从黄昏到清晨连续5个月宵禁。黎巴嫩军队在福阿德·谢哈布将军领导下,在冲突中坚守中立。7月14日伊拉克卡塞姆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叙黎边界局势紧张,阿联部队陈兵边界。20日,美国1万名海军陆战队员应夏蒙政府的要求在贝鲁特登陆,进驻了贝鲁特市区和郊区,"帮助马龙派镇压了穆斯林夺权的企图"。这期间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达成了妥协,夏蒙不再连任,而选举谢哈布将军为总统。谢哈布9月就职。10月25日美军离境。局势暂趋平稳。

到60年代和70年代,穆斯林人数超过了基督教徒人数,在黎人口中已占60%多,与基督教徒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益发尖锐。基督教徒担心,如总统职位一丢,议会席位多数又被非基督教徒占有,他们的地位就将降到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基督教徒一样,"例如,类似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虽然他们人数比黎巴嫩总人口还多,但对国家的政治不起真正的影响"。因此,基督教徒反对改变政治体制,主张"保持现状"。

二、旷日持久的内战

内战的爆发

60年代末,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逐渐转移到黎巴嫩,特别是约旦"黑9月事件"后,巴解主力进入黎巴嫩南部及中部地区,黎巴嫩随之成为阿、以冲突的热点之一。对巴解力量的进入,黎巴嫩内部

各派之间意见不一。大多数基督教派别对此持反对态度，而各穆斯林派别则表示欢迎，各派之间因此隔阂加深，并逐渐发展成武装冲突。巴解进入黎巴嫩后，与穆斯林派别结盟，因而打破了原有两大教派的力量平衡，加之外来势力的参与和干涉，1975 年一场规模空前、持续 16 年之久的内战爆发。

1975 年 4 月 13 日，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长枪党为打击部分穆斯林教派的武装力量和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势力，以反对巴勒斯坦难民迁居黎巴嫩为由，调动武装力量，在贝鲁特艾因鲁马纳地区袭击了巴勒斯坦人并向巴勒斯坦人聚集的居民区进攻，黎穆斯林各派别联盟组织——黎巴嫩全国运动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立即组成联军进行反击。至此，黎巴嫩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并直接影响到中东地区局势。1976 年 10 月 18 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科威特、沙特和巴解五国六方首脑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达成了在黎实现停火、派遣“阿拉伯威慑部队”、执行黎、巴之间的《开罗协议》等决议。这些决议在第 8 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获得各方认可。根据有关决议，沙特、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派出 3 万多阿拉伯威慑部队(其中叙军 28000 人)进入黎巴嫩，维持停火，内战渐趋平息。但是，由于黎巴嫩基督教派坚持要解决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南部的问题，双方战事处于僵持局面。1977 年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叙利亚三方签署了《什陶拉协定》，重新确定了有关方面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阶段内战给黎造成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 750800 亿黎镑，4 万多人死亡，10 多万人受伤，约几十万人逃亡国外。

1978 年 3 月 15 日，以色列为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主力，大举入侵黎巴嫩，并占领了利塔尼

河以南近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19日，联合国安理通过425号决议，呼吁各方尊重黎巴嫩主权，决定向黎巴嫩南部派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维持和平部队”。4月14日，以色列开始分阶段撤军。27日黎巴嫩议会举行会议，通过6点决议：执行联合国安理会425号决议；停止巴勒斯坦人或非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领土上的武装活动，禁止任何武装存在，重建黎巴嫩政府军；全国实现社会公正；有关各方认真实施议会决定的各项决议。但是黎巴嫩各派对此决议均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基督教马龙派认为决议已明确规定取消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南部的武装；而穆斯林社会进步党等议员则强调，该决议并不要求废除黎巴嫩与巴勒斯坦之间于1969年已达成的《开罗协议》。以色列军队撤离时，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扶持原黎巴嫩马龙派退役军官哈达德在黎巴嫩与以色列交界处黎方境内成立“独立的自由黎巴嫩国”。尽管未被承认，但使局势更加复杂。

外部势力的介入

叙利亚、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强国，在黎巴嫩均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特别是安全利益。出于各自的利益，叙、以两国在黎巴嫩内战愈演愈烈之际直接卷入黎内战，加之美苏出于争霸中东的需要，对黎巴嫩内战各方及对介入黎巴嫩内战的各外部势力施加各种政治、军事影响，致使黎巴嫩内战日益复杂化、持久化，并向国际化演变。

1978年后，叙利亚改变了原来倾向基督教马龙派民兵的立场，转而公开支持穆斯林左派势力。1978年7月，叙利亚军队与黎巴嫩马龙派民兵在贝卡谷地发生了“百日大战”。10月15日，

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同参加或资助阿拉伯威慑部队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在贝鲁特附近的贝特丁召开会议，讨论黎巴嫩问题。与会者对黎巴嫩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重建军队，解除非法武装和实现黎巴嫩全国和解取得一致意见。1980年3月5日，黎巴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了全国和解的14点纲领。由于黎巴嫩各派政见不一，此纲领未能奏效。

1981年4月，叙利亚军队与黎巴嫩长枪党民兵在贝卡谷地的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导致黎巴嫩局势再度恶化，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叙以导弹危机"。28日，以色列派飞机轰炸了在黎巴嫩扎赫勒市附近的叙军阵地，并击落叙军两架直升飞机。翌日，叙利亚调遣7000人的增援部队和几组苏制萨姆－6防空弹进驻贝卡地区，接着又在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萨姆－2地对空导弹。这样叙利亚以阿拉伯威慑部队名义进驻黎巴嫩的军事人员总数超过3万并配备导弹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以色列认为叙利亚在黎的军事部署直接威胁到其在黎巴嫩的制空权，要求叙利亚撤走导弹设施，否则将用武力予以摧毁。叙利亚拒绝撤出并继续增加导弹部署。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步步升级。前苏联加紧对叙利亚的支持和渗透。美国为防止前苏联插手，派出总统特使哈比卜穿梭于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三方，从中调解。7月24日，美国在沙特等国配合下，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停火协议的同时，也促使叙以达成危机解决办法，由此"叙以导弹危机"宣告结束，黎巴嫩局势出现暂时平静。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遇刺，悍然出兵进攻黎巴嫩。在6天之内占领了黎巴嫩1/4的土地，攻陷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的大部分基地。6月9日，以色列占领军

与叙利亚驻黎巴嫩部队开始交火。14日,以色列集中兵力包围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所在地。8月18日,黎巴嫩内阁会议通过了美国里根总统特使哈比卜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贝鲁特问题的方案。经过美国特使哈比卜的斡旋,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三方于19日达成协议。美国特使哈比卜的方案是: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和叙利亚军队撤离贝鲁特西区;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派兵组成多国部队进驻贝鲁特。8月21日至9月1日,巴解游击队全部撤出贝鲁特并陆续转移到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8个阿拉伯国家。9月18日,得到以色列支持的部分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军队的配合下,对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大屠杀,1000余名巴勒斯坦难民被杀。这一暴行激起了世界的公愤。20日,美国派遣1200人、法国派遣1600人、意大利派遣1000人组成多国家部队于10月2日再次进驻贝鲁特及效区。一直到1984年1月美、法、意三国驻军才开始撤离。

寻求和解之路

1982年8月23日,贝希尔·杰马耶勒当选为黎巴嫩总统,但不到一个月就遇刺身亡。9月21日,其弟阿明·杰马耶勒当选为新任总统。他在宣誓就职时把制止暴力和实现国家统一作为首要目标。

1983年9月4日,以色列占领军自黎巴嫩中部舒夫山区撤至南部阿瓦利河一线,黎巴嫩政府军和长枪党武装力量同以琼布拉特领导的德鲁兹民兵为争夺以色列撤出地区的控制权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9月5日,黎巴嫩交战各方在沙特和美国的斡旋下

达成停火协议。10 月 31 日 - 11 月 4 日,杰马耶勒总统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由黎巴嫩各派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和解会议。1984 年 2 月 2 日黎巴嫩战火再起。穆斯林什叶派阿迈勒运动武装力量向政府军发动军事进攻,并控制了贝鲁特西区。与此同时,德鲁兹民兵在舒夫山区同政府军短兵相接。3 月 5 日,黎巴嫩政府被迫宣布废除黎以撤军协议,交战各方开始停火。3 月 12 日 - 20 日,杰马耶勒总统在瑞士洛桑主持召开由黎巴嫩各派领导人参加的第二次全国和解会议,达成 6 点和解决议。由于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解会议决议未能兑现。

1985 年 12 日,黎巴嫩基督教组织黎巴嫩力量司令埃利·胡贝卡、穆斯林什叶派阿迈勒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和德鲁兹民兵领导人瓦利德·琼布拉特三大首领在叙利亚主持下签署了旨在结束黎巴嫩内战的和平协议。但在基督教马龙派强硬派势力的反对下,这一协议也名存实亡。1986 年 5 月,基督教马龙派提出解决黎巴嫩问题的方案,又遭到穆斯林方面的拒绝。1987 年 5 月,黎巴嫩总理兼外长、穆斯林逊尼派的重要领导人卡拉米提出辞职,虽然未获总统接受,但实际上内阁早已处于瘫痪状态。6 月 1 日,卡拉米总理被刺,后由教育和劳动部长萨利姆·胡斯出任代总理兼外长。1988 年 5 月 6 日,阿迈勒运动民兵和真主党民兵为了争夺对贝鲁特西区南郊 60 万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的控制权又发生了武装冲突,经过 3 周的激战,最后以叙利亚军队进驻该地区而告终。8 月 18 日至 9 月 22 日,黎巴嫩总统选举失败。阿明·杰马耶勒在离任前根据宪法规定,任命了由 6 名军官组成的黎巴嫩临时军政府,武装部队司令米切尔·奥恩担任总理职务。在叙利亚与穆斯林的支持下,黎巴嫩穆斯林派领导人于 2 月 3 日宣布,代总理胡斯领导的

内阁仍为合法政府。胡斯表示愿继续主持原政府的工作。自此，黎巴嫩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没有总统、以奥恩将军为首的看守政府和代总理胡斯为首的临时政府的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

《塔伊夫协议》与内战的结束

1989年3月14日至9月22日，以奥恩政府军和黎巴嫩力量为一方与以叙军和穆斯林民兵为另一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港口之战”。这次派别冲突波及黎1/3以上的领土，死亡1000多人，伤4000多人，几十万人逃离家园，经济损失约12亿美元。为此，沙特阿拉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组成阿拉伯三方委员会，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主持召开会议，黎巴嫩62名议员参加，其中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教派各占一半。会议讨论了三方委员会起草的黎巴嫩“民族和解宪章”，通过了妥协折中的《塔伊夫协议》，其内容主要是政治改革和主权问题。11月5日，黎巴嫩议会批准了该协议。政治改革主要是权力分配问题，但协议也确认了“分阶段消除政治教派制度”的原则。在未明确规定的过渡时期内，基督教方面继续保留担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权力，穆斯林方面扩大了总理和议长的权力。主权问题主要是叙利亚撤军。确认黎巴嫩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先将叙军部分撤至贝卡地区，然后由黎、叙两国政府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最终撤军问题；黎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均为“兄弟关系”，但同时又承认了黎、叙两国有“特殊关系”。对这个协议奥恩方面和真主党坚决反对，其他各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黎巴嫩议会根据《塔伊夫协议》于1989年11月5日选出穆阿瓦德为总统。17天后，穆阿瓦德在一次爆炸事件中不幸身亡。24

日，黎巴嫩议会重新进行总统选举，埃利亚斯·赫拉维当选总统。赫拉维总统上台后迅速任命胡斯组成内阁，宣布解散1988年9月阿明·杰马耶勒任命的临时军政府，解除奥恩将军的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限奥恩在48小时内放弃权力，由埃米德·拉胡德接替奥恩的职务，但奥恩将军拒绝接受。拥有2万多人的奥恩军队和黎巴嫩一些基督教派人士认为，奥恩将军的政府是惟一合法政府，指责赫拉维总统及其新内阁是在叙利亚的控制下行使权力，表示将采取坚决抵制态度。赫拉维总统多次表示，决不允许在黎巴嫩出现两个政府局面，决心用武力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黎巴嫩两派又爆发了持续半年多的极为激烈的武装冲突。

1990年1月，赫拉维总统访问叙利亚，双方就继续对奥恩将军保持压力达成一致意见。此后，黎巴嫩政府在军事上围困奥恩将军控制的贝鲁特东区；在经济上，下令中央银行拒绝向追随奥恩将军的官兵支付薪金，要求法国冻结奥恩在法国银行1500万美元的存款。叙利亚方面向黎巴嫩不断增派部队，使其驻军超过4万人，准备协助黎巴嫩政府对奥恩施加压力。为尽早消除黎巴嫩危机，阿拉伯三方委员会继续积极斡旋，美、法等国也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力求为奥恩离开巴卜达总理府找到妥协途径。奥恩则表示，在主权问题上决不屈服。随后，奥恩军队与穆斯林民兵在贝鲁特东西区的绿线附近发生武装冲突。经过4个多月断断续续的火并，奥恩与黎巴嫩力量等组织在多方调解下于5月26日同意签署停火协议。这次武装冲突有1035人死亡，2770人受伤。此外，为争夺对120万穆斯林什叶派居住区的控制权，叙利亚支持的阿迈勒运动民兵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民兵在黎巴嫩南部的西顿地区也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后经叙利亚和伊朗调解，阿迈勒运动与真主

党于11月5日达成和解协议。

1990年7月11日，黎巴嫩内阁举行全体会议，要求所有军事人员从贝鲁特撤出，以此作为结束黎巴嫩内战的第一步。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要求，黎巴嫩冲突各方停止武力行动，并就《塔伊夫协议》进一步表明各自的立场，奥恩军队停止反抗，其军队加入合法的政府军。30日黎政府发布命令，所有军事哨卡禁止任何运载燃料、武器和其他生活物资的车辆进入奥恩控制区，重申禁止银行向其提供资金。黎巴嫩外交部通知各国驻黎巴嫩使领馆，各国的外交人员不得与奥恩方面进行任何接触。9月7日，奥恩提出解决危机的5点建议：要求萨利姆·胡斯辞去黎巴嫩总理职务；重新成立包括黎巴嫩所有民兵组织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该政府成立后30天内奥恩将其控制的贝鲁特东区陆军司令部交给武装部队总司令拉胡德；最后解散黎巴嫩各派民兵组织。21日赫拉维总统签署由基督教和穆斯林两派平分最高权力的政治改革方案。

10月10日，驻扎在黎巴嫩贝鲁特西区的叙利亚军队出动了1.7万名武装人员，动用大量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配合黎巴嫩政府军，完成对贝鲁特东区奥恩部队驻地最后的军事部署，形成了叙黎联军与奥恩部队对峙的局面。翌日，黎巴嫩力量民兵为支持黎巴嫩政府军的行动，率先向奥恩部队发动试探性进攻。第三天，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部队向奥恩控制区发动全面进攻。首先由叙利亚空军战斗机对奥恩总指挥部进行猛烈轰炸。接着，叙利亚和黎巴嫩步兵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分3路逼近奥恩居住的总理府和国防部。最后，奥恩被迫命令下属部队归顺拉胡德将军，自己则逃往法国驻黎巴嫩使馆请求政治避难，黎巴嫩政府军收复了

曾被奥恩控制两年多的总理府和国防部，黎巴嫩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最终结束。经黎巴嫩政府允许，奥恩于1991年8月侨居法国。

1990年10月24日黎巴嫩政府宣布，凡部署在卡勒布河以南、达姆尔河以北40平方公里范围的贝鲁特市区及郊区的各派民兵，必须自动撤出，由拉胡德将军统帅的黎巴嫩政府军接管。阿迈勒运动、社会进步党所属的德鲁兹民兵表示同意撤出该地区。真主党和黎巴嫩力量则态度暧昧。11月20日，黎巴嫩力量和长枪党代表与赫拉维总统达成协议，基督教民兵撤出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军从21日起逐步接管黎巴嫩力量和长枪党的民兵、武器和在东贝鲁特的设施。29日，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巴武装力量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和黎巴嫩政府军在贝鲁特地区的部署达成协议。巴勒斯坦方面同意将其武装于12月3日前撤离贝鲁特南部50公里的地区。12月4日，黎巴嫩力量民兵撤出贝鲁特，至此黎巴嫩民兵全部撤出首都地区，"大贝鲁特安全计划"的第一步宣告完成。

1990年12月19日，胡斯总理辞职，赫拉维总统授权奥马尔·卡拉米组阁。24日，卡拉米宣布组成由30名成员组成的"扩大民族和解政府"，基督教、伊斯兰教派人士各占一半，其中增设9名国务部长。新政府施政纲领确定：继续巩固"大贝鲁特安全计划"，恢复政府在全境行使权力；解散民兵组织，收缴武器；开始经济重建；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发展关系，加强同叙利亚的特殊关系。1991年4月30日，黎政府按计划开始进行解散各派民兵组织、收缴武器的工作，并开始收编原民兵人员，政府军陆续接管原民兵控制区。真主党强烈抵制政府上述举措。经伊朗斡旋、叙利亚同意，黎政府

允许真主党在黎南部保留部分武装。6 月 6 日，黎巴嫩政府完成《塔伊夫协议》确定的任命议员工作。7 月 1 日，黎政府军在叙利亚驻黎部队的支持下，进驻西顿地区，巴解被迫交出中、重型武器，黎政府军完成了在西顿地区的部署，并控制了各难民营，继而进驻苏尔地区和联黎部队防区以北各地区。黎政府表示将陆续收缴黎南部各派民兵及巴解组织的武装。

此后，黎巴嫩局势趋于稳定。政府继续实施《塔伊夫协议》，促进民族和解，收缴各派民兵武器，安置本国难民，制订战后重建计划。拉菲克·哈利里奉命组阁后，吸收了一批经济、技术专家担任内阁部长，主管生产、服务、工农业、贸易和交通等部门，力争尽快解决国内战乱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问题。

三、内战后的黎巴嫩内政

1992 年国民议会选举

随着《塔伊夫协议》的贯彻执行，黎巴嫩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国家政治生活开始走上正常轨道。1992 年中，黎巴嫩举行自 1972 年以来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1992 年 4 月，黎政府宣布将于 1992 年中举行选举。7 月 16 日，原国民议会通过新的选举法，该法案批准议会议席由 108 席增加至 128 席。议会议席将在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宗教派别之间按比例平均分配。7 月 24 日，选举日程公布。选举共分 3 个阶段：8 月 23 日黎北部及贝卡地区举行第一轮选举；30 日贝鲁特及黎巴嫩山区举行第二轮选举；9 月 6 日黎南部及纳巴提耶地区举行第三轮选举。在正式选举之前，基督教党派

威胁抵制选举，理由是叙利亚军队未按《塔伊夫协议》规定的日程集结，在此情况下，选举不可能公平公正。美国等西方国家敦促叙利亚政府撤军。但黎巴嫩政府声称，叙军撤离，政府将无力保证安全。政府中基督教派部长认可政府的上述立场，并作出妥协，议会选举如期举行。8 月 23 日在黎北部地区及贝卡地区举行第一轮选举，选出 51 位议员，基督教马龙派 16 席，穆斯林逊尼派 16 席，什叶派 8 席。其余席位为由少数派宗教派别获得。8 月 30 日第二轮选出 54 席，以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为中心，马龙派获 20 席，逊尼派 8 席，什叶派 5 席。第三轮选举出南部地区和纳巴提耶区议员 23 位。其中什叶派 14 席，逊尼派 3 席，基督教马龙派 2 席。依据新选举法，黎巴嫩 7 大主要民族以及绝大部分宗教派别和党派都有代表进入议会，其中包括真主党。选举进行的并不顺利，除原有的派别政党纷争外，选举本身的公正性受到各方质疑。部分党派指责原议会议长胡塞尼有舞弊行为，胡塞尼在正式选举结束前辞去议长职务。另外，叙利亚撤军问题一直困扰着选举进程。选举结束后，黎总统赫拉维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美国的敦促下，举行会谈，制订撤军计划。但叙军实际上无意撤离黎巴嫩，口头上宣称 1992 年 10 月完成撤军，但实际上在做出新的驻防部署后，继续留驻黎巴嫩。

这次国民议会选举在黎巴嫩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结束了 20 年来国民议会实际上陷入瘫痪的局面，使议会民主制政治体制重新建立起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以教派分权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得以恢复，并以这次选举为标志，黎巴嫩国家政治生活转入正常轨道，为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下的黎巴嫩国家政治正常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政局稳定、经济重建和推进民族和解提供了条

件。

拉菲克·哈利里三度组阁

1992年10月22日，著名的工商企业家拉菲克·哈利里受命组阁，31日由30人组成的内阁宣告成立，11月12日新政府通过了国民议会信任投票。哈利里新政府仍保持教派分权特征，但进入内阁的成员大多是经济技术专家型人才，在受到国民议会赞赏的同时，在社会各阶层树立起重建经济的良好形象。新政府执政伊始，便以振兴经济、重建家园为工作中心，恢复了黎巴嫩发展与重建委员会，授命该委员会组织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黎巴嫩经济振兴之路。黎政府审议通过了该委员会提出的《黎巴嫩重建与经济振兴计划》，并提出首先修缮公共基础设施，使各项服务恢复到适当的水平，为下阶段工作奠定基础。然而，新政府经济振兴和重建工作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特别是受到黎巴嫩南部问题的困扰。

长期以来，黎巴嫩南部问题一直是困扰黎巴嫩内政和外交的重大敏感问题。这一问题形成于内战时期。内战结束后演变为真主党与以色列扶植的"南黎巴嫩军"之间以及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时起时伏的军事冲突。由于"南黎问题"的背后是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政治、军事角力，而黎巴嫩政府又无力控制真主党及其游击队，因此"南黎问题"成为黎政府难以驾驭的、时常影响乃至冲击黎巴嫩政治稳定和经济重建的棘手问题。1992年11月，哈利里政府执政不久即面临不断升级的"南黎问题"。1993年7月25日，以色列国防军为了消除真主党游击队以及由叙利亚直接扶持的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军事组织等对其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威胁，发动了自1982年以来最大规模军事行动。除上述组织成为以

色列国防军打击的对象外,叙利亚驻军也成为打击的目标。1994年初,为了配合叙利亚阿萨德总统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内瓦的高峰会谈,真主党游击队及其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游击队猛烈轰击亲以色列的南黎巴嫩军。以军予以还击,并造成双方严重损失。1994年10月以及1995年间双方在以军控制下的南黎巴嫩安全区多次发生交火事件,致使南黎问题日趋复杂化。1996年4月,以色列佩雷斯政府发动所谓"愤怒的葡萄"军事行动,以期彻底消除真主党游击队的火箭炮威胁。这次军事行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南部安全区",以军甚至轰炸贝鲁特等地区,给黎巴嫩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致使约40万黎巴嫩人逃离南黎地区。在联合国的安排下,以军与真主党于4月27日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承诺不再攻击黎巴嫩民用目标。同时,国际社会还成立了停火监督委员会,然而南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上台后,摆出强硬姿态,中东和平进程陷于困难之中。受叙利亚支持的真主党游击队,继续在南黎巴嫩打击以色列军事目标,以军也不时地予以还击,双方军事冲突持续至以色列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巴拉克总理在着手重新推动和平进程的同时,声称将撤出南黎巴嫩安全区。2000年5月,以色列国防军以闪电般速度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南黎问题至此暂告结束。

南黎问题尽管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也是中东国际政治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南黎问题更是一个黎巴嫩的内政问题。黎巴嫩结束长达16年的内战之后,广大民众企盼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黎政府希望重树国家权威,充分行使国家主权。但南黎巴嫩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和政府不能如愿地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解,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因此受到各方的批评和指责,进

而影响到得来不易的政治上的安定局面。在经济上，更是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外来投资者慑于南黎问题，对黎投资望而却步，致使经济重建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使本来就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从而影响到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进程。

1990年8月，宪法修订后，内阁总理的权力大大扩充。总统不再拥有行政权，总理经总统任命拥有全权行政执行权。这一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国家政治生活刚刚恢复正常的背景下，其运转却不顺利。1994年5月，哈利里总理突然提出辞职，原因是哈利里请求总统赫拉维对政府提出的马龙派代表进入内阁的建议予以确认的提案遭到总统和国民议会的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介入后，政府危机结束，哈利里于5日下旬复职。1994年12月，哈利里再次突然提出辞职。观察家认为，哈利里的经济重建计划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受到国民议会的质疑。哈利里尽管很快又收回辞呈，但对脆弱股市和外汇市场已造成不小的冲击。1995年5月，赫拉维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哈利里总理希望赫拉维总统能够继续留任。哈利里认为，赫拉维总统在国民中有良好的声誉，在复杂的党派政治中运筹帷幄，有效地实现了各教派党派力量的基本平衡。赫拉维总统还同叙利亚阿萨德总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加之哈利里内阁与总统赫拉维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哈利里总理确信，赫拉维继续担任总统将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重建工作等。但是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届满后不得连任，如再次竞选总统必须在6年以后。因此，哈利里希望修改宪法，但是修改宪法的动议立即遭到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反对，哈利里为此于5月19日第三次提出辞呈。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赫拉维总统接受了哈利里内阁的总辞职。但赫拉维总统经过积极斡旋，使各方暂时

达成妥协。哈利里21日接受任命再次组阁,组成第二届哈利里政府。此后,通过与国民议会协商,于同年10月完成并由议会通过对宪法第49条款的修正案,批准赫拉维总统任期延长3年,至此政府及其宪法危机获得圆满解决。

1996年2月初,政府宣布新一届国民议会将于9月举行。然而就在此时,黎巴嫩工会总联盟号召工商企业界举行大罢工。罢工并非针对新的国民议会选举,而是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改善人民的生活。政府为确保政局安定,调动军队、实行宵禁,黎巴嫩政局再度出现动荡。1996年中,国民议会选举日益临近,曾经在1992年鼓动基督教选民抵制大选的基督教党派领导人改变姿态,号召基督教选民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但是此前政府对选举法进行修改,新的选举法将基督教选民聚集区同黎巴嫩山区分离,对此基督教社团极为不满。8月初,议会通过了新修改的选举法,但同时宣称将黎巴嫩山区分离将是一个特例,今后将不会再次出现类似情形。在各方妥协的情况下,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如期举行。10月,新一届国民议会组成后,拉菲克·哈利里第三次受命组建新政府。新政府组成后,除继续推进既定的经济重建计划外,又宣布1997年中期将举行地方选举,这是1963年以来首次地方选举。至此,继国家中央权力机构及其政治体制在90年代初步入正轨后,国家地方一级的政治生活也逐步恢复。它标志着黎巴嫩国家政治生活全面进入正常化轨道。

教派分权制国家的特点

依据黎巴嫩宪法,黎巴嫩是议会民主体制下的共和国,但同时

黎巴嫩又是典型的教派分权制国家，权力体制充满宗教派别色彩，其表现是在不同教派群体中分割国家权力。黎巴嫩宗教教派十分复杂。纷繁复杂的宗教教派实际上与民族构成没有直接关系，在黎巴嫩现有的300多万人口中，民族结构比较简单，阿拉伯人约占95%，其余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等。复杂的教派关系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有长期以来处于阿拉伯、波斯和希腊三大宗教文化重合处因而深受三种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对黎巴嫩民族特点、宗教教派结构的形成和社会发展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各教派之间经过斗争和妥协，达成了不成文的《民族公约》，亦称《民族宪章》，新诞生的黎巴嫩共和国继续实行教派分权制。但黎巴嫩独立后半个世纪中，各教派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末的统计数字表明，什叶派占人口总数的27%，逊尼派占26%，马龙派占23%，德鲁兹派占7%，其余为其他教派的人口。动态的教派人口结构变化总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平衡，新崛起的拥有较强实力的教派当然要求根据实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利益。

黎巴嫩不仅教派众多，各教派还拥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这既是黎巴嫩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是引发长期内战的原因之一。在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下，各教派为了自身的教派利益而进行的激烈争夺引发了多种矛盾，且矛盾日益激化，接踵而来的便是无休止的武装冲突。教派实力的动态变化使掌握军政大权的基督教派（以马龙派为主）与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几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使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巴解组织的指挥机构和部分武装力量也进入了黎巴嫩，客观上

加强了伊斯兰教派的力量，进一步刺激了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愿望。1975 年 4 月终于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1988 年甚至出现过代表基督教的临时军政府和代表伊斯兰教的两个政府同时并存的局面。

教派分权的政治结构存在很多弊端。首先，执掌国家权力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来自不同教派的宗教领袖，而个别教派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整个民族的国家利益，有时个别教派的现实利益甚至是同国家长远利益相悖的。长此以往，不仅损害国家利益，还加剧了教派矛盾和纠纷。其次，教派分权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教派实力基础上的，而教派实力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这种实力消长一旦打破原来的教派力量对比，就会产生重新分配权力的要求。在各教派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在实现重新分配权力或达成某种新的妥协前，国家势必陷入极度混乱的状况。再次，由于教派分权且各派拥有武装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形成教派武装割据的局面。而在教派武装割据的情况下，各教派为了自身的生存，维护或扩张教派利益，并要求教徒首先效忠所属教派，形成了“保教不保国”的观念。久而久之，大大削弱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从而导致国家分裂的政治危机。绵延 16 年的黎巴嫩内战就是教派分权制种种弊端的集中体现。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国家政治生活从中央到地方逐渐恢复正常。但是政治生活逐渐恢复的基础依然是教派分权制，宪法的修改、议会的扩大以及权力的再分配，都是分享和分割国家权力过程中各教派暂时妥协的产物，教派分权制本身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动，其制度本身种种弊端并未消除。黎巴嫩某些政治家及有识之士曾发誓，要取消教派分权制。但是，内战后的 90 年代，黎巴嫩政

治教派制依然如故，教派分权制仍然是黎巴嫩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仍然是黎巴嫩政治制度最显著的特征。

四、共和国的经济与战后重建

独立后至内战前的经济发展

独立以后，黎巴嫩政府一贯奉行自由经济的原则，实行外汇、黄金贸易等全面开放，国家较少干预经济活动，力图建立一个外向、服务型的现代经济。

独立初期，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全国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在农村。黎巴嫩的土地制度以小土地为主，1953 年土地占有情况估计如下：平均拥有土地不到 2 公顷的农民占有全国 70% - 75% 的土地，中小地主占有 15% - 20%，大地主占有 10%。小土地主主要集中在马龙派和德鲁兹派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国内外市场所需的酒、橄榄油、橄榄和木炭等，独立后发展较快的主要是面向出口的水果、蔬菜，而谷物生产则停滞不前，并且前者的出口值远远超过谷物和畜产品的进口值。

较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黎巴嫩的工业相比较发达。它的工业以食品、纺织、炼油为主，其他包括水泥、服装、制鞋、印刷、木材、家具、采矿和冶金，主要是小型企业。黎巴嫩政府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信贷和供应廉价电力等方式促进工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工业发展主要采取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出口的形式，发展最快的是面向出口的轻纺部门。

独立后，黎巴嫩经济中发展最快的是商业、金融和旅游等服务

部门。1950 年黎巴嫩开放贝鲁特国际市场，1954 年取消港口税，过境贸易因而发展迅速。1950 年总额为 3.348 亿黎镑，1954 年猛增到 6.172 黎镑。黎巴嫩的对外贸易发展也很快，但因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相对缓慢，外贸逆差很大。在金融业方面，1948 年政府解除外汇管制，大批外国银行迁入贝鲁特，并很快取代开罗，迅速发展成为中东的金融和黄金贸易中心，1966 年共有 82 家银行的总部设在贝鲁特。旅游业主要集中在山区，1949 年时游客为 6 万人，1974 年高达 230 万人。与服务业的发展相适应，交通运输和建筑业的发展也很迅速。至 70 年代中期黎内战爆发前，黎巴嫩是中东地区享有盛名的商业、金融和旅游业中心。另外，黎巴嫩还奉行服务为主，外向发展的经济政策。除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外，这主要是因为控制政权的马龙派资产阶级素来以经商为主，并与西方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黎巴嫩的服务业和以出口为主的工农业均集中在马龙派和德鲁兹派聚居的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1975 年以前，黎巴嫩政局较其他阿拉伯国家稳定，而中东产油国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强与西方贸易金融联系，这些都促进了作为东西方经济贸易桥梁的黎巴嫩工商贸易及金融等为主的服务部门的发展。在 1957 年黎巴嫩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占 15.8%，工业占 12.6%，服务、贸易和金融占 47.1%；1972 年时三者的比例依次为 9.9%、15.9%和 54.6%。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1966－1973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 9.1%（市场价格）。但是，黎巴嫩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其服务行业的发展取决于国内，乃至整个中东的政治形势。另外，黎巴嫩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地区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徒聚集区，经济发展较好；而山区特别是穆斯林什叶派人口集中的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区域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增强了地区间经济的互补性，但它首先带来的是教派争夺经济利益的冲突，从而加剧了教派纷争。16年的内战起因之一，就是争夺以教派为主体的经济利益。1975年内战的爆发不仅使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内乱之中，也使黎巴嫩此前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走向终结。

百废待兴的经济

黎巴嫩是一个商业为主的国家，商业和服务业产值长期以来占国内总产值的70%以上，曾享有中东贸易、金融和旅游中心的盛名。黎巴嫩政府自独立以来充分利用本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发展贸易和旅游业。黎巴嫩的转口贸易，与东西两方的商贸交往，使贝鲁特迅速成为中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之一。而这些条件为黎巴嫩经济复兴和繁荣造了条件。作为中东的旅游胜地，1974年旅游业收入达到15.7亿黎镑，占国民总收入的20%。1962年起，政府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投资14亿美元发展公路、灌溉设备、水利资源、电力设施、海港和运输设备等。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条件下，黎巴嫩经济呈现出平稳和相对繁荣的发展局面。到70年代，除海湾产油国外，黎巴嫩是中东地区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

1975－1990年，连绵不断的内战，严重地破坏了这个经济已经相对繁荣的阿拉伯国家，破坏了经济稳定发展的环境，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资金和技术外流十分严重。1977年，旅游业的收入仅为2.6亿黎镑，比内战前一年的1974年有明显的下降，仅占国民总收入的7%。内战期间，商贸活动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中东商贸中心名存实亡，金融中心地位也因大量外资和本

地资金外逃而不复存在。工业企业大量倒闭,农业生产也备受影响。1982 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 1970 年水平,人均收入逐年减少,1982 年为 2011 美元,1985 年仅为 980 美元。1991 年内战结束后第一年人均国民总产值大约为 1100 美元,仅相当于内战初期的一半。整个 80 年代,黎巴嫩经济呈现出全面倒退的局面,国民总收入大幅度下降,1984 年比 1980 年减少 41.54%,1985 年比 1984 年减少 61.67%,1986 年又比 1985 年减少 58.59%。

1990 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经济百废待兴,民族经济发展处于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

战后经济重建

1992 年底,黎巴嫩内阁会议通过黎巴嫩发展与重建委员会提出的《黎巴嫩重建与经济振兴计划》。该计划是由重建委员会组织,工程师协会参与,与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公共服务业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国有企业单位协商后,制定出的比较全面的计划。其原则是首先修缮公共基础设施,使各项服务设施恢复到适当水平,为下一阶段打下合理的经济基础。

重建计划主要分恢复、振兴和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工程项目的总数为 126 个,共需资金 50 亿美元,其分配比例是社会设施占所需金额总数的 30%,饮水、排污管道、垃圾、植树等公共卫生占 11%,交通运输占 38%,其他方面占 21%。

黎巴嫩政府将外援作为实施其发展与重建计划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据统计,早在 1982 年至 1985 年时,外国已允诺向黎提供的援助和贷款总额达 33.35 亿美元。截至 1992 年初,黎巴嫩重建工作所获欧共体委员会赠款 0.58 亿美元,意大利赠款 1 亿美元,

欧共体委员会优惠贷款 100 万美元,欧共体投资银行普通贷款 0.5 亿美元,意大利贷款 0.9 亿美元,世界银行普通贷款 1.5 亿美元,欧共体投资银行普通贷款 1.62 亿美元,意大利普通贷款 2.93 亿美元。此外还有法国的 0.55 亿美元,科威特发展银行的 0.1 亿美元和沙特阿拉伯的 0.6 亿美元,作为向黎巴嫩提供赠款和长期贷款。

黎巴嫩有大量侨民和外籍黎巴嫩人,他们手中握有巨额资金。黎巴嫩政府对此十分重视,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包括调整经济政策,改革税收制度、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等,吸引和鼓励他们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内以推动黎巴嫩经济恢复、发展和重建。

此外,黎巴嫩政府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推进国营企业私有化。内战期间,黎巴嫩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基础设施,如水、电、通讯、道路交通等遭受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之多。恢复和重建完全靠国家来承担,困难重重,国家也无力承担。但这些项目又是经济重建的重点,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营企事业单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不善,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其原因是:内战期间,管理和技术人员大量外流,或转向私人企业,国营企业合格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国营企业的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无资金维修和更新。虽然国家为保证居民水电、交通、通讯等一些基本需要,提供了大量财政补贴,但仍未能如愿。大量的财政补贴导致内债加剧,经济困难。国营企业已成为政府在经济上的沉重包袱。而黎巴嫩的私人企业管理比较科学,经济效益不断上升。黎巴嫩经济学家称,私人企业的成功经验表明,国营企业私有化势在必行。

在 90 年代初期的重建工作中,黎巴嫩经济逐步恢复,特别是

黎政府鼓励私营经济发挥作用，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和积极寻求外援的政策初见成效。自1992年后，黎巴嫩经济逐渐缓慢增长，1995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628美元，比1991年增长一倍，接近甚至超过内战初期的水平。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2亿美元，比1991年37亿美元翻一番。90年代中期，出口持续增长，国际收支转为顺差，外汇储备逐年增加，财政状况好转，经济增长率达到5%，黎巴嫩经济的复苏初露曙光。但是，90年代中期，黎巴嫩仍面临经济重建的巨大任务。特别是经济重建仍需巨额投资，黎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制约经济重建和发展的瓶颈仍然是资金不足，为此黎政府积极寻求多方外援和外资投入。外资投入主要来自黎巴嫩海外侨民。据哈利里政府公布的数字，1993年私人投资曾一度达到15亿美元。1995年初，国外赠款也一度达到19亿美元。但是这一数额远远少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诺的数额。1996年4月，以色列因黎巴嫩真主党袭击黎南部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区和以色列边界地区，对贝鲁特等地实施报复性打击，尤其对电力、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军事打击，造成经济损失5亿美元，使黎经济重建雪上加霜。

根据1996年黎政府公布的经济报告看，黎巴嫩经济重建仍需50多亿美元的投入。政府报告称，1997年至2001年重建计划所需资金不低于50亿美元，其中2.7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2.16亿用于卫生、教育、住房等；3.24亿用于公共服务行业；1.5亿用于农业和工业等。1996年11月，黎巴嫩友好国家经济援助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出席会议的国家和组织约30多个。这次会议承诺向黎巴嫩提供32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截止时间为2001年底。会议所提供的资金承诺总额虽然少于50亿美元，但对许多急需资金

的工程项目,无疑是雪中送炭。从总体看,黎巴嫩经济在90年代后期仍处于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其经济重建还未进入发展和振兴阶段,即《重建与经济振兴计划》规划的第二、三阶段。90年代后期,由于政局一度出现动荡,黎巴嫩经济又面临诸多挑战。

第十二章　中东国际政治中的黎巴嫩对外关系

一、黎巴嫩与阿以争端

南黎问题与南部“安全区”

黎巴嫩南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国际社会一直十分关注。黎巴嫩南部泛指黎巴嫩第5行政区南方省利塔尼河以南至以色列边境线以北地区。该地区以农业为主，资源贫乏，经济也不发达。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该地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生存和出击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主要基地，驻有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约12000人，以及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视其为以色列北部地区安全的心腹之患。

内战初期，黎巴嫩政府军驻防南部地区的部队因后勤供应断绝，陆军少校萨阿德·哈达德率数百名官兵与政府军分道扬镳，与该地区基督教民兵1000多人联合组成“南黎巴嫩军”，哈达德自任司令并宣布成立“自由黎巴嫩国”。“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到90年代初，其人数已超过3000人，其中40%为穆斯林逊尼派和德鲁兹派，编制为两个旅。“南黎巴嫩军”司令哈达

德 1984 年 1 月病逝后，黎巴嫩政府军退役高级军官安托万·拉赫德继任。

1978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撤军时将黎巴嫩南部境内约 5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交给以哈达德为首的"自由黎巴嫩国"，形成了日后所谓"安全区"的雏形。1982 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一直到 1985 年 6 月才撤军。撤军时，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建立 6 英里宽、50 英里长、面积 850 平方公里的"安全区"，由以色列军队和"南黎巴嫩军"共同驻防。至此，以"安全区"为核心的南黎问题最终形成。"安全区"内约 20 万人口。以色列方面负责培训军事人员，提供军事装备，估计平均每月资助金额达 300 万美元。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安全区"内驻军经常保持在 1200 人左右，局势紧张时达数千人。以色列驻军在不同方位构筑了数十个军事据点，设制哨卡，架电网，埋地雷，层层防御，阻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人员和黎巴嫩政府军以及黎巴嫩各派武装力量进入。以色列除在军事上控制该地区之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安全区"进行变革，建立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制定区域内的税收等方面的制度，设立为以色列作宣传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还搞了一些民用基本建设。在此区域内，以色列的货币谢克尔、黎巴嫩货币黎镑和美元可以通用。

在黎巴嫩南部还驻有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维持和平部队，总人数最多时曾达到 5000 多人。1978 年 3 月 15 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后，19 日安理会通过要求以色列撤军、尊重黎主权的 425 号决议。该决议通过后，联合国安理会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向黎巴嫩南部地区派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维持和平部队。

多年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维持和平部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联合国安理会425号决议规定其任务的性质是一支维持和平部队，并未授予其使用军事手段的权力。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这支部队表现得无能为力，而且在驻期内曾受到以色列方面、“南黎巴嫩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各派民兵的袭击。据不完全统计，该部队有160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伤。1991年底，黎巴嫩政府曾提出派政府军进驻黎巴嫩南部地区与联合国临时维持和平部队联合驻防，遭到联合国驻黎部队的反对。加利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根据前任秘书长提出的削减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人员、节约经费的报告，提出削减联合国驻黎维和部队兵员10%的议案，并获安理会通过。黎巴嫩政府曾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黎巴嫩南部问题的敏感性有其特殊含义。以色列方面称，为了维护其北部地区的安全，必须在黎巴嫩南部境内建立“安全区”；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长期驻扎本地区，被迫撤离后又陆续返回；黎巴嫩各派民兵，主要是穆斯林派别武装以及真主党等在南部均保留自己的武器装备，政府军进驻困难重重。在以色列军事入侵和控制“安全区”并与巴解武装时常发生军事冲突的同时，黎巴嫩各派与巴解武装方面也发生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火并。如阿迈勒运动与真主党、巴解组织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武装冲突。由此，使黎巴嫩南部问题更加复杂。

内战结束后，南黎问题仍然是困扰黎巴嫩内政和外交的敏感问题。由于南黎问题的存在，黎巴嫩国家统一、领土完整难以最终实现，也损害了黎巴嫩战后经济重建进程。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之后，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巴以和谈、约以和

谈均取得明显进展。但是南黎问题始终难以取得突破，以军不仅拒不撤出“安全区”，甚至与真主党等派别民兵组织的战火持续不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致使南黎地区成为阿以军事冲突最后的战场。1996年4月，以色列佩雷斯看守政府发动“愤怒的葡萄”军事行动，对黎南部“安全区”及其以外的真主党游击队发动规模空前的军事打击，甚至对贝鲁特等城市发动空中打击，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经济损失达数亿美元，200多名黎巴嫩平民死亡，40余万南黎及其他地区居民逃离家园。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斡旋下，以色列与真主党游击队实现停火，双方承诺不再攻击对方民用设施。同时，国际社会专门成立停火监督委员会。1996年中，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南黎地区以色列与真主党周而复始的报复和反报复战持续不断。以色列设立“安全区”及其真主党对以方目标不间断的打击，使以色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国内要求单方面撤出“安全区”的呼声越来越高，希望首先同黎巴嫩缔结和约。1998年4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425号决议。1999年7月，以色列工党领袖巴拉克就任总理时宣称，要在一年之内完成从黎巴嫩撤军，声称如果不能通过双边或三边协议实现撤军，以色列也会单方面撤军。2000年5月24日，以色列国防军趁着夜幕，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撤离南黎“安全区”，实现了一年前许下的诺言。至此，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长达22年的占领宣告结束。

阿以争端中的黎巴嫩

南黎问题是阿以冲突与黎巴嫩内战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

自60年代末以来,南黎巴嫩是巴以军事冲突的主战场。黎巴嫩长期以来坚持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立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但是黎巴嫩是4个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中惟一一个在4次中东战争中没有全面卷入与以色列战争的国家。1948年阿以中东战争时,黎巴嫩非政府穆斯林志愿者民兵武装参加了对以战争,但此后至60年代中黎以边界一直相对平静。60年代中期前,在黎巴嫩共有20余万巴勒斯坦难民,大多居住在南部沿海地带及难民营里,他们受到黎政府有效的控制。1965年,巴解组织开展对以武装斗争,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逐渐成为巴解组织训练和出击以色列的作战基地。1968年5月,为了逼迫黎政府控制巴解组织,以色列首次对黎巴嫩腹地发动惩罚性袭击,轰炸了贝鲁特国际机场,13架阿拉伯国家民用飞机葬身火海。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动用全部力量,将巴解武装全部赶出约旦,此事件史称“黑9月事件”。阿拉法特被迫率巴解主力1.5万人转移到黎巴嫩境内。从此,黎巴嫩南部沦为巴以军事冲突的主要战场。此前在1969年11月,黎政府与巴解组织曾签订《开罗协议》,就双方关系和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活动范围作出规定。但巴解主力转移南黎巴嫩后,巴以战端愈演愈烈,本地区居民大批外逃,致使社会陷入动乱。加之巴解组织独立性增强,《开罗协议》形同废纸,而黎巴嫩政府又对巴解组织越来越难以控制,巴解与黎政府矛盾日益加深。70年代初,巴解与黎巴嫩穆斯林阵营联手,打破了与基督教社团在政治军事上的力量平衡。1975年4月,以基督教长枪党为一方,同穆斯林民兵和巴解游击队为另一方的内战爆发。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在黎巴嫩德鲁兹和什叶派武装支持下,巴

解组织逐渐在混战中占得上风。黎巴嫩政府尽管仍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但黎政府与巴解组织矛盾进一步恶化,以色列视南黎地区巴解组织为巨大威胁,伺机而动,出兵打击巴解游击队,从此黎巴嫩被迫卷入巴以冲突之中。1978 年 3 月,巴解组织海上突击队从黎巴嫩出发,在海法附近登陆,劫持了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并向特拉维夫进发,一路上杀害了 30 多名以色列乘客。三天后,2.5 万以军越过边境,发动“利塔尼行动”,彻底摧毁了利塔尼河以南所有巴解营地。战后,数千名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6 月份以军撤出,亲以色列的基督教民兵随即控制了黎以边界黎方一侧约 12 公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保护以色列的一道屏障,从而形成了日后“安全区”的雏形。1981 年 4 月,叙利亚与以色列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爆发僵持不下的“导弹危机”。此后以色列贝京政府同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共同策划再次入侵黎巴嫩。1982 年 6 月 3 日,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在伦敦遇刺,以色列借机于 6 月 5 日开始实施“加利利和平”的军事入侵。拥有 1600 辆坦克的 10 万以色列大军在空军掩护下越过联合国维和部队防区,击溃 2.5 万人的巴解主力,6000 名巴解战士被俘。同时,以军还完成了对叙利亚驻军的压制,摧毁了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全部导弹。8 月 5 日,巴解总部大楼遭以军铁壁合围。次日,阿拉法特被迫发表声明,接受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决议。8 月 21 日,多国部队登陆贝鲁特,巴解总部和残存的 1.2 万巴解人员分批全部撤往 8 个阿拉伯国家。巴解撤出黎巴嫩,标志着以色列脱离了同巴勒斯坦武装的正面接触,巴解在黎巴嫩的军事影响力显著下降。9 月 21 日阿明·杰马耶勒在其兄长贝希尔·杰马耶勒总统遇刺身亡后当选新的总统。阿明·杰马耶勒立志结束内战,要求所有

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经半年谈判,以杰马耶勒为代表的黎政府与以色列于1983年5月17日,签署划时代的准和平条约——《黎以撤军协议》。然而协议遭到黎巴嫩国内以德鲁兹派为主的穆斯林社团的反对,叙利亚也表示绝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与此同时,德鲁兹派和什叶派武装加紧对多国部队的袭扰,美法等多国部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甩手撤出黎巴嫩。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杰马耶勒总统被迫转变立场,1984年3月5日黎巴嫩政府宣布废除黎以协议。此后,黎以之间开始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新的和平谈判,但毫无进展。

1985年6月10日,以色列单方面撤军黎巴嫩,并单方面将黎巴嫩南部约85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定为"安全区",由亲以色列的基督教南黎巴嫩军协防。然而就在巴解撤离和设立"安全区"的同时,一支新的得到伊朗和叙利亚双重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崛起。南黎巴嫩安全区的设立实质上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它不仅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反而为真主党提供了打击以色列的依据。从此,南黎问题演变为以"安全区"为核心的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相互周而复始的报复与反报复战。直至2000年5月,以色列单方面撤军。

1982年8月,巴解撤出黎巴嫩后不久又陆续返回黎巴嫩。巴解组织重返黎巴嫩引起有关派别的不满,也遭到以基督教马龙派为核心的黎政府的反对。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89年,曾经是巴解盟友的穆斯林什叶派阿迈勒运动,以"赶走阿拉法特分子"为由与巴解武装在贝鲁特和西顿等地的难民营连续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即难民营战争。巴解组织被迫将大部分武装转移至西顿地区。1987年5月,黎巴嫩议会通过废除《开罗协议》及其附

件的决议,并反对巴勒斯坦人定居黎巴嫩。这些决议受到黎政府和各派组织的欢迎。1990年1月,巴解驻黎巴嫩代表处要求黎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代表处升格为大使馆,黎政府未予置理。1991年7月《塔伊夫协议》签订后,黎政府开始执行恢复行使在南部的主权、解除一切非法武装的决议,派军队进驻西顿地区,收缴了巴解游击队手中的中重型武器。1992年12月17日,以色列将400余名巴勒斯坦人驱逐至南黎无人地区,黎政府拒绝接受,但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向被逐巴勒斯坦人提供帐篷和食品。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和平进程重新启动。黎巴嫩政府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日后的多轮和平谈判中与叙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协调立场,积极推动和平进程。不过,黎巴嫩政府内部及其社会某些舆论对马德里中东和会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批评政府不应参加马德里中东和会。批评者认为,马德里中东和会既然是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安理会关于以色列撤出南黎地区的425号决议将搁置一旁。黎以问题的核心是以色列占领南黎巴嫩,只要以军撤出南黎"安全区",执行425号决议,黎以问题将迎刃而解。而黎以边界等其他问题实际上在1947年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中以及在1949年停战协定中都已基本得到确认,黎以之间已无必要展开新的谈判。为此,黎政府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积极与阿拉伯国家,与联合国,特别是与美国政府接洽,重申执行安理会425号决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际社会对黎政府的立场表示理解,美政府等口头承诺,支持黎巴嫩政府希望将执行425号决议与其他有关中东和平的决议作适当分离,以确保425决议得到彻底执行。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黎巴嫩与阿拉伯国家采取一致立

场，支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黎政府始终坚持与叙利亚协调立场，将解决黎以问题与解决叙以戈兰高地问题相联系，显示出黎叙特殊关系的重要性。1998 年 4 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决定接受 425 号决议，企图以撤军换取黎政府同意与以色列单独缔结和约。黎政府对以方接受 425 号决议表示欢迎的同时，对与以方单独媾和表示反对。2000 年 3 月，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决定单方面撤军。黎巴嫩军队总参谋长对此发出警告：单方面撤出就意味着战争。强调以色列必须交还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叙利亚戈兰高地。什叶派领袖及其真主党领导人都发出类似警告。

黎巴嫩政府对 90 年代初期以来阿以和平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总体上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现出谨慎的担忧。受黎叙特殊关系的影响，黎政府希望在中东和平问题上达成一揽子协议。黎政府尤其对巴勒斯坦自治协议（1993 年 9 月 13 日签订）表现出较大担忧。其原因是黎巴嫩对巴解在黎巴嫩参与内战记忆犹新，深恐巴解内部不同派之间因对该协议立场不同而在黎境内再次爆发混战。黎境内仍居住着近 40 万巴勒斯坦难民，这些难民深受巴解不同派别组织的影响，一旦战端重开，《塔伊夫协议》后得来不易的、依然十分脆弱的黎国内和平局面将毁于一旦。另外，因巴解组织介入黎内战，黎巴嫩政府对巴解以阿拉法特为代表的主流派没有好感，加之叙利亚及阿萨德总统对阿拉法特长期不信任，加深了黎巴嫩对巴解组织的疑虑。

二、黎巴嫩的对外关系

黎叙特殊关系

在黎巴嫩的对外关系中，黎巴嫩与叙利亚关系密切，保持着所谓“特殊关系”。黎叙两国在独立之前长期的历史中，是一个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联系紧密的地区。1943 年和 1946 年，黎、叙两国分别获得独立，在原本各方面联系十分紧密的地区分别建立起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独立一直未予承认，黎叙两国至今没有互设使馆、互派大使，黎叙之间保持着所谓的“特殊关系”。

70 年代以前，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叙利亚始终未能直接介入黎巴嫩内部事务。70 年代初，叙利亚阿萨德总统执政后，中东局势及黎叙两国政局开始发生变化。在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结束了独立以来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局面，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并且在中东国际政治中影响日益扩大。而黎巴嫩则因教派分权制政治结构发生危机，国内政治局势日益动荡，直至 1975 年 4 月爆发持续 16 年之久的内战。加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等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内战不仅更加复杂化，而且经久不息，黎巴嫩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由于黎巴嫩在阿以冲突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叙以对抗中，黎巴嫩军事政治等地位十分特殊，叙以两方均把争夺黎巴嫩作为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重要目标。巴解组织又在黎巴嫩具有特殊地位，叙利亚力求控制巴解，而以色列则把南黎地区作为打击巴解游击队的重要战场，黎巴嫩

成为夹在叙以两强之间的羔羊。叙利亚最终依靠政治、军事及外交手段控制了黎巴嫩。叙利亚采取“扶弱抑强”的战略，凭借以“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名义进驻黎巴嫩的3万多大军将黎巴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出于自身利益，叙利亚积极配合阿拉伯三方委员会，在叙利亚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促成了《塔伊夫协议》的签订。黎巴嫩政府在叙政府及其叙驻黎部队的帮助下，促使《塔伊夫协议》得以执行，结束了16年内战，实现了民族和解，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活走上正常轨道，并启动了经济重建计划。

1991年5月21日和9月1日，黎叙两国元首签署《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防务条约》，确定两国将进行最高级和最全面的协调，从而以正式条约的形式确立了黎叙两国的特殊关系。这一特殊关系体现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政治上叙利亚时常介入黎巴嫩内部事务。例如拉菲克·哈利里总理在担任总理期间，多次提出辞职并引发政府危机。在危机僵持不下时，阿萨德总统多次出面调解，使危机得以化解。黎巴嫩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议长等频繁出访叙利亚，不仅与叙利亚领导人商讨国际事务，而且密切协商讨论黎巴嫩内部事务。1998年10月，黎巴嫩赫拉维总统延任期三年期满，而黎国内在总统人选问题上发生分歧，后经阿萨德总统协调，黎巴嫩军队总司令拉胡德成为正式人选，并经议会同意出任黎巴嫩新总统。据外电报道，2000年6月10日上午11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正在与黎巴嫩总统拉胡德通电话，协商有关事宜时，突发心脏病逝世。在军事上，自1975年10月叙军进驻黎巴嫩后，一直驻扎在黎巴嫩的战略要地，并对黎内战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基督教社团曾强烈要求叙军撤离，以色列也以叙军留驻黎巴嫩为由，据不履行联合

国 425 号决议。只是 90 年代后期,以色列企图甩掉"安全区"这一沉重的包袱,并企图借此在黎叙之间制造分歧而单方面撤出了南黎地区。另外,国际社会如美国政府等也曾多次要求叙军撤离,某些阿拉伯国家对叙军留驻黎巴嫩也表示过不满。但是叙利亚根据自身利益,通过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在黎总统、总理等要求下,其军队继续留驻黎巴嫩。叙军留驻黎巴嫩是叙利亚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筹码,但是叙军的存在也体现出黎叙关系非同一般国家间关系。在外交上,黎叙在阿以和谈问题上全面合作,并确定在与以色列谈判时密切配合,不予以色列可乘之机。在巴勒斯坦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为摆脱被动并创造条件迫使以色列与叙利亚谈判,双方紧密配合,坚持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包括撤出戈兰高地的立场。黎巴嫩政府默认叙利亚支持并频频调动"真主党游击队"等黎巴嫩境内反以力量,打击、骚扰以色列,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中东。因此,黎叙关系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包含历史因素也包含现实因素。黎叙两国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但两国之间又保持着非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这一现象在国际社会中极为罕见。

与其他中东国家的交往

黎巴嫩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关系良好。沙特是促成黎巴嫩实现全国和解的重要调解者,是致力于解决黎巴嫩内战的阿拉伯三方委员会成员之一,为推动黎巴嫩议会议员通过《塔伊夫协议》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沙特也是黎巴嫩获取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1979 年,第 10 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曾确定,5 年中向黎巴嫩提供 20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沙

特承担了28.6%的份额。1991年,沙特向黎中央银行拨款6000万美元。海湾战争爆发后,黎巴嫩支持科威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2年10月,哈利里出任总理后,多次访问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

在与其他中东国家关系中,黎巴嫩与伊朗的关系较为特殊。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两国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因而黎伊(朗)两国关系接近,且较为平稳。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成功,影响了黎巴嫩部分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进入黎巴嫩"同以色列作战",并以巴勒贝克为基地扶植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最多时曾达到2000人。伊朗不仅为真主党提供武器装备,帮助培训军事指挥和作战人员,而且提供大量财政资助,使真主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一支令黎巴嫩各派力量以及以色列方面不敢小觑的力量。真主党在黎巴嫩内战后期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在黎内战结束后,又在叙利亚的支持下频繁骚扰南黎"安全区"及以色列北部边界地区,时常成为中东国际事务中令各方关注的焦点。内战中后期,黎巴嫩什叶派阿迈勒运动曾与真主党发生冲突,伊朗积极介入,派高级官员及神职人员到黎巴嫩进行"调解"。在伊朗驻黎巴嫩使馆中,伊朗高官频繁会见各方人士,但却很少与黎巴嫩官方交往,对此黎巴嫩政府曾表示不满。内战后,两国关系有所发展。1992年6月伊朗时任外长韦拉亚提访问黎巴嫩,会见了黎巴嫩总统、总理和议长。伊方表示,尊重黎巴嫩国家主权,愿为黎巴嫩局势的稳定做出努力,并强调伊朗支持真主党抵抗以色列的方针不变,要求黎巴嫩政府在收缴各派民兵武器、解散非政府武装组织时,特殊对待真主

党。黎巴嫩政府对伊朗方面上述立场表示欢迎;关于伊朗方面要求特殊对待真主党问题,因涉及叙利亚的态度以及南黎问题,黎巴嫩政府对此予以默认,但在表示愿意同伊朗发展关系的同时,要求伊朗政府通过黎政府与真主党联系。此后,黎巴嫩与伊朗关系正常化,但总体上两国关系一般。

重视同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合作

由于历史上黎巴嫩与西方宗教、文化等传统联系,黎巴嫩历来重视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逐步取代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成为影响中东事务的主要西方大国。50年代美国一度十分看重黎巴嫩在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50年代初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抛出所谓中东新政策以及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都受到亲西方的黎巴嫩政府的欢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黎政府公开宣布支持埃及,但并未断绝与英国、法国的外交关系。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后,黎政府不仅反应积极,甚至声明将与美国紧密合作,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及其同时宣布的各项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合作计划。1957年7月黎政府宣布,将于1958年财政年度中接受美国1500万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58年2月至7月,黎巴嫩因修改宪法问题爆发政治危机,危机很快引发社会骚乱,并形成了亲政府的基督教与反政府的穆斯林派别的政治军事冲突。时任总统夏蒙力邀美军进驻黎巴嫩,以确保国家的统一、完整和安全。美国出于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摆脱纳赛尔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展对其中东政策的威胁,以及伊拉克卡塞姆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威胁到黎巴嫩基督教亲西方政权等原因,派兵进驻黎巴嫩。1个月后,美军才撤出黎巴嫩。60

年代,阿以冲突愈演愈烈,直至爆发“六·五”战争。黎巴嫩政府反对以色列的扩张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国家联手共同抵抗以色列的扩张战争。1967 年 6 月 8 日,黎政府敦促美英两国驻黎大使离境,但两个月后,黎政府又很快恢复了与美英两国的大使级关系。

70 年代中期后,黎巴嫩依然重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在政治上,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国压制以色列,保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上,希望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1982 年 8 月和 9 月,美国两次派海军陆战队参加多国部队进驻贝鲁特。1983 年 5 月,在美国的直接参与下,黎巴嫩与以色列签订准和平条约《黎以撤军协议》。同年 10 月 23 日,驻贝鲁特美海军陆战队官兵在一次爆炸事件中伤亡 197 人。1983 年,美国决定把向黎巴嫩提供的 2.5 亿美元贷款中的 1.51 亿美元改为赠款。杰马耶勒总统执政时期,美向黎政府军提供了约 6 亿美元的军火。1988 年,杰马耶勒任期将满前,美国倾向于米·达海尔为惟一总统候选人,后因基督教派抵制,议会选举失败,杰马耶勒任命军队司令奥恩为总理,组成过渡政府。奥恩的过渡政府多次公开严词指责美国对黎巴嫩的政策。1989 年 9 月 5 日,黎巴嫩基督教区一些群众在美国驻黎巴嫩使馆外举行抗议示威。次日,美国以奥恩威胁要抓美方人质和使馆不能正常工作为由,撤走使馆全部外交人员。美国支持《塔伊夫协议》和其后产生的黎新政府。赫拉维总统执政后,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选派议员、财政部长等访美。1991 年赫拉维总统本人、议长、总理和外长先后赴美访问,寻求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国敦促以色列执行安理会 425 号决议,实现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要求美国支持成立援黎重建国际基金会,取

消关于禁止向黎出口武器和停止训练黎军官、禁止美国人到黎旅行、禁止黎中东航空公司班机飞往美国等方面所实施的制裁。1990年和1991年美国决定向黎提供5425万美元援助。1992年3月美决定向黎提供7550吨食品援助;取消向黎出口武器的限制;恢复黎军在美接受培训的项目。7月23日,美国务卿贝克访黎,就中东和平进程和黎形势与赫拉维总统、索勒赫总理和布维兹外长交换意见。贝克国务卿表示,美支持黎巴嫩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叙利亚根据《塔伊夫协议》精神尽快重新部署在黎的部队。赫拉维总统要求美敦促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1992年10月哈利里总理执政后,出于经济重建的需要,黎巴嫩政府更加重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美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向黎巴嫩投资、贷款和赠款的主要国家之一。黎政府重视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调停人角色,对克林顿总统第二届任期内对阿以和平进行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但是受叙利亚的牵制,黎美政治关系难以进一步深入发展。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黎巴嫩与法国的关系较为特殊。黎巴嫩独立前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两国间有着传统的关系。黎巴嫩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加强同法国的友好关系,对法国在中东争端中所持的立场表示满意。1982年8月和1984年3月法国两次派兵参加多国部队到贝鲁特。1983年10月,法国驻黎部队在一次爆炸事件中死伤58人。1989年黎两大教派炮战期间,法国支持基督教派,引起穆斯林各派的不满。1990年10月13日,黎巴嫩政府军在叙利亚军队的支持下,进攻奥恩占据的总理府和国防部,奥恩投降后进入法国驻黎巴嫩领事馆避难长达4个月之久,使黎法关系一度紧张。1991年8月,黎议会通过特赦令,有条件允许奥

恩去法居留，两国关系才有所松动。10月，赫拉维总统访法，两国关系得到改善。12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1992年2月26日法国经济和议会代表团访黎，探讨参与黎经济重建工作的途径。7月8日，黎巴嫩新闻部长访法，法方同意帮助重建黎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技术培训和制作节目等方面进行合作。12月12日，刚上任才两个月的黎巴嫩总理哈利里访问法国，要求法积极参加和援助黎重建，特别是在水电和通讯方面。法方赞赏哈利里政府为实现民族和解所作的努力，支持黎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黎要求执行安理会425号决议的要求，愿意参加援黎重建，对黎所欠债务重作安排。

黎巴嫩在保持与美、法两国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发展与英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关系，并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的经贸往来。意大利是西欧国家中继法国之后向黎巴嫩提供经济援助较多的国家。黎巴嫩还十分重视与日本的经济关系，黎巴嫩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访问日本，以求得到日本的经济资助。另外，黎巴嫩因宗教文化因素与梵蒂冈关系密切。

第十三章　叙利亚、黎巴嫩与中国

一、悠久的历史联系

丝绸之路:连接古代叙中两地的纽带

丝绸之路是世界历史上贯通东西方陆路交通的大动脉,古老的叙利亚地区和中国处在这一文明交往大动脉的两端,正是丝绸之路将相隔万水千山的叙利亚地区与中华文明连接起来。1877年,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种西域交通线",称之为"丝绸之路"。但是后来,德国另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mann)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进一步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涵义,使之延长至叙利亚。他在文中说:"我们应把该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夏德研究的结果,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

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赫尔曼的这一主张得到欧洲一些汉学家的支持和进一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的探险家们到中国西北边疆进行考察探险。他们发现了古代中国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西方交往的遗址和遗物,用实物证实和说明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发展。"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把古代丝绸贸易所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而古老的叙利亚地区不仅是丝绸贸易在西亚的重要地区,而且正是叙利亚的帕尔米拉、杜拉欧罗巴、哈莱比等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继站和分水岭,向西北延伸到欧洲,向西南通往古埃及。"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开通以后,历1500余年,直到明代一直承担着中国内陆与西域、中国与西亚、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主要任务,直到后来海道取而代之以及因其他原因使它中断为止。尽管在早期,如赫尔曼所说,叙利亚始终未与东方的大帝国中国发生什么直接关系,但"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交往的纽带,毕竟将两个互不熟知的文明地区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起到了犹如人体动脉的那样的作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语)。

中国最早了解到西亚的叙利亚是中国汉代的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于公元前126年从巴克特里亚归国后,向汉武帝刘彻报告,帕提亚(安息)是西域最大的国家,条支在它以西。这里所说的条支便是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以安条克为国都的古塞琉古王国。在罗马帝国兴起以前,最初统治西亚的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塞琉古王国,塞琉古王国不久之后一分为三,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相继独立,亚洲西部则归安条克。安条克建都地中海海滨、奥朗特河(又称奥沦河)畔的安条克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阿拉伯北部

都归入它的版图。中国人将统治此地的安条克(又译安提阿克)王朝称为条支,它省去了开唇音的第一个音节。公元前30年前后,罗马并吞叙利亚地区,取代安条克统辖地中海东部领土。当时张骞已知条支有大鸟,卵如瓮,又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前汉时代,据称已有汉使到过条支。他们通过伊朗北道,经过安息都城番兜城,抵达地中海海滨的安条克,或到过波斯湾头地区。后汉时代条支的地理概念与前汉时代大不相同,这是由于叙利亚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动。不过条支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波斯湾和海滨国家。公元94年,班超征服焉耆,葱岭交通畅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

公元一、二世纪时,中国的缣帛已从幼发拉底河渡口经红海涌向利凡特(黎巴嫩等地区)和叙利亚地区。利凡特的罗马人城市贝鲁特、西顿(又译赛达)、提尔将中国缣素重新拆解,按罗马式样织成“胡绫”。同时,中国丝织品也以适应西亚式样的纹饰,制作美观大方的面料,运销阿拉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帕尔米拉是中国丝货在西亚叙利亚地区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是丝货运销地中海地区及埃及地区的必经之地。这个位于叙利亚东部沙漠的绿洲国家,因中国丝绸而闻名天下。1933年和1937年在当地出土的织有汉字的绫锦与缯綵,据考古学家普菲斯特(法国著名考古学者)在其撰写的《帕尔米拉织物》和《帕尔米拉的汉代丝织品》等文章中考证,是公元一、二世纪的遗物,其图样与20世纪初楼兰出土的丝绢相仿。这些出土的丝绸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其先进的纺织技艺被普菲斯特命名为“汉式组织”。可以说中国和叙利亚之间正是由于这种丝绸贸易,获得了阿尔巴特·赫尔曼等学者赋予的

"丝路"之美名。中国丝货的输入,给当时包括叙利亚在内的罗马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西方学者 M.R.查尔斯沃恩就曾描述道:"丝服之盛行于叙利亚镇中,尤其是在贝鲁特及提尔两地,殆有多年,各地之丝商亦必如过江之鲫,逐利而来者;叙利亚中安提阿地方有一人名希烈异多士(Heliodorus)者,在那不勒斯从事此类事业,名传史册。而在加比(Gabil)地方,有一叙利亚种之希腊人名衣非利迭打(Epaphrodifus)者,在本镇中从事贸易,获利甚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属下的叙利亚杜拉欧罗巴北面的哈莱比和西南的帕尔米拉都曾有丰富的中国丝织物出土。当然,亚洲大陆两端的中国人和叙利亚人因关山阻隔,相互之间并不熟知。公元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说,将丝绸"由地球东端达至西端"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多国多民族参与的国际性交易。中国学者方豪指出,在早期的中西贸易中,"惜当时西安、洛阳之中国商人,并不知出售之丝将远至何地;即居中的媒介者,如吐火罗人、大夏人、安息人、米太人、叙利亚人,亦不知最后享受为何人,惟有提尔或其他地中海口之腓尼基水手,方知罗马为其主要市场"。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如同一条大动脉,将中国与西亚两个互不熟知的地区连接起来;而叙利亚又是这条大动脉延伸到西亚地区的重要一环。

唐代及其之后的中国、叙利亚文化交流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崛起,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西亚地区被纳入强大而统一的帝国之中。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唐王朝的文化经济等关系秉承以往中国和伊朗、叙利亚、埃及关系的传统,尤其在8世纪中叶,唐朝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关系在政治上由于彼此和平相处而显得十分融洽,在经济上更因加强了海上

联系,展开了以中国外销陶瓷和阿拉伯香药成批东运为标志的文化交流的崭新时代。

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初,奥斯曼哈里发就曾派出使团远赴长安,开创了中阿建交的历史。伍麦叶王朝时期叶齐德一世也曾派出使者出使长安,使者来自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大马士革。中国史书上的白衣大食所指正是伍麦叶王朝。此后阿拔斯王朝时期,中阿双方更是频频交聘。在9世纪时中阿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双方主要的贸易途径。其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就是经久不衰的中国外销陶瓷世纪的到来。它以华瓷的世界性输出,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信誉。宋、元、明三代,中国瓷器销往阿拉伯地区的数量十分可观。在历史文献中及其大量的考古发现中,都证明华瓷在叙利亚地区以及其他阿拉伯地区十分盛行,在黎巴嫩巴勒贝克罗马时代遗址附近就出土过华瓷。其中一片被证明是宋代龙泉窑莲花瓣青瓷碗,另一片被认为是元代花草纹饰的青华瓷碗。这些华瓷瓷片现保存在柏林贝尔雅门博物馆东方部。在叙利亚哈马古城,1931年至1938年经丹麦国家博物馆调查发掘,在公元950年至1400年的地层中找到了青瓷、白瓷和青花瓷片。其中有些被认为是宋代德化窑白瓷片,有些被认为是南宋官窑浮牡丹纹青瓷钵残片。还发现了内侧贴花的元代青瓷钵碎片以及元代青花瓷片。在大马士革博物馆的现存藏品中,可以见到15世纪仿制青花白地蓝釉彩画陶器。

唐代时及其之后,随着丝织品大量输往阿拉伯地区,以及唐代工匠侨居阿拉伯,中国的纺织工艺受到当地工匠艺人的借鉴。特别是宋、元以来织金技术在叙利亚、伊拉克广泛流行。《诸蕃志》称,大食生产的织金软锦、异缎,都系伊朗和艾尤卜王朝统治下的

叙利亚与下埃及产品。异缎正是享誉欧洲的“大马士革缎”，而这种异缎的纺织技术借鉴了中国的纺织技艺；另一方面，叙利亚、利凡特的毛织工艺十分精湛，曾受到包括中国商人在内的东方世界的青睐。据记载，叙利亚的亚麻式野茧丝与羊毛混纺的氍毹锦帐，早在公元 2 世纪时已受到中国人的推崇。亚麻和棉布是中国最为瞩目的阿拉伯产品。《魏略》中列举了 3 世纪中销往中国的三种叙利亚亚麻织物：一种叫绯特布，是希腊、罗马时代亚麻业中心贝鲁特织造的麻布，“绯特”为“腓尼基”的音译；一种叫度代布，因帕尔米拉的阿拉伯语名称台德穆尔(Tadmor)得名；一种叫阿罗得布，由安条克的奥朗特河(又译奥沦河)命名，产自安条克。

中国的造纸术传入西亚后，叙利亚地区成为主要的造纸业中心。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哈马和第比利斯等在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拥有了自己的造纸厂。大马士革以制造的纸张长期供应欧洲而闻名遐迩，拉丁文中称之为大马士革纸(Charta damacena)。

在历代的阿拉伯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和地理学家中，有许多学者在他们著作中记载和描述了东方帝国——中国的故事。其中与叙利亚相关的学者中较为著名的有，1321 年著有《统一的国家》的大马士革百科全书学者阿布·菲达(1273 - 1331 年)和著有《眼历诸国记》的大马士革人乌玛里等人。阿布·菲达在他的地理著作中，录有关于中国的各项知识。阿布·菲达的著作，习惯上被称为《阿布·菲达地理书》，法国人莱诺和古耶分别于 1848 年和 1883 年完成了该书第一、二卷的法译本。他在书中列举了中国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城市的大量材料，但史料被认为大都取自阿尔·比鲁尼(973 - 1048 年)的著作。阿拉伯地理学家乌玛里(1301 -

1349年）出生在大马士革，但长期居住在埃及，被认为是当时埃及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所著《眼历诸国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交通和地理；第二部分，自东而西，从印度、信德、成吉思汗国家，经西亚、地中海至西班牙，分述各国历史、地理、宗教。对中国北方的论述，多采用访问过中国的伊拉克、叙利亚、波斯和中亚人士的报道，这些人中有商人，也有学者。这些记述一致认为，蒙古大汗欢迎各国人士来华。另外，乌玛里还记述了阿拉伯商品输往中国的情况，阿拉伯商人贩往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马匹、猎鹰、宝石和珐琅盘器皿等。这些记述充分反映了直到元代为止，中国和阿拉伯的叙利亚等地频繁的商业往来。

景教在中国

景教是唐代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又称波斯教、弥施诃教。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源起于小亚细亚地区和叙利亚。公元431年和451年其创始人聂斯脱利乌斯及其教义两次受到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正统派的谴责，随后该教派脱离正教会，另立门户并日渐向东传播。公元7－11世纪时景教传播甚广，据说其教徒曾达百万之众，有25个大主教区，250个教区，并从叙利亚、伊朗，经阿富汗传到中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别。景教传入中国，并在7世纪中叶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在古代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文化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历史物证见证了叙利亚与中国历史上的交往关系，尽管这种交往更多的是单向的，但它却是双方历史交往的重要一页。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9年(635年)，大秦

国(中国对罗马帝国及东罗马帝国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古称)主教阿罗本来到中国,唐太宗给予优渥的礼遇,请其在皇帝的藏经楼翻译圣经,并不时地在内室垂询问道。贞观12年,唐太宗下令准其传播,由朝廷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造波斯寺,后改名大秦寺,即景教礼拜堂。唐太宗死后,高宗李治继承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当时除长安外,“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景教得到很大发展。高宗时仍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保持其景教大总管的地位。武则天称帝后,景教一度受到压制,但玄宗执政时,恢复了太宗时对宗教的宽容传统,并在景教寺内设立神坛,修复毁坏的建筑。玄宗之后,肃宗李京,代宗李豫以及著名将领郭子仪等都对景教予以保护。德宗李适时期,虽极力提倡儒道释三教调和,但对景教仍有好感。唐武宗李炎即位后,鉴于“僧尼耗蠹天下”,在道士赵归真的怂恿下,于会昌5年(845年)下令禁佛。景教亦被波及,并以“邪法不可独存”而受到打击,一度中绝于中原地区。但唐末时代至五代北宋时期,在中国西北边陲地区景教活动仍然十分频繁。13至14世纪元朝政权建立后,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并向南北各地扩展。约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景教已在大都(今北京)设置主教座。除大都外,福建泉州成为南方景教中心,扬州、杭州、昆明以及甘肃等地,先后建造了景教寺院。元至顺元年(1330年),据称中国境内景教徒已超过3万人。当时景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皆被称为也里可温。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唐建中二年(781年)立,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在今陕西省周至县出土。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十字架,碑底和两侧有古叙利亚文教士题名,碑文共计1780字,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序文主

要记述了景教在唐朝6位皇帝支持下在中国140年的活动经过。颂词部分多是对唐王朝6位支持和保护景教的皇帝的赞颂。碑文还简略述及基督教基本教义,对上帝造物,人类始祖受撒旦诱惑而堕落,三位一体的救世主降临人间,施洗拯救众人等基督教义的扼要提及,但没有涉及聂斯脱利派的基督二位二性主张。碑文作者是波斯人景净。作为景教传教士,景净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参加过佛经翻译工作,与佛教僧侣有来往。碑文由吕秀书写。该景教碑现藏于西安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已发现的其他有关景教的重要文献还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基督教会普遍使用的《荣归主颂》的唐代汉译本,译自叙利亚文,译者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石室,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此外,在敦煌还发现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天)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等景教经典和文献。

二、叙利亚、黎巴嫩与新中国

叙、中建交和双边关系的发展

叙利亚于1956年8月1日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第二个正式承认新中国,并与之正式建交的国家。建交后不久,叙利亚经历了1958年同埃及合并又在1961年同埃及分离的重大政局变化,一度使叙中关系受到波及。在叙埃两国合并时期,中国撤销了驻叙利亚大使馆,设立驻大

马士革总领事馆。但是叙埃两国分离后，中国立即同叙利亚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60年代，叙利亚政局动荡不已，政权屡次更迭，叙中两国均保持了正常的友好关系。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叙利亚驻华大使时说："叙利亚是一个富有民族独立意识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建交以后，中叙两国关系很好。我们希望叙利亚的民族独立、民主传统得到巩固，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这有利于反帝事业。不管叙利亚是哪一派政府，我们希望友好关系继续下去。"

60年代，中叙两国领导人相互访问，双方关系不断发展。1965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途经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时，同叙利亚总统委员会主席阿明·哈菲兹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强调亚非国家需要相互支持，重申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外来侵略的立场，感谢叙利亚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努力；阿明·哈菲兹赞赏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的支持。双方都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同年3月，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曾率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中国政府隆重接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代表团，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哈桑会谈。哈桑外长介绍了中东和叙利亚局势。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时谈到，中叙两国都有反帝和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是友好国家，并强调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六·五"战争后，叙利亚执政党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成员、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塔维勒于1967年7月访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会见。在会见中，双方就中东战争和战后中东形势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同意向叙利亚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1969年5月，叙利亚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部队参谋总长穆斯塔法·塔拉斯访华，周总理与他

会见。塔拉斯感谢中国对叙利亚的支持和援助,周恩来总理称赞叙利亚的反帝、反侵略斗争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就每年派团参加大马士革博览会,这表明中国一贯坚持同叙利亚建立全面的、包括经济往来在内的友好关系的立场。

1971年3月,阿萨德担任总统执政后,调整叙利亚内外政策,但阿萨德政府仍然坚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依然坚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贯立场。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叙利亚作为恢复中国在联大合法席位的提案国之一,在促进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中国方面则一如既往地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事业,支持叙利亚的反帝反侵略斗争。特别是在十月战争中,中国坚决站在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一边,支持它们维护国家主权、恢复失地的斗争。但是由于叙利亚与苏联关系的不断密切,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叙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叙中关系跌入低谷。

1967年"六·五"战争中,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战败。为了实现与以色列在军事上的战略平衡,叙利亚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叙利亚从苏联获得大批军事和经济援助,特别是在70年代,苏联势力在埃及遭到驱逐,苏叙关系更加密切,直到1980年10月,叙苏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在这一背景下,叙中双方重要互访明显减少,仅有的两次重要互访是1972年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访华和1978年7月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姬鹏飞访叙。哈达姆访华时,周恩来与之会见,李先念副总理与之会谈。会见与会谈中,哈达姆称赞中国是世界上一支最重要的革命力量。哈达姆介绍了叙利亚当前的任务是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土

地和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周总理感谢叙利亚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重申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斗争的立场。1978年,姬鹏飞访叙时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阿萨德总统接见姬鹏飞副委员长时,高度赞扬中国的上述立场是"高尚"、"有原则性的",并且说中国"没有野心","不追求私利",双方表示重视彼此的友谊。但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双方分歧明显。实际上从1976年6月起,叙利亚就没有派大使来华,至到80年代初。

80年代中期,叙中双方一度较为冷淡的关系开始升温。1985年12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问叙利亚是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吴学谦外长访叙期间受到阿萨德总统的亲切接见,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位常年被中东政治风云困扰的总统居然对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得非常透彻。在交谈中,他谈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谈到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谈到了1979年开始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请吴学谦外长向他介绍中国农村改革的情况。1986年3月,叙利亚复兴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党际友好关系,两国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

进入90年代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双方高层互访日趋频繁。1990年6月,叙利亚副总统、全国进步阵线副主席莫沙拉克访华。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王震副主席分别会见了莫沙拉克一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同莫沙拉克举行会谈,双方分别代表中国政协和叙利亚全国进步阵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全国进步阵线友好合作协议》。1991年5月,乔石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叙

利亚，受到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见。同月，叙利亚成立叙中友好协会，复兴党地区领导机构副书记卡达哈担任会长。1991年7月，中国政府总理李鹏访叙，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叙，叙中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李鹏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受到叙利亚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尊敬的感情。阿萨德总统会见李鹏总理之后，李总理还分别会见了哈达姆副总统和祖阿比总理。双方着重讨论了巩固和加深两国间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双方对发展两国间农业、工业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给予高度重视，重申要履行两国签署的协议等。90年代中期以前，叙方党政领导人多次访问中国。1996年9月，叙利亚人民议会议长卡杜拉率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96届世界议联大会。同年12年，叙利亚政府总理祖阿比正式访华，这是中叙建交以来叙总理首次访问中国。对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国家主席江泽民、人大委员长乔石分别会见了祖阿比总理，李鹏总理与他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祖阿比总理访问中国之后，中叙双方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1997年4月，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访华，5月叙环境国务部长曼杰德、6月叙住房福利部长萨法迪分别率团访华。中方领导人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于同年12月访叙。1998年5月，叙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副总书记艾哈迈尔，同年12月，叙副总统莫沙拉克再度访华。1999年4月，李鹏同志又以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出访叙利亚。至此，叙中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双方关系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90年代初期以来，叙中双方除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等协定之外，还签署了新闻交换和合作协议，中叙1995－

1997年文化合作执行计划,以及1995年至1996年两党合作议定书,中叙两党1998－2000年合作议定书等合作协定,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中东国际关系与叙、中政治合作

叙利亚独立后不久,即面临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和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涉。在长达数10年的阿以冲突及其之后的阿以和平进程中,叙利亚是阿拉伯一方抵抗以色列侵略扩张和促进中东全面和平的重要成员。叙中建交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叙利亚反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干涉叙利亚的立场,声援和支持叙利亚抵抗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并高度评价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0国时,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为中国同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发展政治合作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针。这五项基本原则是: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事实上,在上述五项原则发表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在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时坚持上述原则的基本立场。之后,更是依据上述原则发展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争夺中东当作它争夺世界霸权的

重要目标。1957年1月5日，美国趁英法因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在中东势力进一步削弱之际，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力图取英法而代之。"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中东国家面临"来自共产主义方面的危险"，要求美国国会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中东各国，并向它们提供"援助"。1月10日，叙利亚政府发表声明，批驳所谓势力"真空"的谬论，强调"保持中东的和平和安全纯粹是中东地区人民的责任"。50年代以来，叙利亚奉行反帝、反殖、反对以色列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政策，不参加西方大国策划的政治、军事同盟，特别是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1957年8、9月间在阴谋颠覆叙政府失败后，美国唆使叙利亚邻国土耳其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土耳其在土叙边界集结5万重兵，一场战争一触即发。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叙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美国"正在策动邻近叙利亚的国家在叙利亚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为美国进行直接侵略制造借口，这不仅是对叙利亚的严重挑衅，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中国人民把叙利亚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把叙利亚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叙利亚总统库阿特里表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次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伊斯兰协会、中叙友好协会等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叙利亚人民抵抗侵略的正义斗争，"呼吁一切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人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最大的努力和有效的行动，制止和粉碎美国驱使土耳其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坚决保卫中东

和世界和平”。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和由此引发的叙土边界危机使严峻的中东形势更加动荡不定。在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及其全世界主持正义国家的强烈谴责下，美国和土耳其的行动不得不偃旗息鼓。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叙利亚的全力支持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主持正义的决心和立场，赢得了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信赖，并且加强了中叙两国建交不久后的政治合作关系。从此以后，中国政府依据自己的原则立场，在中东国际问题上与叙利亚保持紧密的政治联系，全力支持和声援叙利亚的正义斗争。

60 年代后，中东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直至 1967 年 6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五”战争爆发。60 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军事对峙不断加剧，两国军队在边界上不断发生冲突。1967 年 5 月 1 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分裂后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根据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出兵赴叙利亚。15 日，埃及增兵西奈半岛。次日，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西奈，并封锁以色列海上重要通道亚喀巴湾。以色列认为这是“一次武装进攻”。6 月 5 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了“六·五”战争。

中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叙利亚以及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一边，从政治上、物质上予以支持和援助。5 月 27 日，中国政府曾发表声明，着重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谴责美国派遣第六舰队进入东地中海炫耀武力。战争爆发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分别致电埃及总统和叙利亚总统委员会主席，表示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支持。6 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阿联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正义战争”。与此同时，北京 100 万群众连续 3 天游行示威，支持埃及、叙利亚

等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中国向叙利亚及埃及等各提供一笔紧急援助。

"六·五"战争持续时间虽然不到一周,但是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叙利亚不仅在军事上损失惨重,而且失去了固有领土和战略要地戈兰高地。为了收复失地和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埃及和叙利亚经过周密准备,在1973年10月6日从两线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进攻,打响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或称"十月战争")。10月8号,中国外长姬鹏飞会见叙利亚、埃及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11日,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叙、埃驻华大使,请他们向两国总统转交中国领导人的支持电,并通知他们,中国决定提供应急现汇和粮食援助。支持电称,"你们为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已赢得了并将继续赢得整个第三世界以及一切主持正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同你们站在一起"。叙、埃和巴解领导人对中国的支援多次表示感谢。

"十月战争"后,埃及政府逐步与以色列实现单独媾和。叙利亚与巴解组织等国家和组织组成"拒绝阵线",阿拉伯抗以阵营发生严重分裂。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灵活务实和决不干涉的态度。对埃及的行动,中国政府表示理解,认为萨达特总统的"耶路撒冷之行"开辟了埃以直接谈判的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在同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反对埃以单独媾和的阿拉伯国家交往中,不失时机地推动它们之间的团结。但是叙利亚政府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一贯坚持强硬立场,尤其是"六·五"战争后以及阿萨德总统执政后,叙利亚政府的立场更趋强硬。这与中国政府理解埃及与以色列进行和平

谈判的立场有较大出入。也正是由于这种分歧的存在,影响了中叙两国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的政治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叙政治关系冷淡的因素之一。80年代中期后,中叙关系逐渐升温,加之中东时局的变化,双方对阿以冲突和中东平进程的观点逐步接近,相似甚至相同的观点逐步增多,为中叙两国政治合作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1991年7月,李鹏总理访叙时,双方除讨论并签署经济贸易等协定之外,双方还就广泛的国际政治问题、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和阿以争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达成许多共识。在回顾了中东的严峻形势之后双方宣布:支持实现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努力,这种解决应该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法准则基础上,通过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形式加以实现。双方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及有关方面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90年代初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后,随着中叙两国及两党关系的加强和巩固,中叙两国政府在中东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在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看法上相近相似甚至相同点进一步增多,使中叙两国在中东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合作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叙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利害分歧,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同叙利亚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中国政府全面支持叙利亚在中东国际事务中的正义立场的同时,叙利亚政府也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给予有力的支持。叙利亚作为阿拉伯世界第二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新中国在建国之初打开外交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叙利亚自从与中国建交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的立场。

叙利亚是联合国第26届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参加国之一,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国际场合叙利亚与中国相互支持、密切配合。90年代初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屡次提出反华提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配合下,中国屡次挫败反华提案。叙利亚对中国的严正立场给予一贯的支持。叙利亚政府对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1991年李鹏总理访叙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认为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强调如果不能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果不能减轻第三世界日益严重的债务负担,任何一种建立新秩序的尝试都是有缺陷的。

叙、中经贸文化交流

叙利亚和中国在经济、贸易、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友好的合作。在叙中两国建交之前的1955年,双方就曾签订贸易协定。1963年2月,叙中双方签订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叙利亚提供7000万瑞士法郎的无息贷款,用于购买成套设备。此后两国先后又签署或续签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文化协定、航空以及水利合作协定等。1969年,中国方面在叙利亚开始援建第一个工程项目——叙利亚哈马纺纱厂,此后其他援建和合作工程包括大马士革体育馆、德尔祖尔纺织厂、印德利布纺织厂、哈布尔水利工程及水电站和费依哈体育维修工程等。此外,应叙方要求,中国还向叙利亚提供过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

1963年至1983年7月,双方贸易实行记账贸易。贸易额总

体上呈上升趋势。1970年,叙中贸易总额为2189万美元,其中叙利亚出口额为1315万美元,中国出口额为874万美元。1978年,叙中贸易达到7319万美元,其中叙利亚出口额为3298万美元,中国出口总额为4021万美元。进入90年代后,叙中经济等交流不断加强。1995年5月,首届叙利亚中国经贸混合委员会会议在大马士革举行。叙中双方讨论了两国政府积极推动两国企业间合作和交流、鼓励两国企业投资办厂、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等问题。在此前的1991年李鹏总理访叙和此后的1997年祖阿比总理访华过程中,叙中双方签订多项经济、技术及贸易合作协定,进一步推动了叙中之间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其中主要成果之一是,1995年7月叙中汽车制造公司在叙利亚塔尔图斯自由区建设汽车厂。叙中汽车制造公司总投资为1650万美元,中方股份为31%,其余部分为叙方所有,日本三菱公司负责生产的全部技术指导,60%的汽车制造工艺在叙利亚完成。初级阶段生产1000至2000辆面包车和卡车。这一期间,中叙双边贸易额逐年增加,1991年为0.79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0.75亿美元,进口400万美元。1993年为1.223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21亿美元,进口200万美元。199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1亿美元,中国出口1.69亿美元,进口197万美元。1995年双边贸易有所下降,为1.57亿美元。1998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又达到1.7547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为1.74亿美元,进口147万美元。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粮油食品、纺织品、轻工产品、五金矿产、机械设备,化工医药等。为了改善双方贸易不平衡现象,中叙双方经研究扩大了中国向叙利亚进口石油、石化制品以及大麦等。

叙中双方在文化及教育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和交流。

1956年双方建交后，首先签订的协定是文化合作协定，1965年又再度续签。1966年4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叙利亚，受到叙国家元首、总理和教育、文化部长的接见，随团文艺小组演出受到叙利亚观众热烈欢迎。同年6月，中国穆斯林代表团访叙，同样受到隆重接待。代表团参加了叙利亚穆斯林宗教仪式。在教育合作方面，主要是双方互派留学生和派遣学者开展学术研修活动。自1963年首度接受中国留学生后，虽然在"文革"期间一度中断，叙利亚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中主要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之一。部分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成为中国阿拉伯语和研究阿拉伯文化、文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有些人在外交界崭露头角，并担任了驻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大使等职务。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叙中各方面合作的加强，叙中双方的文化、教育交流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黎巴嫩与中国关系

黎巴嫩于1943年11月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于1950年同它建立了贸易联系。黎巴嫩奉行亲西方政策，但1955年卡拉米内阁对中国表示友好，主动要求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中国考虑通过商务往来争取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遂于1955年12月与黎巴嫩签订了贸易协定，并在黎巴嫩设立商务代表处。但是由于黎巴嫩政局变化，黎政府在夏蒙总统和其他亲美势力影响下，接受美国建议，发展同台湾的关系。1957年4月，黎巴嫩同台湾签订了贸易协定，并将"公使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同年，黎巴嫩在联合国表决美国关于不考虑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提案时投了赞成票。为此，中国于同年12月撤回中国驻黎巴嫩商务正、副代表。又经过两年的观察后，于1960年撤回代表处全体人员。尽管

如此,中国继续支持黎巴嫩人民的反帝斗争,中黎两国民间友好人士来往和贸易一直未有中断。例如,《黎巴嫩晚报》社长马什努克、社会进步党主席卡·琼布拉特等知名人士访华络绎不绝。70年代初,国际社会出现同中国建交的高潮,黎巴嫩以及约旦、科威特、阿曼、利比亚等国先后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黎巴嫩政府表示愿与中国建交,要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当1971年黎方提出建交问题时,双方顺利达成协议。1971年11月9日,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台湾驻黎"大使"撤离贝鲁特。建交后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顺利发展。黎巴嫩重视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中的作用,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赞赏中国政府在中东阿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立场;而中国政府则一贯主张黎巴嫩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充分尊重,支持黎巴嫩关于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425决议和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的要求,赞赏和支持黎巴嫩政府和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民族经济等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袭击和入侵行动后,中国红十字会三次向黎巴嫩人民提供物资援助和赠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发表谈话,对黎巴嫩内战的发展表示关注,呼吁黎各方停止军事行动,配合阿拉伯三方委员会的调解努力,实现黎巴嫩内战的全面和平解决。1990年3月,应赫拉维总统夫人的呼吁,中国红十字会又向黎巴嫩提供价值5万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帮助难民安置工作。同年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黎巴嫩政府为实现民族和解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希望黎巴嫩冲突各方以《塔伊夫协议》为基础进行政治协商,早日实现民族和解、安宁与稳定。1992年5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访黎;1993年4月,黎外长布维兹访华,实现了黎巴嫩民族和解后两国部长级第一次互访。1992年11月,双方签订了中黎文化合作协定。同年12月1日,黎总理哈利里会见中国大使时表示,黎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增加黎、中两国高级官员互访,欢迎中国参与黎的重建工作。黎巴嫩内战结束后,两国经济关系也得到发展,两国间的贸易额已由1989年的不足2000万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057亿美元。1998年,中黎贸易总额为1.48亿美元,主要是中国向黎出口商品。中国进口仅为25万美元。

90年代初期以后,双边官方来往逐渐增多、双边关系进一步加强。1993年3月26日,黎巴嫩中国友好协会在贝鲁特成立。4月,黎外交和侨务部长法雷·布维兹访华。9月,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巴嫩提供3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10月,黎巴嫩前总理索勒赫访华。11月和1994年8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办的中国贸易展览会两度在黎首都贝鲁特举行。1995年6月,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黎,会见了黎总理哈利里。1996年6月5日,黎总统赫拉维、议长贝里和总理哈利里在贝鲁特会见了以中国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徐大有为团长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同年6月13日至16日,黎巴嫩总理哈利里访华,这是中黎建交以来第一位访华的黎巴嫩总理。1997年12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黎巴嫩。不断增多的双方高层互访,加深了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和了解,为进一步发展双方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主要参考书目

一、英文参考书目

1. Alasdair Drysdale and Raymond A. Hinnebush, *Syria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New York, 1991.
2. B. Tibi,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qairy*, London, 1981.
3. David Roberts, *The Ba'th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yria*,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7.
4. Derek Hopwood, *Syria* 1945－1986: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89.
5. Eberhard kienle, *Ba'th V Ba'th － The Conflict Between Syria and Iraq* 1968－1989, London, New York, 1990.
6. Eberhard kienle, *Contemporary Syria*,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4.
7. E. R. Norton and M. H. Greenber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PLO*,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8. 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3,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9. John F. Devlin, *Syria － Modern State in an Ancient Land*, London, 1983.
10. Kamel S. Abu Jaber, *The Arab Ba'th Socialist Party － History,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11.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9.
12.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Unir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3. Philip K. Hitti, *Syria: 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59.
14. Philip K. Hitti, *A Short History of Lebano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65.
15.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Syria*, London, 1951.
16. Robert Olson, *The Ba'th and Syria*, Priceton, 1982.
17. S. G. Haim, *Arab Nationalism: An Anthology*, Berkeley Calif. and Los Angeles, 1976.
18. Stephen Hemsley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 Tabitha Petran, *Syria*, London, 1972.
20. Volker Perth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 London, New York, 1997.

二、中文参考书目

1. 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二、三、四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3. (日)田口富久治等著,耿小曼译:《当代世界政治体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版。
4. 季国兴、陈和丰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5. 刘竞主编:《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6. 刘竞、张士智、朱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7. (叙)伊萨特·阿尔-努斯等著,马肇椿译:《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年版。
8. 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9. 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10.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11. 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 年版。

12. 肖宪、左文华主编:《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版。
13. 张俊彦主编:《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14. (苏)阿·耶·别里亚也夫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部译:《现代叙利亚》,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版。
15.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16. 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第 2 版。
1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18.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9. 海伦·德斯福瑟丝、雅克·莱维斯克:《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20. 钱乘旦等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1. 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年版。
2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
23. 董友忱主编:《万国博览·亚洲卷》,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24.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5.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26.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与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27.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8.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修订本。
29. 彭树智主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30.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

编 后 记

一

“文明交往论”对于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意义，在于它重视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于它关注这种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中所达到的程度与发挥的作用。

我在《中东国家通史》的《卷首叙意》中，已明确了这一点，并把它作为全书的主旨肯定下来。在编完《中东国家通史》的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黎巴嫩共7卷之后，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明交往的上述意义的认识。

中东地区上述7国的通史给我的启发是：

第一，文明交往的作用，最重要的内在精神，在于对不同文明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发彼此的创造力上，在于促进、激励不同文明之间吸收对方经验、调整自身和充实生命活力上；

第二，像整个人类文明史一样，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也贯穿于全部中东文明史之中，即使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也不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绝对闭塞状态；

第三，文明交往的原动力，是它的开放性、主动性和自主性，具

有这些特性的文明,在地理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会更积极利用邻近文明接触的机遇,开展多样化的交往形式,吸收其他文明以丰富自己,并且传播自己文明;

第四,文明的本土因素在交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失去本土因素即失去文明主体,以本土文明因素为基线而吸收外来文明,是内部和外部交往平衡状态得以保持的前提条件。

这里,根据叙利亚(泛义上的叙利亚地区)的文明交往史,除了以上共同点之外,还有三点需要加以特别强调:

第一,商贸交往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在卷首叙意中已经提到。商贸交往是地区之间物质交往的重要途径,在叙利亚地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的环海和沿草原与欧亚大陆地带的贸易,已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文明交往。以中东最早的两个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而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是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方面是,在今黎巴嫩有埃及商人需要的木材。通过这种商贸交往,埃及人了解并学习苏美尔文明,促使其在本土发展起来的有独特性的埃及古文明,以灿烂的光辉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

第二,文明交往的互动性规律,在叙利亚地区有许多具体的实例表现。例如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影响,持续了相当长时期,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使之减弱,反而使之愈加强烈。早在亚历山大的400年前,即公元前8世纪,叙利亚文明就向希腊文明传送了腓尼基字母。这种文明交往中送去主义的影响,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此外,公元前7世纪,叙利亚文明又把腓尼基、阿卡德和埃及相融汇的艺术风格传送给希腊文明。

公元前 4 世纪,叙利亚文明又把斯多葛哲学的伦理和宇宙观传送给希腊文明。众所周知,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腓尼基人城邦基提翁的公民。同样,也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文明也传往叙利亚地区。W.F.奥尔布莱特在 1957 年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一书中指出,到公元前 5 世纪,希腊的陶器等物品和艺术品已输入叙利亚地区,而且到公元前 4 世纪该地区已经采用了雅典的货币制度。该书还特别提到,波斯的总督们、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当地统治者、朱迪亚的犹太人自治国教长们,甚至包括叙利亚世界另一端的南阿拉伯人,都在铸造雅典的硬币。

第三,叙利亚地区文明交往过程中的文明分解转化环节,延续了叙利亚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断层,从而衍生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由于希腊文明在叙利亚地区长期渗透的历史背景,为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叙利亚文明迅速屈服于希腊文明创造了条件。但叙利亚文明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它的销声匿迹、荡然无存。叙利亚文明在败于希腊文明之后,通过一种文明分解的微妙过程之后,与希腊文明进行长期融合,把胜利者变成了自己文明的俘虏。这种分解出的叙利亚文明因素和希腊文明因素一起综合而成的"叙利亚一希腊文明模式",是一个矛盾对立的混合体。它使叙利亚文明核心的犹太教分化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相互对立的文明,并使希腊世界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失去自身文明特质而解体了。希腊文明在同叙利亚文明交往中,最终结果是自己的解体。这和我们后来看到的 16 世纪迄今的西方文明强势地位不同,希腊文明与同时代文明这次重要接触反而泯灭了自身。这种反差曾激起了汤因比的历史好奇心:"过去是那样,现在怎么会是这样?""世

界与西方接触的故事将来是否会重复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文明接触所经历的过程呢？一个新的‘文化混杂区’是否会养育新的宗教，并会有新的文明接踵而来呢?”他因此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关于自愿协商联合的未来世界设想，以抑止西方文明的“破坏倾向”。

二

编审完《中东国家通史》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以后，在我的研究中东的视野中，出现了两个互相区别、互相联系的东西方文明交往汇聚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第一个是我在《中东国家通史》的《阿富汗卷》中已经描述过的、以阿富汗地区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第二个是以叙利亚地区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在世界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创造力的中心，而叙利亚和阿富汗地区又是中东地区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文明，犹如从四面八方驶来的车辆，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声势，纷纷纳入中东的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两个地区的文明交往序列之中，经过冲突和融合之后，又向邻近地区扩散而去。时代毁灭的巨轮，给这两个地区古代文明留下的遗迹，因为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而显示出了各自在文明交往中经常影响世界文明，并在接触和联系方面受着外来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去重述阿富汗地区“文明十字路口”的文明交往详细情况。我只想着重论述叙利亚地区“文明十字路口”交往之

路。但在此之前,为了比较起见,先简要概括阿富汗地区"文明十字路口"的主要特点。

阿富汗地区是中东东部一个文明交往中心区,它连接中亚、东亚和南亚,并与西亚的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辐射区相毗邻。它的最突出的特点,首先是文明交往的多样性。它是一个东西方各种文明接触的汇聚点和扩散地。欧亚大陆、游牧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贵霜文明、叙利亚文明、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等等文明之光,先后在这里相互辉映、交聚闪烁,又先后从这里四散扩张,迸发出令人目眩的多彩文明交往景观。其次,在这些文明中,欧亚大陆游牧文明对这一地区影响最为深远。早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欧亚游牧部落便越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进入阿富汗地区,虽历经多个世纪历史变迁和文明渗透,游牧民族的文明因素因地理环境而始终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人们观察这里的社会,仍然不能不关注它的部族作用。再次,这里又是邻近各大帝国争夺的政治舞台。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塞琉古帝国、大夏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帖木尔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英印帝国,如历史上走马灯般的侵略干预,以至于左右这里的政局。外国的作用,成为内部政局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内外交往的态势,使小国阿富汗处于夹缝生存空间之中。

总之,各种文明和帝国政治的历史交往,游牧民族的社会遗存,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给予阿富汗地区的影响,都同它所处的"文明十字路口"的内外交往息息相关。从古文明的交往中心区(巴尔赫、赫拉特、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向周围辐射的地理交通图,可以看清楚交往的状况。这个"文明十字路口"北部由巴尔赫经铁门关、撒马尔汗通向伏尔加河流域,西北通向马尔古斯(亚历山大

里亚马尔吉亚纳、梅尔夫)。正西由喀布尔经赫拉特经由里海通向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经由哈兹尼、坎大哈通向普罗弗萨西亚以至哈马丹、巴比伦和波斯湾。南部由坎大哈通向印度河三角洲,东南经由开伯尔山口通向恒河流域。东北由巴尔赫和卡皮萨通向中国,这是一条从长安到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丝绸大道,它像一条文明纽带把阿富汗和叙利亚两个"文明十字路口"连接起来。

同阿富汗"文明十字路口"地区相比较,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地区的同异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像阿富汗地区一样,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是就其历史地理上的广义而言,其地域并不限于今日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疆域。阿富汗地区指乌浒河、药杀水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地区。叙利亚则比阿富汗更为广泛,它包括了北阿拉伯草原、地中海东岸、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南坡,其中心是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带"。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它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土耳其南部的伊斯坎德伦(叙利亚称之为亚历山大勒塔)。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有三条交通路线通向阿富汗地区,其终点都是印度。第一条由坦弗里克经过西幼发拉底河通向里海、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印度。第二条由尼西比斯通向里海、波斯湾和印度。第三条分别由阿勒颇经尼斯福里姆和由帕尔米拉通向波斯湾和印度。这三条路线实际上是西亚古文明和中亚、南亚古文明的连接线,它也延伸到中华文明地区。

第二,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交通线与阿富汗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面向欧洲和非洲的交往方向。叙利亚有三条交通线通向

欧洲。它的西北部有两条分别由塞巴斯蒂亚、凯撒里亚巴扎和奇里乞亚山口通向爱琴海、海峡和欧洲。它的正西部从安条克和加沙经过地中海而通向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而达到欧洲。这三条环海路线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构成了叙利亚文明交往环岛区域的主要特点。这是区别于阿富汗内陆文明交往的相异点。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使叙利亚文明具有接触西方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并且相互影响的直接有利条件。这种外部和内部的文明交往对叙利亚的影响特别深远,包括黎巴嫩在内,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宗教文化状况,有别于其他中东国家的缘由,都要追溯到历史地理上的"文明十字路口"。

第三,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的西南路线和南部路线的交通状况,也相当重要。西南方向由加沙通向北非尼罗河流域的交通线,把中东两个古老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联系在一起,这种交往的后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南方的两条路线,有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方向是由耶路撒冷、加沙、佩特拉、马安通向麦地那、麦加和也门;另一个方向是由大马士革、马安、埃拉特通向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前者把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同伊斯兰教的圣地直接联系起来,这对叙利亚在阿拉伯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创造了优越条件。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6世纪这9个世纪中,叙利亚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中世纪的先进文化一部分。它在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地位超过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后者则表现了叙利亚环海地区的开放性,在红海地区尤其发挥着传播文明的作用。

上述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的交通路线,反映了密集于新月

地带多种文明的交往特点。在上古时期,它处于两个古老文明之间,一个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另一个是埃及文明。向它挑战的既有来自北方的小亚细亚文明,还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游牧文明和来自地中海的欧洲文明。它是传播者,又是应战者。它吸取了阿卡德、埃及、爱琴海和赫梯文明的因素,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古代叙利亚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三大贡献:发明了字母拼音的文字体系、创造了一神教、对西地中海和北非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探险和移民,在航海距离上超过了有史记载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

叙利亚地区文明在政治方面同阿富汗地区颇为类似,它长期处于帝国争夺的分裂状态。早在公元前3000年,叙利亚北部和南部就被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兴起的王国所占领。公元前2000年后半期,埃及和赫梯瓜分了叙利亚。从公元前8世纪起,叙利亚先后被许多帝国、王国和公国占领或瓜分,其中有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阿赫明尼德帝国、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法蒂玛哈里发国家、东罗马帝国、十字军建立的各公国、伊斯兰邻国、奥斯曼帝国、直到法国和英国。文明十字路口的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变迁,表明了它的文明交往活动在中东史上的重要作用。在文化上富于创造性,而在政治上却是分裂状态,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希腊也有相同之处。但是,叙利亚地区毕竟是塞琉古王国和伍麦叶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这方面不仅有别于希腊,也与阿富汗地区不同。总起来说,叙利亚的政治变迁比阿富汗更为剧烈。

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交往汇聚区的最突出之点,在于它是世界性宗教文明的发源地、融合地和扩散地。阿富汗地区也有这

个特点，它是祆教的发源地和扩散地。祆教后日成为萨珊朝波斯国教并由阿富汗东传至中亚和中国。阿富汗也是佛教的传播中介区，中亚、东亚地区佛教的传播，也主要是通过阿富汗。但是，叙利亚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它创造了一神教，这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文明的伟大成就。这种对上帝的特殊观念，既与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印度和希腊宗教思想和情感相通，也与犹太教、祆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同。从宗教意义上，犹太教代表着古代叙利亚文明。希伯来人创造的犹太教，在公元前 2 世纪已经吸取了祆教的上帝灵魂和最后审判的因素，也就是在那时它与希腊文明在叙利亚科埃莱山区发生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基督教文明来源于叙利亚文明，它是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融合体基础上交往的产物。基督教最初是作为法利赛人的犹太变种在加利利出现，然后在安条克形成为新宗教而由此传遍希腊世界的。叙利亚文明因素和希腊因素，同样在伊斯兰教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反对基督教偏离犹太教一神论的希腊化倾向，但并没有回到犹太教严格的反希腊传统。相反，希腊哲学和科学逐渐变成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因此，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叙利亚和希腊因素在叙利亚“文明交往十字路口”汇聚交融的产物。

历史上叙利亚地区经过多次的政治、宗教和民族的历史变迁，至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联系，其中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现代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国家了。正是考虑到这种从古到今的连续性联系，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中，把这两个关系密切的毗邻而居的国家，放在一卷之中，命名为《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三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多元社会，是历史上长期文明交往的结果。不但是古代的“文明十字路口”深远影响，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文明交往的结果。

奥斯曼帝国4个世纪的统治，法国20多年的殖民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演变，导致这两个国家在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性质。它们既以同西方文明交往密切而著称，又以民族、宗教和语言多元社会的特征而置身于阿拉伯国家的群体之中。这两个国家都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同时都存在着其他众多的民族。这两个国家居民的大多数都信仰伊斯兰教，但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当今叙利亚约有14%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这在阿拉伯国家中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在黎巴嫩更为突出，从前，基督教徒已超过全国居民的50%，穆斯林一度只占37%，其他教派占11%。现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仍占46%，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尤为独特的，是它的教派林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属17个不同派别。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治，出现了教派政治和“政治教派体制”。当代阿萨德家族与阿拉威教派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两任总统的连续性确保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地位。尽管在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叙利亚拥有200万的阿拉威派仅占人口约11%，但阿萨德家族“政治之狮”仍然加强了统治力量。

除了宗教、血统的多元性以外，这两国在语言上既都以阿拉伯语为国语，同时又广泛地使用法语和英语。

叙利亚和黎巴嫩至今仍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变革地位上，正像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东西方文明汇聚地位一样。以叙利亚为例，可以窥见在不同时代中这种文明交往的传承与变动的轨迹。2000年7月17日，巴沙尔·阿萨德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能把别人的民主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具备特别适合我们的民主经验。这种经验来自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它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适应我们现实的需要。”叙利亚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它面临的是一场提升内部文明交往程度和外部文明交往程度的重大抉择。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它将更加开放，着力于解决经济弊病、政治体制和社会诸多问题，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要解决与以色列、土耳其、美国等国关系问题，从而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叙利亚需要一代着眼于世界并具有现代素质的年轻人，而现在1600多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将在21世纪中重演历史上“文明十字路口”辉煌角色，使叙利亚进入一个文明化的新时代。

然而，面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诸多现实问题，重视事物来龙去脉和源流关系的历史学者，总愿意把现实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拔刀断水水复流的不可绝对加以分割的关系，用不同文明和内外文明交往的联系性和综合性进行思考这三者的关系，是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中东国家通史的编纂，对我说来，就是把整体性、联系性和综合性三个关键因素贯通起来，使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明交往链条。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已经凝固、正在凝固和尚未凝固的3个层次的历史。已经凝固的历史是远古、中古和近现代史。正在凝固的历史是当代史。

尚未凝固的历史,就是现实问题和现况。这三个层次是一个互相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统一过程。历史学者的任务,是从第三层次的现实问题和现状出发,追溯和反思第二和第三个层次,然后再从这个历史高度来审视和观察现实问题和现状,并且思考和关照未来。

这种整体史观,对于现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赋予相对稳定的性质;对于历史研究成果赋予延续发展的性质;对于历史具有现实感和对于现实具有历史感。历史和现实问题,在通古今之变中都便于理解了,在究天人之际中都易于领悟了。当然,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的规律,对于一个时代的人的有限智力来说,确实困难重重,甚至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徒劳的。历史学是基于理解自然界、社会界和人们内心世界的分析科学。如果一个历史学者力求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更广阔的联系,关注普遍历史过程的综合和分析,他至少是在探求规律方面迈进了一步,虽然他不能奢望自己会发现社会规律,这如同自然科学家会发现物质的根本性质一样艰难。

整体史观最直接体现在通史上,大者为全球通史、地区通史、国家通史,以及专题通史,然其中心线索在于现实和历史的贯通。在我看来,贯通然后才有整体。若要贯通,需要有通识、综合和比较三个相互连贯和反复酝酿的过程。通识是贯通于各种专门史之中的史学理论。比较是把握同与异、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方法。综合如范文澜所说:“局部性的研究愈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这是研究通史的经验之谈。研究历史有各种角度和分类,无论是在通识、综合和比较方面,用联系和影响的观点

观察人类文明交往关系，都可以达到通史的整体性目标。

20世纪国际史学界取得了许多突出成果，但最突出的当推对通史的认识、研究和撰述上。全球的、世界的、地区的和国别的通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总脉胳、揭示不同文明的内涵及其内外交往，从而审视其相互影响和作用。例如仅见的中译本《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伊萨特·阿尔—努斯等著、马肇春译，三联书店1958、1974年版）的序言中就指出，文明是"很多民族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和进步，在人类文化的各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积累起来的人类共同遗产"。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先民"善于选取他们所接触和联系的许多民族文化精华，在各个世纪中保持了文明的稳步发展"。这里要特别提到美籍黎巴嫩裔学者菲力普·K.希提，他对通史的贡献，是在《阿拉伯通史》、《叙利亚史》和《黎巴嫩简史》以及《近东史》等一系列著作中，把地区和国别通史的通识、综合、全局和局部融为一体。读希提的著作，使人想起了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以纪伯伦为代表的"侨民文学"。希提在阿拉伯、叙利亚和黎巴嫩史的卓越成就，反映了不同文明的交往，堪称为黎巴嫩"侨民史学"的代表人物。我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正是继续许多前人的工作，以人类文明交往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理论为线索，为通史研究提供一个历史个案。

曾著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德国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862－1954年）的通史观点值得一提。他把历史研究看作是对不同时代人们的斗争、希望、恐惧、挫折和成就的一种富于理解性的参与。他确信，历史学家只有经由当今之门，才能进入往昔之地，也就是只有关注当今现实，才能强烈意识到什么真正重要、什么是历史上需要把握的东西。任何采取别种做法的人，任何以

蛀书虫心志习惯埋头于历史资料的人，都将无法同已逝年代里活生生的力量建立真正的联系，都无法把握古往今来极为本质的东西。他把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讲透了。这是研究现实学者的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关注现实的优势，从而追溯历史，反思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那就更完美了。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当代事态的未来结果又是为难以预见的不可知数所困扰。历史科学依靠知识积累和依靠对先前的解释的再解释中向前发展。学术史告诉我们，当代史著作无论达到什么高度，都只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一种参考文献而已。

彭树智

2001年12月31日于悠得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作者="彭树智主编，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2003"
页数=434
SS号=11074867
出版日期=2003